

序言——王玉哲

土地这种自然物自从与人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以后，才具备了社会意义，土地变成提供给人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料的源泉。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最初是通过群体而不是单个人孤立地进行的。人类在开发和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的时候，群体与群体之间、或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便发生了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它包括诸如对土地的占有、使用、领有、私有、买卖、转让等等关系。概括之，这就是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和主要内容。

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疑难问题最多的是前一部分，尤以两周的土地制度为最。所以，要想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必以此为突破口，难关打通，其它就易于进行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两周土地制度新论》，是袁林同志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论文。书中对两周的土地制度，比较全面、系统地作了剖析，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为指导，同时吸取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参照了我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资料，对两周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诸如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对金文中出现的“田”、“贮田”的理解、对孟子“井田论”的源流、“使黔首自实田”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出了新的、独到的分析和研究。

下面我们可以略举几个具体例证：

第一：作者在论述西周土地制度时，以少数民族西双版纳傣族与西周的土地剥削情况互相印证，而得出西周的剥削关系的特点是“集团整体剥削关系”，这是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大家都承认的农民集体进行的，这些直接劳动者的被剥削，自然也就以集团形式出现。把集体被剥削作为西周土地制度的一个特点明确地提出来，好像是本书作者为第一人。

第二，在论述春秋晋的“爰田”与战国时秦的“辕田”的历史作用时，把爰田（辕田）与开阡陌、牛耕、铁耕联系在一起考虑，就可以看出爰田（辕田）实是一种农业技术伟大的革命，这就更能体现

出了其历史作用了。作者又把辕田的“辕”字联系到“车辕”、“犁辕”等名称上，去看辕田（爰田）辕（爰）的命名，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第三，本书曾将《孟子》的“井田论”与战国时的“授田制”作了比较研究，对孟子井田论的剖析很有启发性。他把孟子说的井田，指出哪点是西周当时确实有的，哪点不是西周的而是依据战国的现实情况附会到西周的，令读者一目了然。孟子所说的西周的井田，确实有不少是孟子的理想、虚构的部分。作者分析的有些地方有理有据，完全可以信赖。

除了上面所举的这三处之外，还有一些独到的提法和见解：如对土地所有制的“所有”、“占有”、“使用”的理论分析，对公有制与私有制互相对立与互相补充的分析，又如对战国时国家授田制的普遍的论定，对“使黔首自实田”的新解等等，都有一些精彩、可取的见解，读者读后自会领会，我这里就不多介绍了。并且，从全书写作总的思路上看，作者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力的作用，生产力逐渐提高，自然就使土地制度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因而我愿意向读者提出推荐。

至于我所认为袁林的这些好的论点，与我自己的观点也未必完全相合或一致，这点也有向读者说明的必要。比如本书作者把孟子所说的西周的井田制几乎全部否定了，我就觉得是否说得有些过份？因为作者并不否认西周存在有公田、私田之分，其实这也就是井田制的基本内容。作者只强调战国授田制出现后，才有孟子的井田论，那么，西周公田、私田中的“私田”不是授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否认西周有“授田”的内容，那战国时的授田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恐怕也难说得通。再有，就是作者对战国时实行的国家授田制看成是当时唯一的田制，那就把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史给掩盖住了。于是，对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尤其在见到《云梦秦简》、《青川秦牍》中，只有“授田”的记录，而没有土地买卖的明确记载，于是便断言“秦国的土地私有权尚不存在”。对这种极端的看法，我也难以同意。1995年我曾发表过一篇东西，就已明确地说过，战国时期各国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国有制与地主私有制同时并存，随

时代的推移，土地私有制逐渐超过或压倒了国有制。我认为董仲舒说的关于土地买卖的史实，夸大则有之，说他完全是撒谎则未必。这种看法至今我仍未变。总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化是当时经济史上重要的一线，若视而不见，就无法说明：何以秦时还是土地国有制的天下，一到西汉一下子土地私有便普遍于全国，太突然了，这是叫读者难以理解的。

袁林同志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曾把我的不同看法直接向他提出过，不过我又几次明确地向他表示：在学术观点上我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问题，只有在不同意见互相驳辩中，学术才能有发展，才能有创造、发明，若只有师说传授，代代相因，学术哪会有发展的前途呢？不同意见的提出，仅仅是作为对方参考而已，告诉他要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绝对不要轻易改变，而是要把自己的论点，更深入地补充更多的证据，使自己的说法完善起来。当然若发现自己的论点确实有硬伤，也应当及时的修改。这种指导思想我是一贯坚持的。

最后，从总的方面看，袁林同志这部《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确实作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写成的。其中，凡所论列，可以看出，他确实提出了新问题，探索到新领域，作出很大贡献。有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发挥，使之更深化、更具备说服力；有的则是自出机杼，体现自己的新创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构成一家之言。这些都可以反映本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本书就要出版了，作者希望我说几句话，因时间仓促，对古代土地制度问题不暇详论，乃拉杂书此以为序可乎！

王玉哲

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南开大学寓所

英文提要

ABSTRACTS

Since the 1930s a good deal of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by scholars to China's land-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which is obviously a quite important question for discussion in the study of the Pre-Qin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the very question has been restudied by the author of this dissertation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nd a series of new conclusions has been reached consequently.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uthor approached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problems relating to that question and, by analyzing concretely the essence and origin of the systems of ownership, pointed out that the systems of ownership sh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but not the contrary. The author also pointed out that while the theory of five social formations, which bears considerable defects, does not coincide with the theory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t all,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cial formations should be multi-stratified and multi-lineal. The author held that the traditional problem of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hould be restudied by way of new thinking. The author also believed that the basic feature of the pre-capitalist community is not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but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 with external society as a whole which has its own internal system and is self-adjustable. 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theories, the author made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land-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As a result of this analysis, it appears that the collective mode of exploitation prevailing in the

Western Zhou times determined the then land-system dealing with only the part of cultivated land used to materialize the surplus labour, which was called *tian* (田, land), while the part of cultivated land used by the exploited to materialize their necessary labour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system but was self-controlled and self-adjusted within the exploited group belonging to the pre-capitalist community. It was the fundamental content of economic reforms carried out in various stat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o abolish the intermediate link in the form of community of the exploited. By establishing a system for the state to deliver land, the state extended its controlling power over the exploited direct to their basic unit that were *jia* (家, household). The principal land-system of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was 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which involved major matters of land planning, land relations and agricultural technique. On the basis of his study of the land-system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author reexamined various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so-called *jing-tian* (井田, square-land-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by a comparative method. He believed that the square-land-system described in the book *Zhou-li* (《周礼》, The Rites of Zhou) was nothing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established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chang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and the square-land-system described in the book *Meng-zi* (《孟子》, Mencius) was alike except a kind of servitude form of exploitation mixed in it. Generally speaking, both of the *Zhou-li* system and the *Meng-zi* system do not reflect the land-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collapse of 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of the Warring States type began with

the movement ' for the black heads(the common people) to own their own land ' which was conducted in the 31st year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216 B.C.) and afterwards the ming-tian land-system(名田制 , land-occupation-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ough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had been developed fully since the Emperor Ai of the Han(6-1 B.C.), 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didn't disappeared completely. Instead, it continued existing in a form of both delivering land to the peasants and restricting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lords'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simultaneously. It revived in the jun-tian land-system(均田制 , land-equalization-system) which came into being in the Northern Wei Period(386-534 A.D.) and it wa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hen ' no land-system was established ' (“ 田制不立 ”) and ' annexing land was not restrained ' (“ 不抑兼并 ”) that the state-deliver-land-system proclaimed its end formally.

内容提要

两周土地制度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30年代以来就为学者所十分关注,本文从新的角度,对其重新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文中首先探讨了与之有关的几个理论问题,指出应从生产关系来解释所有制而不是相反,并具体分析所有制的本质与其起源;指出五种社会形态说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其有重大缺陷,社会形态分类应是多层次和多线的,并提出应从新的思路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指出前资本主义公社的基本特征并非公有制,而是其内部自成系统,自我调节,作为整体与外部社会发生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然后以前述理论探讨为前提,具体分析两周土地制度。认为,西周时期占主导地位集团整体的剥削方式,决定了当时土地制度只涉及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那部分耕地,即“田”,被剥削者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不在其管辖之下,由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的被剥削者集团内部自行控制和调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取消将被剥削者公社作为剥削关系的中间环节,国家对被剥削者的控制直接达于其最基本单位“家”,建立国家授田制度。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度,它包含了土地规划、土地关系、农业技术几方面内容。在战国田制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重新考察了西周“井田”说,认为《周礼》系统的“井田制”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所确立的国家授田制的反映,《孟子》系统的“井田制”相同,只是糅合进了西周的劳役剥削形式,它们都不是西周土地制度的反映。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度的崩溃始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此后名田制建立。土地私有制自汉哀帝时开始有了较充分发展,但国家授田制度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授民以田和限制地主土地私有制过份发展两种形式继续存在,并在北魏开始的均田制中复活,直到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方正式宣告结束。

绪言

一 研究缘起与基本逻辑

两周土地制度是一个老问题，特别是自本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来，随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发展与深入，这一问题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有关论著汗牛充栋，新异观点层出不穷，而且以这些不同观点为基本依据之一，形成了中国古史研究的不同学派。由于上述原因，继续深化两周土地制度研究就显得尤为困难。笔者斗胆进入这一领域，主要由于下述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时至今日，依然可以说，两周土地制度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具有很高价值的重要课题。对于两周史研究来说，把握当时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仍然是其首要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同时把握当时的土地制度。另外，不管研究两周史的哪一领域，对该领域历史事实与过程的描述和解释，都必须以对两周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的理解为基础和前提，而对土地制度的把握又是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重要基础。对于两周以后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要使之成为历史的研究，也必须以两周土地制度作为一个基本的起点，由此方能以后的土地制度得到历史的解释。

第二个原因，是近 20 多年的考古新发现为两周土地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有些资料直接推翻了成说，这就使我们有可能进行一些新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描述和解释。这些资料中比较重要的有：出土于陕西岐山的裘卫诸器，出土于湖北云梦的睡虎地秦简，出土于四川青川的秦《为田律》木牍，出土于山东临沂的银雀山汉简，出土于湖北江陵的张家山汉简等等。

第三个原因，则是文革以后理论研究方面的解放与突破。由于两周土地制度研究与诸多理论问题密切相关，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状况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两周土地制度的研究状况，因此，理论方面的突破对两周土地制度研究至关重要，它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背景、新

的角度和新的方法，从而使之有可能得到新的突破性的成果。

为便于读者了解本文的基本脉落，下面简略叙述一下笔者的思考逻辑。

土地制度自古就是史家的研究对象之一，一般来说，食货类史籍首先要谈到的就是土地制度。但在古代，土地制度仅仅是作为典章制度的一个门类而被研究，并不表现出特殊的意义，即使对史学家和经学家所共同关心的两周土地制度，也是这样。自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土地制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成为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持续了五六十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由于按照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描述，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与基础，它决定了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产品的分配形式。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就总的历史过程而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如果立足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或者说暂时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居于第一重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生产关系整体，也即决定了经济基础，并从而决定了上层建筑，而在中国古代，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土地制度是决定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第一重要因素。这样，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诸对象中，土地制度就像旧戏中的丞相角色一样，他登台的第一句台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史学家们对被认为是西周土地制度的“井田制”予以极大关注，首先肯定其存在，并依据自己的理解予以种种解释。在此基础之上，方对其由来及发展、灭亡过程进行探讨，并据此对当时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作出种种推论。这种思维定势固然是史学发展某个阶段成果的汇总和标志，但同时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对这种思维定势作出某种突破，从而推动史学、特别是两周史研究的发展，使之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笔者的思考逻辑起始于两个点。理论上的起始点是所有制问题。在笔者看来，斯大林对于生产关系的解释与马克思的理论并不一致，不是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相反，是生产关系决定所有制，所有制的

存在与否及其具体存在形式，都必须从生产关系中找到依据和解释。历史事实的起始点则是战国国家授田制度，随着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随着史学研究的进展，这一事实已经为许多学者所承认。从理论上的起点开始，笔者首先对战国国家授田制找到一个基本解释：当时的社会基本剥削关系以国家和农民为两极，国家是剥削者，农民是被剥削者，剥削阶级具体成员的剥削收入来源于国家剥削的二次分配，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国家授田制这种具体的土地制度形式。从战国授田制这一历史事实出发，笔者否定了西周基本土地制度为“井田制”的说法。不论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持何种看法，学者们一般都承认，春秋战国是一个涉及社会结构的大变革时期，经济结构当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既然如此，那么被作为西周基本土地制度的“井田制”理应与战国授田制有根本性的区别。然而，当笔者把两汉及其以前所有论及“井田制”具体内容的资料汇总起来、与战国国家授田制进行比较的时候，却发现二者除了劳役剥削与实物剥削形式的差别而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由此便得到一个结论：《周礼》系统的“井田制”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所确立的国家授田制的反映，《孟子》系统的“井田制”相同，只是糅合进了西周的劳役剥削形式。既然“井田制”不过春秋战国国家授田制的反映，那么西周土地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当然仍须从生产关系入手进行观察。西周时期的被剥削者主要以集团整体（往往是以血族关系为纽带联结而成）的形式出现，这些被剥削者集团就是早期的被剥削者公社，剥削者的剥削仅只达于这个集团整体，并不深入于其中的具体劳动者个人，被剥削者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则由其自我调控。在这种状况下，土地制度由两个层次所组成。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范围只是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土地，即各种类型的“田”。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一端终止于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相应，这一层次的土地制度也终止于此。它并不涉及全部耕地，被剥削者集团自行控制、调节的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不在这一层次土地制度的管辖之下。第二个层次则是被剥削者内部生产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被剥削者集团所控制的土地。它一方面表现为被剥削者集团整体对土地的占有方式，这是各被剥削者集团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

一方面表现为被剥削者集团内部对土地的分配、使用方式，这是被剥削者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这两个层次显然不能同等而语。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土地制度，那么，其基本内容应是土地制度的第一层次，只有当我们的考察深入到被剥削者集团这一极之内部的时候，第二层次的土地制度才成为我们的主要对象。

有了上述关于战国国家授田制、所谓“井田制”和西周土地制度三个点的研究结论，便可以将逆向研究改为正向研究，历史地观察两周土地制度的演变。在笔者看来，西周土地制度是承袭夏商而来，但夏商土地制度并非像人们传统理解的那样，从原始社会的原始公有制演化而来，而是从原始社会的没有所有制的状态演化而来，最早的所有制与最早的剥削同时形成，二者融为一体。由于早期剥削主要是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由于早期对耕地的使用带有较强的变动性，因此当土地开始成为这种剥削关系实现中介的时候，成为中介的土地并非所有耕地，而仅仅是实现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土地，这就是土地制度第一层次所涉及的范围。这种状况，便是西周土地制度形成的历史前提。西周类型土地制度瓦解的明确标志是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而新类型土地制度形成的标志则是齐国管仲的变革。随着被剥削者集团的逐渐瓦解，剥削者失去了控制被剥削者的一个最便利工具——公社，作为社会剥削关系中剥削者一极的国家不得不将统治与剥削深入到被剥削者个人和家庭，在土地管理方面，则不得不同时管理被剥削者实现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土地，两种土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再区分，这样便形成了国家授田制度。这种变革是贯穿于春秋战国时期一系列土地制度变革的基本内容，从管仲一直到商鞅。管仲与后来变革者不同的一点，是他还试图在新形式中将公社复活，按照一定户数为标准，将被剥削者强制编制起来，组成“书社”，但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公社并不能复活，书社与公社性质迥异。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授田制度的确立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导致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活跃、繁荣时期，并最终导致了强盛秦汉帝国的形成。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的瓦解始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自此而后，土地私人所有制开始发展起来，但国家授田制作为一种制度，却并没有自此死亡，而是以两种形式继续存在了下去。一是国家以种

种办法保证农民与相应土地相结合，一是国家以种种措施限制地主占有土地的过份发展，两种形式最终又汇为一体，在北魏开始的均田制中得到了复苏。只是从中唐两税法到宋代“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变革过程中，国家授田制才最后消亡。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4页。）笔者先逆向对两周土地制度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了探讨，然后又正向对两周土地制度演变过程作了研究，这种思考程序对于研究来说是比较方便的，但对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却并不一定合适，因此，本文的叙述完全是正向的，并不直接表现出逆向的研究过程，但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也作一下逆向的考察，观察角度的变化往往会使观察者眼中的事物形象有所变化，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

梁启超说：“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归著于此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笔者不敢说真有什么创获，但是力争按照这一精神进行研究。由于本课题难度较大，涉及面较广，更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理论素养仍欠，知识缺漏甚多，具体错误在所难免，立论能否成立，依然有推敲余地，故若能得识者批评指正，实为笔者万幸。

二 土地制度研究的对象

一个学科或学科的某一个领域要能够成立，明确研究对象是首要基本条件，如果缺乏这一条，不仅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基本研究方法无从谈起，连研究范围也不清楚。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虽然已经经过多年研究，但在研究对象方面，还不够充分明确，需要进一步予以界定。

所谓“制度”，是指一定时期社会要求其成员必须予以遵守的行为准则或办事规程。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就狭义来说，它一般局限于上层建筑范围以内，是指国家的法律、命令等等，而就广义来说，则涉及整个社会，即不仅涉及上层建筑，也涉及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一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往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虽然也涉及了广义的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如关于耕作制度方面的三田制（这属于生产力范畴）、地主与农民的具体关系（这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等等，但一般是狭义看待制度这一概念，研究对象大致局限于国家有关土地的一些法律规定，特别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规定，这样就使研究带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所研究的“制度”应当从广义上来理解，即有关土地的各个方面的制度，一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耕作制度，一是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土地关系，即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通过土地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如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一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其理由如下：一、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是现实土地关系的折光反映，它只有从后者得到最终和根本的解释；二、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与现实的土地关系并非完全一致，其间必然存在差异，有时差异还非常大，我们不能完全用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来描述和解释现实的土地关系；三、土地关系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关系密切，从根本上来说，前者为后者所决定，例如，在实行耨荒制耕作方式时期，生产关系方面的共同体色彩就浓厚得多，而只有铁犁牛耕，才为广泛的个体小农家庭经营奠定了真正的基础，从

而也为封建式的农业租佃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

对于两周土地制度研究来说，笔者以为，如果能从这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就会深化，会发现一些未被注意过的问题，得到一些新的结论。例如，如果我们注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水平巨大发展的巨大变化，耕作制度的巨大变化，那么土地关系以及有关土地法律制度的巨大变化就会很容易理解。自春秋中后期产生并逐渐推广的铁犁牛耕、以铁犁牛耕为基础的我国第一种精耕细作耕作法垄作法的推广实行，是导致共同体瓦解与小农广泛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共同体瓦解、小农的广泛形成又成为国家授田制实行的根本依据，共同体瓦解使国家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只与共同体发生关系，而不需直接接触其中个别成员，现在必须直接与小农发生关系，共同体的模式依然是最便利的，将共同体原有的定期分配耕地的内部关系直接移植过来，主体由共同体变为国家，国家授田制便成为必然。由于上述原因，笔者将尽量从这三方面进行探讨，如果不尽人意，那么一方面是笔者功力水平所限，另一方面就是资料缺乏所限。

三 史实考证与理论研究

史学研究中史实考证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一个旧话题，见仁见智，也理所当然，因为人们的研究范围、课题以及研究兴趣各不相同，不应当也不能强求一致。但是，对史学研究整体来说，这个问题却至关重要，正确而又恰当地处理二者之间关系，对于史学整体的发展水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任何一门科学都由如下几个不同的层次所构成。一是正确地描述对象，一是正确地解释对象，一是指导人们去正确地行动而改造对象。对于后两个层次来说，理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对象的解释，最后结论只能是理论的语言，而要解释，也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研究前提，真正能够正确地指导有目的行动的也只能是一定的理论。即使是描述对象，如果是个别的对象，似乎可以采用文学的语言，进行形象思维，对其予以具体的描述，但是对于较大范围的对象，例如描述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同样只能使用理论的语言，借助理论的工具。如果脱离了理论，使用形象思维，试想如何才能描述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呢？

当然，笔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是有一定针对性的。现在，我们的史学界依然有一种忽视理论的倾向，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史学的具体特点所决定，弄清一个个具体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无论如何总是史学的基本任务；另外则是由于多年来强制以某种错误理解了的理论贯穿于史学，不允许多种理论的讨论和竞争，在相当大程度上窒息了史学的活力，引起了史学家们一定的反感，从而逐渐远离了理论。

笔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抹杀史实考证的重要性，在史学领域，主要的大量的工作依然是史实的考证，没有这个基本的工作，史学就不存在，轻视或放松这个基本的工作，史学就会成为客里空，变成一种宣传的工具，像 20 多年前那样。笔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只是想我们的史学界是否可以通过补充自己相对薄弱的方面——理论方面，主动寻找或创建一定的理论作为工具和武器，同时又使自

己的研究成果——结论更加理论化，从而使史实的考证能跨上一个新的水平，在理论研究和史实考证两方面的互相促进中，推动史学整体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两周土地制度研究表面上看主要是一个史实考证过程，似乎是由于史料的过于缺乏才导致了这一领域许多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史料的缺乏对于历史学科许多研究对象来说都是如此，但它们都没有像两周土地制度研究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种状况产生，主要还是一个理论问题。当马克思主义尚未产生的时候，两周土地制度研究仅仅限于通过现存史料考订当时法律意义上的土地制度，由于历史久远，史料缺乏，因此历代解释包含了许多想当然的东西，自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则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理解，将所有制（实际上一般只是指法律意义上的所有制）看作社会经济关系的决定性的基础，由此产生了许多混乱。因此，在研究两周土地制度时，必须对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清理和研究，将以前被错误理解了的理论纠正过来，以其成果作为基础和工具，重新看待和研究历史事实，这样，才有希望得到更为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

第一章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自 30 年代以来的两周土地制度研究,不仅表现为对于史实本身的研究讨论,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这些问题涉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研究中的重大分歧,可以说都源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所以,两周土地制度研究无法回避有关理论问题,必须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方有可能充分展开对史实本身的研究。本章试图对有关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以作为研究的前提。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所有制问题,社会形态问题,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

第一节 所有制问题

一 所有制与生产关系

自我国史学界有意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时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先入为见的思维定势，学者们对所有制、特别是土地所有制看的极为重要，把它视为社会的基础与核心。它决定了生产关系总体，即决定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也就决定了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然而，什么是所有制？却被视为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从未有历史学家仔细探讨一下这个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当然，哲学家与经济家的探讨也是近年的事。学者们只是含混地使用这一概念，把它理解为人对生产资料的一种控制，理解为国家关于一定的人对一定的生产资料的控制的法律规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问题投入了很大精力去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把握上，却始终停留于原地，不能前进。这种思维定势今天也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成为史学界的主流。究其根源，在于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斯大林的理解和阐述，因此，分析必须先从斯大林的定义开始。

1938年，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著中谈到生产关系时说：“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开始将所有制解释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在谈到历史上的各种具体生产关系时，就更为明确：“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者”；“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者——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8页。）

十几年以后的1952年，斯大林更明确地对生产关系下了一个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页。）。这里更明确地将所有制确定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互相之间的关系、交换、产品分配形式等等都是以所有制为基础和前提。解放以后，这个定义充斥于各种哲学、经济学、史学著作与教材之中，可以说是一统天下，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定义是不是正确呢？是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呢？答案却是否定的。

斯大林这个定义的错误，核心就在于他将所有制脱离于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全过程之外，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并以此来把握、理解、解释整个生产关系，而不是通过生产关系去把握、理解、解释所有制，因果、主次完全被颠倒了。这个思想与蒲鲁东类同，早已为马克思所批驳。马克思说：“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4～325页。）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4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土地所有权为例分析了各种所有权存在的理由，他说：“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历史的暂时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当然，像我们以后会看到的那样，土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马

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702 页。）任何所有权存在的理由，都必须以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存在的生产方式，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加以说明，当条件发生一定变化时，它就可能失去存在依据。具体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总合的表现，只能在后者之中得到解释和把握，如果反过来，那只能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蒲鲁东类型的这个错误必然导致一种误解，即所有制首先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人对一定生产资料的占有，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形成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恩格斯的定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和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6、189 页。）显然，恩格斯所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即生产关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三个方面，其中并不包含一个独立的所有制范畴。

是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决定所有制，表面看似似乎不是特别重大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与迟缓，斯大林定义是主要理论原因。3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艰难，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理论偏差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研究的长期混乱与停滞，史学家受到经济学家的批评便在情理之中。孙冶方先生辛辣但不无道理地说：“历史学家往往对古董研究得很仔细，但在理论上则欠缺。”他将郭沫若先生的古史分期观点作为类似于蒲鲁东“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的一个例证，说：郭沫若同志认为，如果从生产关系角度着眼，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容易混淆，如果从所有制角度着眼，问题就容易弄清楚，“初税亩”是合法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土地私有制正式确立，地主制度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的证据。孙冶方先生说：“不在于有没有土地私有权，而在于有没有剥削关系”，“斯拉夫公社、印度公社、俄国的村社等等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土地公

有制下，既可以是奴隶制社会，也可以是封建制社会。”（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0、402 页。）

斯大林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所下定义的根本性区别，早已为经济学家们所发现并阐述，如成书于本世纪 6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奥塔·锡克《经济 - 利益 - 政治》一著，据作者说，他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撰写应追溯于 1956 年，即东欧社会开始发生变动的时期。又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发表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许多论文。但经济学方面的这些进展，似乎并未引起历史学家的充分注意。

二 两个概念——“使用”与“所有”

人是一个两重性的存在。人要生存，就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这表现了人同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人要从事生产，又必须和其他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实体，这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同样带有这种两重性。一方面，社会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生产活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又必须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即一定的社会关系。有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社会才能存在。一定的生产资料，由于它是与人、与社会发生着确定关系的物，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带有两重性。

一定的生产资料，首先是人“使用”的对象。人们通过对它的“使用”，进行物质生产，提供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在这里，它作为一定的物，是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具体体现者。其次，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是人“所有”的对象。人们通过对它的“所有”，以其作为中介，相互间发生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从而把人们联结成社会整体，去从事社会性的物质生产。在这里，它又成为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体现者。

这样，一定的人对一定的生产资料就有着两重关系，一是“使用”，一是“所有”。使用，是指人们实际地利用着某些生产资料进行物质生产，由此从自然界得到相应的物质产品。它并不涉及是否通过相关的生产资料及产品与他人发生了社会关系。因此，所谓“使用”，实际上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同义语。“所有”，则是指相关的人们相对于一定的生产资料存在着某种社会差别，由此在物上存在和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关系。更具体地说，“所有”是指一定的生产资料成为一定的个人、家庭、集体或群体的意志专有领域，排斥未经所有者同意的他人的“使用”。它包含着针对一定的生产资料而与他人发生矛盾，需要从法律上（有形的或无形的、成文的或习惯的等等）加以确定的内容。至于所有者是否实际地“使用”了这些生产资料，在这里没有意义。马克思曾严格地区别了生产资料的这种两重性，他说：“劳动本身，就

它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这个简单的规定性而言，不是同具有社会形式规定性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而是同作为物质实体、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32页。）

一定的生产资料要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现物，就必然是这种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中介物，它使与其发生关系的人们之间产生某种差别，也就是一定的排他性。如果没有这种差别，一切人对这个物地位相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现就不需要以这个物作为中介，它不可能体现社会关系，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所有”的对象。例如在一般情况下，空气不可能成为“所有”的对象，尽管对于人类生活和物质生产来说，空气都是必需的自然物，是极其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但由于它的特殊性质，人在它面前不可能产生差别，即不可能产生排他性，因而它不可能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或表现实体。当然，这种排他性是相对的，在一定的生产资料上既能表现某些人之间的差别，也可以表现某些人之间的无差别。被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一定生产资料，通过对他人的排斥，一方面表现了该集团与他人的不同社会位置，实现了其间的一定社会关系，实现了一定的所有制；一方面又相对于集团外的他人，表现了该集团内部不同个人的相同社会位置，从而也实现了其间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一定的所有制。如果没有排他性，物不仅不可能表现集团与他人之间有差别的社会关系，也无法表现集团内部个人之间无差别的社会关系，某个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相对于一定的生产资料所呈现的相同社会位置，必须以对外的排斥、即与外人社会位置不同为条件，否则便无法存在，就像没有“上”作为参照系，便不可能有“下”一样。

显然，排他性是“所有”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在分析土地所有权问题时说：“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在这段话的脚注中，马克思还批判了黑格尔认为私有权是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的观点，指出，这种私有权只是“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5页。）。马克思在谈到最早产生的所有权时也说：“某一

个共同体，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页。）

与“所有”类似的一个较重要概念是“占有”。罗马法这样规定了“占有”与“所有”的不同：“占有”是对于物的事实上的管领，是一种事实关系，而不是权利；“所有”则是个权利问题、法律问题，是所有依据法律而对一定物的绝对支配和处分。就反映对于一定物的排他性社会关系来说，罗马法中的“占有”与“所有”并没有什么差别，它们反映的是同一社会现象，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反映了同一社会现象的不同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法律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在成形法律还未顾及的某些范围，或在法律尚未明确、完整确立起来的远古时代，暴力、强制就是实际的法律。马克思说过：“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8页。）如果说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差别的话，“占有”更多注意了其现实存在状况，而“所有”则更多注意了社会法律观念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页。）

“使用”和“所有”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一个会成为另一个存在的前提，考察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但是它们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对于“使用”的理解，可以从考察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中得到，对于“所有”的理解，则可以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得到。只要有人存在，就有“使用”存在，这毋需说明。而“所有”，只有在人们针对一定的生产资料产生了一定的排他性活动之后，才能存在。显然，从原始的状态说，“使用”是“所有”的前提，如果人们还没有“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针对这些生产资料的排他性活动则无从产生。在阶级社会

里，“所有”又成为“使用”的前提，任何一个“使用”事实的存在，或者“使用”者同时就是“所有”者，他的“使用”必须在现实的排他性活动条件下方能实现，或者“使用”者没有所有权，他必须为其“使用”付出某些代价，如交纳地租，作为对所有者权利的承认。

三 早期社会不存在所有制

早期社会是否存在所有制，这个问题向来为人们所忽视，似乎不言自明，只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人一经产生就存在着所有制。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所有制并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3页。）因此，所有制有两个必需的要素：一、它必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二、它的实现必须以生产资料这种物作为中介或表现实体。当然，自人产生伊始，就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它是否一开始就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以物作为中介或表现实体呢？自人产生伊始，人就必须与一定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但是这个物是否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实现中介或表现实体呢？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论述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类最早的社会关系是婚姻、血族的关系，即人自身生产关系，而并非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实现不需要以生产资料作为中介。因此，这个时期不可能存在所有制。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直接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直接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最早的社会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即婚姻与血族关系，它同时是人和自然界的直接关系，是人的自然规定。一年以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个思想进一步明确化：“家庭（即“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引者注)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这里是说,最初使社会得以构成的社会关系只有婚姻与血族的关系,它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等等是后来才产生的。十多年以后,马克思在其“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6页。)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说:“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又说:“部落共同体,即天然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作为劳动前提的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部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所加],或部落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页。)最早的社会有机体部落共同体由婚姻血族关系联结而成,它是占有土地的前提,经济关系例如部落共同体成员共同占有土地的这种关系,则是后来才产生的,此时它并非是使社会得以构成的因素。既然以生产资料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尚未产生,所有制当然无从谈起。又过了二十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概念,他说:“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着重号系引者所加),“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页。)由上述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一贯认为,在阶级冲突产生之前,作为社会构成基础的唯一的社会关系是婚姻与血族的关系,即人自身生产关系,而不是经

济的关系，因此，这个时期当然无法存在所有制。

那么，这个时期人与作为生产物质条件的自然界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马克思对此作过许多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他把此时的自然界直接规定为人的组成部分，人的无机的身体，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直接的统一体。他又说：“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也就是说，在异化劳动产生之前，人与生产条件之间只是人同自然界的联系，等到异化劳动开始剥夺了一部分人的无机身体的时候，在生产物质条件上才开始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内容。在《手稿》中，马克思又作了阐述：“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这时的生产条件只是人的组成部分，还不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还不可能具有所有制的内容。

由于以上原因，马克思曾明确提出早期社会不存在所有制的观点。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所有权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说：“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最初的所有权依据”，于是，他们就导致出一个奇怪的结果，“所有权的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时代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页。）这就是说，人的劳动并非导致所有权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历史上也曾有过还不存在所有权的时代。可见，马克思认为早期的社会形态中并不存在所有制。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谈到了将来社会中所有制的消亡问题，他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8 7 5 页。) 土地失去了所有者，便不再反映出所有制关系，不再是所有制的实现物。土地是这样，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也可以这样。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理解还有一个旁证。1895 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献给恩格斯的《财产及其起源》一书中，也多次谈到了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并不存在所有制，他说：至今还有野蛮部落“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土地所有制（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关于建立猎场的公有制——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态，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谁有土地，谁就要打仗’这句封建时代的谚语还在野蛮时代和公有制产生时代就被证实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3 5、5 1、5 2 页。）恩格斯读过这部著作后，虽对其中个别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对上述观点并无异议（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 3 4 ~ 4 3 6 页。）。)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最早的唯一的社会关系是婚姻与血族的关系，所有制等经济关系是后来才产生的，而生产的物质条件自然界起初直接就是人的组成部分，是人的无机体，在它上面并不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在早期人类社会中，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直接存在形式，一个人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与相应的自然界直接统一为一体，这样才成为一个现实的人。由于这时人的存在由两部分即作为有机体的人本身和作为无机体的相应自然界而组成，因此，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只是人自身的运动形式之一，它并不成为当时具体的社会的构成依据。早期社会的形成首先在于人在自身生产中所必然结成的关系，即婚姻与血族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个人联结起来构成具体的社会，而这种社会的存在又将作为个人存在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联结成为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在这个联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婚姻与血族的关系，它不需要以任何生产资料为中介，因而社会的经济关系还不存在，使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转化为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职能由人自身生产关系来执行，因此，婚姻与血族的关系就成为早期社会唯一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所有制当然还不能产生。

四 所有制的产生过程

那么，所有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在《手稿》中有详细阐述，他说：“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页。）以人自身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在不与他共同体发生针对生产自然条件的排他性关系之前，并不存在所有制，只有当一个原始共同体排斥其他共同体使用一定的生产自然条件时，所有制才得以产生，它形成于部落共同体之间现实的互相排斥的战争之中。在这种现实的排他性关系中，以前作为某一部落共同体成员“无机体”的生产自然条件，开始反映出一部落和他部落之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之具有了所有制的性质。

通过战争等现实的排他性活动所产生的第一种所有制形态是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建立在部落制度（集体的结构最初归结为部落制度）上的财产的基本条件，——是作为部落的一个成员，——使得被一部落所征服和服从的那个别的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这个部落本身沦落于集体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来对待的那些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列。”（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日知译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这段话前半部分另两种译文为：“以部落制（这是社会最初的表现形态）为基础的所有制，其最基本的条件是作部落底成员，这就使得那被本部落所侵占所征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刘潇然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1页。）“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一个成员。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从文意看，个人作为部落成员和使他部落丧失财产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不能由前者导出后者，作为部落共同体所有制的基本条件，当是使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不是个人作为部落成员，因

此，日知的译文似更妥当。)这种最早产生的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就是以部落共同体为单位排斥他部落使用一定的自然物，并夺取作为他部落“无机体”的自然物，甚至更进一步统治和奴役其他部落共同体。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排他性活动，所有制在产生时便必然带有掠夺、统治的性质，并迅速向一定的剥削关系过渡。《手稿》中，马克思在叙述了战争是原始共同体的最原始工作之一后紧接着说：“假如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491页。)在占有他部落“无机体”的同时占有了“有机体”人本身，将其作为物质生产的条件，就会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它们改变了部落共同体的原始形式，从而形成了种种既保存着部落共同体，又包容着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所有制形态。马克思在论述了部落共同体所有制的基本特征之后也说：“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

因为所有制在它一开始产生时就必然带有的剥夺他部落的“无机体”自然物、并必将发展到统治和奴役他部落的独特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剥削和压迫视为所有制、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物质生产方式的必然内容。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说：“所有制……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在《手稿》中马克思又说：“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参见〔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4页所引依据俄文的译文：“以前的一切所有制形态都为大部分的人类带来苦难，使他们成为奴隶或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说：“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

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他也说：“‘社会’本身……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以及由所有权必然产生的奴隶制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

“资本的生产性，……首先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这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9页。)

五 公有制与私有制是同时产生的

从上述分析出发进行推论，马上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公有制和私有制不仅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和一切对立统一体一样。这里说它们是统一的，不仅指它们像“上”与“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互为存在条件，互为参照系，互为补充，而且也是说它们在历史上是同时产生和确立的。这个说法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公有制与私有制互为存在的依据。由于所有制必须含有的排他性因素，任何公有制都只能是有限制的公有，它以排斥一个集团之外的其他人占有为前提和基础，因而并非该集团内外人们的公有。一定的物是“我们的”而不是“你们的”，在“我们”这一集团内部相对于集团以外的他人来说是公有的，但如果超越这种集团的界限来看，却不过是扩大化的私有而已。当然，“我们的”、“你们的”生产资料一经产生，随着社会本身的扩大以及其中社会关系的多样化，随着个人的生产活动从可能逐渐变为现实，其中必然会逐渐产生“我的”、“你的”生产资料，原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混沌为一体的所有制形态，必然分裂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极，并以这种对立的形态持续至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分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只是在近现代社会才达到顶点，发展成为极端对立的形态。

另一方面，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它们对立存在的整个过程中是互相补充的。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私有制是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如拉法格所说：“个人财产是在原始公有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不仅不与原始公有制相矛盾，像经济学家所说那样，而且是它的必要的补充。”（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1页。）而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公有制又成为它的必需补充。例如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之中，不仅有拉法格称为“古代起源的公有财产”（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9页。）的国有财产等等存在，而且还广泛存在过各种形式的农村公社，这种公社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内部土地公有，它的公有制从爪哇、印度到俄国，“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

广阔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页。)又例如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掌握着大量的资产和企业，拉法格称此为“现代起源的公有财产”(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9页。)这种公有财产在当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本世纪70年代，英国国有经济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已占一半以上，国营企业投资已占全国投资总额的40%以上；法国国有经济在国民总产值中已占42%，国营企业投资额已占全国投资额的38%；联邦德国国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已占47.2%，在投资总额中占31%；美国国家资产价值已占全国国民财富的30%以上；日本国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已占25.3%，国有固定资本已占全国总固定资本的19.9%（转引自〔苏〕迈博罗达：《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25页。）。国有经济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以及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和调节作用。这种以国家所有制表现出来的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需补充，缺少了它们，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运转，资本主义私有制也难以维持。

上面我们集中说明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统一的一面，这并不是要抹杀或冲淡它们的对立，而只是想全面说明它们是对立统一体。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它们互为存在的条件和依据，哪一方也不可能单独存在。

六 第一种所有制带来的两种不同剥削形式

前面已经作过叙述，第一种所有制形态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必然带有剥夺他部落的“无机体”自然物、并必将发展到统治和奴役他部落的性质，奴隶制和农奴制是其必然的发展，因此，剥削是其必然包含的内容。由于剥削产生的具体过程不同，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剥削形式。

一种剥削形式，是征服者不改变被征服者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结构，将其整体作为统治和剥削的对象，要求其服从统治，按规定缴纳贡赋，有时或委派贡赋征集人和监督人。如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实即居民点——引者注），他们就征收沉重的实物贡赋，并留下赋税征集人来监督支付，但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法律和政府。”（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四川民族研究所 1980 年版，第 2 4 2 页。）这种剥削形式使被征服共同体逐渐演变，其中许多共同体变化为曾广泛存在过的作为专制主义政权基础的农村公社。

另一种剥削方式，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完全从其原属共同体中脱离出来，将其个人人身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变为奴隶。这些奴隶开始并不像在古典奴隶制社会中那样命运悲惨，如早期日耳曼人的奴隶，“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奴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从属关系仅此而已。……笞打奴隶、囚禁奴隶或罚奴隶作苦工的事是很少遇到的。”（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6 7 页。）类似的情况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似乎带有浓厚的氏族收留养子的色彩。这些奴隶，随剥削者内部所有制发展状况的不同，主人也不同。开始，由于统治者内部私有制尚未充分发展，奴隶便归集体公有，这种状况后来也存在，如亚里士多德时期，在克里特岛各城市所占领的一些岛屿上就有成群的奴隶，他们耕种供养全体公民的国有土地（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5 8 页。）。以后，随着共同体内私有制的

发展，奴隶也逐渐成为家庭或个人的私产。

部落共同体所有制时期及后来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各种所有制时期，这两种剥削形式都是并存的，它们同样是以被剥削者人身被控制为前提，只是控制的形式不同而已。当然，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条件等等的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剥削形式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例如以古代社会而言，在中国的西周，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一种剥削形式，即对“殷民六族”、“怀姓九宗”之类的整体剥削，周王不必“料民”、干预被剥削者共同体内部的事务，与此同时，也有少量奴隶，从事家务、仆役劳动及少量的农业生产。在古罗马，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二种剥削形式，大批奴隶的劳动维持着罗马的繁荣，但同时东部一些行省第一种剥削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正是东西罗马最终分裂并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剥削形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农村公社成员被变为奴隶，也可以看到奴隶被变为农村公社成员，像新王国时期的埃及，阿蒙神庙便将大批奴隶移入农村公社，变为公社成员（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1页）。一般来说，由于第一种形式对被剥削者状况的改变最小，因而不仅使剥削者易于管理，被剥削者也较易接受。第二种形式剥削的确立，不仅在统治者内部必须有使用奴隶劳动的现实需要和条件，而且要有一系列管理手段的建立。由于它对被剥削者状况变动很大，不仅被剥削者极难接受，剥削者也很难管理。因此，只要条件许可，剥削者就尽量使用第一种剥削形式，而不用第二种剥削形式。这样，就世界范围来说，使得大部分地区以第一种剥削形式作为主要形式。

在第一种所有制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形成之日起，这两种剥削形式便同时存在和发展着，在不同的地区，它们各自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状况，对后来的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了解这一点，对于把握世界历史的多线发展，对于理解两周土地制度的特有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七 剩余产品导致私有制以及剥削、阶级产生说试析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始产生剩余产品，氏族首领等人物逐渐将其据为己有，由此产生私有财产，剩余产品的产生也使剥削有了可能并转变为现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早的阶级对立——奴隶主与奴隶的对立。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关键在于对剩余产品的理解。为了更好把握所有制概念，必须对这种说法也作一些分析。

对于“剩余产品”这一概念，同样可以从人与物的自然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人与物这一自然关系角度看，人类物质生产品不可能有剩余。

首先，人类消费水平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仅就必需消费品来说，今天的必需消费品，若干年前可能是奢侈品，而今天的奢侈品，以后可能变为必需消费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消费掉它所可能创造的一切生产品。

其次，不仅生产决定了消费，消费也决定了生产，二者互为前提。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9页。) 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人们有一定的消费需要，反过来，一定的消费需要又确定了一定的生产。如果没有社会因素的作用，人们不会在自己的需要已经满足之后再去主动地生产什么东西。例如在北美的达科他印第安人那里，男子夏季平均每天劳动不过1小时，冬季约6小时，妇女夏季劳动约6小时，冬季约10小时(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81页。)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时间也是相当丰裕的，他们完全可以用多余时间生产“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财产储存下来，但他们并没有这样作。类似的现象在原始民族中比比皆是，例如澳大利亚中部土著阿兰达人，从不知道珍惜时间，“男人和女人会因观看孩子们嬉戏而耽误数小时之久”，只有在急需食物时，他们才去寻

找。他们一般也不储蓄食物，如果食物充裕，客人们便会聚拢来，每个人尽量吃饱，只有在节日的前几天才储蓄一些食物。又如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塔斯马尼亚人：“当食物充裕时，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大吃大喝，并不留点储蓄；如遇寒冷的冬天，就要感到饥饿的痛苦，有时被迫去啃袋鼠皮。”（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四川民族研究所 1980 年版，第 20、22、16 页。）这种很少变化的消费方式，不能为生产提供新的需求，因而剩余产品无从产生。

从人与人社会关系角度看，剩余产品的产生只有在所有制这种排他性关系确立之后才有可能。对尚未产生所有制的原始共同体来说，它能够通过变换消费方式消费掉自己所可能生产的一切，也不会生产自己消费需要以外的任何东西。而当所有制产生之后，第一种所有制形态部落共同体所有制便以剥夺他部落生产品为基本条件，如马克思所说：“建立在部落制度（集体的结构最初归结为部落制度）上的财产的基本条件，——是作为部落的一个成员，——使得被一部落所征服和服从的那个别的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这个部落本身沦落于集体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来对待的那些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列。”（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9 页。）被掠夺或被剥削的生产品，便成为被征服和服从部落的剩余产品，交付与征服者。因此，不是剩余产品导致所有制产生，而是所有制产生导致剩余产品形成。部落间的交换是派生的社会现象，因为原始的部落（甚至也可以包括后来的农村公社）是历史形成的自给自足共同体，如果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例如部落之间的战争、英国殖民者对付印度农村公社的洋货和枪炮，交换是无从产生并发展的。

所有制、剩余产品必然包含掠夺与剥削，而实现掠夺与剥削，就必须有强制。马克思谈到亚洲群岛东部的一些岛屿上，居民们可以从西米树上轻易地得到面包，闲暇时间很多时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他还指出：“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62 页。）马克思在谈到地租时也说：直接生产

者在“有可能从事剩余劳动”的时候，“这种可能性不会创造地租，只有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强制，才创造地租。”（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2～893页。）这也就是说，当自然条件优越，人们存在大量闲暇时间时，他们不会在满足消费需要之后再去生产什么东西。要他们把闲暇时间通过生产为自己所利用，必须同时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把闲暇时间用来从事剩余劳动，即用来生产无偿交给他人的产品，基本条件是外部的强制。因此，从人与人社会关系角度看，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不过是被他人掠夺或剥削的劳动产品的代名词。

有人会说，由于原始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在某些人手里，某些产品是剩余的，这些剩余产品必然要导致交换，从而导致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分工只有发生在不同的所有权之间，产品才有可能成为剩余的产品并互相发生交换。在共同体内部，只有当私有权已经产生并有相当发展的时候，分工才能使某些人手中的某些产品成为剩余的产品，进而产生不同所有权之间的交换。如果共同体内私有权还没有产生，不论内部分工发展到何种程度，生产的产品都是属于共同体的，不存在个人手中剩余的产品，也不会有他们之间的交换。甚至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斯拉夫与印度农村公社中也可以看到，由于公社内部的私有权还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相当的分工并没有导致广泛的交换，而只是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因此马克思说：“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概括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私有财产以至于阶级，不是剩余产品产生的结果，而是其原因。

第二节 社会形态问题

研究两周土地制度无法回避两周社会性质问题，而谈社会性质只能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这里，我们直接面对的就是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以及与此相关且引起过广泛而又长期争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即把人类社会历史归结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学说。它最后确立于斯大林，今天仍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宏观框架。它比马克思主义以前一切学者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所设计的宏观框架都要高明，但随着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进展，特别是马克思大批手稿的公布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深入，其违背马克思原意的严重缺陷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笔者以为其主要缺陷有三，下面试予叙述，另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社会形态分期系列问题略述笔者意见。

一 五种社会形态说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一些规则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第一个缺陷是违背了形式逻辑有关概念划分的一些基本规则。

从逻辑上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所提出的社会形态区分问题，也就是一个划分或分类问题，它意味着将社会形态这一属概念（上位概念），根据某个标准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的种概念（下位概念），或者说，意味着将各种各样具体社会形态的概念，根据某个标准归纳分类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概念，这两个过程就概念关系来说是等价的。从概念划分的角度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有两个缺陷：一、违反了概念划分中每一次划分应当使用同一个划分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并列于同一等级；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误将各社会形态间的对立（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忽视了它们之间中间类型或过渡时期的存在。

先看其逻辑缺陷之一。五种社会形态说把斯大林所定义的生产关系作为区分社会形态的核心标志，由此，五种社会形态概念内涵的基本规定可用下表表示。

社会形态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有无剥削与阶级	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	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剥削者的形式
原始社会	公有制	无	平等的互助关系	
奴隶社会	私有制	有	不平等的压迫关系	奴隶人身被奴隶主占有，奴隶主强迫奴隶劳动
封建社会	私有制	有	不平等的压迫关系	农奴人身依附于封建主，封建主逼迫农奴劳动
资本主义社会	私有制	有	不平等的压迫关系	工人人身自由，资本家迫使工人劳动
共产主义社会	公有制	无	平等的互助关系	

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基本规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无剥削，无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关系。相对此规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概念内涵相同：生产资料私有制，有剥削，有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压迫关系。区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仅在于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剥削者形式的不同，而这个标准根本无法使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显然，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对社会形态概念的一次划分中，使用了不同的两套标准，从而造成并列的五个概念不等位、不可比的混乱现象。相对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合并为阶级社会的概念，方能与之并列，成为等位概念。奴隶社会等等只是阶级社会这一属概念的再次划分，是其下的种概念。

不遵从概念划分中一次划分应使用同一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同等并列，必然造成逻辑混乱。例如，划分人这一概念，可根据生理性别得到男人、女人、两性人三个种概念，这是合理的，但如果不使用同一标准，混淆概念等位，划分为男人、女婴、少女、青年妇女、……两性人等概念，就显得不伦不类，闹出笑话。

纠正这个缺陷，如果不改动五种社会形态说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描述，社会形态的划分至少应改造为两个层次的划分系列。首先根据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有无剥削，有无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否平等的标准，划分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然后再按剥削压迫形式的不同，将阶级社会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应当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相类划分处于同一层位，例如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等等处于同一层位。对研究对象按层次进行连续分类，每一层次遵从同一标准，由此形成若干层次的概念系列，这是全面把握对象唯一正确合理的方法。试想，如果没有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系列，生物学能否存在？如果没有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的分类系列，微观物理学将陷入怎样的混乱之中？要从宏观上把握人类社会历史，也需要建立包含若干层次的社会形态分类系列。

再看其逻辑缺陷之二。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各种社会形态概念，两两之间都是全异（平行）关系，其外延边界清晰，互相间断，例如不

能说封建社会同时又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中间形态，辩证法对此极为重视，恩格斯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互为中介。”（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4～555页。）各种社会形态之间同样存在中间形态或过渡时期，例如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社会形态定义，从其核心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看，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中间形态，以具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二重性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公社曾长期存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确立者斯大林也明确谈到过中间形态和过渡时期的存在，他将生产关系分为三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6页。）那么，这些“过渡关系”应当归入哪一种社会形态之内呢？斯大林并未予以考虑。显然，两种生产关系之间的“过渡关系”是“亦此亦彼”的，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不能归入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因而，五种社会形态概念的总和并不能满足社会形态这一概念的外延。这就将各种社会形态概念间的对立关系误当成矛盾关系，从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

忽视中间形态的存在，不仅妨碍对事物运动变化的把握，而且进一步增加了分类的人为性，易于造成混乱。例如，早期生物分类采用林奈的动物、植物二界分类法，这种方法在中间物种上碰了壁。有一种低级生物眼虫，它有叶绿体，能进行光合作用，这是植物特征，它有鞭毛，能游泳，有眼点，能感光，能通过细胞膜吸取环境中的有机养分，这是动物特征。因而植物学家将它看为植物，归入鞭毛藻一类，动物学家将它看为动物，归入鞭毛虫一类，使分类陷入混乱。后来海克尔在动物、植物两界之间添加了原生生物界，才开始使这些中间形态有了较合理的归宿。

纠正这个缺陷，社会形态的划分至少应当声明：各种社会形态之

间被相应的中间形态分隔开，它们并不是连续的，这些中间形态在社会形态分类系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或者再进一步，对这些中间形态的内涵规定性作更深一层的确定，然后排列于相应的社会形态分类层次上。

二 五种社会形态说误以社会经济形态概括社会形态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第二个缺陷是以社会经济形态囊括所有的社会形态。

五种社会形态说将社会形态等同于社会经济形态，例如斯大林就是根据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不同，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这种学说把生产关系即经济的关系作为社会唯一的基础性关系，认为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同，而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48 页。）。这种理解已经深深渗入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维之中，其实，社会形态并不等同于社会经济形态，斯大林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

在本章第一节中，我们已经作过叙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类最早的社会关系是婚姻、血族的关系，即人自身生产关系，而并非经济的关系。所有制是较晚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曾经有过并不存在所有制的历史时期。“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0 页。）。既然人类早期社会唯一的或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婚姻与血族的关系，斯大林作为经济关系核心内容的所有制又是在较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的，那么，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斯大林所定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存在的。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存在着经济的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之分。在所有制产生之前，社会结构是以婚姻血族关系为基础的，所有制产生之后，才开始有了经济形态的社会结构，而经济形态的社会又必然与经济上的排他、掠夺、奴役以至剥削联系在一起。因此，试图以社会经济形态囊括所有的社会形态，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在 19

世纪 70 年代接触到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前，马克思对“原始社会”所知甚少。且不说五种社会形态说对“原始社会”所下定义的科学与否，仅就阶级产生之前存在过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言，上述看法并不全面。固然，在摩尔根之前，马克思对这一阶段的具体社会结构不可能有太多的了解，但这并不妨碍从逻辑上对它进行推想和把握，如我们在第一节所列举的许多论述所表明的。正确的思维可以大大超前、跨越于已经掌握资料的局限。这一时期婚姻血族关系是社会唯一或主要的关系，它是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逻辑推导的结论，这个结论为摩尔根等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证明、所充实，因此 1884 年恩格斯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并声明：“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 40 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9 页。）这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贯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攻击恩格斯将摩尔根的理论 with 历史唯物主义强行联系在一起，则仅仅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如果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之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思想就为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言论提供了钥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资本主义以前的三种所有制形态：“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既然是所有制，是经济形态的社会，那么阶级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对应于这三种所有制形态的分别是“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奴隶制”、“农奴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5 ~ 28 页。）。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说：“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87 页。）既然是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的社会形态，所涉当然是阶级已经产生后的社会历史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既然是社会经济形态，就必然包含阶级关系的内容。后几种生产方式不用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与此同时撰写的《手稿》中明确描述说：“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剩余产品……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是“普遍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3、493、496页。)显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当归入阶级社会的范畴之内。

以上理解是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呢？笔者认为，这样才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直反对把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对此作过许多阐述，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0页。)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包括什么内容呢？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产生”、人自身生产三个因素，统称其为“生命的生产”，并指出其“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33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又提到两种生产，一种是物质生产，一种是“与消费同一的生产”，即“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两种生产缺一不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予以更清晰的解说：“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是物质生产，一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当劳动不够发展、社会财富较少时，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当阶级的产生炸毁了“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的时候，“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页。）。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把人自身的生产置于重要地位，与物质生产同等看待，认为在阶级产生之前人自身生产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恩格斯多次讲过：“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但他又作注解：“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9页。），显然，他这里所谈的经济条件仅仅是相对于思想、政治条件而言，包含了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两个方面。恩格斯坚持的两种生产的理论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激烈攻击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库诺就说，恩格斯“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摩尔根的思想，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推导研究的有机的结果，而是人工地嫁接出来的”，“完全打破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德〕亨利希·库诺夫：《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2卷，商务出版社1988年版，第508、485、522页。）。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家们也指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犯了一个错误”（〔苏〕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2页。）。一方面则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说，摩尔根的理论“是一个完全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是借助于非经济因素找到的”，恩格斯将“经济唯物主义”“附合”于摩尔根的理论（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128页。）。他们的共同失足之处，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列宁对此批驳说：“你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看到他们确实谈到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吗？”（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因此，要正确、

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充分考虑人自身生产及其生产关系。当然，如何科学地描述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今天仍是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三 五种社会形态说误以“单线”历史观描述“多线”历史过程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第三个缺陷是以“单线”的历史观描述“多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五种社会形态说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看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纳入其单一的模式之内，排除了其他历史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十分重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他们并不认为历史只有单一的发展模式。

二者差别首先表现在对奴隶制与农奴制之间关系的看法上。五种社会形态说认为，奴隶制和农奴制是历史上前后产生的两种剥削形式，其间有承继关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它们是可以同时产生、同时并存的。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所有制的产生后说：“假如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491页。）所有制产生的重要前提是排他，是占有作为他部落无机体的生产自然条件，如果同时占有了土地上的人，并使之成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即形成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便必然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它们的产生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当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之所以同时产生两种不同的剥削形式，与被剥削者从事的具体劳动有关。马克思论及现代个体家庭的产生时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页。）恩格斯说得更清楚：“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迫使当地居民

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1页。）迫使被剥削者从事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与条件导致了农奴制的产生，而这种需要和条件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上古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制和农奴制不仅可能同时产生，也可以同样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直接历史前提。《手稿》中，马克思论及相对于资本的劳动的产生时，将奴隶制和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即“劳动者本身”作为“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被人占有”关系的解体，同看为前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9页。）。在《巴师夏与凯里》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说：“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解体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这就是说，奴隶制和农奴制可以同时并存于部落共同体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整个历史时期。

基于奴隶制和农奴制是前后承继的两种剥削形式的看法，五种社会形态说建立了以它们为基础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社会形态概念，认为这两种社会形态是历史上前后承继的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而马克思明确认为，在部落共同体所有制之后，社会历史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他认为，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必然导致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由此便形成了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日耳曼的等等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又保存着共同体的所有制形态。在《手稿》中，马克思同等并列分析了这种种形态，统称其为“以公社成员身份为媒介的所有制”。其区别在于：亚细亚形态“表现为公有制”，“单个人只是占有者，决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古典古代形态“表现为国家（也即公社——引者注）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后者被前者所制约”；而在日耳曼形态中，“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所有制的基础”，“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这些形态包容着奴隶制和农奴制，其区别在于：亚细亚形态中是“普遍

奴隶制”，共同体中的个人实质上“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6、493页。）；古典古代的形态是“劳动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8页。）；日耳曼形态下“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它在其故乡时就实行了这种“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7～178页。）这种种形态也都保存着共同体，但保存程度差别很大：亚细亚形态所采取的普遍奴隶制“并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对原始共同体“所能改变的最少”，“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持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3、492、484页。）；古典古代形态的共同体“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日耳曼共同体则更少保存原始部落的特征，除了“作为语言、血统等等的共同体”而外，“事实上只存在于公社为着公共目的举行的实际集会上”（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2页。）。在马克思看来，形成这些不同形态的原因并非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是“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由于部落共同体本身结构的差异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不同，人类社会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

五种社会形态说出于其“单线”的历史观，还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为仅仅是从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诞生出来的。马克思则明确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多样化的历史前提之下，他说：“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

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可以产生于后期的欧洲类型封建社会，也可以产生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瓦解之中，可以产生于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公有制的崩溃之中，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世界历史发展也从未按照某种同一的模式进行，而是呈现出多类型、多道路的发展趋势。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单线”历史观，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也难以恰当描述繁纷多样的社会历史发展现实。

四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130 多年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在此前后的手稿和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过大量论述。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既牵扯到怎样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怎样正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又涉及如何正确研究并解决我国及其他东方国家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问题，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它为学者们普遍注意，不断进行探索，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讨论高潮。这里，笔者不可能对这个繁杂庞大的问题详细进行讨论，但两周土地制度研究又不能回避它，因此只能简略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

多年的讨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都被作为牵扯面很多的一个问题来研究，笔者则认为应由两个问题群取而代之。一个问题群完全局限于思想史的范围之内，即必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怎样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又对它进行了怎样的论述，而暂时不必考虑它与历史事实本身的对应程度如何。一个问题群则局限于历史事实范围之内，即我们如何对历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社会有机体进行恰当的横向与纵向分类、也即恰当地予以分型和分期，怎样把握其社会结构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而暂时不必考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具体论述。这两方面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将其有机地综合起来，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工作，似乎更有可能最终解决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群是很难彻底分开的，但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可以有所侧重。有意识地区分两者，可以使问题的提法更为合理，减少盲区，也减少无谓争论，从而使研究取得切实的进展。

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作如下界定。

1、如前所述，最早的社会形态不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而是建立在婚姻、血族等人自身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因此它不是最早的社会形态。

2、如前所述，最早的所有制形态是部落共同体所有制，以这种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最早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从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不是最早的社会经济形态。

3、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斯拉夫的所有制形态是同时并存的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它们同样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在《手稿》中，马克思一直将其并列起来加以论述，从来不把其中一些形态看作是从另一些形态发展而来的。

4、如前所述，亚细亚生产方式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并列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可归纳如下：一、所有制形式“表现为公有制”，“决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二、剥削和统治的形式是“普遍奴隶制”，处于共同体内的个人实质上“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三、由于其所采取的普遍奴隶制的形式，因而对原始共同体“所能作的改变最少”，“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持久”。

5、概括上述，以《1857 -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中心，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社会演化观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其中的位置，可用下述简图表示：

动物界 非经济形态的社会形态 部落共同体所有制

(包含着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各种所有制形式：)

亚细亚形态的所有制

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

日耳曼形态的所有制 封建社会

古典古代形态的所有制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

从现实社会历史这一问题群着眼，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实际上被

融解于社会形态问题之中，也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我们对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社会形态进行正确的分期和分型。

五 社会形态历史演变是多层次和多线索的

历史分期与分型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形态的分类问题，它与生物分类完全相同，当然，这里的生物分类包含了古生物分类。拉马克和达尔文都认为，生物分类工作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任何分类工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种随意性。这是由于，事物都是复杂的综合体，而人们的研究目的和着眼点又各不相同，因此，对同一事物及其发展过程，就会产生根据不同标准而划分的不同分类系列。社会形态分类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工具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可以根据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可以根据社会组织形式划分为血缘组织社会和地域组织社会；等等。但是，要使这种分类能够真正把握住社会总体，就必须抓住决定了它存在的最基本和最一般的内容。要作到这一点，就需要给社会一个准确的定义，而为此，首先需要分析组成社会的人是什么。

人，是一个两重性的存在。

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一方面，人要存在，就要通过人类自身生产把自己生产出来，同时又通过这种生产把自己延续下去。另一方面，人要存在，就要通过物质资料生产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保证作为人类自身生产前提和结果的人能够生存。再一方面，人要存在，还需要通过精神生产来把握人以外的世界和人自身，把人在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中所获得的战胜自然的能力，以信息的方式，保存和传递下去，从而使一定的人自身生产方式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能继续延存，并且当这两种生产产生变革的条件和要求时，精神生产便作为一个中介，根据这些条件和要求生产出相应的精神产品，指导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从而使这些变革逐渐完成。人的自身生产、物质资料生产、精神生产三者构成了人的自然存在，它表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通过这些生产，人和自然界联系了起来，并在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中推动自然界和人自身的发展。

人，又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人要存在，必须处于一个确定的社会之中，脱离了社会，人不可能进行任何生产。人要进行自身的生产，就必须结成一定方式的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即人自身生产关系。人要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就必须以社会整体同自然界斗争，不论是上古狭小的原始人群社会、还是现代世界规模的社会，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使个人构成社会整体的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人要进行精神生产就必须和他人发生精神的交往，并对现有的精神生产产品和精神生产条件进行分配和交换，从而结成人们之间一定的精神生产关系。一方面，人只有在这三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相应的生产，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然存在，另一方面，任何自然存在的个人，又必然要表现着一定的人自身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关系和精神生产关系，成为这些相应社会关系的交汇与总和。这三种关系构成为人的社会存在，它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这些关系，从自然界异化出来的人自身又产生了异化，对立于个人的社会整体使个人的自然存在得以实现，这种对立统一同时推动了人和社会的发展。

人是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人的两重性存在，使由人构成的社会也成为两个两重性的存在。

社会要存在，首先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区别于自然界并与自然界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就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进行的人自身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这是社会的外部存在，它表现了社会同自然界的关系，反映了人类社会首先是对立于外部自然界而存在的。

社会要存在，还必须具有内部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把个人联结成社会整体的各种社会关系，它们可以还原和最终归结为人自身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关系三种。社会的本质就由这种内部结构所决定。这是社会的内部存在，它说明社会是可分析的，表现了社会与其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人类社会还是对立于自己内部的个人而存在的。

社会是其外部存在和内部存在的统一体。

我们要考察一个具体社会存在、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就必须研究社会外部存在和内部存在两个方面以及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随着考察侧重点的改变，对象各部分间的相对位置也发生变化。当我

们考察社会发展的原因，进行动态的研究时，需要着重研究它的外部存在、即各种生产的发展状况。当我们将一个个社会发展阶段排列起来加以分类，进行静态的考察时，研究对象实际上局限于社会的内部存在，即比较分析各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别和同一，一般并不牵涉社会整体与其他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是因为，在连续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才能使我们准确地确定各间断阶段的界限和异同，并在纵向的分类中，排除由于地理、历史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属于分型方面的差异对这种考察的影响。所以，在这种考察面前，社会的外部存在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社会形态分类的研究时，对象是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各种生产活动被当作外部因素而暂不加以考虑。

就社会的内部结构来说，人自身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关系三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派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其他关系，各自形成了相应的复杂体系，已经在或者将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充分表现自己。因此，我们在静态地考察社会内部结构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由于派生而形成的复杂体系，把它们最终归结和还原到三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上去，然后再反过来考察这种复杂体系的内部联系与结构。

这三种基本社会关系，虽然同是社会内部基础性的关系，可以同时并存，但它们并不是始终都处于相同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可能是不同的社会关系。比如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是人自身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关系和精神生产关系从属于前者，甚至被包容于前者，而不以独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又比如在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生产关系，其他两种关系从属于这种关系。因此，我们在考察处于某一发展阶段的一个具体社会时，必须首先抓住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社会生产关系，然后再分析从属于它的其他社会生产关系。

由于以上理由，我们对于社会的分类，就可以按照下述几个层次的问题来进行考察：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什么？二、这种关系演进为什么样的形态或类型？三、这种关系的一定形态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或一定类型中存在怎样的类别？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分型问题，以欧洲的古典古代形态的整个发展过程为对象，则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形成下表所示之多层次分类系列。

人 类 社 会	第一分 类层次	第二分类层次	第三分类层次
	血缘婚 姻关系 的社会	原始群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血缘家庭部落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母系氏族部落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到经济形态的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经济形 态的社 会	奴隶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封建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经济形态的社会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	第三层次社会分类
			(第二层次分类间的)过渡时期
	个人全 面发展 的社会
	

基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便形成了社会形态分类的第一个层次，即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三个名称很不确切，还有待修正。这三个社会形态分类与马克思在《1

857 -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作的论述统一。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在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是人自身生产关系。它表现为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即家庭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派生出了相应的越来越复杂的亲属关系。在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内部的各种组织领导机构，和类似阶级社会法律的、以道德与习惯为表现形式的行为准则及奖惩办法等等相应的上层建筑，以辅助和保证人自身生产关系的实现。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形成了人自身生产关系的一个体系，它把个人联结成原始群、血缘家庭部落、母系氏族部落等具体的社会。这个体系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而物质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关系则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或者被包容于前者。

在经济形态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关系把个人组成不同的集团、阶层、阶级，从而联结成社会整体。经济形态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由于在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和地位，从而形成不同的阶级，因此必然存在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剥削。经济形态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派生出了相应的政治关系。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又产生了相应的政治机构、法律及其实行机关等等的上层建筑，以辅助和保证相应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实现。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形成了物质生产关系的一个体系，它是经济形态的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基本内部结构。这个体系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人自身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关系则处于被支配的从属的地位。

至于在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

么，现在还缺乏作出肯定回答的条件。不过，根据今天的社会发展，可以作出大致的分析和预测：由于人类已经科学地把握了自身的生产，人自身生产对于人的自然存在的意义减小，人自身生产关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必然随之进一步下降；随着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力的极大提高，随着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极大满足，物质资料生产对于人的自然存在的意义也同样减小，从而物质生产关系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逐渐降低。这样，就要由其他的社会关系——从今天的社会发展来看，大概就是精神生产关系——来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形成社会形态分类的第二个层次，它当然包括分期和分型两个方面。如果仍不考虑分型，以欧洲的经济形态的社会为例，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第二层次的社会形态。如果从分型角度予以考虑，则可以划分为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日耳曼的等等第二层次的社会形态。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则可形成社会形态分类的第三个层次，例如以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从分期角度看，可以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现代资本主义时期之不同的社会形态，从分型角度看，则至少可以划分为欧美式、日本式、新加坡等较先进发展中国家式、发展中国家式等等。

为了使分类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相统一，不致割裂历史，这个分类系列中给了过渡时期以应有的位置。这些过渡时期在分类系列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们既不能分割归属于与其相连的社会形态之中，又不能与这些社会形态处于同一个分类层次。下面试以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到经济形态的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为例作些讨论。

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占社会统治地位的不是单一的某种社会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在不同社会范围占据着统治地位。在原始共同体内部，人自身生产关系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这时群婚已逐渐为个体婚所取代，世系逐渐改由父系来计算，但氏族与部落的结构依然存在，而使这个结构存在的基础仍然是婚姻、血缘、亲属等关系，即人自身生产关系。在原始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以往互不接触的状态已被打破，物质生产关系把不同的原始共同体联系了起来，在这个范围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其表现为：土地等生产资料为不同的部落所争夺，所有权问题已经产生，在一定的生产资料上已经表现出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一种所有制形态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已经形成，一部落对他部落偶然的掠夺与常年的贡赋剥削，是其基本特征。这个时期大致相当于父系氏族部落社会。

由于这个过渡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某种确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带有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和经济形态的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特征，它无法归入这两种社会形态之中，又不能以同等的身份与这两种社会形态并列处于第一层次的社会形态之中，因此只能作为中间过渡形态去充填第一层次社会形态之间的间隙。但是，如果从第二层次来看，它就有了相对确定的内部结构。它的部落内部的婚姻、血缘、亲属等关系，可以看作人自身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部落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也可以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因此，在第二层次社会形态之中，无论相对于母系氏族社会等血缘婚姻关系的社会，还是相对于奴隶社会等经济形态的社会，它都有资格作为一种同等独立的社会形态而存在。

至于其他各层次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时期，其性质与特征与此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第三节 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

在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公社是经常被使用的一个概念。前资本主义的公社究竟是什么？这似乎不成问题，通常人们把土地公制作为其基本特征，将它看为原始社会的组织形式，或这种组织形式在阶级社会的遗存。然而，这种理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述直接矛盾。例如，马克思说，在日耳曼的公社中，“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恩格斯说，马尔克可以通过移民在地主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土地所有权归地主，公社成员必须缴纳代役租（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3页。）。他们认为，公社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恩格斯说，公社“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7页。）。看来，他们并不认为土地公有制是公社必需基本特征，也不认为公社仅仅是原始社会的特征性存在。研究两周土地制度无法回避公社问题，因此，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廓清公社概念的基本内涵。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的公社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提到了许多公社名称，例如“原始公社”、“最古的自发的公社”、“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氏族公社”、“家庭公社”、“亚细亚的公社”、“古代的公社”、“古代的城市公社”、“日耳曼的公社”、“印度公社”、“亚洲村社”、“农村公社”、“农业公社”、“马尔克公社”、“斯拉夫公社”、“小规模的经济公社”、“以奴隶生产为基础的公社”、“小农组成的带有一定自发性质的公社”，等等。有时候，他们还用“共同体”、“古代的共同体”、“公社共同体”等词称呼公社。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公社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呢？笔者打算选取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的公社形态，罗列其主要特点，寻找其共同的规定性。为使分析简明，我们只探寻与公社概念内涵有关的内容，而不考虑这些具体公社概念外延的互相包容之处，也不考虑公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形态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作过较多论述的公社有如下一些。

（一）印度公社

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这种公社。它有如下特征：

1．“土地公有”。“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荒地作为公共牧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2页。）

2．公社的经济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以及固定分工之上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因而各个公社是孤立的、分散的、互不联系的，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397页；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7页。）

3．公社必须向专制国家缴纳赋税，“为了获得纳税的钱，必须卖掉它们的一部分产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

版社 1974 年版，第 8 1 8 页。)

4 .“ 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8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 7 2 页。)

5 . 这些“ 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 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 4 8 页。)

(二) 亚细亚的公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 8 5 7 - 1 8 5 8 年草稿)》中，与古典古代的公社、日耳曼的公社同等并列论述过这种公社。它有下列的特征：

1 .“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即通过血族关系联结而成的共同体，是公社占有土地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 7 2 页。)

2 . 就公社内部来说，土地公有，个人只是占有者，这种占有必须以“ 公社成员的身份为媒介”。各个家庭“ 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个人对公社来说是不独立的，“ 只表现为偶然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 8 4、4 7 3、4 8 2 页。)

3 . 公社经济是自然经济，“ 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 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 8 4、4 7 3 页。)

4 . 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是“ 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他不仅是公社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是“ 公社财产的真正前提”，也是公社成员人身的所有者。他把公社成员作为自己的财产，即奴隶，“ 普遍奴隶制”下的奴隶。公社剩余产品“ 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 7 3、4 9 3、4 9 6 页。)

(三) 古典古代的公社

这种公社的基本特征有：

1 .“ 土地为公社所占领”，“ 一部分土地留给公社本身支配”，成为公有地，另一部分则被分割，成为每一个公社成员的“ 私有财产”。

公社成员的身份是他占有土地的前提。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是分开的。“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但“后者被前者所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8、475、484页。）

2．个人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

3．这种公社把城市作为自己的基础，这种城市“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480页。）

（四）日耳曼的公社

这种公社基本特点有：

1．公社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联合，它只“存在于公社成员的集会中和他们为公共目的的联合中”。同时，公社本身又“作为语言、血统等等共同体，是个人所有者存在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484、482页。）

2．土地基本为个人所有，“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所有制的基础”。公有土地作为猎场、牧场、采樵地等，“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只是个人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并且只有在必须把它当作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使之免遭敌对部落侵犯的情况下，它才表现出是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2、481页。）

3．“每一个单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工业只是妇女的家庭副业等等）。”公社及其财产的存在只表现为这些独立主体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1页。）

（五）较古类型的原始公社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比分析了较古类型的原始公社和农村公社（农业公社）。较古类型的原始公社有以下基本特征：

1：“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页。)

2：“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公社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9页。)

3：耕地是公共财产，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9页。)

(六) 农村公社(农业公社)

农村公社基本特征如下：

1：这种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9页。)

2：公社的“耕地是不准买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9页。)

3：“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9页。)

4：“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保持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最后的原始类型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任何地方，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5页。)

5：公社以外还有大量的非公社所有的土地。以俄国而言，“除国有土地外，掌握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是和公社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7页。)

(七) 马尔克公社

在《马尔克》、《法兰克时代》等著作中，恩格斯对这种公社作了较多的论述。其基本特征如下：

1：早期全部土地归公社所有，或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各个家庭

使用，定期分配和更换。后来，“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成为占有者的自由财产。”但公社对这些土地仍具有最高统治权，必要时加以“监督和调整”。森林、牧场、荒地、犁头所不能及的地下埋藏的财富，都归公社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1、358～359页。）

2．在公社内占有份地的个人，必须对公社负担一定的赋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1页。）

3．“每个马尔克都是自给自足的”。“邻近的各个马尔克的产品，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它们之间的交换，便几乎不可能了。”各个公社之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0页。）

4．当地主得到了马尔克的土地、使马尔克服从自己的统治时，“旧的马尔克公社仍然继续存在下去”。马尔克也通过移民在地主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移民必须世代向地主付一定的代役租，为地主服一定的徭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3页。）

5．在开始数百年间，马尔克“曾经是体现各日耳曼部落的自由的形式。后来它却变成了上千年之久的人民受奴役的基础”。“在整个中世纪里，它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39、353页。）

（八）“最古的自发的公社”或“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多次提到上述公社名称，不过，他这里说的可能是多种公社形态的总称，在有些地方，他使用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称呼，有些地方还以印度的、斯拉夫的、俄国的公社作为实例。其主要特征为：

1．在“古代的自发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物品。早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交换时，它就发展成商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6页。）

2．“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3页。）

3.“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7页。）

（九）家长制家庭公社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著中，分析了这种公社。其主要特征如下：

1．公社由“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组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页。）

2．“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土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71页。）

3．公社内包括有一定数量的“非自由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9页。）

4．“公社处于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外代表公社，……他是选举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二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公社的基本共同特征

上面，我们罗列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的九种具体公社形态的特点，其间差异明显是多方面的。

从土地所有制方面看，形态各异，有的是公社所有制，有的是公社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相并列的双重形式，有的是个人所有制为主、公社所有制为辅，有的则公社及其成员均无土地所有权，所有权归于“最高的统一体”，或归于公社之外的地主。

就生产的形式来看，有的以公社为单位集体劳动，有的则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

就公社成员之间的血族关系来看，有的公社以成员间的血族关系为前提，有的则完全是没有血族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

就个人与公社的关系来看，在有的公社中，个人对公社只是一个不独立的存在，他对土地的占有必须以公社成员的身份为媒介，而在有的公社中，公社只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独立个人的联合。

就公社所涉及的阶级关系来看，有的公社内部包含有奴隶等等的非自由人，有的则不包含非自由人，有的公社，其成员是完全的自由人，而有的公社，其成员只是对公社具有所有权的最高所有者的财产，是“普遍奴隶制”下的奴隶。

就公社对外部的关系来说，虽然大部分公社是孤立、分散、互不联系、闭关自守的，但并非所有的公社都是这样。在整个社会中，有的时候公社是唯一的社会基层组织，有的时期它只是社会中一部分地区的基层组织。

就公社之上的上层建筑来看，有的公社之上尚无国家等政治机构，有的公社之上则矗立着集权的专制制度。

在上述这些方面，我们找不到它们的共同规定性。就以前学者所特别看重的土地所有制方面来说，公社所有制也并非其必然内涵，因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前资本主义公社质的规定。固然，在上述的罗列中，可以看出一项共同特征，即它们的经济形式都是农业和手工业

相结合的、或在内部有固定分工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但这并不能作为公社概念的特征性内涵，因为在各种形态的封建社会中，当公社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是社会基本的经济形式。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公社这一概念呢？笔者以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中，公社首先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社会基层组织，在社会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的整体而存在。马克思曾称公社是一个“自治制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9页。），“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小天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1页。）它的内部关系由公社自我调节，有着自己确定的内部规则，不论它与外界的关系怎样，在其内部都按自己的规则办事。例如，当马尔克公社完全丧失了土地所有权，移居在地主的土地上接受地主剥削时，它内部的活动仍然是“按照日耳曼的法律，即古代的马尔克法律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3页。）对于外部社会，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与之发生关系的，例如国家向公社征收赋役、地主或领主向公社征收地租、徭役，都是以公社为单位，外部社会与公社中具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公社这个中介。因此，我们说，公社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概念。

其次，公社也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它意味着公社内部有自己相对独立于外部社会的经济关系，这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不管公社对土地是否具有或具有何种程度的所有权，不管公社对外来说参予了怎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公社成员总有对于某些土地的平等使用权。例如在土地基本上为个人所有的日耳曼公社中，仍然有公共的猎场、牧场、采樵地供公社成员平等使用。在土地所有权实际归于“唯一的所有者”的亚细亚公社中，公社成员可以平等地得到份地的使用权。就是移居于地主土地的马尔克公社，在其内部各个成员间也具有平等的使用权，“每个人都分到家宅和园地，分到了一块同样大小的、用古代抽签方法决定的村有土地。每个人都有利用森林和牧场的权利，这多半是地主的森林，专用的马尔克比较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3页。）二、不论公社形态有何种差别，其成员都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例如，在亚细亚公社等公社中，

个人只有作为公社成员才能占有土地，他必须“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在日耳曼的公社中，“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来维持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6页。）。三、公社“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页。）。因此，它排斥商品经济，尽管在印度公社等形态中，公社为了缴纳国家赋税，必须出卖一部分产品，但这并不影响公社内部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四、在经济方面，公社对于外部社会当然也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关系的，公社成员个人与外部社会的经济关系，也同样必须通过公社这个中介方能实现。

总括上述，如果要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的前资本主义公社概念内涵作出某些确定的话，那么可以说，内部自成系统，自我调节，作为整体与外部社会发生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这是它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可以作为我们判定是否公社以及其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依据。

在以前的古史社会性质及土地制度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喜欢使用“公社残余”一词来解释历史现象。依据上述对于前资本主义公社的理解，这种说法显然不够妥当。这种说法以斯大林的理论为根据，将公社的公有制看为前资本主义公社的基本规定性，同时又将公有制看作与阶级社会截然对立的東西，因此，面对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公社无法自圆其说，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只好用“残余”来搪塞。“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公社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它作为该社会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该社会质的规定性之一。正像人身体里的阑尾，它比起食草动物要短得多，而且失去了消化功能，于是人们将其视为“残余”，甚至在有的国家曾经实行婴儿一出生就割去阑尾的作法，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阑尾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非赘物，当然也不能视其为“残余”。

第二章 西周土地制度研究

如果抛开把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核心与基础的旧观点，从生产关系的整体状况去观察所有制，那么我们对西周土地制度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看法。由于直接反映西周土地制度的史料过少，而春秋又与西周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尽管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但它毕竟保留了许多西周时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可以作为研究的一个资料来源。因此，当西周资料比较充分时，笔者尽量将所凭借以讨论的资料局限于西周，而当资料缺乏不得已之时，只好将使用资料的范围扩展及春秋。下面，我们先从西周史料中大量出现的“田”入手，探讨一下当时的土地制度。




第一节 析“田”

研究西周经济制度者，无不对含有“田”字的金文史料予以很大注意，但“田”的准确概念内涵究竟为何，却多被忽视，多依现代解释。仅仅看作“耕地”。当然，在金文和文献中，有一些“田”字确实仅只在“耕地”、甚至仅只在“土地”的意义上被使用，但局限于此，未必能了解“田”字真实、全面的本义，由此也影响到对一些重要经济史实的准确把握。笔者试图探寻“田”所包含的超出“耕地”的其他含义，特别是其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探讨西周的
土地制度。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出于克服反映西周社会有关资料极度匮乏障碍之目的，本节讨论暂将西周与春秋时期作为一个单元，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关系和土地制度视为同样的东西。

— “田”“邑”比较研究

仅仅局限于反映西周社会状况的金文和文献中有关“田”字的资料，很难对其予以准确把握，如果能找到相关联而又性质相类的其他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则较易了解其本义。西周时期，可以带来剥削收益的对象有许多种，如“族”（如《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宗”（如《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人”（如《易》（又称《周书》）：“易（锡）臣三品，州人、人、人。”）\“尸（夷）”（如《师西》：“王……册命师西：‘司乃且（祖）……西门尸（夷）尸（夷）尸（夷）京尸（夷）身尸（夷）’”）\“生（姓）”（如《宜侯》：“易（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伯”、“夫”（如《大孟鼎》：“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易（锡）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邑”（如《宜侯》：“易（锡）……厥邑卅又五。”）\“室”（如《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田”等等（能够带来剥削收益的有“族”、“宗”、“姓”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反过来说，凡称为“族”、“宗”、“姓”的都可以带来剥削收益，剥削者也使用着这一类名称。）。春秋时期有同时并列这几种对象的记载，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曰：“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夺薳居田，……又夺成然邑……”这几种对象均可以带来收益而为人们所争夺。笔者以为，相对“田”来说，“邑”是一种相关联进行研究的比较恰当的对象。下面，我们就通过分析“田”、“邑”之异同及其联系，对“田”的真正内涵试作考察。

1. “田”、“邑”形态不同，但都可带来剥削收益。

“邑”，甲骨文、金文皆从“邑”从“人”，“邑”当表示一定的地区范围，故“邑”用以表示居民点（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曰：“像人跪形，邑为人所居，故从人从邑。”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曰：“邑，甲骨文作，从，像地面上筑城或堤防之形，从在下，像人在城或堤下穴居席地而坐之形。”）。它必然包含土地、住房等内容，但核心内容是居住于其中的人，故字从“人”，因此《左传》中大量可见

“迁邑”、“以邑奔”、“邑叛”之类记载（如《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郛、郛、郛。”杜注曰：“齐欲灭纪，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如《左传·昭公元年》：“莒务娄、瞽胡及公子灭明以大廌与常仪靡奔齐。”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对“邑”的大小度量也着眼于人，如称曰：“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 “千室之邑”（《论语·公冶长》）。这是自然形成的人数不确定的“邑”，后来又产生了人为的有确定户数的“邑”，《国语·齐语》记管仲“制鄙三十家为邑”即此类。但不论人口或室户是否有定数，“邑”仍然以人作为着眼点，其度量标准是户。而“田”的基本内容是作为物的耕地，故对“田”的度量着眼于土地面积，金文中赏赐或交割时多讲明“田几田”，后一“田”即为量词，对此，金文及文献中有许多证据。《五祀卫鼎》有：“迺（乃）令参（三）有（司）……帅履裘卫厉田四田。迺（乃）舍（宇）于（厥）邑：（厥）逆（朔）疆（逮）厉田，（厥）东疆（逮）散田，（厥）南疆（逮）散田（暨）政父田，（厥）西疆（逮）厉田。”上文记述裘卫从厉那里得到了四“田”，其四界被严格划定，显然四“田”非四块田，而是一块田，但其地积为四个度量单位“田”。《敌簋》述“赐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于一邑有五十田，如果理解为在同一邑设五十块田，则管理殊为麻烦，缺乏可操作性，且没有必要，因此以理解为五十个度量单位“田”的耕地为妥。另外，以“田”为耕地度量单位并非仅存在于西周，战国时亦有，如《管子·乘马》曰：“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猪饲彦博注云：“制，十亩；田，五十亩。”学者亦早有解金文中“田几田”之后一“田”字为量词者，如唐兰先生释“田十田”曰：“上一‘田’字是名词，指农田。下一‘田’字，是田亩的量词。”（唐兰：《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年第5期。）当然，这时对量词意义上的“田”之大小度量，大概多采用间接度量的方法，而并非像后世那样一般采用直接度量方法，对此后文有详细讨论。“田”、“邑”性质与着眼点各不相同，因此文献中常可见到将二者区别对待的记载，如《左传·僖公元年》记曰：“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所赐之物，前一为“田”，后一为“邑”。

“田”、“邑”虽形态迥异，但都被作为赏赐的对象。金文赐“田”记载颇多，如《敌簋》“赐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不簋》“赐

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等等。赐“邑”记载也不少，如《宜侯 簋》“赐土，……厥邑卅又五”，《 铸》“赐之邑二百又九十九邑”。此外亦有赏赐或交割“里”的记载，如《大簋》“赐大乃里”，《九年卫鼎》“舍裘卫林 里”。《尔雅·释名》曰：“里，邑也。”《周礼·里宰》郑注：“邑，犹里也。”上述金文中的“里”也即“邑”。至于反映西周及春秋时期的《左传》等文献中，赐“田”、“邑”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既然“田”、“邑”均被作为赏赐对象，则显然它们都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可以借此剥削他人而获得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

“田”、“邑”的这种共性使二者间的交换得以存在。《 从 》记章、 二人以十数“邑”与 从交换“田”。文献中亦有类似记载，如《左传》隐公八年至桓公元年就叙述了鲁以“许田”与郑之“祊邑”交换的复杂经过。也正是由于这种共性，文献中可以见到混称“田”、“邑”的现象，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王取郕、刘、蔿、邾之田，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緄、……隰、怀。”此中温、原等皆为“邑”。又如，《春秋·宣公元年》曰：“齐人取济西田。”《公羊传·宣公元年》解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直接以“邑”称“田”。

当然，这里须说明一点，本文所讨论的“邑”并非笼统地指所有的“邑”，而是仅指成为被剥削对象的“邑”。有一些“邑”并非被剥削对象，仅有居民点含义，如统治者所居住的“邑”，其大者即为国都，如商之“天邑商”、“大邑商”，周东都之称“新邑”、“新大邑”，等等。

2.“田”必与一定的“邑”相联系。

金文中记述赏赐或交割“田”者，多指明其处于某“邑”，如《卯簋》“赐于乍一田，赐于 一田，赐于队一田，赐于 一田”，《大克鼎》“赐汝田于埜，赐汝田于淦”。有的虽未列举邑名，但指明属于“厥邑”，如《五祀卫鼎》“履裘卫厉田四田，乃舍 于厥邑”，《召鼎》“必尚卑处厥邑，田厥田”。文献中也同样，如《左传·昭公三年》记曰：“（晋侯对郑公孙段曰）‘赐女州田’，……初，州县，栾豹之邑也。”表明了“州田”与“州县（邑）”之关系。又如《左传·成公三年》曰：“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公羊传·成公三年》

亦解释曰：“棘者何？汶阳之不服邑也。”表明了棘（邑）与“汶阳之田”的关系。这种记述形式除了用以指明某“田”的地理位置而外，还指明了某“田”与某“邑”的确定联系，因为土地必须有人耕种，才能产生剩余产品。在人少地多的上古社会，要实现剥削，获得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首先需要以各种方式控制劳动者人身，从而建立起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确定社会关系，土地所有权往往处于次要的地位，仅仅占有土地并不足以形成这种关系，像后来较为发展的阶级社会中那样。因此《周易·系辞下》在谈到财富概念时说：“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根本没有提到土地，能带来财富的是人，是劳动力。对于“田”、“邑”之间的这种联系，金文和文献中有资料更清楚地表现了出来。《散氏盘》记、散双方交割“田”时，交付方有十五人参预，除官员“有司”之类外，还有“豆人”、“小门人”、“原人”、“人”之类有关“邑”的代表。《五祀卫鼎》记厉与裘卫交割“田”时，交付方除了邦君厉的代表“厉叔子夙、厉有司季”等而外，也有“荆人”、“井人”之类有关“邑”的代表。他们的参预，当然表明交付的“田”与他们所代表的“邑”利益相关，“田”的耕作当然是由这些“邑”来承担。《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一条记载更为生动。晋文公定周襄王有功，被赐予“阳樊、温、原、欑茅之田”，但“阳樊不服”，晋军围之。阳樊人“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作为德政，晋文公“乃出其民”。这条史料表明两点：一、“田”并不只是指一定量的耕地，还反映出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了控制阳樊之“田”的权力，也就有权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控制阳樊之人，晋文公出于某种考虑，放弃了这种人身控制权，“乃出其民”，成为一件德政，并被史籍特意记载了下来，正说明这种人身控制是正常的普遍现象，而这种人身控制首先应当与有关“田”的耕作联系在一起；二、据苍葛所说，阳樊之民人与周王室有一定姻亲关系，因而至少应当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独立性，并不能简单地将阳樊之民人等同于奴隶或农奴。上述这种“田”与“邑”的联系表明，“田”并不简单的只是“耕地”，更重要地，它包含着一定的人身控制关系，或者说，这种“田”只是一定社会剥削关系的表现物。由于“田”只是对某些“邑”之类集团整体进

行剥削的表现物，因此其必然靠近被剥削者集团居住地“邑”，而不一定靠近剥削者居住地。朱凤翰先生研究周原遗址出土各器群，如孟鼎诸器、克氏器群、散氏器群、井氏器群等，得出结论：“周原遗址地区只是这些贵族家族居址所在，是其亲族成员生活区，而其主要封土（土田、私邑）及属民并不在这里。”（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9 页。）这个结论完全符合西周实际，也与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召片领、召勐之类占有的“宣慰田”、“土司田”地理分布相一致。

3.“田”的全部收获归其所有者。

如果我们把“田”仅仅在一般意义上看作耕地，那么，作为实现剥削关系的生产资料，其收获物应当包含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两个部分，也就是说，占有“田”的贵族只能依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剥削关系状况，从其收获物中取得一定部分。但是，这种理解会在两个方面遇到矛盾。

首先从收益量来看。金文所见赐“田”最多者为《散簋》，于两地共百田，其余一般为数田或数十田。量词意义上的“田”究竟多大，金文中不见记载，文献则说法不一，《考工记·匠人》：“田首倍之。”郑注曰：“田，一夫之所佃百亩，方百步地。”《国语·鲁语下》：“季康子欲以田赋。”韦注引贾逵曰：“田，一井也。”有百亩和九百亩两说，目前学者多取一田百亩之说，如唐兰先生释“田十田”曰：“上一‘田’字是名词，指农田。下一‘田’字，是田亩的量词。《考工记·匠人》说：‘田首倍之。’注：‘田，一夫之所佃百亩。’那末，田十田是田一千亩。”（唐兰：《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 年第 5 期。）在计量手段有限的上古社会，对土地的度量往往不是直接的，一般采取间接的方式，类似情况在民族学资料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有的以种子来度量，如云南景颇族以箩种度量土地，一箩种水田约 4 亩、旱谷约 2.5 亩（马曜：《关于潞西县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藏族也是这样，其类似于斗的量器“克”（一般容谷物 25 ~ 28 斤），同时也是计算耕地面积的单位，一克地就是可以播种一克种子的土地（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7 页。）有的以牛耕来度量，如云南怒族

以“架”度量土地，所谓一“架”，就是正常情况下一条牛一天能够犁耕的土地面积，约折合两市亩（《碧江县一区九村怒族社会调查》，《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以想象，在尚未产生牛耕的西周时期，大概是以人力作为耕地度量标准，即所谓一“田”，大概就是一个成年男劳力可以耕作的土地，其更细划分的地积单位“亩”可能后来才产生。“亩”作为田间之垄，西周早已有之，《诗经》多见“南东其亩”的诗句。当需要对“田”作更细致划分的时候，作为垄之“亩”已经将“田”区分为若干小块，而且一般是均等的，这样，“亩”就自然成为“田”下更细致划分的单位。随着这样划分，一“田”便逐渐演化为后来的“一夫”耕作之“百亩”。西周时是否有作为地积单位之“亩”，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有，如《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当然，文献中此类记载多不可靠，很可能是由春秋战国推想西周。金文中有《贤簋》一器，其曰：“公命事，晦贤百晦（粮）。”郭沫若先生释曰：“晦，古亩字”，前一晦假借为贿，后一晦即地积之亩（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贤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如果郭沫若先生的考释确当，那么西周时已经产生作为地积单位之“亩”，百亩正合一“田”之数，当然这个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敲。根据以上讨论，作为量词的“田”，即一夫所能耕之土地，它后来演化为春秋战国的一夫所治田“百亩”，这种观点笔者以为是合理而可信的。

李悝曾计算过战国时期农民收支情况，“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平年亩收一石半，除上缴什一之税十五石而外，所获养活全家尚缺四百五十钱，而且“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还不计在内，只有丰年才略有盈余（《汉书·食货志》。战国秦汉亩有大小亩之分，石有大小石之别，故农民收支帐之类颇难计算。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研究认为：一家一百小亩大约是秦汉时每户垦田实际平均数字，依汉代一般农田平年亩产水平，每小亩大石一到二石，平均一石半，一家五口大小男女通计，每人平均月口粮1.2到1.54大石之间。根据这些数字，李悝的计算应当说是可信的。）。这就是说，百亩耕地平年总收入除去十一之税而外，最多只能养活农民之家五口，按此比例，什一之税只能养活剥削者0.5人。依此计之，《卯簋》所说被赐四田可养活剥削者二人，《散簋》所记被赐百田只可养活剥削者五十人，其收益量实在太小。据《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

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依此则《卯簋》所赐尚不足以维持下农夫生活，而金文中赐“田”数额最高之《散簋》所赐仅稍高于上士之入。上述推算尚略去以下方面：一、剥削者生活水平应大大高于被剥削者；二、战国生产水平应高出西周不少；三、战国亩积大出西周亩积一倍左右，周制“步百为亩”，而三家分晋前之魏即“制田以二百步为畛”，亩积已扩大为二百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孙子兵法 残简释文》，《文物》1974年第12期。）（不过若仅只局限于李悝所言，其所谓亩当为小亩，因其前曰：“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四、战国时连作制已有相当程度的推广，而西周时由于水利、施肥、管理等技术的低下，大多采用轮休制，得到相同收获物必须有更多的土地。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因素，则“田”的收益更少，显然极不合理。

其次，从占有耕地面积来看。金文所见赐“田”最多百田，一般仅数田，即最多周制万亩，一般为数百亩，这与赐“邑”、赐“人”以及战国时期的赐田形成鲜明对比。先看赐“邑”。金文所见赐“邑”有数十邑者，《宜侯 簋》曰：“易（锡）……厥 邑卅又五。”有数百邑者，《 罇》曰：“侯氏易（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文献所记春秋时赐“邑”一般也是数邑、数十邑，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郑伯赏入陈之功”，赐子展八邑、子产六邑，《襄公二十七年》记鲁公“与免余邑六十”。亦有涉及数百邑之资料，《论语·宪问》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一“邑”最小十室，“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论语·公冶长》。）多则百室，“（鲁）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一家人口，战国时如李悝、孟子等所讲，多为“五口之家”，但因时期及地区之不同，亦不乏“十口之家”、“百口之家”（《管子·海王》）。每家主要男劳动力当不止“一夫”，特别是家庭人口较多时，《周礼·小司徒》曰每家可负担徭役之强壮劳力（“可任者”）有三人、二人半、二人之别，《周礼·遂人》讲授田亦有“余夫”

之说。一夫治田百亩，首要条件是连作制，若轮休则还需增加耕地。魏授田一夫百亩，但邲因“田恶”需二百亩（《吕氏春秋·乐成》）。《周礼》叙述授田规模，在都鄙，“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在野，一夫授田百亩，另据肥瘠分上中下地，分别加授菜田五十、一百、二百亩（《周礼·地官·遂人》）。以上述数据推算，假定中等之“邑”一邑三十家，每家二夫，每夫受田一百五十亩（含轮休田），则一邑至少应占耕地九千亩，即九十田，这已接近金文所见赐“田”最大数额，更何况赐“邑”有数十数百之多者。再看赐“人”，金文所见动辄数百上千，《大盂鼎》记赐人鬲一千七百余，人，《宜侯 簋》记赐庶人等一千六百余人，《令簋》记赐鬲百人，《麦尊》记赐臣二百家，若按一劳动力须结合耕地一百五十亩计，就剥削收入而言，则相当于赐予耕地数百田至数千田，大大超出金文所见赐“田”数额。再比较战国时之赐田，《史记·赵世家》记赵烈侯赏赐郑歌者枪、石二人田各“万亩”，《战国策·魏策一》记魏王赐公叔痤田“百万”，赐吴起之后田“二十万”，赐巴宁、爨襄各田“十万”（此处“百万”、“二十万”、“十万”，以前一般解其单位为“亩”，本文此处暂依成说。张政烺《“土田十万”新解》（《文史》第29辑，1988年。）认为，《魏策一》所述之地积单位为步，此说对于解释西周以及春秋前期之“田”颇有启迪，但战国时期已普遍采用实物剥削形式，如果以步为计量单位，仍将“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耕地”，则依然存在收益量过低的障碍。以公孙痤被赐田百万步计之，魏制二百步为亩，合五千亩，依李悝之计算，其所提供剩余产品仅可养活剥削者二十五人，仅合《礼记·王制》所述上士之入。吴起之后受田二十万步，合一千亩，可养活剥削者五人，相当于《王制》下士之入。巴宁、爨襄受田十万步，合五百亩，可养活剥削者二人半，连《王制》下士之入也达不到。以上收益对于国家大官僚均显过低，即便以百步之亩计之，收益量予以加倍，也仅相当于《王制》所述下大夫、中士、下士之入，亦嫌偏少，且与《史记》所记赵侯赐郑歌者枪、石田各万亩很不协调。关于“土田十万”一条史料，其所反映时代稍前，本节后面另予讨论。），此时赵亩积已为二百四十步，魏亩积已为二百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孙子兵法 残简释文》，《文物》1974年第12期。），以此计之，则赐田分别相当于周时二百四十田、二万田、四千田、二千田，即使以周制百步亩计算，亦相当于周时百田、万田、二千田、千田，远远超过周金所见赐“田”。

要解除上述两大矛盾，较合理的解释就是“田”上的收获物全部归其所有者，即，“田”是专门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只有这样理解，受赐“田”者的经济收益才比较合理，受“田”数额也不显其小。如果郭沫若先生的考释妥当，那么1972年出土的《眉县大鼎》似可显示出“田”的这一特征。其铭曰：“唯八月初吉，王姜锡田三于（与）待。”郭沫若先生释曰：“‘于’是与字义，古文多如此用法。‘待’殆是刈字，像田中有禾穗被刈之意。‘锡田三于（与）待刈’，是说将三个田和田中有待收获的禾稻一并授予。”（郭沫若：《关于眉县大鼎铭辞考释》，《文物》1972年第7期。同期《文物》载史言《眉县杨家村大鼎》认为：“于”为介词，“待”为地名，即赐三田在待之地，与《敌簋》之“赐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相类。）依郭释，“田”之所有者对其上收获物具有全权。以一定土地上的收获物全部赏赐予某人，在金文中也有类似实例，如《贤簋》曰：“公命事，晦贤百晦（ ）。”郭沫若先生释曰：“晦，古亩字；晦贤百晦者，上晦字是动词，盖假为贿，犹赐也、予也。……下晦字则如字。……本铭当读为粮。……本器之贤则因公叔贿之以百亩之粮，故亦作为祭器以纪念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贤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眉县大鼎》与此相类，在赐予定量土地的同时，又赐予了该土地上有待收获的庄稼，因此可以讲通。

4.“田”、“邑”剥削方式之异同。

既然“田”与“邑”都可以带来一定的剥削收入，但其又被作为两类不同的事物，则显然其间在剥削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了解“田”的剥削方式，下面先来看看“邑”。

“邑”以“室”、也即人身作为基本计量单位，其着眼点在人，也就是说，其剥削的基本依据是对被剥削者人身某种方式的控制，因此直接的劳役剥削便成为必然。关于西周时期对“邑”的剥削形式，尚未见明确描述之系统资料，但笔者以为，《诗经·豳风·七月》应当说是对这种剥削方式的一个形象描述。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猗彼女桑。……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八月其获，……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八月

剥枣，十月获稻；……八月断壶，九月叔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这里的劳役剥削形形色色，除了农业方面的耕、种、收、藏、修农具、筑场圃而外，还有修桑、采桑、养蚕、纺织、染色、缝纫，以及打猎、练武、藏冰、修建等等，应有尽有。而要实现这种包罗万象式的劳役剥削，人身的控制显然是首要条件。

“田”作为特定的实现剩余劳动的耕地，为了实现其剥削，就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使被剥削者不得不在“田”上生产剩余产品。这种关系不可能是纯经济的，诸如后来的租佃关系或雇佣关系，因为如此则没有必要将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明确区别开来，直接的产品分割即可达到剥削目的。这种关系也不可能表现为直接的全面的人身控制，如奴隶制那样，因为如此也没有必要将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明确区分开来，剥削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最终产品上实现这种分割。较合理的推想，就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有一种相对较弱的群体人身控制关系，除了在“田”上实现剩余劳动而外，剥削者无权干预被剥削者群体内部的结构和生活，被剥削者有着相当大的人身自由，甚至可能与剥削者有某种姻亲血统关系。这个推测可从文献中找到说明。鲁僖公二十五年，周襄王赐晋文公阳樊等邑之“田”，“阳樊不服”，晋军围之，阳樊人仓葛述其理由曰：“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并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韦注：宣王臣仲山甫）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残其姻族”，“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国语·周语中》、《国语·晋语四》）。由此可见，阳樊人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内部结构，有宗庙（“宗祊”），有自己独立的传统（“有夏、商之嗣典”），参预周之政治，与周室有姻亲关系，但同时又须受周王或晋文公的控制，在阳樊之“田”上生产剩余产品，付出剩余劳动。类似事件在“汶阳之田”上也发生过，“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左传·成公三年》。）另外，相似的关系在《散氏盘》所记参与田土交割的人员身上也有所

反映，在参加踏勘与划界的人员之中，除了散与 两方有关人员外，还有豆人、小门人、原人、 人的代表，这些人即与阳樊之人相类，虽然被剥削但有着相当的自由权。

至此，我们可以对西周及春秋前期的“田”下一个初步的定义：“田”是仅仅用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不在其列，剥削者只关心“田”，通过“田”从被剥削者那里获取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至于其他的耕地，剥削者既不关心，也不干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经济关系，除了直接发生的部分而外，间接部分基本上是通过“田”作为中介来实现的。

二 有关“田”字史料的一些辨析

根据以上对“田”的讨论，西周和春秋经济史研究中一些涉及“田”字、而且曾经引起热烈讨论的问题似乎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下面试分别予以探讨。

1. “贮（ ）田”。

目前所见含“贮田”字样的金文资料仅有三器，为便于讨论，先摘抄有关内容如下。

《棚生簋》：

格伯受良马乘于棚生，厥卅田，则析。……铸宝簋，用典格伯田。

《卫盂》：

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八十朋，厥，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虎两、两、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

《五祀卫鼎》：

卫以邦君厉告于井（邢）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曰：厉曰，余执共王恤工，于昭太室东逆二川，曰，余舍汝田五田。正乃讯厉曰：汝田不？厉乃许曰：余审田五田。井（邢）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乃顙，使厉誓。乃令参有……帅履裘卫厉田四田，乃舍于厥邑。

这些资料引起学者浓厚兴趣，展开了热烈讨论，解说大致如下：

一、贮即租，贮田即贵族间的土地租典（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格伯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第6期），等等。）；二、贮即贾，贮田即贵族出卖土地产权（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格伯簋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183页，等等。）；三、贮即予，贮田即赐予土地，“有理由把它看成和称作是周王对土地的改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册附《观堂别集·颂壶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周望森：《西周的“贮田”与土地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等等。）。上述意见着眼点都在对“贮”

的考释上，而对“田”含义究竟为何则未予注意，因此歧见迭出。就《匜生簋》等三器而言，不管如何解释“贮”字，“贮田”毫无疑问是一种交换行为，一方付出了财物，获得了“田”，一方获得了财物，付出了“田”。《匜生簋》中，匜生付出“良马乘”，格伯付出“卅田”，两相交换。《卫盂》中，裘卫两次共付出价值百朋的瑾璋等物，矩伯获得财物，“舍”（给予）裘卫“田”十三田。《五祀卫鼎》虽未记述裘卫付给邦君厉哪些财物，但讲明是厉在为周王办事、“逆二川”时两人达成协议的，因此可以推想，这时的厉由于急需，类如《卫盂》中之矩伯，从裘卫处获得某些财物，因而答应给其“田”五田。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交换，而在于付出或获得“田”意味着什么。依本文前述讨论，“田”是被剥削者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因此，付出或获得“田”，只是付出或获得对于确定的被剥削者以确定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的权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转移，因而谈不上“卖出土地产权”，与后世土地买卖迥然相异，当然也就谈不上土地市场以及所谓土地的市场价格。它不是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因而也无法理解为土地租典，与后世的土地租赁和典当毫无共同之处。它也不是“改封”，因为分封必须具有“授土”、“授民”两方面内容，《宜侯簋》是典型实例，“改封”当然不能例外，而“贮田”不包含“授民”的内容。另外，分封、改封须有周王命令，但“贮田”三器不见周王踪影。不仅如此，周金所见“田”、“邑”之交割，凡双方和平达成协议者，参预者为双方有关人员，如《散氏盘》、《匜生簋》、《九年卫鼎》等，只有当双方出现纠纷、产生诉讼时，才会出现有关执政大臣，予以评断处置，如《攸从鼎》、《智鼎》、《五祀卫鼎》等，《卫盂》虽未记载发生何种纠纷，但说明是裘卫“彘告”于伯邑父等执政大臣，并由他们命令“参有司”到场交割“田”，因此仍可推断裘卫与矩伯之间发生了某种纠纷。

根据上述，具有交换性质的“贮田”仅仅发生于贵族之间，实质上仅仅是剥削收益权的某种转移，对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无改变，也未改变剩余产品在剥削者内部分配的基本方式，因此，它是西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固有内容，并非破坏西周土地制度、标志土地私有化历史进程已经发生的新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周

王赐晋文公阳樊之田中包含了阳樊人之人身，齐、鲁间交付汶阳之田必然涉及棘邑一样，上述三铭也有类似情况，其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如《棚生簋》中的 、 人等，《五祀卫鼎》的荆人敢、井（邢）人倡犀等，他们不属于交换双方的任何一方，独立于其外，当是耕种这些“田”的被剥削者“邑”之代表。

2. “公田”、“私田”。

《诗经·大田》曰：“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曾据此句对西周剥削形式作了一番推测。此句“私”为“私田”之省略，已无异议，但“公田”、“私田”究竟指什么，则因人们对古史分期、西周土地所有制形态和剥削形态、井田制有无等问题观点的不同，解释各异。理解不论如何分歧，着眼点都在于对“公”、“私”两字的解释上，同样未注意到“田”的具体含义，都仅仅在现代意义上理解为耕地。如果依本文的讨论，把“田”看作被剥削者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则“公田”、“私田”的区别就很清楚，是归属于不同等级贵族的“田”，同属于“田”的范畴以内，被剥削者用以生产必要产品的土地不在其列。本级贵族占有的“田”即“私田”，而上一级贵族所占有的“田”即为“公田”，大概下一级贵族要为上一级贵族代为管理这些“田”，因此才有了“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句。《吕氏春秋·务本》曰：“《诗》云：‘有渰淒淒，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可见，在《吕览》的作者看来，《大田》所说的“私”依然是贵族，“三王之佐”。笔者以为，《大田》的歌唱者很可能就是田峻自己。前面，他说各项农事活动的组织和安排都达到了曾孙的要求（“既备乃事，……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接着是希望“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最后则说自己很高兴，因为曾孙携带妇子光临耕作现场，还要举行盛大的宴享和祭祀，禋祀四方神灵（“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来方禋祀，……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看来，歌唱者为曾孙进行具体的劳动管理，有如西双版纳傣族的“陇达”，而这正是“田峻”的职责。“公田”，是他为曾孙管理的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田土，“我私”，则是他自己的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田土，也即其“职俸田”（当然与战国以后之职俸田并不相同），类如西双版纳傣族的“陇达田”。不论是

“公田”还是“私田”，都属于“田”，与农民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毫无干系。

其实，本文对“田”的理解在《诗经》中也可以得到形象的说明，《甫田》一篇详细描述了对“田”的管理。首先，“我”的“田”（或由“我”所负责管理的“田”）是由农夫耕作的，只有种好“我田”，农夫才能得到一些赏赐（“我田既臧，农夫三庆”）。其次，“田”的耕作是在监督下进行的，监督者有“我”（“今适南亩”）、有“曾孙”（“曾孙来止，以其妇子”；“曾孙不怒，农夫克敏”），还有田峻（“田峻至喜”，这个田峻或许即“我”本人）。最后，收获物是归于曾孙的（“曾孙之稼，如茨如梁”），而且产量有着某种最低的限度（“俶彼甫田，岁取十千”）。

由此来看，孟子虽然引用了《大田》此句，但实际上并不了解西周“田”的真正含义，他是在一般耕地的意义上来看待“田”，而将“公”解释为统治者，“私”解释为受田农民，由此推测西周实行“彻”法劳役剥削形式，并将《大田》诗句与他“方里而井”的设想统一起来。

3. 《散氏盘》。

对于西周土地制度研究来说，《散氏盘》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详细叙述了一块“田”的交付情况。下面先抄录有关文字如下：

用 散邑，廼（乃）即散用田。履自 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以下叙述勘界立封具体情况——摘抄者。）人有（司）履田：鲜且、微、武父、西宫襄，豆人虞、录、贞，师氏右眚，小门人，原人虞、淮、（司）工（空）虎、孝、丰父，有（司）荆，凡十又五夫。正履，舍散田，（司）土（徒）、（司）马人、（司）工（空）君、宰德父，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父、襄之有（司）囊、州、倏从，凡散有（司）十夫。……（以下为 人有司起誓记录——摘抄者。）厥受图，王于豆新宫东廷。厥左执 史正中农。

关于《散氏盘》，有多家考释，大意可通。文中“履”字，以前均释为“眉”，因此或解释为水湄，或解释为埧埧，或解释为田名，铭文内容或被看为关于“眉”和“井邑”两块“田”的交付（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散氏盘》，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裘卫诸器出土后，李学勤先

生据《五祀卫鼎》“帅履裘卫厉田四田”中之“履”字形，认为《散氏盘》中此字为“履”（李学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光明日报》1983年11月30日；《古文字学十二讲》第十讲《方法与成绩》，《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从而为《散氏盘》铭的正确解读奠定了重要基础。曲英杰先生《散盘图说》（《人文杂志》丛刊第2期《西周史研究》，1984年8月。）则对其中所交付田块描绘出示意图，使之更为易读。本文借用前人研究成果，不再考释铭文本身，只想从土地制度方面讨论一下有关内容。

铭文描述了 与散之间交付一块“田”的情况，叙述相当细致，是了解西周土地制度的珍贵资料。铭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所交付“田”面积不大。据曲英杰先生研究结果，该“田”为 形，有些边以“周道”、“原道”、“ 道”等为界，其余几边则立“封”为界，共立二十封。其“封”，有解释为“封树”的（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散氏盘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有解释为“封土”的（如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人盘》。），从秦《为田律》看，农田中之“封”当为土封，而且从“履田”当时实际情况推测，临时栽树总不如封土方便可靠。秦《为田律》曰：“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固然，《散氏盘》“封”之大小未必与其相同，但作为田界之“封”，当不会太大，比如说，1米多高的土封已经可以说是很大的了。“封”间距离究竟多大，文献中不见记载，从秦《为田律》看，“封”间以“埒”相连，方能形成完整田界，因此，“封”之设置必须以修筑“埒”方便为基本前提，至少应当是两“封”间可以清楚看到，例如其间距离在50米上下，当土地上杂草丛生时，距离可能还会更短，至多也不过百米上下，文中记述在同一条直线上有多个“封”，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样，即使以十“封”作为其某一边之边长，“封”间距离以百米计，最多当不过1公里，合周里两里多，整个“田”不过为数十“夫”所能耕之数十个百亩、即数十“田”，与金文所见赐“田”数额相统一。二、参与“田”交割的人员中有一些并非交予方和接受方人员。除“ 人有司”数人、“散有司十夫”而外，尚有“豆人”、“小门人”、“原人”、“ 人”之代表，从“履田”实际过程可见，“原”有“原道”，“ ”有“ 莫(墓)”，都在这块“田”近旁，“小门”大约类似，“豆”则是 王最后“授图”之地点，亦当在此附近。曲英杰先生认为： 付田地予散，同时包括生活于其上的

居民，豆、小门、原、等地之人即聚族生活劳作于此田地，“他们受治于族长和当地的首领(有司之类)，同时又要受到其上属的统治者(如王等)的管辖”，上属统治者可以改变其归属，但不能随意拆散或破坏其内部组织(曲英杰：《散盘图说》，《人文杂志》丛刊第2期《西周史研究》，1984年8月)。此说颇开拓思路，但如果仅仅在一般田地意义上来看待交付的这一块“田”，仍存在一些障碍，豆等被理解为“族”之类也好，理解为“邑”也好，一个最少当有十数家至数十家，一家劳动力也当不止于一夫，一夫耕百亩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考虑轮休则当多于百亩，相对于此，这一块田地还是过于小了。如果按照本文对“田”所作讨论，则铭文理解更为通畅，“田”是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耕地，因此数十夫所能耕数十“田”之收益对剥削者不能说是一个小数，故值得特意铸器铭记，而对于豆等四“族”或“邑”来说，在剩余劳动率为十分之一左右的水平下，在这样一块田地上专门从事剩余劳动，也确实不算少。正因为他们必须在这块田上付出剩余劳动，勘定“田”界时他们的代表参予全过程便更是情理中事。

4.“土食田”及其他。

《国语·晋语四》有一条史料，谈到了社会阶级的划分，向来为人们所注意，其中也涉及“田”，这段文字是：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

这段话中其他内容都比较好解，“土食田”三字，以前多理解为士凭借其占有的土地剥削他人，获取剥削收益。根据斯大林式的生产关系理论，根据人们对汉以后社会的了解，这种理解可以说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在西周及春秋那样一个以人身控制为实现剥削首要前提的社会中，依据土地进行剥削，劳动力来源于何，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段话中，“土食田”与“庶人食力”之间存在一个界限，前一部分均属于剥削者，“公食贡”，剥削的实现需要对被剥削者的直接人身控制，“大夫食邑”直接就控制着一定数量的人，“土食田”按照本文的解释，对“田”的控制本身就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对一定数量人身的控制，则这三种方式的剥削在本质上完全一样，只是形式和程度有差别而已，这样解释似乎更为通顺。韦昭注“土食田”曰：“受公田

也。”他这里的“公田”概念显然来自孟子，依照孟子的定义，“公田”是专门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在这个意义上，韦昭的理解应当说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也还可以推想，大概士还不具有剥削一个整邑的资格，通过“食田”则可以实现对一个邑剥削的分割，即几个士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一个邑的联合剥削。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大夫可以“食邑”，而士只能“食田”。

用这样的思路，类似的一些史料也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

此为赵简子誓众之辞。士显然是个分界线，前面是剥削者，后面是被剥削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与《晋语四》“大夫食邑”相同，其剥削的实现当然也是以人身控制为首要前提。“士田十万”，以前解释将“田”理解为一般耕地，“十万”的单位则被视为亩，杜预注“十万”曰：“十万亩也。”张政烺先生《“士田十万”新解》（《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首先提出，这里“十万”之地积单位当为步，“十万”即周制千亩。若仅用以解释春秋时期史料，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将其中“田”仍理解为一般耕地，则收入仍嫌太少。

《礼记·王制》曰“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十万步依周制为千亩，若据《吴问》所述三家分晋前之赵制，240步为亩，则仅为417亩。千亩为十夫能耕之田，即使其均为上农夫，所能提供剥削收入依李悝所计为十一之税，则其收仅相当于下士，若以赵制亩积，则距离下士亦远，且此等收益与仅高于士一级之下大夫差距甚大，下大夫所受为郡。如果按本文对“田”之理解，士所受田仅为实现剩余劳动之耕地，则“十万”之单位为步可以得到更顺畅的解释。依千亩计，其全部收益稍高于《王制》所述之下大夫，按赵240步亩积计，稍高于上士，比较合于情理。

（陈）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左传·哀公元年》。）

此处所问为国人，其身份地位较高。《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

襄王出，“国人纳之”；《僖公二十八年》，“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文公十八年》，莒纪公之太子仆“因国人以弑纪公”；《昭公十三年》，右尹子革谓楚灵王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也”；《成公十三年》，郑“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等等。国人可以纳君、出君、弑君、干预国家大政，连国君也怕众怒难犯。国人肯定有不同层次，时代不同，国人的组成及地位也有变化，但至少在一定时期，国人中包含了大臣。《国语·晋语三》记吕甥教郤乞“令国人于朝”，“且赏以悦众”，面对国人，吕甥却说：“吾君惭焉其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不亦惠乎？……”他称国人为“群臣”，而“群臣”又能“征缮以辅孺子”。显然，国人当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自食其力，而是靠剥削生活。关于《哀公元年》这段话，杜预注曰：“都邑之人无田者随党而立，不知所与，故直从所居，田在西者居右，田在东者居左。”杨伯峻先生注将此明确化，曰：“陈侯南面，其右为楚，其左为吴，田在西者邻楚，田在东者邻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67页。）此种解释未尝不通，但在一般耕地意义上理解“田”，仍有勉强之处。国人有无田、有田之分，那么无田之人如何生活？或曰，管仲制国为二十乡，有工商之乡六，此即无田之国人。但是，管仲“制国”之国人，与陈怀公所问之国人似乎有某些差别。管仲制国二十乡，仅士乡十五，即可提供军士三万人，且不说二十乡成员之身份地位是否高到须“问之”的地步，如此之多人聚于朝而问国之大政至少也是很难实际操作的事。因此，陈怀公所问国人当不是依靠自己劳动生活，其中较高级者大概有“邑”之类为食，较低者则以“田”为食或以职为食，后面一部分人中间所存在的有田与无田之区别，大概就是“陈人从田，无田从党”所指。

范文子……曰：“……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将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暱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国语·晋语六》。）

此为鄢之役后，晋范文子对栾武子所言。“益妇人田”而必须“夺大夫田”，这在后世不大好理解，因为就一般耕地而言，除了大夫之类贵族所控制的土地而外，应当还有大量国有土地（特别是大量未垦荒地），有小农个体家庭所控制的土地，在先秦地多人少的情况下，荒地

之类就更多，“益妇人田”首先需“夺大夫田”，而无须分割赏赐国有土地或“夺”个体小农土地，似乎不好理解。但是，如果依照本文对“田”字的新理解，则解释上述资料似乎更为通顺：这里的“田”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耕地，它是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它不仅包含土地这一物的内容，还包含一定的劳动力这一人的内容，社会劳动力总数确定，其所能提供剩余劳动也是确定的，这就决定了尽管有大量待开垦土地，但被劳动力数量所决定的“田”的数量却是一定的，因此，“益妇人田”就必须“夺大夫田”。

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公羊传·桓公元年》。）

桓公元年，鲁、郑之间以“许田”和“祊邑”的交换完成，《公羊传》在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时，特意对“许田”作了详细解说，曰：“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鲁朝宿之邑也，则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讳取周田，则何为谓之许田？系之许也。曷为系之许？近许也。此邑也，其称田何？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何休疏释此曰：“田多邑少称田者，谓邑外之田多，邑内家数少，如此之时，则称田，……言邑多田少称邑者，谓邑内家数多，而邑外之田顷亩少，如此之时，则称邑，……”后来学者对此条材料似乎多未予以注意，都沿从何休之解。何休将“田”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其解释基点是邑内户数与邑外土地数量的对应。就后世眼光看，这种解释非常正常，但仔细推敲，便存在问题，先秦人少地多，邑外土地除现实耕种者外，一般当有相当数量的荒地，如果将何休所解释的“田”只理解为土地，那么且不说怎样的土地数量对应于一户才算合适，仅只因为荒地的存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田多邑少”。如果认为何休的解释只是指现实的耕地，那么耕种多余耕地劳动力从何而来？笔者以为，如果以本文对西周“田”字含义的解释来看待这条材料，则非常通顺。“田”也好，“邑”也好，都是可以给剥削者带来剥削收益的对象，但二者在形态上存在重大差异。对于一个具体的剥削者来说，他所得到的—批剥削对象，其中可能既有“邑”，又有“田”，如果其中来自“邑”的收益多，则简称其为“邑”，如果来自“田”的收益大，则简称为“田”。

5．关于“土”与“田”的区别。

研究先秦土地制度者对有关土地买卖的资料极感兴趣，而春秋时期确有一条资料谈到“土”的买卖，该文见于《左传·襄公四年》：

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

这里的“土”与“田”并不一样，当为疆土之意。《大孟鼎》曰：“我其遘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左传·定公四年》曰：“聃季授土，陶叔授民。”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疆土是一个大的区划，通常作为国与国之间界限，而且一般都是大致的，并非后世那样精确，如《左传·定公四年》所述：“少皞之虚”、“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殷虚”等等，其意只在于对统治者之间划定界限，并不包含实现剥削关系的内容。而且就《襄公四年》所说戎狄之“土”而言，其显非耕地，由“荐居”可见，孔颖达疏曰：“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与此相对，“田”，则具有比较精确的界限，设立有“封”或“疆”，如我们在《散氏盘》和《五祀卫鼎》中所看到的那样，其面积一般较小，不仅明确是耕地，而且是仅仅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耕地，它所体现的主要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在次要的意义上，它也反映剥削者之间如何分割剥削收入的经济关系。

第二节 一个比照范例——近代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制度剖析

根据上节对“田”字的分析，西周耕地依据其所用以实现的社会关系之不同，在空间上被严格区分开来，一部分耕地专门用于实现剩余劳动，一部分耕地则专门用于实现必要劳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西周特有的土地制度。所有制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某种表现，那么，这种土地制度究竟是以何种生产关系作为基础和前提呢？鉴于有关史料仍然十分缺乏，本文试图先从民族学资料中寻找一种类似而且较为系统的土地制度，将其作为研究范例或比较参照对象，对之进行较充分地把握，然后在比较中探索西周社会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认识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在笔者看来，近代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是最为理想的参照对象和研究范例，经过许多学者的辛勤劳动，人们关于这一对象已有了比较充分的知识（本节资料主要来源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至“西双版纳之六”（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1984 年版）、《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一）》（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等著作，为避冗赘，非直接引文和个别具体事例，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一 耕地的划分

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的耕地根据其占有形态，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召片领、召勐之类剥削者控制土地、农民集体占有土地、个体农民占有土地，其中前两种是主要类型。下面分别予以叙述。

1．剥削者控制的土地。

剥削者控制土地又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纳召”、“纳召片领”(宣慰田)和“纳召勐”(土司田)，前者为召片领(西双版纳最高统治者)直接占有的土地，后者为各勐召勐(土司)直接占有的土地，均为世袭土地。第二种称为“纳波郎”(波郎田)，为召片领和召勐分赐给其属官或家臣波郎在职期间的薪俸田，此种土地不可世袭，卸职须交回。第三种有“纳道昆”(头人田)和“纳陇达”(陇达田)，前者为召片领或召勐划分给各农民村寨“头人”作为薪俸的土地，卸职必须交出，后者为领主选派对“宣慰田”、“土司田”及“波郎田”等等之耕作、收获进行监督的“陇达”(直译“下面的眼睛”)之薪俸田，亦不可世袭，卸职须交回。剥削者控制的这些土地少数集中于召片领、召勐等人的城堡周围，如勐海，多数分散于各农民村寨。它们最早都是由农民村寨无偿代耕的，后来有少数发生变化。据西双版纳全区统计，这一部分土地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4% (此处及下述村寨农民和个体农民占有土地比例数据均来自曹成章《傣族奴隶制和宗教婚姻》第五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据马曜提供的数据，这一部分土地占全部耕地的13%，农民占有的份地为86%。见《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经济调查总结报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2．村寨农民占有的土地。

村寨农民占有的土地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为村寨集体占有的土地，称为“纳曼”(寨公田)，由村寨成员分配使用，这部分土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58%。第二种称为“纳哈滚”(家族田)，是一个村寨中某些家族集体占有的土地，只有该家族成员才可分配使用，这部分土地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19%，个别

村寨中比例较高，如勐混、勐笼部分地区达到 30% ~ 40%。以上两类土地，即村寨农民占有的“寨公田”和“家族田”，总计占西双版纳全区耕地面积的 77%。

3．个体农民占有的土地。

个体农民直接占有的土地，称为“纳辛”(私田)，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 9%。其中一部分土地具有某种程度的私有财产性质，可以自由承袭转让，被称为“纳召庄”(召庄田)，属于由贵族中分化出来的“自由农民”召庄所有。一部分由“傣勐”、“滚很召”等级的被剥削者所占有，这些土地往往是在沟渠附近、房前屋后以及荒地上开垦出来的零星土地，只能暂时占有。此外还有一些是某些村寨头人开垦出来的私田，他们可以利用其特权，较长时期的占有。后两种“私田”未被纳入“负担”系统，如果离开村寨则不能继续占有，也不允许典当买卖(近代已偶有买卖现象发生，但只能“活卖”，相当于抵押典当，不能卖死)，而且依据习惯，往往在数年后被并入“寨公田”，因此，这部分土地严格来说不属私有财产，而是寨公田的一种变化形态而已。

二 剥削的实现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1 . 主要的剥削形式及其基本类型。

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剥削基本上采取劳役剥削的形式，它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在剥削者所占有土地上的无偿代耕，一种是为剥削者生活及社会公共事务无偿付出的各种劳役。

宣慰田和土司田或集中于其城堡周围，如在勐海，多数则分散于某些农民村寨，波朗田、陇达田、头人田则分散于各村寨。虽然解放前夕已有相当一部分改为分成实物剥削，这当然与内地影响有密切关系，但在数十年前，这些土地都是由农民携带自己的耕牛农具无偿代耕，剥削者坐享全部收获物。代耕承担者以村寨为基本单位，被代耕的土地按面积大小和离村寨的远近，分别划给一个或数个村寨负责。例如宣慰街附近有召片领的一块土地“纳永”，由曼纽、曼莫、曼依坎、曼景兰、曼火勐各寨代耕，其中曼纽寨子代耕二份，其余寨子代耕一份，由曼景兰寨子头人担任“陇达”，收获量按曼莫寨子农民自种土地收获量为标准，每份至少交纳谷子80挑，产量不足80挑则须补足（确定最低限额是由于村寨农民的反抗，曾发生农民将稻秧倒插于该田的事件），若有超产仍须全部上交（刀国栋等：《勐景洪的土地情况调查》，《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四）》，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或以村寨为单位，实行劳动编组，每个村寨承担不同的农业生产任务，某寨犁田、某寨插秧。例如景洪曼景兰附近有召片领的250亩宣慰田，由曼纽、曼喝勐、曼莫龙、曼东老、曼德、曼浓坎等六个傣勐村寨分工代耕，曼景兰滚很召村寨负责围篱笆、管田水（《傣族社会调查材料》之五，第31页，转引自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关于召片领占有的宣慰田及其代耕村寨的分布情况，马曜先生和缪鸾和先生曾绘制出了“勐景洪坝纳 召（宣慰田）分布示意图”（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可作为参考实例，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宣慰田相对集中，很多承担代耕的村寨附近并无宣慰田。每年到农作时节，召片领议事庭即发布命令，

通知各代耕村寨，代耕村寨则每一户（负担户）派出一个劳动力，自带农具、耕牛到“宣慰田”之类土地上去耕作，如因某种原因不能出工，则须雇人代替，否则要受处罚。耕种和收获期间，召片领、召勐等则派“陇达”（意为“下面的眼睛”）到田间督耕，有时召片领、召勐等人在官员和侍从的陪同下亲自到田间视察，还送去酒肉，待耕作完毕后给代耕农民食用，以示“犒劳”（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有一张村寨农民代耕完官田后，共同坐于田间食用被犒劳酒肉的照片，生动反映出代耕农民集体耕作的场面，十分珍贵，可供参考）。在被代耕的“官田”附近，召片领、召勐之类修建有谷仓，用以收藏“官田”所获全部谷物。波朗田和头人田则分布于各个村寨，绝大部分村寨都有这两类土地，这些土地由其所在村寨农民代耕。

除了代耕土地而外，村寨农民还要承担各种劳役，其中有各种公共劳役，也有从召片领、召勐到村寨头人的各种家内劳役。承担的内容因村寨类型而有不同。傣勐村寨多承担公共劳役，如修路、造桥、修水渠、修建宫室、服兵役以及“灵披勐”（召片领祭祀部落神活动）中的各种劳役等等。滚很召村寨则承担“召”生活方面的各种劳役，每个村寨都负担有一项或数项劳役，仅据景洪地区统计，各种专业劳役达一百多种，有挑水、烧茶、煮饭、炒菜、摆饭、掌灯、端洗脸水等日常生活劳役，有养马、养象、榨糖、熬盐、织布、纺纱、染布、制作金银陶瓦器皿和金属兵器等生产性劳役，有送信、听差、当脚夫、为召片领巡行拉大旗、摇孔雀尾、放炮、击鼓、吹号等带有公务性质的劳役，甚至还有专门守灵、哭丧、提绣鞋、牵统裙、削大便时所用揩屎棍等各种劳役。

据1954年调查资料，全西双版纳1948年各等级农民共19145户，该年向剥削者提供包括代耕在内的各种劳役共277000个劳动日，平均每户15个劳动日。据勐遮地区调查统计，傣勐和滚很召每年每户平均为召勐、波朗和村寨头人无偿代耕十天左右，各种家内劳役十天左右。有的多于此数，最高总计可达30天，有的少于此数，低者总计达12天（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农民每年有效劳动日肯定少于自然日数，如果以三分之二计，有效劳动日为240天，再考虑到代耕时间均为农忙关

键时间，质量高于一般劳动日，因此，最高30天、最低12天、平均15天的劳役剥削姑且按30%系数加值，平均为19.5天，另外再加上各种实物剥削，剥削率大致可以说在10%左右，与西周所谓“十一之税”类似。

除各种劳役剥削而外，还有实物贡纳，在各种节日，在“召”有婚丧嫁娶、生日满月、建屋出差、祭祀赎佛、“升和尚”等事项时，农民都要向“召”奉献银钱、米、鸡蛋、蜡条以及土产、水果等各种实物。

近代以来，西双版纳呈现出劳役剥削向实物剥削过渡的现象，不仅代耕劳役有被实物稻谷代替的现象，家内劳役也有用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稻谷或银币实物来取代者。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西双版纳傣族主要类型的剥削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村寨为基本单位，一是以劳役剥削为主要剥削形式。在这种剥削形态中，剥削的实现以对村寨农民集体的人身控制为首要条件，因为农民村寨都有自己的土地，农民个人可以通过村寨内的定期分地而与生产资料土地实现充分结合，如果召片领、召勐之类仅仅依据其所占有的土地（仅占西双版纳全地区耕地的14%），采用类似于后世租佃制等剥削方式，是根本无法实现其剥削的。这种人身控制关系在社会观念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在西双版纳，凡是‘召片领’领地以内的‘人民’，都是‘火丁给马兵卡闷松板卡召，烹总喝先信兵瓦兔召纳信’，意即每个人‘头脚落地是召的奴隶，亿万根头发都是召的财产’”。“提供负担是每个人的天职和作为‘人’的条件，所以凡是15岁以下未达负担年龄的少年，被视为没有取得‘人’的条件，他们死后‘也没有灵魂’，不能用棺装殓，村上也不帮助抬埋。”（马曜：《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经济调查总结报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但是，这种直接的人身控制关系一般情况下却并非直接对于农民个人的人身控制关系，而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整体控制关系，西双版纳傣族民谚说：“增加户口，头人欢喜，增加寨子，召勐（土司）欢喜”（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就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种关系。召勐之类的剥削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

寨有相对确定的“负担”，其中包括有最低产量要求的代耕“负担”、各种确定的劳役“负担”和实物贡纳“负担”，这些“负担”的分派以村寨为最小单位，其下如何继续分派，召勐之类一般并不进行干预，实际上也无法干预，他们实际上把村寨作为一种管理其中农民、以其所具有的类似后世联保制的机制来保证对其中农民剥削的实现。因此，他们的着眼点最终止于村寨，“增加寨子，召勐欢喜”，增加村寨即增加了土司剥削的基本单位，他们当然高兴。不仅如此，召勐之类还经常将自己的家奴释放出去或再加上外来投靠人口，组成新的滚很召村寨（这很像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奴隶被转入村社作为农民是很平常的事，如土特摩斯三世送给阿蒙神庙的奴隶就被转入村社。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61 页。），解放前近百年时间以内，这类人口及其村寨增长速度都是相当可观的。至于上面分派下来的“负担”在村寨内部又如何进行二次分派，则不属于召片领、召勐与被剥削者村寨之间经济关系以内，这是由村寨通过自己的内部结构与机制自行调节与处理的。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终止于召勐之类与村寨之间，并不包含向下更基层的内容，这种关系集中表现在专门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宣慰田”、“土司田”、“波朗田”、“陇达田”、“头人田”以及各种其他劳役和贡纳上面。当然，最初召片领、召勐之类确定某一村寨总“负担”额时，似乎是以户口为基本依据，因此有所谓“负担户”之说，而并非以土地为依据。村寨内部为了减轻共同负担，最常见的方法是集体隐瞒负担户数，实际承担平均“负担”的自然户数往往多于名义上的负担户数。对于此种现象，召勐之类也颇伤脑筋，想方设法予以解决，设立了所谓“火西”制度，但这种制度在实际施行中仍然无法干预到村寨的内部事务。

三 被剥削者村寨内部的经济关系

召勐之类进行剥削的直接对象一般情况下终止于村寨，而作为提供剩余劳动最基层单位的村寨，本身内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调节系统，有一套足以独立自存的组织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内部分工。村寨内，有被村寨成员称为“寨父”、“寨母”，又被召勐之类加封为“叭”、“蚌”、“ ”的当权头人，他们有管理居民迁徙、代表村寨接受新成员、管理村寨土地、征收并上缴各种劳役贡赋、管理宗教事务、管理婚姻及调解争端等职权。在他们下面，有管理武装的“昆悍”，有向下传达、向上反映、类似“乡老”的“陶格”，有通讯跑腿的“波板”，有职掌文书的“昆欠”，有管水利的“板门”，有管“社神”的“波摩”，有管佛寺的“波沾”，有男女青年的领头人“乃髦”和“乃少”等等。此外，还有处理日常事务的“贯”、即“村寨议事会”，处理涉及全村寨重大问题的“村寨民众会”。

村寨内部还有处理公共事务“甘曼”(寨内负担)的一套制度，据解放初期调查，有如下几类。协作：包括开水渠、建堤坝、挖鱼塘、围鱼塘边、围村寨竹篱、修村内外道路等诸项事务，规定视具体情况，或由受益户出工，或全村寨每户出一人，直到作完。互助：新立户和外来户免出一至三年的寨内负担并给予补助，遇建屋或丧葬，全村寨出工出力帮助。宗教：每个村寨成员都必须参加斋僧、赎佛、祭社神、养波摩、修佛寺等宗教活动。

一些村寨还设有银工、金工、铁工、木工、猎手、屠夫、酒师、商人、理发师、医生、“章哈”(诗人兼歌手)、马医、阴阳家等等，虽然不一定每寨都设全，但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自己村寨的需要。他们都不脱离农业生产，一般可以免除部分负担，但须为召勐之类无偿服各种专业劳役。

各个村寨占有的土地也是完全确定的，有着严格的地域界限，这不仅是其占有土地的界限，也是承担“负担”的界限，由村寨成员共同把守。由于村寨是由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发展而来，因此各个

村寨占有的土地多寡不一，表现出较大的差别。

村寨内的土地以份地的形式交给寨内农民使用。分配形式形形色色，有的由各户按劳动力多寡自由占用耕地，有的采用打乱原有土地占用状况、重新按户平均分配的办法，但这两种形式都较为少见，大多数村寨经常采用的是在原耕地占用基础上定期抽补调整的办法。村寨内部的土地分配不受外界干预，它并不是以自然的人口数或户数来作为标准，而是按“负担”来分配，凡是可以承担一份“负担”者就可以得到一份份地，如果只能承担半份“负担”，就只能分得半份份地。每一份田地面积多大亦无规定，由村寨自行掌握。这大概是由于召勐之类最初是以户数而非以土地面积确定了一村寨的总“负担”额，村寨是最基本的“负担”单位，以后人口发生了变化，村寨便自行调整，按照能够承担“负担”的农户平均分配“负担”，同时使之得到相应的份地。份地与“负担”密切相关，耕种一份份地，就要相应承担一份“负担”，这份“负担”实际就是村寨总体“负担”按照其中接受份地的农民户数均分的。

在召勐之类为一极、村寨整体为一极的这种确定的剥削关系之中，村寨的存在以提供确定的剩余劳动为必须条件，因此无论对于村寨整体来说，还是对于其中的每一户农民来说，如何完成“负担”都是极为重要的事。在各村寨内部，为完成各种“负担”，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黑召”制度。这种制度首先表现为负担户的形成，每一负担户在承担一定负担的同时，便享有了村寨内部包括得到份地在内的各种权利。村寨内村民，15岁至结婚前即为所谓“学负担”时期，分给成年人应得份地的四分之一，承担成年人“负担”的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五十岁方可申请退田，退田要先经过村寨头人同意，然后逐级上报火西叭龙、波朗、叭龙诰直至召勐等各级统治者。在村寨里，“负担”的概念深入人心，解放初，村寨甚至把出民工、选组长、送民族学院学习都视为“负担”，由各“负担户”轮流承担，在其所用工日超过应承担的“负担”额时，村寨内部还以各种方式予以补偿。在这个基础上，各个村寨内部都有一套轮流平分“负担”的具体办法，既能使“负担”顺利完成，又使村民感觉到公平合理。

因为各种剥削的最终对象是村寨整体，其数量和项目又是相对确

定的，村寨户口多少便直接关系到每户所实际承受的“负担”额，所以，村寨内部都力图通过增加实际“负担户”来减少各户“负担”，无力承担一份“负担”者必须两三户合为一个“负担户”，“遇有分家户或外来户，大家都乐意分给他一份，如果没有机动田，还不惜抽补调整，甚至打乱重分”。各村寨还以各种办法吸引外来者成为其“负担户”，合伙凑钱给外来户作安家费，大家出劳力、材料为其盖房子，一定期间内免除或减少其“负担”。例如，勐海曼回宫寨人少地多，全寨置备“安家费”以吸引外来户，路远者给70挑谷子，路近者给50挑或30挑；景洪曼列寨人多地少，就集体租进土地给外来者，租子由全寨人员分摊，曼海寨人多地少，则由集体出钱买进几块土地（活买，定期几年），分给外来户耕种（马曜等：《勐海封建领主经济概况》，《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五）》，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对于因婚姻关系而去外村寨上门者，原村寨有严格限制，若未得头人同意，原村寨“负担”仍由其出，而对于上门者，女方村寨则尽量设法使之能留下来。对于因其他原因脱离村寨者，也要受到严格限制，一方面本村寨对之有强烈的舆论压力，一方面村寨头人则用种种方法予以刁难。傣族民谚说：“多了一户，飘起一点，少了一户，沉下一点。”“增加户口，头人欢喜”（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形象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也因为召勐之类的剥削和统治以村寨为最基本的单位，一般情况下并不干预村寨内部事务，因此村寨经济活动有非常大的独立性，它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各种经济行为，诸如吸收人口、阻止人口外流、租出或租进土地等。例如，解放前夕，和其他数寨共同代耕召片领在宣慰街附近一块土地“纳永”的曼纽寨子，将应由自己代耕的两份田地租给曼景兰寨子耕种，后者每份田地交租25挑，然后由曼纽寨子补足为80挑再予上交。与此同时，曼列、曼沙、曼令三寨都租曼纽寨子的田种（刀国栋等：《勐景洪的土地情况调查》，《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四）》，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参照本文第一章第三节的讨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资本主义公社概念内涵所作的论述，内部自成系统、自我调节、整体与外部社会发生关系是公社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上述西双版纳被剥削者村寨明显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范畴以内。

四 西双版纳傣族生产关系的形成条件

根据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大致地对西双版纳傣族生产关系作出描述：去除各种次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进入近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生产关系表现为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召片领、召勐、波朗等等以至部分头人，一方面则是村寨整体，前者获得剩余劳动，村寨提供剩余劳动；剥削实现的基本依据是召片领等人对村寨整体的人身控制，因此，劳役剥削成为基本的剥削形态，与此相应，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则表现为村寨对大部分耕地的占有，如前所述，达到西双版纳全区耕地面积的 77%；召片领之类直接占有土地仅只有 14%，然而这些土地却是被剥削村寨实现剩余劳动的所在；召片领之类除了向村寨索取“负担”而外，一般并不干预村寨内部事务，村寨本身表现为一个自我调节内部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整体面对社会并与之发生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下，社会的土地制度由两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范围只是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土地，即“宣慰田”、“土司田”、“波朗田”、“头人田”之类，一般具有法定(成文或不成文)的形态。这一层次土地制度所涉及的土地，是土司之类剥削村寨这一社会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中介，因而表现出鲜明的所有制色彩。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一端终止于村寨，相应，这一层次的土地制度也终止于此。它并不涉及全部的耕地，村寨土地则由村寨自行控制、调节，不在这一层次土地制度的管辖之下。第二个层次则是被剥削者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的范围则限于村寨所控制的土地，一般不具有国家法定的形态，而以习惯的形式存在。它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村寨整体对土地的占有方式，它是各村寨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一是村寨内部对土地的分配、使用方式，它是村寨内部各成员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这两个层次显然不能同等而语。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土地制度，那么，其基本内容应是土地制度的第一层次，即涉及“宣慰田”、“土司田”之类土地的制度，只有当我们的考察深入到被剥削者村寨这一极之内部的时候，

第二层次的土地制度才成为我们的主要对象。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方，一国与外国存在着国际性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所有制，该国内部各地区各民族、以至各地区各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也表现为确定的所有制，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国内部的经济关系归入国际关系之内，不能把一国内部的所有制形态归入到国际的所有制关系中去，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那么，近代西双版纳这种生产关系以及土地制度究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以怎样的方式形成的呢？为了更深入地予以解释，有必要再进行一些讨论。

从西双版纳傣族生产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它是在外来居民对本地居民的不断征服中形成的。它的形成以及存在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外来人对本地人的统治，一是人少地多。

关于第一个条件，民族调查已经了解清楚，在这里表现出一种多层的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据说西双版纳地区定居最早的民族是补角、布朗，其次是爱尼，傣族是最后来的，当时平坝里已经住着布朗族和爱尼族。傣族征服了他们，所以傣族称他们为“卡”（奴隶），他们称傣族的上层为“波朗”，称一般傣族的成年男女为“依波”（我父）或“依咩”（我母）。在布朗族与爱尼族杂居的地方，爱尼族受布朗族管辖，爱尼族称布朗族头人为“波藤”或“召藤”，即山主之意。他们都要向傣族交纳贡赋，但爱尼族要交两份，傣族波朗和布朗族波藤各得一份。而在傣族中，相对来说，傣勐是土著，本地人，召片领、波朗等等则是以后来到此地的统治者，据《泐史》，距今约800年前，叭真“入主勐泐”，建立政权，形成了此后直到解放时西双版纳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基本格局。因此，傣勐说：“先有傣勐，才有田，召片领是后来的。”“若无我们先来开荒，召片领及波朗什么也吃不上。”“宣慰田、波朗田都是因为他们为我们办事，可怜而给他们吃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社会概况》，转引自赵卫邦《解放前西双版纳的社会结构》，《西南民族研究》第1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关于对傣勐村寨的以村寨为基础的剥削制度的建立，马曜先生研究傣族史后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勐“召勐”（土司）统治的形成，

都是在该勐被征服以后，由召片领把自己的宗室亲信直接派到各勐作“召勐”，建立起来的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对于山区被征服的哈尼、布朗、基诺等其他民族，仍以各自原有的土地封赐给这些民族的头人，征收一定的贡赋。（马曜：《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经济调查总结报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对于一般的农业社会来说，由征服而形成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往往并不改动被征服者的内部结构。例如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实即一个居民点——引者），他们就征收沉重的实物贡赋，并留下赋税征集人来监督支付，但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法律和政府。”（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四川民族研究所 1980 年版，第 242 页。）西双版纳傣族以及哈尼、布朗、基诺等也是这样，征服者或仅派出统治人员“召勐”之类，或干脆仍利用原有的头人。

征服是很艰难的事，单纯的武力并不能使一个民族、部落或村寨彻底屈服，在西双版纳傣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实例。在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傣勐寨子中，最隆重的仪节是“灵披勐”，即祭祀“勐”神（部落神），各勐主持祭祀的都是“傣勐”老寨的头人，而并非统治者土司之类。在勐海，土司参加这项仪节，但是任由“傣勐”把他禁闭在一间空房里，杀牛祭献“勐”神时，不许土司说话，也不许他动，否则“傣勐”头人可以打他耳光（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6 页。）。

另一个条件便是人少地多。土地的使用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土地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受到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影响与制约，农耕人口与可耕地之间的比例作为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一种表现，当然不能不对生产关系以至土地制度发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在民族学资料中可以大量看到。例如在许多西南少数民族中，人少地多是普遍现象，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存在，而人少地多和刀耕火种，又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占有和控制方式采取了极为松散的、在后世人看来简直不可理解的方式，西南少数民族中大量存在的“号地制”（号地制是西南少数民族中常见的村社内部农民占有、使用土地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实行于原始的村社之内，也可以实行于山官、土司统治下的村社

之内。一般形态是：村社农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村社土地范围内，选择一块或几块土地，标明边界记号，多见的是折断树梢并在树上留某种记号，然后就可使用（有时需报告山官之类），几年后抛荒，土地又重归村社。），就是这种方式的一个典型。在人少地多条件的制约下，若与此同时，土地私有制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形态，类如我国自宋代以后的形态、或类如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以后的形态，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便很难以土地作为基本的或主要的依据，因为生产者可以通过开荒等等方式实现自己与生产资料土地的充分结合，而剥削者对土地的严密控制也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在这种条件之下，剥削只能以对人身体的控制为基本或主要的依据。如果这种因素再加入历史地存在下来的人们的共同体村社，而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形成又与征服联系在一起，那么西双版纳傣族式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土地所有制便成为必然。

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西双版纳地区应当说是农业生产相对发展的地区，但即使在这里，人少地多的现象仍很突出。西双版纳气候温暖，水稻一年可二三熟，但人们仅种一季，多为晚稻，其主要原因就是地广人稀，拥有丰富的水田。“即使如此，仍有未被利用的大量荒田存在，例如景洪盆地拥有水田 11 万亩，但每年仅栽种 55000 亩，仅占水田面积之半，勐遮盆地拥有 181500 亩地，其中休耕的荒田荒地 67000 余亩，占田地总面积的 36.9%。”（宋恩常：《西双版纳自然概况》，《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一）》，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

人少地多不仅对整个地区的生产关系具体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对村寨内部的土地分配方式也发生着巨大影响。例如，“曼卖 傣勐村寨在五十年以前还是人少地多，村民按劳动力多寡自由占用土地，后来人口激增，开始因占用不平均而发生争执，便打乱原有占用土地界限，重新平分了一次。”（马曜：《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经济调查总结报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人口的增多，农业人口与可耕地资源之间关系的变动，不仅必然影响到耕作方式，也必然最终影响到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以及建立于此基础之上的土地制度。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生产关系与土地制度

作了关于“田”性质的讨论，又有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生产关系作为参照对象，西周的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依据和基础的土地制度便比较容易讨论了。讨论自然要从剥削与被剥削这个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最关键和最核心的关系入手。

一 被剥削者的存在类型

谈到剥削关系，自然必须首先了解其两极：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西周时期，剥削者比较清楚，这就是周王、诸侯、大夫、士等各级贵族。至于被剥削者，以前的分析多较粗略，故本文拟稍多讨论。被剥削者称呼多种多样，目前所见有如下一些：

1. 族。

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使之职事于鲁。分之土田陪敦，……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左传·定公四年》。）

这里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都是被周统治者以“族”为单位整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条”、“徐”、“陶”、“施”之类即其族名。“陪敦”、“商奄之民”也是这样的集团。“土田陪敦”即《诗经·閟宫》的“土田附庸”、《召伯虎簋》的“仆墉土田”，孙贻让、王国维早有论述。《礼记·王制》曰：“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玄注曰：“附庸者，以国事附于大国，未能以其名通也。”《孟子·万章下》也有同样的说法。这种附庸既然被周成王与殷民六族一起同等地分予鲁公，可见也是一些小的被剥削者集团，或是“族”，或是“族”的集合体。“因商奄之民”，即沿袭原被商统治者整体统治的奄地之民，马宗璉《春秋左传补注》曰：“奄本殷诸侯，故曰‘商奄’。”《班簋》有：“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士驭、人伐东国戎”。郭沫若先生释曰：“戎当即奄人。”（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班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可见，奄民也是被周统治者整体征服和统治的，大概也属于“族”或“族”的集合体，成为一集体的被剥削对象。

2. 宗。

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左传·定公四年》。）

此处分予唐叔的“怀姓九宗”，当与分予鲁公的殷民六族、康叔的殷民七族相类，都是以“族”为单位而被整体剥削的。这里的“职官五正”，当是“怀姓九宗”的首领人物，虽然他们同时是被赐予对象，但在社会上仍具有贵族身份，具有较高政治地位，《左传·隐公六年》记曰：“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春秋时期，“职官五正”仍然参预重要政治活动而被史籍记载了下来。

3. 人。

易（锡）臣三品，州人、 人、 人。（《 簋》，又称《周公簋》。）

郭沫若先生释曰：“此所赐之‘州人、 人、 人’，殆渭水沿岸之部落氏族。”（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周公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易（锡）女（汝）井、 、 人，易（锡）女（汝）井人奔于。（《大克鼎》。）

郭沫若先生释此曰：“井、 、 均国族名， 字在此说为藉亦可通，盖用为奴籍之籍。”（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大克鼎》，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班簋》中被命以出兵征伐之“ 人”，郭沫若先生疑为冶铁工人（郭沫若：《班的再发现》，《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但若将此与“州人”、“井人”看为一类，似更为恰当。这些“人”被作为赐予对象，显然是被剥削者无疑，前面又冠以“州”、“井”等字样，当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为国族之名，“ ”当与“州”、“井”相同，亦是国族之名，与《左传》所说之“条氏”、“肖氏”等类似。因此，这些“人”也是以“族”为单位被整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

4. 尸（夷）。

王……册命师酉：“（司）乃且（祖）……西门尸（夷）、 尸（夷）、 尸（夷）、京尸（夷）、 身尸（夷）。”（《师酉簋》。）

今余令女（汝）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 夷、京夷、 夷、师笱侧薪、 华夷、由 夷、 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匭簋》，见郭沫若《弭叔簋 及 匭簋 考释》，《文物》1960年第2期。）

此处之“夷”乃非华夏族之其他民族，其前所冠“西门”等字样当系其国族之名，是类似于“殷民六族”之类的集团，它们又是被“官司”之对象，同时被“官司”者又有“ 人”、“戍秦人”、“降人”之

类，故其亦当属被整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

5. 生（姓）

易（锡）在宜王人 又七生（姓）。（《宜侯 簋》。）

对此，郭沫若先生考释曰：“生假为姓。一姓代表一族，则‘王人’下所缺一字当为十，为数不能过多。‘王人’之在宜者当即殷王之人，原为贵族，故有姓，今亦转化为奴，而成赐与之物。”（郭沫若：《[铭文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唐兰先生释“王人”为“王国的人”，“就是王臣”（唐兰：《[宜侯 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韩连琪先生则认为：“王人即作为公社的井田中的农民”（韩连琪：《[西周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这里且不讨论哪种说法更为恰当，既以“姓”为标志和单位，可见也是以血族关系为纽带的某种集团，和“殷民六族”同类，既为被赐予之人，身份为被剥削者无疑，因此也是被整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

6. 邑。

易（锡）……厥 邑卅又五。（《宜侯 簋》。）

金文和文献中涉及春秋时期的邑的资料数不胜数，这里不再列举。关于邑，本章第一节已经作过一些讨论，它也是以劳动者人身为基本依据、被整体控制的被剥削者集团。当然，如第一节所述，本文讨论的“邑”并非笼统指所有的“邑”，而只是成为被剥削对象的“邑”。

以上这些，都是集团整体的被剥削对象。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被剥削者虽然不是以集团整体的形式出现，但似乎还保留着集团的痕迹。

7. 伯、夫。

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 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易（锡）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大盂鼎](#)》。）

锡奠七伯，厥甿 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十〕夫。（《[宜侯 簋](#)》。）

虽然这里的“人鬲”、甿、庶人均以夫为单位计算，不表现出任何集团的形式，但在此前又赐有以“伯”计数的“邦司”、“夷司王臣”等人物，他们当是类如“职官五正”那样的被剥削者集团的首领人物，将以“伯”计数者和以“夫”计数者同时赐予，其间似乎应当有某种

联系，也就是说，他们或许仍然以集团整体而存在，但当时统治者暂不将其作集团整体看待，或许曾经是集团整体，现在刚被拆散，但其中人员身份差别尚未消失。

当然，也有一些被剥削者不再保留集团整体的痕迹，但其数量都较小。如：

姜商（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令簋》。）

王易（锡）叔德臣 十人、贝十朋、羊百。（《叔德簋》。）

“侯休于耳，易（锡）臣十家。”（《耳尊》。）

“王才，已夕，侯易（锡）者 臣二百家。”（《麦尊》。）

“王曰：令 畚，乃克至，余其舍女（汝）臣卅家。”（《令鼎》。“卅”一释为“十”。）

“王曰：，……易（锡）女（汝）尸臣十家，用事。”（《簋》。）

“白（伯）大师易（锡）白（伯）克仆卅夫。”（《伯克壶》。）

“易（锡）女（汝）……尸（夷）允三百人。”（《师询簋》。）

“白（伯）氏曰：……易（赐）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不簋》。）

“易（赐）几父……仆四家、金十钧。”（《几父壶》。）

这些被剥削者或以个人身份出现，或以家庭形式出现，不带有集团的色彩，一般不过数十人或数十家，最多者也只有“夷允三百人”，因此可以估计，这些人大概主要被用为家务劳动，身份可能是奴隶。

二 剥削关系与剥削的实现

前述列举可以使我們得到一个初步印象，西周时期，被剥削者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族”、“宗”等等集团整体。与此相应，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主要剥削形式是对其进行集团整体的剥削，而并不触动其内部结构，就像召勳之类对待倭勳村寨一样。西周后期，发生过一个重大事件，这就是周宣王“料民太原”，对于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存在形式以及剥削者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形式来说，这个事件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国语·周语上》记述这一事件说：

宣王既丧南国^①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廩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獮于既烝，獮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这段记载可以说明许多问题。首先，在周宣王以前，以王室为代表的国家并不清点被剥削者人口数量，可见，剥削者对被剥削者是以集团整体形式进行剥削的，有如西双版纳召片领、召勳之类对村寨的剥削，他们并不具体深入村寨把握其中人口数量。其次，周宣王之前，是“不料民而知其多少”，显然，这种“知”只能是基于剥削收入的“知”，也就是说，是依据所得收入而对被剥削者人口的把握，类如西双版纳村寨中的“负担户”，但这与被剥削者实际人口数量一般情况下并不一致，而且往往是自然人口多于“负担”人口，因此周宣王方能产生“料民”的念头，因此仲山父才称宣王之“料民”为“示少而恶事也”。再次，周王室对被剥削者控制和剥削的实现通过一个中间层次，这就是“司民”、“司商”、“司徒”等，这些人看来并非周王室或地方政府直接统辖下的国家官吏（对于这些人物，韦昭注均依《周礼》解为中央职官。从金文资

料看，西周中央职官中确实有“司徒”之类，而且地位相当高，但在地方以至被剥削者集团内部，似乎也有类似名称的人物，他们的职责大概与中央相应职官有类似之处。《散氏盘》中，一方有“司工(空)虎”，如果更准确一些说，此人名前冠以“原人”，当为原人集团的代表，亦当为原人内部的首领人物，但无论如何理解，其显然并非中央职官。“散有司十夫”之中，明确记有“司徒”、“司马”、“司工(空)”各一人，此为散之属员，亦非中央职官。《卫盂》、《五祀卫鼎》中之“参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空)”，似乎也是如此，他们为“伯邑父”等人所“令”，去具体实施“履田”职责，身份地位似乎并不很高，当亦为“伯邑父”等官员的下属。以此来看，《周语》所述之“司民”、“司徒”等人当系被剥削者集团内部之有职责者，这样对理解《国语》上述史料似乎也更为恰当。) 像后世的国家官员那样，因为如此，周宣王的“料民”之举完全可以通过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这样一个系统进行，而不必另外举行。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类比于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他们当如头人及其以下的“昆悍”、“陶格”、“波板”、“昆欠”等等，周王室对被剥削者的控制和剥削通过他们具体实现。最后，仲山父说，无故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并将周至幽王而灭的原因归之于此。这些言论则显示出，在双方力量的对比上，统治者、剥削者并非占有绝对优势，被剥削者亦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可以在政治上发挥一定作用。就像在西双版纳，尽管是召勐，也必须对村寨的传统表示相当的敬畏，而傣勐也可以说，因为“可怜”召勐之类才给他们种田，让他们吃饭。

西周社会主要的剥削对象是“族”、“邑”等集团整体，但同是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因条件各有差别，剥削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于较边远的“族”、“国”等被征服者，由于其间的人身控制关系相对比较薄弱，剥削便大多采取贡纳的形式，有如西双版纳统治者对山区被征服的哈尼、布朗、基诺等民族的剥削。西周金文中有此类记载。

淮尸(夷)旧我 晦人，毋敢不出其 、其 、其进人、其
(《兮甲盘》。)

淮尸(夷) 我 晦臣.....(《师 簋》。)

淮夷作为被征服者，是周的确定贡纳人，其贡纳物除各种物品 、 、 而外，还有人。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例如楚对于周便有贡纳义务。齐桓公伐楚时，管仲陈述南征理由曰：“尔贡苞茅不入，

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这种贡纳义务当是从西周时期的贡纳演化而来。这类剥削对被剥削集团内部结构无所触动，对于其中的直接劳动者来说是间接的，即该“族”或“国”的统治者首先从劳动者身上取得剩余劳动，然后再分出一部分交纳予周室。

第二类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有着全面而牢固的人身控制关系，因而，剥削便采取了较全面的劳役剥削形式，就像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滚很召村寨，由于其成员是从家奴转化而来，对召勐之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除了承担“宣慰田”、“土司田”等等的耕种而外，还要承担从炒菜做饭到削揩屎棍子的各种各样的劳役。西周时期也同样存在这种较全面的劳役剥削类型，本章第一节所引述的《诗经·豳风·七月》，笔者以为就是这种剥削类型的形象描述，其劳役既有农业方面的耕、种、收、藏、修农具、筑场圃，又有修桑、采桑、养蚕、纺织、染色、缝纫，还有打猎、练武、藏冰、修建等等，应有尽有。

第三类则是被剥削者集团整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类如春秋时之阳樊人、棘人，他们所接受的剥削大概主要是在“田”上的耕作，提供剩余劳动，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劳役和实物的“负担”，类如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之傣勐村寨。《国语·周语上》所记仲山父谈到的被剥削者集团大概就是这样。在这种剥削类型下，出于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劳动一般比较集中，往往是许多劳动者同时共在一块田地上耕作，因而场面宏大。就像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当傣勐村寨农民在“宣慰田”、“土司田”上耕作时，人数众多而且集中，曹成章先生《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第100页有一幅珍贵的照片，许多农民在代耕完官田后，集中坐于田间，共同食用召勐之类“犒劳”的酒肉。这类场景，我们在西周时期同样可以看到：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经·周颂·噫嘻》。）

这里的场面相当大，“终三十里”，有三十里之阔（或说“里”为居民组织单位，亦可通。〔苏〕·瓦西里耶夫《公元前第一千纪初中国的土地关系》在谈到《噫嘻》诗篇时说：“‘里’字在那个时代差不多都是表示乡里和住地，而不像后世那样用为

土地测量的单位。”见郝镇华主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十千维耦”，耕作者达到两万。诗人的描述难免夸张，但场面的宏大也是事实。

《诗经·周颂·载芟》记述了类似的情形。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飧其饁，思媚其妇，有依其土。

这里有两千农夫同时集中劳动，规模也相当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出现，他们当即“千耦”所耕耘的“田”的主人、剩余劳动的攫取者，耕作之时几乎倾巢而出，大概既是监督，又是安抚。

“田”主人亲临耕作现场，这在《诗经·周颂·甫田》中也可以看到：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曾孙不怒，农夫克敏。……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

“曾孙”，《毛诗郑笺》云：“谓成王也。”不论是否成王，但可以肯定，他是“田”的主人，带着老婆孩子，亲临耕耘现场。“饁”，《说文》曰：“饷田也”，《尔雅》曰：“馈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杜注曰：“野馈曰饁”。“田峻至喜”，杜注曰：“田峻，司啬，今之啬夫也。喜读为饔，饔，酒食也。”曾孙将酒食送予田间耕作的农夫，有如西双版纳傣族中之实例，类似西双版纳“陇达”的田峻也同来享用。农夫勤奋劳作，则曾孙不予责罚。最终目的，是求得“千斯仓”、“万斯箱”，获得巨额剩余产品。

三 集团整体被剥削者的内部关系及各类型被剥削者间的差别

如本节第一小节所述，西周时期被剥削者主要是以集团整体形式出现的，这些集团有“族”、“宗”、“人”、“夷”、“姓”、“邑”等等，此外，还有如《大盂鼎》、《宜侯 簋》所述，以“邦司”、“夷司王臣”数“伯”和“人鬲”、“甿”、“庶人”数百千人同时被赐予的被剥削者，其中至少保存着一定的集团整体的痕迹。与此相对，则有以“家”、“夫”、“人”等单个人或个体家庭为计量单位的非集团整体的被剥削者。关于后者，情况一般比较清晰，本文不再讨论，这里，仅就被剥削者集团的内部结构作一些探讨。有关这些集团内部关系的资料非常少，我们只能比照于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根据蛛丝马迹般的资料作一些讨论。

可以看到，被剥削者集团内部也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依照笔者的理解，《国语·周语上》所述之“司民”、“司商”、“司徒”、“司寇”、“牧”、“工”、“场”、“廩”之类，就是被剥削者集团内部的首领和管理人员，他们类如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头人及其以下的“昆悞”、“陶格”、“波板”、“昆欠”等人，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组织管理系统，自我控制调节被剥削者集团内部的各种事务。《左传·定公四年》所说“职官五正”，也属于这个系列。类似的情况在金文也可以看到。

《散氏盘》在叙述参予履田人员时，列举了 方参予“履田”的人员，以前断句多将所列十五人归入“ 人有司”之内，理解为 王下属。从文句来看，在“ 人有司履田”之下，先列出了鲜且、微等四人，此即 人有司，其下依次列出“豆人”四人，其中有“师氏”一人，“小门人”一人，“原人”五人，其中有“司空”一人，“ 人有司”一人，此与“ 人有司”相对应，足见不属“ 人有司”之内，总共“十又五夫”。除去“ 人有司”四人而外，其余人员当即居住于此“田”附近，“豆”、“原”、“ ”地名见于同铭文，他们当是承担该“田”耕作劳役的被剥削者集团的代表人物。《国语·周语上》所述仲山父之言，

认为周王不可料民，亦从另一方面证明，被剥削者集团内部有着自己独立的自我调节和管理系统。根据本文第一章第三节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公社的讨论，本章第二节对西双版纳农民村寨性质的讨论，这种被剥削者集团应当归入前资本主义公社的范畴之内。

西周被剥削者集团被整体地进行剥削，在社会总体的剥削关系中处于被剥削者一极，但这并不排斥这些集团内部存在多种结构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在本质上都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但其内部关系可能有多种类型。有些集团内部大概仍然保持较为原始的形态，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有些集团内部则已经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方面虽然资料甚少，但亦有迹象。周初大分封时，曾分予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职官五正”当是“怀姓九宗”的首领人物。他们似乎已经贵族化，《左传·隐公六年》记曰：“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后来的“职官五正”参预着社会的重要政治活动，由此可见，他们大概已经成为“怀姓九宗”内部的剥削者与统治者。当然，被剥削者集团内部这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存在，并不妨碍其作为一个整体处于被剥削者的地位上，在社会总体关系中处于被剥削者一极。

具有各种不同称呼的被剥削者集团之间，肯定存在有一些差别，这可以从资料本身看出来。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记周王分鲁公、康叔以“殷民六族”、“殷民七族”，而分唐叔以“怀姓九宗”，其间肯定有差别，这里的“族”与“宗”似乎表示着地域性的差别。又例如，《宜侯 簋》中既有赐“王人 又七生(姓)”，又有赐“邑卅又五”，二者同时存在，则其间当然也存在差别，这似乎可以推测为内部结构方面的差别。“族”、“宗”、“人”、“夷”、“姓”从名称似乎就可以推断，其整体是以血族关系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血族关系使其中有了相当稳定的内部结构，使之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邑”有可能仍以血族关系为基本纽带，但也有可能其中一部分已发生变化，“邑”中成员不再具有血族关系，就像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提到的农村公社，它们“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9页。）

“族”等以血族关系为基本纽带的集团，在被周统治之前，或是独立的，或统治别人，或被别人整体统治，在变为周之统治对象时，“族”等较多保留了自己原有的内部结构，有较强的血族关系纽带，作为一个整体变成了被统治者，因此其称呼带着血族关系印记。与此相对，另有一些被征服的集团，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结构似乎在征服中被不同程度地打破，故以个人计数，称之为“伯”、“眚”、“庶人”等等，如《宜侯 簋》所述，但被剥削者中的首领人物与一般人员分别计数，又至少带有集团整体的痕迹。这种差别形成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在变为周的统治对象时方式或过程不同。《逸周书·世俘解》记载说，武王攻克商都之后，向武王臣服者有 652 国，而被用武力灭国的仅有 99 国。“族”等集团可能经历了较温和的过程，因而仍保留了其内部结构，而《宜侯 簋》所见以个人计数的被剥削者，则可能是被武力征服后的产物，其原有的组织与结构至少暂时或形式上被打破了。至于作为被剥削者集团的“邑”，则大概是从较早就变为被统治、被剥削者的“族”之类演化而来，它既有“族”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特征，但又有了自己新的独特的内容。

首先，“邑”中的被剥削者已经被相对稳定地束缚于一定的地区内或一定的土地上，这从“邑”字带有地域性的“阝”组成部分可以看出。因此，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不像对“族”之类那样，只是作为人的集合体予以整体统治，而且也可以表述为对某地的统治，因为“邑”名是地名。当然，对“邑”的统治虽然可以看作对某地的统治，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作为劳动者的人本身。一，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对“邑”的度量依据并非土地，而是“室”，这是对劳动者人身的计量单位。二，“邑”没有很明确的土地界限，一般记载只是指明其中心居住区而已。

其次，统治者对“邑”这一被剥削者集团内部情况似乎已有相当程度的把握，而不像《国语·周语上》所记那样不甚了了，这集中表现在对“邑”中户口的掌握上。文献中可见如下记载：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论语·公冶长》。）

（鲁）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昭公十七年》。）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统治者对“邑”中户口的了解已相当详细，与此相应，当然就有统治者派出的直接监督和控制“邑”的官员，即“邑宰”，如《论语·雍也》记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由春秋上推西周，作为被剥削者集团的“邑”大概也被统治者、剥削者实行着类似的控制。

四 集团整体剥削关系形成的条件

与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类似，西周时期集团整体剥削关系也是一定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条件可以简述如下。

1．人口稀少。

西周及其以前，人口稀少，这种状况似乎到战国才有较大改变。李亚农先生曾作过推测，周灭殷牧野之战时有戎车 300 乘，一乘战车须配备步卒和甲士 72 人，若此为动员全国成年男子，则全部人口不过六七万人。《左传·闵公二年》关于卫国的记载似可作为旁证，鲁闵公二年，卫为狄人所败，复国之时，“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卫在康叔受封建国时是头等大国，又经过三四百年生育繁衍，而一旦败绩，就只剩下男女 734 人，25 年后才恢复到革车 300 乘，此时人口大约也只有 5 万人（李亚农：《西周与东周》，《李亚农史论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668～671 页。）。而被周所征服的国族似乎人口也很少。《逸周书·世俘解》记述曰：

武王遂征四方，凡憇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许倬云先生在屈万里先生研究基础上，据此作了推测：《世俘解》之“亿”为十万，“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中之“十万”为“七万”之误，武王伐国九十九，馘磨和俘人共 487809 人，平均每国不到 5000 人（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112～113 页。）。稀少的人口，导致剥削的基本依据只能是劳动者人身，因此，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确立首先取决于对被剥削者人身控制关系的确立。

2．土地广阔。

相对过于稀少的人口来说，土地则十分广阔，有着大片的荒地，人们往往舍弃旧耕地，迁徙它处另辟新耕地。西周时是这样，春秋时

也是这样，文献记载十分多：

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左传·昭公十六年》。）

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

（姜戎驹支）对曰：昔……惠公……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左传·襄公十四年》。）

楚三意〔四境〕之田，旷芜而不可胜辟。（《墨子·耕柱》。）

宋郑之间有隙地（杜注：“隙地，闲田。”）焉……（《左传·哀公十二年》。）

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左传·昭公十八年》。）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冬，多麋”（《春秋·庄公十七年》。）的记载，杜预注曰：“周之冬，夏之秋也，麋多则害五稼，故以灾书。”麋既然多到可以害稼的地步，灾重到使《春秋》都记上一笔的地步，可见离耕地不很远就有麋借以生存的大片荒地。

人少地多，荒地比比皆是，再加上统治者政权的分散，控制了土地并不足以控制被剥削劳动者，而控制不了被剥削者，则无法实现剥削，因此，土地并不足以成为实现剥削的主要依据。

3．武力征服。

周以小灭大，从偏西一隅而统治广大地域，是通过武力征服而实现的，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康昭南伐，大概可以说是周武力征服的三个主要阶段。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有两种基本的统治与剥削方式。一是不变动被统治者的任何原有组织结构，只征收劳役或实物的剥削即可。另一种方式就是采取武装殖民的方式，将周族人员分散到全国

去，建立一些新的国家，直接统治一部分被剥削者集团，同时对前一种类型的被剥削者集团予以威摄。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再加上“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封尚父于营丘”（《史记·周本纪》。）之类对异姓的分封，便形成了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在两种基本的统治与剥削形式之中，前者占多数。《逸周书·世俘解》述武王战功曰：“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史记·陈杞世家》记曰：“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吕氏春秋·观世》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可见，周初被征服之“国”大约接近千国，而实际分封诸侯国则较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占五十三人。”相对于“服国”近千，封国仅七十一，其中异姓诸侯则仅十八国，足见绝大部分异姓国族集体地变成了被统治、被剥削者。

不仅如此，周由于本身人口不多，派出殖民人员也并不多，在各殖民点，周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保持着距离，即使同居住于一城之内，依然各成系统。例如鲁，朱凤翰先生研究了曲阜鲁国故城之四处西周墓地，指出，鲁故城内周人与土著聚族而葬，墓制、葬俗及随葬物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周人与土著都还各自保存着自己一些独特的生活习俗，同时说明，周人家族的主要成员是贵族武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土著居民社会地位远低于周人，是封土内的二等公民（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275页。）。在各诸侯国内，周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同化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得以完成的，它大致可以说完成于战国。

真正全面的征服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才能完成的事，周人的武力征服，急切之中无法在实际上改变被征服者的文化，也无法改变其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聪明而实际的做法，就是承认这种现实，因此，在人身控制为实现剥削首要前提的条件下，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便成为必然。

五 西周土地制度

搞清楚了西周社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水到渠成，土地制度便一目了然了。

与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类似，舍弃各种次要的经济关系，就主要的基本的生产关系而言，其表现为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周王、诸侯、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一方面则是集团整体承受剥削的“族”、“宗”等被剥削集团，前者获得剩余劳动，后者提供剩余劳动。剥削实现的基本或主要依据是周王等贵族对“族”、“宗”等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人身控制，劳役剥削成为基本的剥削形态。当然，周王等剥削者对“族”、“宗”等被剥削者集团的控制和剥削并非千篇一律，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层次差别。《诗经·豳风·七月》表现的是一个层次，剥削者对被剥削者集团的控制似乎比较严密，被剥削者所承受的劳役剥削是多方面、多种类的，从各种农作劳役到各种家内劳役，应有尽有，类如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滚很召”村寨。《左传》所述之阳樊人、棘人，《散氏盘》所述之豆人、小门人、原人，《五祀卫鼎》所述之荆人、井(邢)人，表现的似乎是另一个层次，周王等剥削者对这些集团的控制似乎稍弱，它们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大概类如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傣勐村寨。他们所承受的劳役剥削大概比较单纯，除了公共事务性质的劳役而外，主要就是在各级贵族的“田”上进行农作，为剥削者创造剩余产品。不管这些被剥削者集团承受怎样的控制与剥削，他们保存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自我调控机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

和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与近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类似，土地的实际占有分为两个部分。贵族直接占有、控制的土地即“田”是少数，这从金文资料中赏赐、交割“田”数量不多、面积不大可以看出，然而，这些土地却是“族”、“宗”等被剥削者集团实现剩余劳动的所在。大部分土地则为被剥削者集团直接占有，由于耕作方式仍然以不同周期的撂荒制为基本形态，被剥削者集团所占有的耕地与荒地融为一体，

因此可以说，“田”以外的所有土地都是被剥削者集团可以开发利用的对象，用以实现其必要劳动。在这种状况下，土地制度也由两个层次所组成。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范围只是用于实现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土地，即各种类型的“田”，它们的存在一般为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所规定。这一层次土地制度所涉及的土地，是贵族剥削“族”、“宗”等被剥削者集团这一社会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中介，因而具有较鲜明的所有制色彩。社会基本剥削关系的一端终止于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相应，这一层次的土地制度也终止于此。它并不涉及全部的耕地，“族”、“宗”等自行控制、调节的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不在这一层次土地制度的管辖之下。第二个层次则是被剥削者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它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被剥削者集团所控制的土地，一般不具有法定形态，而以习惯的形式存在。它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被剥削者集团整体对土地的占有方式，它是各被剥削者集团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一是被剥削者集团内部对土地的分配、使用方式，它是被剥削者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这两个层次显然不能同等而语。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土地制度，那么，其基本内容应是土地制度的第一层次，只有当我们的考察深入到被剥削者集团这一极之内部的时候，第二层次的土地制度才成为我们的主要对象。而且，在西周时期，由于人少地多，由于荒地的大量存在，与近代许多西南少数民族一样，被剥削者可以用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几乎处于无限制状态之中，因而被剥削者之间在土地上的排他性相对较弱，与此相应，需要以土地作为实现中介的社会经济关系也相对较弱，这就导致第二层次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以相对弱化的形态存在。在性质为前资本主义公社的被剥削者集团内部，公社成员间的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直接方式实现的，即直接的经济交往，以耕地为中介而发生的间接经济关系相对较弱。就主要方面而言，是公社成员在公社经济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决定了他们采取各种不同类型的平等分配和使用土地的方式，也即一定的土地制度，而并非是由土地的这种特定分配、使用方式，也即土地制度，决定了公社成员之间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第四节 西周耕作制度

在土地制度研究中，耕作制度是必须研究的一项内容，其理由有二。一、所谓土地制度是关于土地的各方面制度，其中必须包含属于社会关系的内容，这是以前研究中被人们较多关注过的部分，但也必须包括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这部分属于生产力范畴，就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来说，其基本内容就是耕作制度。二、尽管生产关系可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所可能发展的上下限被生产力发展水平严格限定，因此，研究耕作制度，也有助于研究属于社会关系方面的土地制度。

研究西周耕作制度除了其内容为土地制度研究所必须包含而外，比较准确地把握耕作技术水平，也有利于把握西周的土地使用方式，从而可以较好地了解这个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具体形态。有关西周耕作制度方面的资料极为有限，主要集中于《诗经》（《诗经》中有相当一部分篇章成于春秋时期，鉴于春秋与西周相连，且耕作制度方面二者距离不会太大，为使讨论简明，本节暂将其中有关耕作制度的内容统统看为西周时期的反映，不再一一辨析讨论。），本节除了利用《诗经》等文献而外，还必须再借助于民族学方面的资料，以此作为参照对象（本节研究参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 1989 年版），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 1987 年版），非直接引用部分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一 文献所见西周耕作制度

《诗经》所见与耕作制度有关内容似乎可以归纳为如下一些。

1 . 菑、新、畲。

在《诗经》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菑、新、畲的叙述：

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诗经·周颂·臣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诗经·小雅·采芑》。）

不耕获，不菑畲。（《周易·无妄》。）

《毛传》注《臣工》曰：“田，二岁曰新，三岁曰畲。”《尔雅·释地》相同，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与此相异，《礼记·坊记》引上述《周易》文句，郑玄注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畲，三岁曰新田。”

菑、新、畲如何解释，这也是先秦经济史研究中的难题之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如下一些：

（1）清人黄以周认为：菑、新、畲为“再易之田”上的三个耕作过程，第一年除去树根杂草为菑，第二年翻地使土壤解散为新，第三年下种收获为畲（黄以周：《傲季杂著·群经说·释菑》。）。

（2）刘师培曰：“一岁曰菑，即三岁之中仅有一岁可耕也。”“二岁曰新，即言三岁之中仅有二岁可耕也。”“三岁曰畲，即言三岁之中每岁皆可耕也。”（刘师培：《古政原始论》卷五《田制原始论》。）

（3）徐中舒先生说：“根据欧洲村公社的三田制，我们假定西周村公社全部可耕之地也是分为三个相等的部分，其田菑为休耕的田，新为休耕后新耕的田，畲为休耕后连续耕种的田，……第一年如此，第二年仍耕这三部分田，不过其中菑、新、畲已转为新、畲、菑。同例，第三年又转为畲、菑、新。”（徐中舒：《试论周代的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

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4) 杨宽先生认为：“菑田、新田、畬田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三种垦种不同年数的农田。”“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叫菑田，第二年已能种植的田叫新田，第三年耕种的田叫畬田。”(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21页)

(5) 张政烺先生认为：殷周“开荒，大约分三个阶段，须三年完成，即周人所谓菑、畬、新田，菑才耕，畬火耕，最后作疆畎，聚埭亩，成为新田。”(转引自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6) 郭文韬先生说：“菑是垦耕第一年的田；新田是垦耕后第二年的田；畬是垦后第三年的田。这种情况表明：当时对土地的利用，一般不超过三年，在连续耕种三、二年之后，就弃耕撂荒，而易地耕种。当时的撂荒是长期的和不定期的。”(郭文韬：《中国古代农作制之史的考察》，《中国农报》1963年第9期。)

(7) 石声汉先生主张：菑、新、畬是三类不同的撩荒地：“一类是刚收过一料，旧茬还在地里，称为菑(茬的古写法)；一类旧茬已被卷土重来的天然植被吞没了，正在复壮过程中，称为畬(意为肥力在蓄积中)；还有一类，是现在已经长出小灌木(以‘亲’——即榛作为代表)来，需要用斧子(斤)来砍掉，作为垦辟对象的新田(新字的构成，就是用斤伐亲‘榛’，也就是新鲜，未经用过等意义)。”(见马宗申《略论“菑新畬”和它所代表的农作制》，《中国农史》1981年第1期。)

(8) 陈振中先生认为：菑、新、畬“是西周开荒治田过程中分三年进行的三个工序：第一年砍伐林木，放火烧荒，或翻草入土，进行初耕，这叫菑田。垦荒后第二年的田，可以试播一些作物，一般是撒播漫种，粗放耕作，这叫新田。经过两年的垦种，土质‘舒缓’，到第三年做成疆畎，有沟有垄，能排能灌，这叫畬田。”(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以上诸解归纳起来有三类。一、轮耕。如黄以周、徐中舒。二、性质不同的三类土地。如刘师培、石声汉。三、开垦时间不同的三种荒地。如杨宽、张政烺、郭文韬、陈振中。笔者倾向于将菑、新、畬与荒地联系起来看。为使讨论比较集中，这里不想过份纠缠菑、

新、畬三种田具体含义的讨论，只想说明，这三种田与垦荒、抛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三种土地类型是撂荒耕作制的反映。菑，《说文》曰：“不耕田也。”徐锴注曰：“田不耕则艸塞之。”孙炎注《尔雅》云：“菑，始灾杀其草木也。”《诗经·大雅·皇矣》孔疏引《韩诗》曰：“反草也。”郭璞注《尔雅》曰：“反草曰菑。”清人黄以周说：“菑字从艸 田会意， 者灾也，以烧薙杀草为本义，……以耕田反草为后义，郑笺《良耜》，读俶载为炽菑，云‘农以利善之耜炽菑南亩’，是也。”（黄以周：《傲季杂著·群经说·释菑》。）以上解释互有差别，但统一之处在于，菑与荒地有关，作为名词，是指一种荒地，或生荒地，或抛荒地，作为动词，则是指开荒除草垦田。新，虽然以后有许多衍申意思，但其本义如《说文》所曰：“新，取木也，从斤，新声。”《段注》曰：“取木者，新之本义，引申之为凡始基之称。”取木与田相连，则为开荒无疑，即使按引申义，作开始讲，也是新开垦土地。畬，《说文》曰：“畬，三岁治田也。……从田，余声。”孙炎曰：“畬，和也，田舒緩也。”（郝懿行：《尔雅义疏》引。）郝懿行又予以详细解释：“畬，田和柔也。……盖治田三岁，则陈根悉拔，土脉膏肥。”（郝懿行：《尔雅义疏》。）这些解释将其视为开垦已三年之耕地。但另外还有一些解释，直接将其看作刀耕火种（动词）或使用刀耕火种方法的土地（名词）。《广韵·麻韵》曰：“畬，烧榛种田。”《集韵·麻韵》曰：“畬，火种也。”宋范成大《劳畬耕诗序》曰：“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不管采取哪一种解释，都与荒地有关，或为生荒地，或为抛荒地（某种意义上也可包含休耕地），只是开垦时间长短稍有差别而已。可见，菑、新、畬所反映的耕作制度，是某种类型的撂荒制。这个结论，还可以得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旁证，后面讨论中还将谈到。

2．火耕。

《诗经》等文献中可以看到火耕的痕迹。

芄芄棫朴，薪之樵之。（《诗经·大雅·棫朴》。）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诗经·大雅·旱麓》。）

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诗经·小雅·正月》。）

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诗经·小雅·大田》。）

茂密的树林，人们砍下来焚烧，以开垦耕地，就连去除虫害的工作，也委之以烈火。周人砍伐的对象多是槲、柞之类，这些小灌木便于砍伐，在铁器尚未使用之前，这点十分重要。同时，这种土地又属林地，开垦之后一般草荒较轻，对于农作十分有利，而且火烧灰对于增加土壤肥力也具有重要意义。火耕与开荒密切相关，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3．除草。

《诗经》等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除草的叙述：

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诗经·小雅·大田》。）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周颂·载芟》。《毛传》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郑玄注曰：“将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气蒸达而和耕之，则泽泽然解散，于是耘除其根株。”这里的除草既可看作休闲地的耕作，也可以理解为抛荒地或生荒地的开垦，因为其所除者不仅有草，还有木。）

其耨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诗经·周颂·良耜》。薅，《说文》曰：“拔去田草也。”）

厌厌其苗，绵绵其麋。（《诗经·周颂·载芟》。《毛传》曰：“麋，耘也。”郭璞注曰：“芸不息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麋，芸也。《说文》作耨，音同，云：‘耨，耨鉏田也。’《字林》云：‘耨，耕禾间也。’”）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诗经·小雅·甫田》。《毛传》：“耘，除草也；耔，黽

本也。”)

若农之服田，务耕而不耨，维草其宅之；既秋而不获，维禽其飧之，人而获饥，云谁哀之。(《逸周书·大开》。)

除草成为耕作的重要一环，除草工作的繁重，也从另一角度说明现耕地与荒地（生荒地、抛荒地或休耕荒地）有一定联系。即使人们在想方设法除草，但草患依然严重。因为，在由荒地转化为耕地时，草害是必然遗留的问题，而采用“火耕水耨”方式解决草害问题，又有很大局限性，“火耕水耨”只能解决杂草的地面部分，地下根株并未清除，适当时机又会萌发，必须以耒耜“耕田反草”，但其效率又非常低下，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在耕田基本工具为耒耜，施肥、灌溉等耕作技术尚未系统形成时，撂荒制、草荒、火耕等等都是必然相伴的现象，只有在经过战国铁犁牛耕的普及之后，一次深耕便可完成耕田和反草两道工序，草荒问题才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加上其他技术进步，连作制方才得以形成。

4．耦耕。

先秦“耦耕”曾是人们相当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诗经》等文献中有许多记述。

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经·周颂·噫嘻》。)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周颂·载芣》。)

兴弹相庸，耦耕俱耘。(《逸周书·大聚》。)

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左传·昭公十六年》。)

譬如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国语·吴语》。)

长沮、桀溺耦而耕，……耰而不辍。（《论语·微子》。）

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吕氏春秋·季冬纪》。）

关于耦耕，以前也曾众说纷纭，有各种解释。或曰为两人并肩，各执一耜，同时插入土中，同时用力发土；或曰耒耜即犁，耦耕为一人扶犁，一人在前拉犁；或曰为耜上系绳，两人相向而立，一人推耜入土，一人用力拉绳发土；等等。通过民族学方面的研究，已经搞清楚了耦耕具体内容。原始农业最早使用的掘土工具是尖头木棒，安装脚踏小横木之后，便演化为耒耜形工具，这种工具的困难不在入土，而在发土，特别是草根缠绕的荒地。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并耕，数人并排踏耒入土，同时发土，就可以将较大土块翻起来。“如门巴族人使用青杠杈翻地时，通常就是各持一杈，同时刺地发土，对面两个帮忙的妇女手执木锄将土块打碎、磨平。”“十九世纪仍然使用‘乌迪亚’翻地的巴布亚人，也是两三个或更多的男子站在一排，把削尖的‘乌迪亚’深深地插在地里，大伙同时用力，一下子便能翻起一大块来。”（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5页。）耦耕是开荒的有利武器，因而《左传·昭公十六年》、《国语·吴语》谈到耦耕时，都指出其为开荒所用。战国以后，铁犁牛耕逐渐普及，耒耜耦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5 . 灌溉。

《诗经》中涉及农田灌溉的记载也有一些。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风·泽陂》。）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诗经·小雅·白华》。）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诗经·大雅·洞酌》。《毛传》曰：

“溉，清也。”孔疏曰：“《特牲》注云：‘濯，溉也。’则溉亦是洗名。下《传》云：‘溉，清也。’谓洗之使清洁，皆是洗器之名也。”这些均将濯溉同解，以为清洗。但“溉”亦有另解，即灌溉之义，如《说文》曰：“溉……一曰灌注也。”笔者以为后解亦通，姑列于此。）

但是，在战国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之前，我国的水利事业基本上是防止水患，《诗经》中也有类似内容的记述：“遵彼汝坟，伐其条枚。”（《诗经·周南·汝坟》。《毛传》：“汝，水名也；坟，大防也。”）“防有鹊巢，邛有旨苢。”（《诗经·陈风·鹊巢》。）坟、防，都是防御水患的简单堤防工程。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农田依然须靠天吃饭，这同样在《诗经》中有反映，如《小雅·甫田》曰：“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曹风·下泉》曰：“芄芃黍苗，阴雨膏之。”《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等等，人们对雨水的祈求和依赖仍然很强，中国灌溉水利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始于战国。

6．施肥。

《诗经》中可以看到当时萌芽状态的施肥知识：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诗经·周颂·良耜》。）

当时人们已经知道，腐烂的茶蓼等杂草可以使黍稷生长得更茂盛，这可以说是绿肥的起源，但显然，明确的施肥知识当时人们还不具备，有关农田施肥的明确记载，应当说出现于战国时期，而这是与连种制联系在一起的。

7．亩。

《诗经》中有关“亩”的记载相当多：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诗经·周颂·载芣》。）

耒耜良耜，俶载南亩。（《诗经·周颂·良耜》。）

今适南亩，或耘或耔。（《诗经·小雅·甫田》。）

以我覃耜，俶载南亩。（《诗经·小雅·大田》。）

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诗经·小雅·信南山》。）

如本章第一节所讨论，西周时亩大概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训为垄，如《国语·周语下》韦注曰：“下曰畎，高曰亩，亩，垄也。”《庄子·让王》司马彪注曰：“垄上曰亩。”这是表示某种农田结构形式，偏于农业技术。一表示确定地积，偏于农业经济，如《贤簠》所述之“百亩粮”。当然，西周时是否已经产生作为地积单位的亩，还需要继续推敲。一般来说，作为垄的亩远早于作为地积的亩，其内容主要是选择耕地后在作物布局方面的考虑与建设，并以亩的形式确定下来，包括诸如地势高低、水流方向、是否向阳等等。这在《诗经·大雅·公刘》就有表现：“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左传·成公二年》则有更清楚的描述，该年晋败齐，要求“齐之封内，尽东其亩”，齐臣宾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二 西周耕作水平评估

根据上述讨论，结合民族学资料，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对西周时期的耕作水平作出一个大致的评估，这对于我们研究土地使用方式、生产关系在土地上的反映以及土地制度均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耕作方式从早期农业到成熟农业大概经历了从撂荒制到连作制的演化。撂荒制又有两个基本类型。一是生荒耕作制（本小节所使用“生荒耕作制”、“熟荒耕作制”、“刀耕农业”、“锄耕农业”等概念及解释均依据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一章第二节，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即在一块新垦地上耕种一年后抛荒若干年，抛荒期长短取决于林木重新长成的年限、人地比例等因素，有数年、十数年、数十年等不同时间。这种耕作类型下的工具主要是刀斧和用于点种的竹、木棒，技术重点在林木的砍伐，人们过着较频繁的迁徙生活，它可以称之为“刀耕农业”。二是熟荒耕作制，即在一块新垦地上连续耕作若干年后抛荒若干年，然后再进行开垦。这种耕作类型中已经使用耒、耜、锄等翻土工具和除草工具，技术重点是土地的加工，人们也已相对定居，它可以称之为“锄耕农业”。连作制则是在同一块田地上连年耕作，这是自铁犁牛耕及施肥技术形成以后直至今天普遍被采用的耕作方式。处于这两种耕作制之间的是休闲制，它是在熟荒耕作制的基础上，为了恢复地力而实行的周期更短、更有次序的轮种轮休，某种意义上仍可归入熟荒耕作制之中，其典型如欧洲中世纪的三田制。

那么，西周的耕作方式究竟在这个演化序列中处于何种位置呢？从火耕的存在和菑、新、畲制度的实行，首先可以从大的方面作出推断，撂荒制始终是西周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环节。

火耕在我国历史久远，史料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方面的记载：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国语·鲁语上》。）

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礼记·祭法》。）

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

“烈山氏”名称本身，就表现出了火耕。在卜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卜焚”、“贞烧”的记载。在此后的《周礼》中，也有关于火耕的记载：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周礼·夏官·司燿》。）

直至汉代，在一些地方仍采用火耕：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史记·货殖列传》。）

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盐铁论·通有》。）

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汉书·武帝纪》。）

凡是在需要对付繁茂林木杂草时，特别是在开荒等情况下，火是首选武器之一，唐宋以后南方山区“畚田”即用火耕法，蒲松龄也说：“垦荒，先纵火烧草，然后深耕。”（蒲松龄：《农蚕经》。）笔者本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也曾跟随父亲进行过火耕，深知其对付林木杂草之方便有效，火耕后土地肥力也大大超过一般田地。既然常用火耕，则开荒是经常性的工作，而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则抛荒也是经常性的了，菑、新、畚等与荒地相联系的不同类型土地之存在正好是一个旁注，而《诗经》所见有关耕作制度的其他内容也就很好理解了。在这

种情况下，除草当然是农田工作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新开荒地岂有杂草不多之理。耦耕就更显得必要，因为对于树根草根缠绕盘结的荒地来说，以类如尖头木棒的耒耜翻土，只有协力发土，方能成功，商之“田”，周之“耦耕”，都是这种耕作制度下的必然产物。灌溉还很少，施肥仅处于萌芽状态，也与此相适应，且互为因果。

在撙荒制这个大范围之中，西周主要的耕作方式又处于哪个阶段呢？这可以从当时广泛使用的工具进行推断。

《诗经》中经常可以见到的与土地加工有关的工具是耜。

三之日于耜，四之月举趾。（《诗经·豳风·七月》。）

以我覃耜，俶载南亩。（《诗经·小雅·大田》。）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诗经·周颂·载芣》。）

耒耜良耜，俶载南亩。（《诗经·周颂·良耜》。）

耜属掘土工具。另外还有钱、镈。

命我众人，庀乃钱镈，奄观铎艾。（《诗经·周颂·臣工》。）

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诗经·周颂·良耜》。）

一般认为，钱为铲或锹类工具。这样的工具似乎既可用以掘土，又可用以除草，只看操作方式，直插起土，则可掘土，类似耜，贴平地面前推，则可铲土或除草。镈，《毛传》曰：“镈，耨。”属于锄草类工具。这些工具的广泛使用，说明西周时期对土地的加工已相当普遍，田间除草亦是经常性农业生产工作，因此，这时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当已经脱离了生荒耕作阶段，实行熟荒耕作制与休闲制。当然，这并不是完全排除生荒耕作制，因为根据民族学资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

区，就砍烧当年产量而言，刀砍火耕的火山地产量高于牛犁地，牛犁地又高于手挖地，且所花劳力较少，因此至今仍有不少人留恋火山地，只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林地资源的被破坏，这种方式才不得不向熟荒耕作制、休闲制以至连作制过渡。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一个方面，显然还有超出撂荒制耕作方式的另一个方面。《诗经·小雅·白华》曰：“滌池北流，浸彼稻田。”滌，《毛传》解为“流貌”，但似解为水名更好。《水经注·渭水》曰：“鄠水又北流，西北注与滌池水合，水出鄠池西，而北流入于鄠。”《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一·雍州》曰：“滌池水，亦谓圣女泉，又曰高都水。”其地在今陕西西安西北。在黄土高原地区建设小型水利设施，并进行农田灌溉，则标志着连作制可能已经产生，因为此地属半干旱地区，水源较缺，水利设施建设亦不易，人们不可能将已建好灌溉系统的农田再轻易抛荒。而萌芽状态的施肥技术，可能也已经为连作制创造了一定条件。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即：西周时期的耕作方式是多类型的，有属于撂荒制的，也有属于连作制的，但主要方面是属于撂荒制。在撂荒制之中，由于人口、迁徙、地区差异等因素，在有条件的地区，生荒耕作制大概一定会存在，因为它费力少而收获多。但主导的方面，是处于生荒耕作制与连作制之间的熟荒耕作制和休闲制。随着春秋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与发展，再加上其他农业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较为普遍的连作制便成为必然。

对于耕作方式不同的土地，由于人们的使用方式不同，占有方式也就不同，在土地上所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强度和形态也就不同，这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不少实例。例如在哈尼族、景颇族等民族那里，耕作方式为撂荒制的旱地归村社共有，村社成员可根据自己生产的需要，采用“号地”等方式占用土地，然后报告山官，得到同意即可开始耕种，休耕抛荒之后土地复归公有，但实行连作制的水田则归私人，可以长期占有，并世代承袭，或可买卖或不能买卖（宋恩常等：《金平县一区马鹿塘哈尼族社会调查》，《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2 年版；《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7 页。）。如本文第一章第一节所述，占有以使用为前提，当一定的物不被使用时，人对其之占

有实际上并不存在，即使在私有制观念极强的现代社会中，一定的物如果不被使用、或至少不具有潜在的被使用之可能性，对该物的占有至多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哈尼等民族中两类土地占有方式的不同由耕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得到直接的说明，采用撂荒制的土地，耕作方式本身就决定了对它的使用只能是间歇的，其间隔可能数年，也可能数十年，因而，人们对这些土地的占有只能是以比较弱化的、不稳定的形式出现，而采用连作制的土地，耕作方式决定了对这些土地的使用是连续的，从而占有也是连续的、相对强化和稳定的。

类比于此，关于西周社会的土地占有方式以及土地制度，从耕作方式方面似也可作出一些推测，即：由被剥削者集团、也即公社所控制的土地较多采用撂荒制及休闲制，公社通过自己的自我调控机制，在公社成员对土地的实际使用中，对土地占有方式进行控制和调节；而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即“田”之类，大概较多采用连作制，这些土地使用连续，因而可以实现较稳定、强化的占有，剥削者可以通过这些土地，比较稳定、持续地实现剥削。剥削者只能以人身控制作为实现剥削的首要 and 主要的前提，其原因之一，就是对于实行撂荒制的土地来说，剥削者对其之占有、所有以至据此来进行剥削，在实际操作方面具有很大困难，不如对被剥削者人身的直接控制方便有效。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

西周后期，由于被剥削者集团本身的逐渐瓦解，以周宣王“料民太原”为标志，旧的剥削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旧的土地制度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新的剥削方式以及在其基础上的新土地制度之形成便成为必然，而新关系与新制度的形成过程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发生的经济方面的变革运动。

第一节 管仲、《周礼》与书社

宋代学者魏了翁说：“井田一变于宣王之料民，再变于齐桓之内政，大坏于渠梁、商鞅之决裂阡陌，周人以厉、宣、幽、平并称，其有以夫！”（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如果我们将其所谓“井田”一词换成社会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那么他的叙述可以说相当准确，宣王料民、管仲改革、商鞅变法标志了两周社会经济变革的三个重要阶段，是两周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三大事件。研究春秋时期的经济变革，管仲改革是首先应当谈到的内容。另外，在笔者看来，先秦文献中的重要典籍《周礼》、先秦重要社会组织“书社”，都与管仲改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下面，试分别叙述之。

一 管仲经济变革内容

对于管仲的经济变革，文献中记载较多的仅有《国语·齐语》和《管子》。《管子》成书情况较为复杂，叶适《水心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这是很中肯的话。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有《王兵》一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王兵 篇释文》，《文物》1976年第12期。），其文字错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兵法》诸篇，相比之下，《王兵》是一篇完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则有许多地方显出经过割裂拼凑的痕迹。该墓竹简的书写年代，有人考证至少在汉文帝即位（公元前179年）之前（许荻：《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文物》1974年第2期。），因而，《王兵》与同墓出土之《田法》、《库法》、《市法》等十三篇，当是战国时齐人作品，而《管子》则可能与这类文章有关。由此，亦可见《管子》成书之复杂。笔者认为《管子》成书于战国，尽管包含不少春秋时代的史实，但其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战国社会实际，不能用作研究管仲改革的主要依据。《国语·齐语》的记载学者多以为比较可靠，本文试图仅仅依据《齐语》来分析管仲经济变革的具体内容。

管仲的经济变革，据《齐语》，其主要内容为“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相地而衰征，……山泽各致其时，……陆阜陵墠，井田畴均”。它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社会基层劳动者靠行政手段予以严密编制。

管仲依国、鄙分别予以编制：

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

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国语·齐语》。）

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国语·齐语》。）

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对鄙民的编制是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其次，对国人的编制是随国人地位下降而实行的一种改革措施。

西周时期，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多以“族”（包括“族”、“宗”、“人”、“夷”、“姓”等）为单位整体施以剥削，对其内部活动一般不加干预，甚至对其内部人数也是不甚了了。到周宣王时，由于王师败绩于姜戎，需要扩大财源和兵源，才有所谓“料民”之举（《国语·周语上》）。随着劳动者对土地附着程度的提高，被统治者又多以“邑”（包括“里”、“采”等）为单位被整体剥削。“邑”被相对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之上，统治者对其内部情况有了较多了解，也开始实际干预其内部活动，但这种邑毕竟是自然产生的，并非统治者强力编制而成，故其中户数不定，它与管仲变革时编制三十家而成的“邑”名同而实质迥异。随着自然形成的“族”、“邑”的逐渐瓦解，随着旧有的对“族”、“邑”的剥削难以为继，针对此现实，才有了管仲对鄙民的强制编制，这是一种全新的统治措施。如果说西周时期的“族”、“邑”之类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那么管仲以行政手段将三十家编制成的“邑”只能是一种基层行政组织，其经济职能只是其行政职能的延伸，本身并不具有自我调控机制，因而不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范畴之内。

关于国人，西周时他们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人，享有一定特权，这一点前人已多有论叙，此不赘述。到春秋时期，国人地位逐渐下降，在齐国以至于被强制编制，再用他们作军队主力。齐国国人地位的这种变化，与其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有密切关系。如果依据李亚农先生的分析，周灭殷时周族总人口大概不过六七万，分到一国，像鲁这样的重要国家，顶多不过二三千人。由此可见，周初各诸侯国国人数目并不多，即使考虑到齐国非姬姓，其国人数目大大多于姬姓封国，将这个数目再扩大几倍，其总数也不过万人上下。而到管仲变革时，制国为二十一乡，一乡二千家，以战国时一家五口计之，则共有国人二十

一万人，何况当时一家并不止五人，有“十口之家”、“百口之家”，其总数必定超过二十一万，这比开国之初至少增加了数十倍。国人中除少数事工商者可以自给外，士之十五乡皆“使就闲燕”，不事生产，他们像古罗马的无产者一样要靠社会来养活。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的生活需求逐渐超出了社会经济承载力，其经济状况必然下降，而国家又必须使用他们来打仗，必须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因此必须有严密的强制编制，“勿使杂处”，以使其“安心”、“不见异物而迁”，并“令勿使迁徙”（《国语·齐语》），这种需要导致了管仲的变革。自此而后，各国国人地位逐渐下降，到战国时，国人与鄙民之间的地位差别渐濒于泯灭。

2．对被剥削者实行国家授田制度。

《齐语》记管仲治鄙政策之一为：

陆阜陵瑾，井田畴均。（《国语·齐语》。）

对这条政策，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字面上看。“陆阜陵瑾”，韦昭注曰：“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瑾，沟上之道也。”《尔雅·释地》邢昺疏引李巡曰：“高平谓土地丰正，名为陆；土地高大名为阜；最大名为陵”。此处陆、阜、陵显然指三种土地类型，陆既然指土地丰正者，可见为良田，阜、陵虽较差，当也是可耕地。瑾为道路，与陆、阜、陵非同类词，此处当作动词讲，即布道路于陆、阜、陵之上。这种广泛布置的道路，显然与田界有关，即为一种界道合一的新设施。商鞅变法时所设阡陌系统即系界道合一，“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顷，一阡道，道广三步。”（秦《为田律》，见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牋——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本文第四章将对此进行讨论，阡道、陌道既为田界，又是道路，商鞅设置的这种界道合一体，是为实行授田制服务的。而管仲的广布道路，显然也与授田制的推行有密切关系。“井田畴均”，韦昭注曰：“九夫为井，井间有沟。谷地曰田，麻地曰畴。均，平也。”此注不甚允当。“田”，《说文》曰“树谷曰田”，《释名·释地》曰“已耕者曰田”，《玉篇》

曰“地也”，《广雅·释地》曰“土也”。“畴”，《说文》曰“耕治之田也”，《一切经音义》曰“耕地也”，《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曰“美田曰畴”。此处田畴实为同义语，均为耕地或土地之意。“井”字，一般以《孟子》或《周礼》来套解，释为九小块组成一大块的土地。对此种看法，笔者以为是不正确的。（关于《孟子》、《周礼》“井田”言论之剖析，“井田”一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真正含义，本文第五章将有详细讨论，请参照。）以井述田，实际上仅取其一定方块的田土形似井状之意，并不包含九小块的内容在内。“井田畴均”之井当作动词讲，即平均划分田畴如井状的小方块。先秦文献中许多包含“井”字而涉及土地制度的史料以此来解都显得更为妥当，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周礼·小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野”，《管子·侈靡》“断方井田之数”，均为动宾结构。综括上述，管仲这条政策从字面上看，即在各类田地里广布道路，平均地划分为一定的小方块，从而使民“不憾”，这显然是对被剥削者“民”实行授田制度。

其次，从历史背景上看。关于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本文第二章已经作了讨论，它由两个层次组成。社会主要的剥削形式是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剥削关系终止于“族”、“邑”之类集团，其间作为剥削关系实现中介的土地仅只是“田”，这些土地用以实现“族”、“邑”集团的剩余劳动，剥削者仅只关心这一部分土地。至于被剥削者实现必要劳动的田土，则由“族”、“邑”内部自行调节与组织，剥削者并不干预。管仲经济变革则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被剥削者鄙民所使用的土地，并谈到要使田“均”，从而使民“不憾”，显然，国家对一般被剥削者的控制已经达到其个人人身，不再经过具有自调节功能的前资本主义公社这一中间环节，公社调节其内部成员使用土地方式的职能被国家接收了过来，这明显是在实行国家授田制度。

再次，从同时实行的其他变革来看。根据《齐语》，与此有关的变革还有两项，一为“相地而衰征”，一为“山泽各致其时”、“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前一项基本内容是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并根据土地肥瘠决定剥削量，这里，剥削的依据已经开始显示出从人身向土地过渡的痕迹，即将一定量的土地与一定的劳动者人身联系、等同起来，这种剥削显然要以国家授田作为基本前提。关于后一项，既然称为“立”，

可见三虞、三衡以前还没有，为管仲变革时所新设立。这里的山泽实际上包括了耕地以外的所有土地，对这些土地，以前剥削者并不加以管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即“田”。由于主要的耕作方式是间隔时间不等的撂荒制，大量荒地为农耕所必需，故这些荒地实际上为各被剥削村社实际使用并占有。管仲变革时特意设机构及官吏严加管理，定时开放，比较合理的解释，还是为了将被剥削者较牢固地束缚于国家所授予的耕地上。

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说，管仲的“陆阜陵墪，井田畴均”，实即国家对被剥削者实行授田制度。

3．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

《齐语》记管仲治鄙的另一政策为：

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

韦昭注曰：“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很明显，这是实行以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这条政策在《管子·乘马数》中又称之为“相壤定籍”，其含义是清晰的。

西周时期，剥削者通过对“族”“邑”这样一些自调节系统的掌握，对被剥削者人身集团地予以牢固控制，在这种条件下，剥削主要采取了劳役剥削的形式，《诗·豳风·七月》对此有十分细致的描述，这时具有特殊意义的“田”的存在，也说明了剥削形式主要是劳役剥削。管仲实行的以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显然与以前不同，也是一种变革。

由上述三条看，管仲对齐国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根本性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使齐国迅速强大，“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而且也贯穿于春秋战国的一系列改革运动肇始先声。

二 《周礼》起源的一个推测

在先秦文献中,《周礼》是一部极为重要但又面目模糊的典籍。一些学者视其为刘歆所造伪书,完全否定了它在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这种怀疑态度是盲目的。又有一些学者,把《周礼》中所记制度统统视为西周时的制度,并据此来描述西周的社会状况,这种完全肯定的态度也带有盲目性。要消除这类盲目性,就必须对《周礼》一书产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作一个正确的估计。杨向奎先生对此作了大量工作,他认为《周礼》至迟出于战国,是齐国人的作品(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乙编第四“儒家与经学”(五)“古文经学中的《左传》和《周礼》”,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关于《周礼》并非刘歆伪造,而是战国齐人作品,杨向奎先生论述很多,这里不再叙述,本文只是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将《周礼》与《国语·齐语》对读,试图探索一下它产生的背景,从而对它的起源作一个推测。

前面,我们已经根据《齐语》探讨了管仲经济变革的内容,这些内容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在《周礼》中都可以见到类似或更加详细的规定。下面试分别作一些比较。

相对于管仲对基层劳动者的强制编制,《周礼》有“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周礼·地官·大司徒》。),“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鄴,五鄴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周礼·地官·遂人》。)

相对于管仲的军队组织,《周礼》有“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周礼·地官·族师》。)

相对于“陆阜陵墠,井田畴均”,《周礼》有“乃均土地”(《周礼·地官·小司徒》。),“以颁田里”(《周礼·地官·遂人》、《周礼·地官·县正》。)。有以家授田者,一家受田依不易、一易、再易之不同分别为一百亩、二百亩、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以夫授田者,一夫田百亩,莱依

上、中、下分别予以五十亩、一百亩、二百亩（《周礼·地官·遂人》。）。

相对于“相地而衰征”，《周礼》有“均地政（征）”（《周礼·地官·均人》、《周礼·地官·土均》。）。征有“财征”、“役事”，须“经牧其田野”而为之（《周礼·地官·遂师》。）。财征，“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无过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礼·地官·载师》。）役事，“上地……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也者家二人。”（《周礼·地官·小司徒》、《周礼·夏官·大司马》。）

相对于“伍鄙”之制，《周礼》有遂人、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鄯长、里长、邻长、旅师、稍人、委人等一整套职掌，控制被剥削者，管理农事及赋敛。

相对于“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周礼》有山虞、林衡、川衡、（矿）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囿人、场人等一整套职掌，管理耕地外土地及其赋敛。

相对于“市立三乡”，《周礼》有司市、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鹵、司稽、胥、肆长、泉府、司门、司关等一整套职掌，管理市场和贸易。

相对于“令夫农……尽其四支之敏”，《周礼》规定“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周礼·地官·载师》。）

相对于“令勿使迁徙”，《周礼》规定：“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圉土内之。”（《周礼·地官·比长》。）

相对于“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周礼》有“以圉土聚教罢民”（《周礼·秋官·大司寇》。）。

相对于管仲之三军建制，《周礼》有“王六军，大国三军”之制（《周礼·夏官序》。）。

相对于军队“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周礼》有“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如蒐田之法。”（《周礼·夏官·大司马》。）

相对于管仲之都鄙不同编制，《周礼》规定国野征役年龄不同，“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周礼·地官·乡大夫》。）

相对于其年终计吏功过，“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选，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周礼》规定“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周礼·天官·大宰》。），“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周礼·天官·宰夫》。），“岁终，则考六乡之治”（《周礼·地官·乡师》。）。

相对于令下属“修德进贤”，《周礼》规定“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周礼·地官·乡大夫》。）

相对于“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周礼》规定“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周礼·秋官·大司寇》。）

管仲作为改革提出了一整套制度和措施，显然，这些制度和措施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说主导的、主要的内容是以前所没有的，然而，这些内容在《周礼》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叙述，其间联系决非偶然。特别是管仲变革中有关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容，在《周礼》中都有更为详细具体的制度和措施，尤其是其三项重要变革：对民编制、国家授田、实物剥削。西周时期对被剥削者实施集团整体的控制与剥削，甚至对其内部人数亦不清楚，“宣王料民”方开始尝试清点人口，在先秦文献中，人口户籍管理较明确也叙述较多的是《齐语》、《商君书》、《管子》，《左传》中仅于《成公二年》可见楚共王时“乃大户”，杜预注曰“阅民户口”，而《周礼》之中，统计、清理、核准户籍，则是上关天子，下及闾里之吏的重要工作，年年时时都要进行，总称之为“比法”，涉及职官数十，显然，《周礼》这部分内容只能来源于管仲变革及其以后的改革或制度。西周时期，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与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一般在空间上是严格区分的，社会第一层次的土地制度集中表现于“田”上，剥削者一般并不干预被剥削者如何使用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这部分职能由公社执行，而《周礼》中有关国家授田的制度系统而完整，是许多职官的重要职责，其源头只能追溯于最早实施国家授田制度的管仲改革。西周时期的主要剥削形式是劳役剥削，实物剥削处于次要地位，春秋时期逐渐转变为以实物剥削为主，这种转变源于管仲变革，而《周礼》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实物剥削已经占据相当比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周礼》与管仲变革的关系。

从《周礼》、《齐语》的这些雷同和类似之处，再考虑到管仲变革发生于齐国，而《周礼》亦成书于齐国，我们可以推断，《周礼》的产生与管仲变革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管仲变革是《周礼》的真正发源之处。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推测，管仲变革之时，统治者中的改革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有的被采纳施行了，有的未被采纳实行，这些方案中的一部分为后人整理加工，再加上其他一些内容，遂成《周礼》一书。《周礼》中所记社会组织及职官设置过于规整且繁杂，这本身就是它成书于一些改革方案的证据。从《周礼》与《齐语》对应之处甚多来看，《周礼》所保存的这类改革方案中有许多是已经实行了的，特别是有关经济变革的部分。当然，《周礼》中也会存在一些管仲变革之前社会的遗迹，这是由于，管仲变革打着沿袭昔“圣王治天下”之法、“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的招牌，他给许多变革披上了旧的外衣，特别是在对被剥削者的统治手法上，另外，其复杂的成书过程也使许多管仲以前的东西汇总了进去，但是《周礼》的主流、特别是其中社会经济部分反映了管仲所推行的社会变革。

三 “书社”的内容及实质

春秋至战国初期，“书社”一词在文献中大量出现，有时也简称为“社”，它被作为贵族间赐与的对象。

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齐与卫地，……书社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景公与鲁君地上阴数百社。（《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景公禄晏子……十一社。（《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齐桓公……与之（管仲）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荀子·仲尼》。）

秦王使公子他之赵谓赵王曰：……赐之二社之地。（《战国策·秦策二》。）

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管子·小称》。）

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吕氏春秋·先识览·知接》。）

越王……请以故吴之地，……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吕氏春秋·离俗览·高义》。）

昭王将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冉有）对曰：……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曰：“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姓名于籍。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虽累千社夫子不利’，是也。”崔述曰：“《史记》误以书社为地名，因加‘里’于七百之文下耳。”（转引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四七。）两说可并存，因为不论是以若干家为里，然后再立社，还是以若干家为书社，实际都是由国家以行政手段将一定数量的农民编制为一种基层的社会组织，以用来控制被剥削者人身。）

引用这样许多材料，只是试图证明书社在当时是普遍的存在。从上述也可看到两点：首先，它是一种被剥削单位，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因而贵族间互相赐赠；其次，有关齐国“书社”的记载尤多。当然，文献中也有将书社存在时间提早到周武王时期的，如：

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士卒坐阵者，里有书社。（《商君书·赏刑》。）

武王伐纣，士卒往者，人有书社。（《管子·版法解》。）

武王胜殷，……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吕氏春秋·慎大览》。）

但这些文献均出现较晚，且西周及春秋时期史料中不见类似记载，因而并不可信。其实，如后所述，书社是管仲变革之后的产物。

书社是什么？我们首先从字面分析起。先看社字。甲骨文、金文中不见社字。《说文》曰：

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 ，古文社。

由此可见，社字最早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许慎解社为土地神。王充解社为土，曰：“社，土也。”（《论衡·顺鼓》。）《汉书·郊祀志下》引

王莽语亦曰：“社者，土也。”王国维研究卜辞，得出结论，土即社，曰：

按 即 ，即今隶土字，卜辞借为社字。《诗·大雅》“乃立冢土”，《传》云：“冢土，大社也”。《商颂》“宅殷土茫茫”，《史记·三代世表》引作“宅殷社茫茫”。《公羊僖公三十一年传》“诸侯祭土”，何注：“土谓社也”。是古固以土为社也。（《殷社征文》，《王忠愍公遗书》第二集。）

可见，土、社本一字，社原意即土地，又指土地神。将社与二十五家联系在一起，则社不仅指土地，还包括了土地上的劳动者。因此，当社被作为社会组织时，实际上是一种人地合一的属于行政编制的基层组织，人在其中占首要位置，因此必须记为一社为若干家，土地则相对处于较次要地位。当然，当社特指土地神时，则它不仅存在于这种基层组织之中，也存在于更大或更上层的社会组织之中。

现在再讨论一下书社。《荀子·仲尼》杨倞注：“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书社者，书其社之人于籍。”《左传·哀公十五年》杜预注：“二十五家为一社，籍书而致之。”《管子·小称》尹知章注：“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则共置社，谓以社数书于策。”其中尹知章注不甚允当。所谓书社之书，当如杨倞、司马贞、杜预之说，为书写社中户籍，而非书写社之数目。关于杨倞注中所言“版图”，《周礼·天官·小宰》郑众注曰：“版，户籍；图，地图也。”《周礼·天官·司会》郑玄注曰：“版，户籍也；图，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周礼·天官·宫伯》郑众注曰：“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可见，在书社之中，人口和土地都有着明确的统计和登记，国家对书社内部情况了如指掌。

总括上述，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书社的一些基本线索：一、为被剥削者的社会基层组织单位；二、为被剥削者的人、地统一体；三、一社户数有定制，为二十五家；四、国家对书社中情况了如指掌。本文第二章已经讨论过，西周时期被剥削者多以“族”、“邑”为单位被整体剥削，由于它们是自然形成的，故其中户数、人数无定制。到管仲变革之时，方将被剥削者依一定规格强制编制起来，可见，书社这种

社会基层组织不会存在于西周。管仲变革时对被剥削者鄙民强制编制为三十家一邑，作为管理被剥削者的最基层单位，同时实行授田制度，这与上述书社线索完全一致，而且据文献的记载，早期书社多见于齐国，因此，关于书社起源的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管仲变革中由统治者强制编制而形成起来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春秋时期有确定户口数目、由国家以行政手段编制的被剥削单位“邑”，与西周时期自然形成而无确定户口数目的“邑”具有根本的区别，前者实即书社。因此，文献所见有确定户口数目之“邑”均属此类，如《国语·齐语》“制鄙三十家为邑”，《管子·小匡》“制五家为轨，……六轨为邑……”《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另外，春秋中叶齐国铜器《 𨔵》“侯氏易（锡）之邑二百又九十九邑”之邑，当然也属书社类型，与西周类型之邑截然不同，因此其数目方大大超过金文及文献所见一般赐邑，而与赏赐书社数目相类。

关于书社的内部结构，除了其户数有定制、户口土地明确登记于版图而外，我们尚不能找到更直接清晰的记载。但是，根据前面所讨论的管仲变革与《周礼》之间、管仲变革与书社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将《周礼》作为基本依据，对书社内部结构予以比较详细的揭示。

根据《周礼》及其他文献，书社有如下特征。

1．统治者对书社人口和土地的严密控制。

这表现为各级国家机构对“版”与“图”的严密控制。如地官之首大司徒之职为“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周礼·地官·大司徒》），天官之首大宰也有“听闾里以版图”的职责（《周礼·天官·大宰》）。有专门的官吏掌管版图：

司书，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知山林川泽之数（《周礼·天官·司书》）。

有人专掌民数：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

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周礼·秋官·司民》。）

管理书社的各级官吏，都有一个重要任务，管理其中的人口与土地。这种管理自然与对书社的剥削密切结合了起来。

遂师，……以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施舍与其可任者；经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数而任之。（《周礼·地官·遂师》。）

遂大夫，……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周礼·地官·遂大夫》。）

酈长，……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周礼·地官·酈长》。）

鄙师，……以时数其众庶。（《周礼·地官·鄙师》。）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周礼·地官·里宰》。）

这里，统治者仍把对劳动者人身的控制列为首位，比控制田土更重要。另外，在统治者眼中，被剥削者与六畜、兵器、车辇属于同一类，作为同一统计和管理的对象。

2．统治者对书社成员的严密编制。

统治者为控制书社成员，按照某种人为的规格（这种规格可能随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对其强制进行编制，编制中较低的某一级即为书社。这种编制与土地分授、征收贡赋、征发力役、实行联保等联系了起来。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宾。（《周礼·地官·大司徒》。）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酈，五酈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周礼·地官·遂人》。）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周礼·地官·大司徒》。）

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周礼·地官·族师》。）

士师……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周礼·秋官·士师》。）

《族师》与《士师》所叙述的这种严密控制，在《汉书》中有更形象的描述：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汉书·食货志上》。）

《管子》亦有类似的描述：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閤，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管子·立政》。）

这种严密控制 ,显然比欧洲中世纪对农奴的控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3 . 统治者直接干预和组织书社内部的各种活动。

《地官·遂人》较全面地叙述了国家干预和组织书社内部活动的内容：

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兴耨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周礼·地官·遂人》。）

其一为授田。西周时期，被统治者“族”、“邑”成员对于实现必要劳动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由“族”、“邑”内部自行组织调节。而在书社，被统治者使用的土地则由国家通过各级官吏层层授与。

凡造都鄙，……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

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周礼·地官·遂人》。）

既然是以岁时稽其人民数，而后根据人数（或家数）授田，可见这种授田是自上而下、逐级进行的。因此，各级官吏都有类似职责，遂师要“经牧其野”，遂大夫要“稽其”“田野”，县正要“以颁田里”，鄫长、里宰要“趋其耕耨”，等等，最后，才授田于农民手中。

其二为催征。西周时期，被剥削者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是以“族”、“邑”为单位而整体付出的，统治者依时接收即可，顶多再派以邑宰、小臣、田畯之类去监督支付，至于“族”、“邑”内部如何组织和分配这种支付，则由它们自行安排和调整。而对于书社，则有各级官吏层层催征，一直落实到“夫”、“家”。

遂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以颁职作事，以令贡赋，以令师田，以起政役。（《周礼·地官·遂人》。）

遂大夫，……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以教稼穡，以稽功事。（《周礼·地官·遂大夫》。）

鄯长，……以时校登其夫家……趋其耕耨，稽其女功。（《周礼·地官·鄯长》。）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趋其耕耨，……而征敛其财赋。（《周礼·地官·里宰》。）

旅师，掌聚野之耒粟、屋粟、闲粟。（《周礼·地官·旅师》。）

委人，掌聚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蓄积之物。（《周礼·地官·委人》。）

另外，还有官吏专门掌握征、赋、役之类剥削在各书社组织间或其他被剥削者间的平衡，如：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周礼·地官·均人》。）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周礼·地官·土均》。）

郑玄注此曰：“政读为征。地征，谓地守地职之税也。地守，衡虞之属；地职，农圃之属；力政，人民则治城郭、涂巷、沟渠，牛马、车辇则转委积之属。”“地事，农圃之职；地贡，诸侯之九贡。”可见，

这是一套完整的催征系统，除征以各种生产品外，还有力役。要实现这些剥削，就必须督促农民生产，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以圜土聚教罢民。（《周礼·秋官·大司寇》。郑玄注：“功，农；力，勤力。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也。民不愆作劳有似于罢。”）

其三为干预生产。西周时期，统治者除了通过藉田礼表示重农，以达到“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国语·周语上》。）具体的生产组织，则由公社自行管理。而在书社时期，各级官吏从各方面对书社生产活动予以全面干预。其大致有如下一些。组织生产，包括了田间规划、水利设施建设、提供农具、一直到种植、施肥等等：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周礼·地官·遂人》。）

以土宜教甿稼穡，……以时器劝甿。（《周礼·地官·遂人》。）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騂刚用牛，赤緹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鹵用豕，勃壤用狐，埴垆用豕，疆埸用蕢，轻用犬。（《周礼·地官·草人》。）

督促生产，以行政手段促使农民努力生产：

遂大夫，……以教稼穡，以稽功事。（《周礼·地官·遂大夫》。）

鄯长，趋其耕耨，稽其女功。（《周礼·地官·鄯长》。）

里宰，……趋其耕耨。（《周礼·地官·里宰》。）

保护生产，主要有提供保险和平抑物价：

以兴耰利甿。（《周礼·地官·遂人》。郑注曰：“郑大夫读耰为藉，杜子春读耰为助，谓起民人令相佐助。”）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周礼·地官·司市》。）

凡天患，禁贵儋者，使有恒贾。（《周礼·地官·贾师》。）

其四为干预民之婚嫁。国家官吏用行政命令使民婚嫁，这一方面是促使劳动力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是使民不易迁徙逃亡，以利统治者的控制和剥削。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日，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周礼·地官·媒氏》。郑玄注：“判，半也，得耦为合。”）

其五为施民教化。这个“教化”是对被剥削者的精神影响与控制，包括刑法、道德、礼节等等方面的观念。

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黷；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周礼·地官·大司徒》。）

4．国家严密控制授民农田以外的各种土地。

这种限制是国家授田的一个必须条件，因为有了这种限制，才能

将书社成员束缚于被授与的土地上，保证授田成为控制书社成员人身的一种有力手段。这种限制囊括了耕地以外的所有土地。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凡窃木者有刑罚。（《周礼·地官·山虞》。）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周礼·地官·林衡》。）

川衡，掌巡山泽之禁令，犯禁者执而诛罚之。（《周礼·地官·川衡》。）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周礼·地官·迹人》。郑玄注：“田之地，若今苑也。”）

（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周礼·地官·人》。）

圉人，掌圉游之兽禁。（《周礼·地官·圉人》。）

场人，掌国之场圃。（《周礼·地官·场人》。）

5．剥削主要取地税形式。

西周时期，剥削形式主要是对“族”、“邑”整体的劳役剥削。而对于书社，统治者基于将劳动者较稳定地束缚于耕地上的授田制这一条件，将主要剥削形式变为地税。

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十二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周礼·地官·载师》。）

这是实物剥削，不管田地是否耕种，都要征收。此外还有力役，力役的计算与征派也是基于授田额。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周礼·地官·小司徒》。）

上述，我们大致讨论了书社的基本特征。那么，书社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以前许多学者称其为公社，这种说法对公社概念的理解是有错误的。什么是公社？本文第一章第三节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过的前资本主义公社，其基本特征就是内部自成系统、自我调节、整体与外部社会发生关系，以此衡量，书社显然不是公社，因为书社内部的各种经济活动、各种事务、以至被剥削者个人和家庭，都为统治者所直接干预，牢牢控制，它自己内部没有什么独立的活动，不能自我调节，也不是自成系统，一切以统治者的需要、组织和干预为转移。西周时期统治者对被剥削者的统治一般仅仅达于“族”、“邑”整体，被剥削者个人的活动由“族”、“邑”自行调节和组织，而对于书社来说，剥削者的统治则达到了社会最小组织单位——“夫”与“家”。书社实质上只不过是社会整个统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是社会的一种基层行政组织。如果说书社与公社有某些共同之处的话，那么，与其说书社保留了公社的残余，还不如说书社作为剥削者人为的一种社会基层组织，竭力去模仿公社，套用公社的形式，以利于自己的剥削与统治。

观察中外古代社会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基层组织瓦解之后，并非马上形成完全以地域为依据的社会基层组织，这时往往会产生一种以人身为基础、按照一定数量的个人或家庭为编制而形成社会基层组织。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之后，即在“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口号之下，推行了“猛安（千、千夫长）谋克（百、百夫长）”制度，对女真本部和归附部族进行编制，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铁木真在统一蒙古高原后，即取消原氏族组织，而按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编制牧民，同时设置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取消原氏族制度，建立了八旗，以三百人为牛录，五牛录

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春秋时期管仲变革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说与此类似。这一类的社会基层组织显然与公社风马牛不相及。

另外，由于这类社会基层组织便于控制，其对居民的组织又比较有效，因此只要条件许可并有机会，统治者马上就会利用这一形式。例如元代初年，民间曾自发产生出一种互助组织“锄社”，他们在生产中进行互助活动，“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锄治篇第七》。）元政府则在此基础上规定：“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元史·食货志一》。）其职能为督促耕作、奖勤罚懒、组织互助、开垦荒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灭蝗害、栽桑枣、建立义仓和学校等等。

第二节 各国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

管仲改革，使齐国一跃而成为春秋第一强国、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如上节所述，他在经济上的政策，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通过人为编制来控制被剥削者人身的同时，也开始控制生产所用的全部土地，以此作为辅助手段，通过国家授田制度，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同时达到控制劳动者的目的，一是将劳役剥削为主改为实物剥削为主，将被剥削者用以实现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土地在空间上合而为一。管仲经济方面变革的意义在于，原来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剥削的实现，必须经过公社这一个中间环节，统治与剥削均不能直接达到公社农民身上，经过管仲变革，关系变得简单了，作为剥削关系集中表现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变为直接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各级国家行政机构得到实现。社会总剥削收入无论在剥削者之间以何种形式及比例进行分割和再分割，都不会影响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关系的这个基本格局。自此而后直至商鞅，各国经济变革项目或多或少，程度或高或低，但大体都不脱出其窠臼，故韩非子同称管仲与商鞅，并指出其影响之大：“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

下面，我们就以管仲变革为基本比照对象，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之中，讨论一下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方面的一些重大变革。

一 各国有关土地制度的变革

1 . 晋国变革。

管仲变革若以他任齐相算起，开始于公元前685年。40年后，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作爰田”、“作州兵”的变革。

（秦）乃许晋平。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惠）公在秦三月，闻秦将成，及使郤乞告吕甥。吕甥教之言，令国人于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将归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赏以悦众，众皆哭，焉作辕田。吕甥致众而告之曰：“吾君惭焉其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不亦惠乎？君犹在外，若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以韩之病，兵甲尽矣。若征缮以辅孺子，以为君援，虽四邻之闻之也，丧君有君，群臣辑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皆说，焉作州兵。（《国语·晋语三》。）

此项变革保留下来的史料过少，故对其解释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关于“爰田”，本文第四章第三节将就商鞅变法“制辕田”进行讨论，认为其基本内容就是推行以铁犁牛耕为核心的耕作技术变革，“辕田”也即“爰田”。因此，从秦的“制辕田”可以推测晋的“作爰田”。由于“爰田”概念的相同，由于秦、晋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之类似，我们有理由推断，晋“作爰田”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以铁犁牛耕为基

础和核心、以垄畝耕作方法为表现形式的农业技术革命。当然,晋“作爰田”中是否包含了类似商鞅“开阡陌”、即实现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变革的内容,现存资料没有明确记载,不敢臆断,但推测必定有类似内容,因为重大的技术革命必须与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结合起来,方有可能真正实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都必须包含生产技术变革和生产关系变革两个方面,二者结伴而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外,同时实施的“作州兵”之兵制改革也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关系变革为基础。或许正如史籍所记载的广义的“开阡陌”囊括了商鞅变法生产关系与生产技术两方面变革内容一样,“作爰田”也是以包涵这两方面内容的广义简称而留于史籍。

关于“作州兵”,韦昭注曰:“二千五百家为州,使州长各帅其属缮甲兵。”杜预注曰:“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均解“兵”为兵器,“作州兵”为扩大兵器制作。惠栋《春秋左传补注》曰:“州兵犹鲁之作丘甲也。”洪亮吉《左传诂》曰:“作州兵盖亦改易兵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略增兵额,故上云‘甲兵益多’,非仅修缮兵甲而已。”蒙文通先生《孔子和今文学》根据《周礼》遂不出兵之叙述认为:“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谓统州者谓之遂,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李亚农先生在《西周与东周》中称“作州兵”为“晋国在开始建立地方兵团。”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也认为,“作州兵”即改革兵制,“兵制改革,势必扩充军器之制造”,因此改革兵制说实际上包含了扩大兵器制造说。后一类解释显然比较合理。

晋国在军队大败、国君被俘的特定条件下,吕甥精心导演,郤乞具体实施,以国败君辱感动国人,又假借君名赏赐以取悦国人,在争取到国人支持之后,晋开始“作爰田”和“作州兵”的变革。比照于管仲变革以及此后的鲁国变革、郑国变革等等,我们可以推断,晋之变革与其他各国变革类似。《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若依此,“州”显然已不是西周“族”、“邑”类型的社会基层组织,而是一种人为编制的地方行政组织,其基础当是与书社类似之社会基层组织。而州之成员显然又不属于国人,因此“作州兵”

另一层含义就是将原来不参加战争的鄙民也拖入战争之中，服兵役。既然国家对被剥削者的控制已经直接深入至“家”，并通过各种人为编制的行政机构实施这种控制，那么显然社会剥削关系已经跨越了以劳役剥削为主的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通过这个变革，晋国的剥削应当是以实物剥削为主，而土地制度则应当转变为国家授田制度。

2．鲁国变革。

而后再过五十一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开始经济变革，前后持续百余年，其中内容，《春秋》仅记有“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九字。《左传》记叙也非常简单：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为齐难故，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

此三事记载都非常简单，故自古以来异说纷纭，这里试图将此三事与管仲改革相对照而进行解释。

“初税亩”发生于公元前594年。“初”，意味着这是一种新实施的制度，是一种改革。“税亩”，即以土地数量为标准或依据，进行实物剥削，这与管仲之“相地而衰征”类同。以土地为依据进行实物剥削，则意味着剥削者对被剥削者不再进行集团整体的剥削，而直接控制到被剥削者个体。因此，在这件事的背后，当隐藏着两个事实：一、国家对被剥削者个体进行重新编制和严密控制，类如管仲之“三其国而伍其鄙”，后来实行的“作丘甲”可作为旁证，因为不如此，在依然人少地多的条件下，仅仅依据土地就会使剥削落空；二、国家对全部土地的全面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被剥削者个体进行授田，因为在剥削者与国家合而为一的条件下，不设法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全面而有效的结合，仅仅依据土地也会使剥削落空。

四年以后，即公元前590年，鲁“作丘甲”。这是给被剥削者增加了一种新的负担军赋，其中即有实物又有劳役，是一种新形式的剥

削。我们知道，西周时期，当兵作战是国人的特权，这不仅见诸文献，也见于考古资料，如曲阜鲁国故城西周墓地所反映的，“周人家族中主要成员是贵族武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土著居民的社会地位远低于诸周人家族成员，作为周人之‘庸’（傭），是封土内的二等公民。”

（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275页。）直到管仲改革之时，国人仍维持这种特权。随着国人与土著的逐渐融合，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一直没有当兵权利的鄙民也被拉上了战场，既要缴纳军需物资，又要当兵打仗，这就是“作州兵”、“作丘甲”的真正内涵，《春秋》其他两传也揭示了这一点。《公羊传·成公元年》曰：“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丘使也。”何休注曰：“讥始使丘民作铠也。”《谷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所能为也，作丘甲，非正也。”当然，这并不标志鄙民地位的提高，而是战争的需要迫使统治者不得不以此种方式增强军事实力，晋“作州兵”在被秦大败之后，鲁“作丘甲”则是“为齐难故”。因此，《孙子兵法》说：“财竭则急于丘役。”（《孙子兵法·作战》。）

“作丘甲”之“丘”，表明了被剥削者的组织形式已经与西周时期完全不同。作为社会基层组织之“丘”，见于先秦文献者还有：《左传·昭公四年》有“丘赋”，《庄子·则阳》有“丘里”，《孟子·尽心下》有“丘民”。这里的“丘”，即“邑”，也即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左传·僖公十五年》“败于宗丘”杜预注曰：“丘，犹邑也。”《广雅·释詁二》曰：“丘，居也。”但作为“丘”之“邑”，已与西周时期无一定户口数量之“邑”截然不同，杜注“作丘甲”引《周礼·小司徒》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孔颖达疏又引《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若据此，则可看到两点，一、作为社会基层组织之“丘”有确定户口，与西周不同；二、虽是以人身为单位的基层组织，其度量人户的标准却是定量土地。由定量土地与一定人户的确定联系可以看出，这时国家授田制已经实施。由“丘”之具有确定户口可以看出，社会基层组织已经是由国家强制编制的由并不一定具有血族关系的人户所组成，这与管仲改革完全类同，其性

质属于书社。

约 100 年后 ,公元前 483 年 ,鲁又实行改革“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一年》交待“用田赋”之背景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孔子私下表示了反对,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由此可见,“用田赋”从“作丘甲”演化而来,“作丘甲”虽以定量土地作为度量人户之标准,但军赋征收的直接依据仍然是人身,通过书社来实施,而“用田赋”则将军赋征收依据完全转移至土地。

鲁国的这三件事表明了一个连续的变革过程。西周时期,剥削的实现以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直接控制为基本前提,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初税亩”先将租税征收转移至土地,这标志着国家(统治者、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人身控制已达及人户,同时标志着国家授田制的实施;“作丘甲”将军赋扩大至鄙民,虽然直接的征收依据是被剥削者人身,但对人户的度量标准还是土地;而“用田赋”则将军赋征收也转移至土地。国家各方面的租税征收都以土地为基本依据,则说明国家授田制度已趋成熟且全面实施,与战国授田制下秦魏之“勿令为户,勿予田宇”,“顷入刍二石、稿三石”之类相同。

3. 楚国变革。

鲁开始变革后 46 年,公元前 548 年,楚国开始经济变革。

楚蔦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蔦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石经、宋本、岳本、监本“卒”作“兵”,其他各本均作“卒”。杨伯峻先生认为当为“兵”,指出,此处“兵”为兵器,车兵、徒兵分别为车上战士与车下徒卒所用兵器。见《春秋左传注》第三册第 1107 页。笔者以为此处作“卒”较妥,因为随战争的扩大,需要扩大兵器制造,但更重要的是需扩大兵源。)、甲楯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楚国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项。一、全面调查并控制所有土地,分

别类型，采取不同制度和方式予以规划与管理，在“衍沃”之地，则以整齐的规划将其划分为均等的小块。控制所有土地，并将宜于农耕的土地划分为均等小块，与管仲之“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井田畴均”相类，标志着国家对被剥削者的控制已达于最基层的人户，当然也就意味着严密的户口编制，同时实行国家授田制度。二、赋税制度改为实物剥削形式，根据土地上的收获决定军赋征收数额，这与管仲的“相地而衰征”类同。三、“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似已将兵役扩大至国人以外，因为全部土地皆在国家控制之下，而征收军赋的直接依据是土地所入，则所有被剥削者均在军赋征收范围之内，大概非国人也已经被作为兵卒来源。鄙民不但要承担军赋，而且要服兵役，相当于鲁之“作丘甲”。

4．郑国变革。

又过五年，公元前543年，郑国子产举行变革。子产变革在春秋战国影响似乎很大，当时就很有名气，孔子曾多次提到他，诸子诸多涉及，太史公也评论说，“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史记·循吏列传》）。他是先秦大改革家，可以说与管仲、商鞅并列。在此之前，公元前563年，子驷曾尝试变革：

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左传·襄公十年》。）

同年，子驷被杀，变革中止。二十年之后，子产再次变革，其内容有：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年》。）

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

以管仲变革类比，“都鄙有章”与管仲“参其国而伍其鄙”相同，即在国与野采取不同的编制体系。“庐井有伍”则与管仲“伍其鄙”相

类，即对非国人之鄙民按一定格式编制起来。表述上则有所不同，不只是对“庐”即鄙民人身的编制，也含有对“井”，即一块块均等的小方块田的编制。其实，这只是表明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国家授予农民以定量的土地，故一定的劳动者人身必定与一定的小方块田相联系，指明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也就等于指明了一定数量的小方块田，同样，指明一定数量的小方块田，也等于指明了一定的劳动者人身，因此，这里的“庐”与“井”实际是同义反复。子驷的“为田洫”和子产的“田有封洫”性质相同，都是在田地里普遍建立田界。《周礼·地官·大司徒》有“制其畿疆而沟封之”，郑玄注曰：“沟，穿地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贾公彦疏曰：“沟封之者，谓于疆界之上设沟，沟为封树以为阻固也。”《地官·封人》曰：“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曰：“畿上有封，若今时界矣。”贾公彦疏曰：“为畿封而树之者，谓王之国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为沟塹，其土在外而为封，又树木而为阻固。”先秦作为疆界之封，似乎由两部分组成，如贾公彦所说，疆界掘土为沟，沟土外置而为土封，然后再于此上树木。掘土立封，必然同时留下沟塹，故二者实同时形成，意义相同。子驷、子产改革，于田中设洫，显然并非只是水沟，否则不会引起如此大之反抗，当与封相类，共同起田界作用，实际是在立封同时所掘之沟塹。另外，若将洫看作水沟，则排水之沟至少早至龙山文化时期就有，春秋当不稀奇，子驷、子产不至将田中设水沟作为重大改革内容。田界的普遍设立，意味着国家对所有土地的全面控制与管理，这与管仲的“井田畴均”类似，实际标志着国家授田制实施。子驷“为田洫”而能使许多贵族“丧田”，子产“田有封洫”，开始也使贵族（或许也包括一些中层国人）痛恨咒骂：“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左传·襄公三十年》。）这大概也意味着剥削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实物剥削取代了劳役剥削，从而原来被剥削者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和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合而为一，全部在国家的控制与管理之下，剥削者用以进行劳役剥削的“田”失去存在意义，它们和其他田土一起被规划成均等的小方块而授与被剥削者，这就是贵族的“丧田”。但是，新的生产方式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从而使剥削者得到了更多的剥削收入，三年之后，他们又歌颂道：“我有子

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

在此变革基础上，五年之后，子产又“作丘赋”，这与鲁之“作丘甲”相类，实际上也是把国人以外的其他人拉上战场，既要他们提供军需物资，又要他们充当炮灰。杜预注将此与鲁之“用田赋”视为一类，曰：“子产别赋其田”，在《哀公十一年》注中，杜预更明确地解释曰：“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此说不甚合理，《左传·昭公四年》记述曰：“郑子产作田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蚕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如果“作田赋”仅仅是对丘民增加了军赋剥削量，郑国国人没有理由如此恶毒地咒骂子产，显然，这种改革剥夺了国人的一种特权，以丘民为兵源，自然也就降低了国人的地位，在国人看来，正如《谷梁传·成公元年》所曰：“夫甲非人人所能为也，作丘甲，非正也。”

子产经济变革的基本内容是改变剥削方式，而设立田界系统以推行国家授田制度又是其中的核心措施，因此晋叔向在致子产函中责备曰：“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杜预注：“作丘赋，在四年。”），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左传·昭公六年》。）将“作封洫”列为其错误之首条。《史记·循吏列传》也说：“（子产）为相一年，……僮子不犁畔”，亦可见其田界系统之慎密和严格。子产的田界系统，应当说与商鞅之“开阡陌”十分类似。

5．魏国变革。

魏文王时期（公元前445～公元前396年），在李悝的主持之下，魏国进行了变革。有关这场变革的经济方面记载很少，我们仅只知道如下一些内容。一是推行“尽地力之教”，将“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革类同，即建立国家授田制度，国家对被剥削者的控制达及其最基本单位——家。《荀子·议兵》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授田制，应当就是李悝变革的结果。一是全面干预农民的生产活动，要求“理田勤谨，

亩益三斗”，要求“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通典·食货二·水利田》。）三是推行“平糴法”，“取有余以补不足”，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现象的发生，以保护农民生产顺利进行（《汉书·食货志》。）

6．秦国变革。

秦国的变革则晚得多。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这与管仲“相地而衰征”类似。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与管仲“参其国而伍其鄙”相似。秦孝公时，“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汉书·地理志》），则类似于管仲之“井田畴均”。关于商鞅变法，本文第四章将进行较集中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二 各国变革的意义与特征

通过上述一系列变革活动，社会剥削关系以及建立于此基础上之土地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剥削关系变化最根本的一点，便是剥削者控制被剥削者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无论在任何社会，剥削者控制被剥削者是剥削得以实现的基础，其差别仅仅在于控制方式的不同。西周时期，剥削者控制被剥削者是通过“族”、“邑”之类前资本主义公社这一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公社的自控制、自调节机制，使公社成员很难随意脱离公社，因而，剥削者的控制只要达于公社即可，其下的控制则由公社去执行。公社的瓦解，公社反抗剥削的斗争，使剥削者逐渐失去公社这一实现剥削的得力工具，他们不得不变换控制被剥削者的形式，把控制深入下去，最后直达其个人或家庭，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关系变革最基本或最核心的内容。变革伊始，无论对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公社依然发生着巨大影响。被剥削者熟悉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并希望通过它的自调节和互助机制来解决自己的各种实际问题，而剥削者则迷恋作为实现剥削最好工具的公社，竭力重新使用或模仿公社的种种形式，通过国家行政干预，强制将被剥削者“家”或“夫”按某种人为的规格编制起来，试图以这种行政的组织起到公社那种中间环节的作用，其典型形态就是书社。然而，剥削方式毕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社的自我调节控制机制已不复存在，新的对被剥削者的控制直达于“家”，内容决定形式，这就决定了书社只能是一种过渡的、中间的形态，新内容最终必然要求抛弃旧形式，这也就决定它必然为新形式所取代。这种新形式完全抛弃了以被剥削者人身为基础模仿公社的行政编制形式，而直接采取地域性的行政组织形式，诸如县、乡、亭、里等等。由此，新的剥削关系从内容到形式就都建立了起来。战国时期完成了这一变革，并由此确立了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关系、以及建立于此基础上之土地制度的基本格局。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滥觞于管仲，集成于商鞅，其间一脉相承，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通过春秋战国时期变革所形成的新的剥削关系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1 .“ 家 ” 被作为基本的被剥削对象。

西周时期，“ 族 ”、“ 邑 ” 等主要以血族关系为基本纽带而组成的集团，是被剥削的最基本单位，而这时“ 家 ” 变为最基本的被剥削单位。其典型形态如在战国所见：

……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商君书·境内》。）

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荀子·议兵》。）

当有书社存在时，尽管赐予的被剥削者以书社或“ 邑 ” 为度量单位，但如管仲变革时“ 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 ”（《国语·齐语》），其中所包含的“ 家 ” 有确定数目，一定数目的书社或“ 邑 ” 即等于一定数目的“ 家 ”。另外，由“ 邑有司 ” 亦可知，国家在书社或“ 邑 ” 中设有最基层的行政人员，用以控制其中的“ 家 ”。

2 . 严密控制或编制“ 家 ”。

在实行对“ 族 ”、“ 邑 ” 予以集团整体剥削的西周时期，国家对劳动者人身并不施以直接控制，“ 宣王料民 ” 事件即是证据。这个时期，则形成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例如《周礼》所见：“ 以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周礼·地官·遂师》。）“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周礼·秋官·司民》。）商鞅变法后秦国同样：“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同时采用什伍联保制控制劳动者，如《周礼》所见之“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 ”（《周礼·地官·大司徒》。）商鞅变法时“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禁民随意迁徙，如《周礼》“ 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圉土内之。”（《周礼·地官·比长》。）《商君书》所见之“ 废逆旅 ”、“ 使民无得擅

徙”(《商君书·垦令》。)等等。

3．以“家”或“夫”为单位由国家授田。

西周时期，被剥削者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由公社自行分配和调节，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则在此外，剥削者只关心并干预后一部分土地。这个时期，实现必要劳动与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在空间上已合并为一，通过实施国家授田制度，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得以充分结合。这种授田制度如我们前面已讨论过那样，自春秋开始实施，至战国则全面普及。

4．国家直接干预各项生产活动。

“族”、“邑”时期，各项生产活动主要由公社内部自行安排、调节，只是在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田”上，方有剥削者对生产活动的直接干预，而且主要是监督耕种收获。这个时期，剥削者对生产活动的干预则呈现为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组织生产，如《周礼》：“以土宜教氓稼穡”，“以时器劝氓”(《周礼·地官·遂人》。)，如云梦秦简所见国家为农民提供籽种、铁制农具和耕牛。二、保护生产，如《周礼》：“以兴耒利氓。”(《周礼·地官·遂人》。)“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周礼·地官·司市》。)，如李悝之行“平籴法”，商鞅之控制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商君书·外内》。)。三、督促生产，如《周礼·地官·鄠长》、《里宰》之职责就有“趋其耕耨”，如银雀山竹书《田法》所见，对产量少于一般水平者予以严厉处罚，以至处以刑罚，如商鞅变法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

5．剥削变为以实物剥削为主，依据授田额决定剥削量。

西周时期，剥削形式主要是对“族”、“邑”整体的劳役剥削。这一时期，由于剥削者已采用国家授田这一形式将被剥削者较稳定地束缚于耕地之上，因而主要的剥削形式成为实物剥削，由于实现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土地在空间不再分开，因此一般剥削数额是依据授田额而采用分成或定额方式予以确定的。如《周礼·地官·载师》所见依据土地产量征收的由二十而五到二十而一的剥削，如晋之韩、魏依据土地而“伍税之”(《孙子兵法》佚篇《吴问》。)，如云梦秦简所见，一顷地

固定收取的、若干。

第四章 战国土地制度研究

在近数十年的先秦土地制度研究中，变动最大、成果也最大的领域就是战国时期。引起这一变革的导火线，是1975年12月发现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此前此后发现的山东临沂银雀山《田法》等竹书、四川青川郝家坪秦《为田律》木牍，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变革。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这一结论已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成为研究战国历史的一个新的立足点（最早提出战国授田制这一概念并加以系统阐述的是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研究战国土地制度，首先必须认真研究的便是商鞅变法所确立的一整套新的土地制度。

商鞅变法是先秦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一，历来为人们所非常重视。“为田开阡陌封疆”，“开阡陌，制辕田”，这是对商鞅变法确立新土地制度的概括，也是商鞅变法的基本经济内容。但是，长期以来，其内涵被误解为划削阡陌、废除井田，全面推行土地私有制，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已经推翻了这种观点。其实，商鞅田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革，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包括了农田规划、社会关系、生产技术三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就从商鞅田制入手，对战国土地制度进行探讨。

第一节 商鞅变法中确立的土地规划制度

1979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之秦《为田律》对商鞅农田规划制度有十分详细的叙述，故先录其释文如下：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匱、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埽（埽）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埽（埽），正疆（疆）畔，及登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

此律名为《为田律》，李学勤先生已有论述（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1982年第10期。）。“为”义为作、治，“为田”即制田之意，《为田律》是关于农田规划的法律，与云梦秦简《田律》不同，后者是有关农业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更修”二字，学者多解为改订，黄盛璋先生认为是重申旧律之意，与云梦秦简《语书》“修法律令、田令”意思相同（黄盛璋：《青川新出秦田律木牍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第9期。），此解较妥。重新颁布的时间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据上述，青川《为田律》是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四十一年后重申的有关农田规划的旧律，可以认为它基本反映了商鞅变法所确立的农田规划制度的内容。下面通过剖析律文中的有关基本概念，来探讨商鞅农田规划制度的具体内容。

律文中有关农田规划的基本概念有如下几项。

1．亩。

先看亩积。秦亩为二百四十平方步，文献早有明确记载。《说文》小徐本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慧琳音义》引《风俗通》佚文曰：“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为田律》证实此

亩积，曰：“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胡平生先生据阜阳汉简“卅步为则”的记载，首先指出此处之“则”为量词，“八则”即二百四十步（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19辑，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律中有一条与上述秦律基本相同，“袤八则”处正作“袤二百卅步”（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成为确证。因此，秦亩亩积为二百四十平方步，合公制461平方米，约相当于今市亩三分之二。此亩积在商鞅时期当为大亩，《商君书·算地》所称小亩则与之相对，其曰，方土百里，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共“出战卒万人”，可见小亩即旧有的百步之亩。

胡平生先生认为，《为田律》中之“畛”既可作为田界，也可作为田区，作为田区之一畛为二百四十平方步，“亩二畛”，即一亩为四百八十平方步（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19辑，1983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难以接受，其薄弱之处有三。一、此种亩积于文献不见任何踪迹。二、“畛”既可指田界，也可指田区，此毫无疑问，但含义不同时所指范围亦不同，田区含义当由田界含义衍生而来。“畛”指田界时，它是一条田间的界限，改换含义用以指称田区时，则只能是两条畛之间所挟持的一块田地。因此，秦《为田律》与《孙子兵法·吴问》所述之“畛”并不矛盾，前者在田界含义上使用，田广一步、袤二百四十步则作畛，“亩二畛”即亩之两边各作一条畛，后者在田区意义上使用，“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卅步为畛”（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孙子兵法 残简释文》，《文物》1974年第12期。），这里的畛就是亩，即两条田界之畛所夹田区。两种情况下的亩积都是二百四十平方步。三、与商鞅重农政策相矛盾。务尽地力是战国经济思想家的基本思想，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管子》学派认为“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管子·霸言》），商鞅学派也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商君书·算地》）。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定，战国时期以一夫为核心的个体家庭所能耕作的土地为百步之亩百亩，即李悝所说：“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至汉代，赵过行代田法，“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汉书·食货志》），此处所言为二

百四十步之亩，换算百步之亩一千二百亩，亦为一夫百亩。若据唐兰先生实测，秦尺长23.1厘米，按旧市亩一亩为614.4平方米折算，百步之亩百亩为旧市亩31.2亩，亦合于解放前北方“三十亩地一头牛”的生产力水平。如果将秦亩亩积定为四百八十平方步，则秦亩百亩相当于旧市亩一百五十亩，相当于百步之亩四百八十亩，“一夫挟五口”耕种这些田地，势必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商鞅学派也明确说：“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商君书·算地》），而改变这种“地不任”状况正是商鞅变法的目的之一。

再看形制。由《为田律》可明确得知，秦亩为长条状，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以公制计，宽1.4米，长332.6米。《说文》曰：“南北曰袤，东西曰广”，据此则《为田律》律文所说秦亩为南北向。

2. 畛。

前节已述，秦《为田律》中之“畛”为亩间界限。律文曰：“亩二畛，一陌道”，可知一亩田地为一畛和一陌道所包围。畛的形制和位置律文未言，下面试予以探讨。

文献中一般解畛为起地界作用的田间道路，如《小尔雅·广诘》：“畛，界也”，《诗·载芟》郑笺：“畛，谓旧田有径路者”，《楚辞·大招》王逸注：“畛，田上道也”，《尔雅·释言》陆德明释文曰：“畛，田间道”，《广韵·轸韵》：“畛，田界”，等等，但关于其宽窄大小，多未谈及，仅《周礼·遂人》郑注曰：“径、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车徒于国都也，……畛容大车”，据《考工记·车人》，车“彻广六尺”，则畛至少宽六尺，即一步，但这种解释很难用于秦《为田律》。若认为畛宽一步，那么以畛位于亩之长边，则每耕种一步宽田地就须隔以一步宽道路，以畛位于亩之短边，则陌道位于亩之长边。即每耕种两步宽田地就须隔以三步宽的道路。这种设计浪费土地，滋生野草，既无必要，也难以耕作。由于《为田律》已明言陌道“道广三步”，显然比畛要宽，因而较为合理的位置是陌道位于亩之短边，畛位于亩之长边。从合理使用土地的角度看，畛的宽度也必定小于一步。

畛的宽度可由律文中封埒之设置予以推定。据律文，封埒相连，构成田界。亩之四边中除一步宽的短边之一外，其余三边皆有界限，顷之四界则只有相邻两边为陌道、阡道（说详下），因此封埒当作为顷

间界限。云梦秦简所言“顷畔封”可为旁证。封为高四尺之土堆，埽为“高尺、下厚二尺”之土埂，在遍地是畛的田地里用埽可以标出顷界，则畛之宽度必然窄于二尺，例如可推定为一尺。这样的土埂既不浪费土地，又便于耕作者往来其中，在耒车尚未发明之前又可作为播种中耕的一种标志，因而是比较合理的。至于畛之宽度是否包含于亩之宽度以内，律文未言，无法作出判断。

3．顷。

律文曰：“百亩为顷”，其地积甚明。后世之顷与亩同作地积单位，无固定形制，但秦亩有固定形制，秦顷亦当有固定形制。“百亩为顷，一阡道”，由此可推测顷为百亩并排而成的长方形田块，一边设有阡道。若将畛宽含于亩宽之内，则顷长二百四十步，宽百步，合公制长332.64米、宽138.6米，计46104平方米，约相当旧市亩75亩。

4．陌道、阡道。

据律文，亩短边之一为陌道，则百亩之陌道相连，成为顷短边之一的陌道，相应，顷长边之一则为阡道。因此，就一顷田地而言，其四边中有相邻两边为陌道、阡道，阡道与亩方向相同，南北向，陌道为东西向。

阡道宽三步，诸家解释无异，陌道宽度为何，有一步、二步、三步诸说（一步说见杨宽《释青川秦牍的田亩制度》，《文物》1982年第7期；二步说见黄盛璋《青川新出秦田律木牍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第9期；三步说见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文史》第19期，1983年）。笔者认为，陌道与阡道宽度应相同，均为三步，理由如下。首先从律文看，其曰：“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顷，一阡道。道广三步。”“道广三步”之“道”显然统指陌道、阡道两类，若仅指阡道，则行文“一阡道，广三步”更简明合理，不必特别指明“道广三步”。其次从实用角度看，陌道与阡道纵横交叉，形成可行车之道路网，纵横道路宽窄相同，方能有利通行，较为合理。再次从文献来看，《周礼·遂人》郑注曰：“道容二轨”，《考工记·匠人》郑注曰：“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谓辙广”，由此则道宽一丈六尺，与律文“道广三步”相近，陌道既然称之为“道”，亦当有此宽度。因此，阡道、陌道均宽

三步，合公制4.2米。

陌道、阡道与陌、阡是否一事？诸家考释皆持肯定态度，其实二者并不相同。首先，由《为田律》中即可看到二者差别。陌道、阡道统称之为道，律文中关于道和阡陌所规定的维修任务、维修时间皆不相同，对阡陌是“癸”其“大草”，在“秋八月”，而对阡道、陌道，则是“大除道”，在“九月”，并规定“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阡陌之上既然长有“大草”，需“癸”之，则可能有部分阡陌并不作为道路使用，只用为田界。而作为“道”之阡道、陌道必然位于顷边，即每一夫所耕种的一顷地边都有一条陌道、一条阡道，青川木牍背面文字“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 二田，一田，章一田，……”（从李学勤先生释文，见《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1982年第10期。）正反映了陌道、阡道的状况，以“田”计道，此处之“田”当即百亩之顷，此处之“道”，则为顷边之阡道、陌道。其次，从汉代文献中亦可见二者差别。《汉书·晁错传》记晁错上书曰：“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足见田作之道与阡陌并不相同。《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言：秦“用商鞅之法”，“富者田连阡陌”，可见阡陌并非秦《为田律》所言阡道、陌道，若二者同一，则“田连阡陌”毫不足奇。《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之田仅因一陌之差便“多四百顷”，足见陌间距离不近。另外，汉代资料谈及具体阡、陌时，皆有具体名称，如桓阡、京兆阡、原氏阡，什三陌、闽陌、平陵陌等，若一顷田边之阡道、陌道即阡陌，则阡陌数量极大，对其命名不胜其繁。有些阡、陌后来演化为较重要的地名，《续汉书·郡国志》某些县名下特注出有某陌，如弘农郡陕县“有陕陌”，常山国高邑有“五成陌”（刘昭注曰“县南七里”），这些现象也说明阡陌数量并非很多。最后，阡道、陌道因顷而设，故笔直规整，而阡、陌则不一定规整，它们大概依自然地势而设，所以在阡、陌与顷之间会形成一些畸零之地，为管理这些土地，如云梦秦简所见，需特设“阡畔封”、“陌畔封”、“顷畔封”。由上述可见，阡道、陌道并非阡、陌。

5. 阡、陌。

关于阡陌，资料不多，《为田律》仅曰：“以秋八月，……癸阡陌之大草”。《说文》曰：“路东西为陌，南北为阡”，《史记·秦本纪》“索

隐”引《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由此可知，秦地陌为东西向，阡为南北向，正与《为田律》所述陌道、阡道方向相同，或许“道”而命名为陌道、阡道，即由此而来。阡陌数量较少，皆有具体名称，其间距离较远，所包围田地数量庞大，这些前已叙述。阡陌可能多用为道路，《汉书·游侠传》记载曰：“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阡”；原涉“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人不肯从，谓之原氏阡”。这种作为专门开辟之大道的阡陌，自然应当比《为田律》所述阡道、陌道为宽。阡陌似乎亦有不用为道路者，因此《为田律》方曰“發其大草”。

关于阡陌之得名，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阡陌考》曰：“阡陌之名，从《遂人》百亩千亩、百夫千夫生义”。阡陌数少而距远，不可能作为百亩、千亩之界，大约是百夫、千夫所受田百顷、千顷的界限，阡陌之名产生于战国时期或许正由于此。银雀山竹书《田法》可作为旁证，其曰：“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 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战国秦汉文献记阡陌时多作“仟佰”，字从人，亦说明阡陌与受田人数间有一定关系。

6．封、埒。

律文曰：“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封为高四尺、大小与高相称的土堆，埒是高一尺、底宽二尺的土埂，以公制计，封高92厘米，埒高23厘米、底宽46厘米。封埒相连，成为田界，孙诒让《周礼正义》引崔豹《古今注》有很好说明：“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也，画界者，于二封之间又为埒埒，以划分界域也。”

封埒在商鞅农田规划制度中的实际作用，可由《为田律》予以推断。据律文，百亩之顷四界中阡道、陌道各占一边，其余两边标志为何，律文未谈，却又明确指出作为田界的封埒的具体形制，因此，这两条边正是封埒作为田界的处所。由于每一顷田边都有一条阡道，一条陌道，所以相邻的两条陌道和两条阡道之间所包围的土地只能是四顷，封埒相连便成为这四顷田之间界限，顷间之封即云梦秦简所谓之“顷畔封”。由于封高不足1米，而顷之边界长者332米，短者13

8 米，为观察其间联线及修筑壝埒的方便，以封埒为田界的顷边上，封应当有数个或十数个。

这里有必要对云梦秦简所提及的“封”作一些辨析。《法律答问》有一条曰：“‘盗徙封，赎耐。’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顷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学者多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句读：“‘封’即田千佰。顷畔‘封’也，且非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78 页。](#)）认为阡陌就是封，百亩田之田界顷畔也是封。这种理解显然不妥。首先，《为田律》中封既非阡陌、亦非阡道陌道甚明。其次，无论将阡陌或阡道陌道看作封，“盗徙之”工程量都十分浩大，不易为之。笔者认为，秦时封当有两类，一类为非田界之封，类如《周礼·封人》所述之封：“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一类即《为田律》所见田界之封，这类封有阡畔封、陌畔封、顷畔封几种，因此《法律答问》特意解释：“‘封’即田千、佰、顷畔封也。”此处之“畔”当训边侧之意，类如《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之“畔”。就是说，“盗徙之”而处以“赎耐”的封是位于田地中阡边、陌边、顷边的封。这些封在商鞅农田规划制度中究竟起何作用，无资料可借说明，笔者推测与顷和阡陌之间不足划分为顷的畸零之地有关。阡陌作为距离较远的大的田界，必然依自然地势而为之，不一定笔直规整，这样，在邻近阡陌的顷与阡陌之间便会有一些畸零之地，为充分利用这些土地，需要将其划归一定的生产者经营，这里大概只用封埒作田界，由此产生阡畔、陌畔、顷畔之封。在这些土地上私自移动封埒、占用国有荒地即“盗徙封”之罪。阡道、陌道所包围四顷田之间的封当然也应属于“顷畔封”，但“盗徙之”很容易被发现，因此《法律答问》“盗徙封”条大概只用于畸零之地，故其连称“田阡、陌、顷畔封”。另外，对比封、埒与阡、陌、阡道、陌道，可以看出二者在性质上有一定差别。封、埒是小的非固定的田界，因此每年须进行“修”和“正”，即重新确定和修建，其规模尺寸较小，也适应此“修”“正”。而阡、陌、阡道、陌道则是大的固定的田界，每年只须“发大草”和“除”，即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维修，其规模巨大，变动极为不易。固定田界与

非固定田界相结合，一方面保证了田界系统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小的变动、调整以及对畸零之地的处理更加方便，从而有利于授田的进行。

根据上述讨论，《为田律》所反映的商鞅田制农田规划制度内容可图示如前页。

第二节 商鞅变法中的土地关系变革

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主要是进行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革，这点早已为史家所重视，但是，由于拘泥于董仲舒的一段言论：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场改革就是变土地国有制为土地私有制。董仲舒的这段言论实则^①是以汉述秦，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已经推翻了他的说法，并揭示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这种观点目前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就其在法律、制度上的表现而言，该制度包含有如下一些具体方面。

1. 土地国有。

商鞅变法后土地属国家所有，在法权上，这是秦国土地制度的基础。

秦国实行土地国有制有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从正面看，首先，国家授予农民定量土地的制度的实施（详见后述），证明国家控制着土地，否则无法实行这种制度。其次，如前节对秦《为田律》讨论所揭示的那样，国家通过制定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等田界，将土地割裂为以百亩顷为单位的整齐田块，并且每年定时维修这些田界，这只有在土地国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土地私有，则田块无法规整划一，也很难定时统一维修田界。从反面看，首先，商鞅变法以后直至秦亡，提到这一时期存在土地买卖的史料，仅有上引董仲舒言论。笔者以为，董仲舒说商鞅变法后土地“民得买卖”，这是以汉述秦，不足为据（关于董仲舒这段言论，本章第五节将予讨论）。查云梦睡虎地秦简和天水放马滩秦简，特别是《日书》，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公私商业仍然以相当的规模存在着，商品种类形形色色，也包括“臣妾”的买卖，但唯独没有土地买卖的痕迹，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放马滩秦简中有某日“可受田宅”的记载（乙种《日书》315简，见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这说明秦国的土地私有权尚不存在。其次，由云梦秦简《封诊式·封守》可见，土地并未成为私人财产的组成部

分。简文作为查封财产文书的程式范例，记述了对“某里士伍甲”之家的查封情况，甲有房产、蓄臣妾，并非赤贫之家，查封帐目亦细致全面，连“门桑十木”、“牡犬一”都未遗漏，唯独没有土地。这也说明，土地归国家所有。

当然，由于资料仍十分稀缺，上述史料虽然可以说明问题，但还不足以构成充分证据。正由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商鞅变法实行了“允许农民土地私有的任耕制”（杨作龙：《秦商鞅变法后田制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有的学者基于“赐田”即私有土地的观点，认为“秦在商鞅变法后是土地国有制与土地私有制并存”（施伟青：《也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难以成立，下面试作简单讨论。

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讨论过的，无论从法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现实的角度来看，私有制或私有权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并非一定的人对于一定的物的关系，而是一定的人通过一定的物与他人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对于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个人可以排斥他人的处置而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处置，这种社会关系是土地私有权核心的和基础性的内容。近现代民法均肯定这一内容，如1804年《拿破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903条规定：“物之所有人，在不违反法律或第三人权利之范围内，得自由处分其物，并得排除他人对物之一切干涉”（转引自法学教材编辑部《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25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1条也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所有权诸权能中，处分权最重要，因为处分的结果将使权利主体丧失对具体财产的占有和支配。法律意义上的处分即以买卖、赠予、互易等方式将财产转移于他人，其中买卖最具代表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私有财产时，曾以自己的大礼服为例说：“只有当我还能处理、抵押或出卖它时，只有当它还是买卖的物品时，才是我的私有财产”，当它失去这一特性后就不再成为我的私有财产，“因为它不能使我支配任何甚至是最少量的他人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3页。》。

根据上述观点分析秦国土地制度，则商鞅变法后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说法不能成立。至今为止，除董仲舒言论而外，尚无一条史料证实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土地占有者可以买卖土地。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云梦睡虎地秦简和天水放马滩秦简，其中涉及商品交换的记述很多，商品种类林林总总，唯独不见有关土地买卖的文字，如果说简书法律部分反映出国家从未从法的角度肯定过土地买卖，那么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用书的《日书》则证实民间尚不存在土地买卖的事实。在一个土地不能而且也并未进行买卖的社会中，真正的土地私有权不可能存在。当然，秦国的农民通过受田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并经过劳动从土地上获得一定的收益，但他们并无权利处分这些土地，不能由此支配他人劳动，从而这里不存在土地私有权。另外，商鞅奖励耕战政策等等使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并因而占有较多土地。《史记·商君列传》曰：“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商君书·境内》曰：“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那么这些土地是否私有土地呢？也不是。它们同样不能买卖，占有者对之不具有随意处分的权利，这便丧失了作为私有土地的基本条件。

2．授田予民。

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秦政府普遍实行授田予民的制度，这与战国诸国相同。对此事实，云梦秦简已有充分证据，《田律》曰：“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摘抄《魏户律》曰：“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商君书·徕民》谈及招诱三晋之民时也说“今利其田宅”，即在一般授田的前提下，予以晋徙民以良田。青川出土《为田律》使用了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等一整套田界系统，其所用以维护的，是以百亩为单位的田块顷，这恰恰就是用以授田的基本单位，因此其维护田界就是维护授田制。另外，“顷”字本身亦可作为旁证。就目前所见，“顷”字用为田块之称始于青川秦《为田律》，它有固定形状和地积，含秦大亩百亩。凡与田土有关之字，多从“田”从“土”，但顷字从“页”，即从人首之首，显然，秦以“顷”称百亩之田是与将该田授予一夫联系在一起的，故以称人之字用来称田。关

于授田数额，虽无明确史料，但可推定为一夫授田秦大亩百亩。《为田律》规定将土地分割为以顷为单位的地块，当与授田数额有关。该木牍背面记曰“ 二田 ”、“ 六田 ”，此处之田即顷，一家可有数顷田地，亦说明按夫授田。上述推断由文献也可得到说明，《商君书·徕民》称以小亩百亩“ 食作夫 ”一夫为“ 先王制土分民之律 ”，《算地》则曰：“ 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 ”，商鞅主张“ 不必法古 ”，亦主张“ 务尽地力 ”，故上述均非商鞅田制的规定。小亩百亩相当于秦大亩百亩二分之一弱，小亩五百则为大亩百亩二倍强，其中数为秦大亩百亩，当即标准授田额。

3 . 严密户籍。

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必须以对全国人口的全面了解和严密控制为前提，一方面据此授田予民，另一方面又据此征收租赋徭役，因此，商鞅严密户籍的政策及其辅助措施也是商鞅田制的一个社会关系内容。商鞅设立了极为严密的户籍制度，规定“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商君书·境内》）。同时禁止人口随意迁徙流动，《商君书·垦令》曰：“ 使民无得擅徙 ”，“ 废逆旅 ”，云梦秦简《游士律》规定：“ 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另外还采取联保制度以控制人口，“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史记·商君列传》）。

4 . 国家剥削及其分割。

国家推行授田制度，以这种方式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保证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其目的是从受田者那里取得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并在统治阶级中进行再分配，因此，租赋徭役制度也是商鞅田制的社会关系内容之一。由于土地国有，受田者缴纳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中包含了后来意义上的地租与国家赋税两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 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为叙述方便，我们以国家剥削称呼这种租税合一体。商鞅变法后的国家剥削包含租、赋、役三部分。田租有两种形式，一为定额租，《田律》所述以顷征“ 刍三石、二石 ”即是；一为分成租，《商君书·垦令》所述“ 訾粟而税 ”即是。

赋有户赋，秦简《法律答问》解释“匿户”时明确提到户赋。是否有口赋，未见确凿证据。役则依口征发，在一定年龄范围之内，须服更役、戍卒、卫卒等徭役。

国家剥削这种租税合一体在统治阶级中又进行了二次分配。除王室的消费而外，据《商君书·境内》，还有如下一些分割。官俸：有“千石之令”、“八百之令”等，其薪俸来源很大一部分当属后来意义上的国家赋税，但至少有小部分为后来意义上的地租。租赋徭役的赏赐：文中述及战功赏赐时曰，“税邑三百家”，“赐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赐邑即将有关人户本应上缴国家的租赋徭役全部赐予私人，赐税与税邑同，是把有关人户本应上缴国家的租赋赐予私人。赏爵益田赐人：文曰，“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对有战功者，国家一方面增授土地，另一方面又以不同形式赐予其劳动力。《史记·商君列传》曰：“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商君书·境内》曰：“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随爵秩升高可以从国家得到一定数量的臣妾。另外还可以不完全占有一定数量的庶子人身，剥削其全部劳动的百分之二十。这些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之后产生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本来归国家所有，国家又以赏爵益田赐人的方式赐予私人，因此它在本质上仍是国家剥削的分割，当然，在这种形式的分割中，后来意义上的地租色彩便要浓厚得多了。

5．干预生产。

国家授田制的最终目的在于取得国家剥削，而生产状况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剥削能否实现，因此，国家对生产的干预成为商鞅田制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商鞅变法推行了一种近乎偏激的重农政策，其中包含了对农业生产的全面干预，大致可分为督促生产、组织生产、保护生产三方面。商鞅主张以强有力的行政奖励和惩罚来督促农民生产，其变法重要措施之一即“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政府组织生产大致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推广以铁犁牛耕为基础的新的耕作方法垄作法（详

见下节讨论)。二是主持兴修大规模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的建设。三是给农民借贷籽种、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云梦秦简《仓律》记曰,县仓库专门存放作物籽种,管理人员必须掌握各种作物的亩用种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3页:“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苽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这可能类如江陵凤凰山西汉前期墓出土贷谷帐,反映出国家借贷籽种予贫苦农民(参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厩苑律》所见定期评比耕牛并行赏罚的律文,借铁制农具因破旧而损坏者准予报销的律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牖)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为旱(旱)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诎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32页:“(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似说明国家假借耕牛、铁制农具予农民,《封诊式·封守》之家产查封帐中不仅无田,亦无耕牛、铁制农具,可为旁证。商鞅保护农业生产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提高粮价,“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君书·外内》);二是管制粮食贸易,“使商无得余,农无得祟”(《商君书·垦令》),将粮食买卖全部控制于国家手中;三是相对降低农业租税,对农业是“征不烦,民不劳”(《商君书·垦令》),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

6. 田界系统。

商鞅变法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田界系统,它表现着授田制下社会成员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也是商鞅田制社会关系内容的组成部分。就西周金文所见,当时田界仅有封、疆(也即埒)两种。《人盘》记“付予散的田土,以树、河、道路等物为基础标志,然后再立封以为田界。《九年卫鼎》记裘卫得到一块土地,设立四封以为田界,《五祀卫鼎》记厉付与裘卫的四田土地,四边设疆以为田界。永孟也提到作为田界之疆(唐兰:《永孟铭文解释》,《文物》1972年第1期)。商鞅变法大大完善了田界系统,除继续沿用封、埒而外,设立了阡、陌、阡道、陌道等田界标志,又创立了顷这一田块概念,从而使随意改换田

界极为不易。这样做，既切实保证了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使私人很难非法占有国家土地，又切实保证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贪官污吏无法“慢其经界”，贵族豪强无法侵田夺土。

以上，我们就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家授田制的外观表现作了讨论，那么，这种制度的社会依据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这种以法律和制度形式确定下来的土地所有制形态究竟附属于、表现了怎样的生产关系呢？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形态之下，社会表现为对立的两极：国家，农民。将国家和农民联系起来的，是剩余劳动，农民生产剩余劳动，国家攫取剩余劳动。表面看来，实现这种联系的基本依据是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国家授予直接生产者以适应其生产力水平的充分土地，使之可以实现其必要劳动，相应作为地租，从农民身上获得剩余劳动，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也相应作为地租，向国家上缴剩余劳动。这种剥削关系似乎与近世的土地租佃关系并无不同，剥削关系的实现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形态成为整个剥削关系得以存在的基础。如果这样理解，斯大林的生产关系理论可以充分解释秦国国家授田制度。然而，仔细考察，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

杜佑早就指出，秦自商鞅变法后“舍地而税人”（《通典·食货四》），仅就“税人”而言，这个看法相当准确，可谓一语中的，国家从农民身上获取租、赋、役等剩余劳动，基本的或主要的依据是人身，而非耕地。赋、役自不待言，秦以及其后很长时期，依据都是人和户。由于秦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的政策，以国家权力强制将大家庭划分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小家庭，因此，赋、役无论以户还是以人征收，可以说基本等价，都是以劳动者人身为依据。学者一般认为，秦国赋重于租，而徭役又远远重于租赋（参见张金光《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文史哲》1983年第1期。），因此，国家剥削中主要部分的依据是人头，即直接来源于劳动者人身。即便就田租而言，表面上按田亩征收，然而在国家授田制度下，每一个成年劳动力都可以通过受田得到足够其耕种的土地，通常是百亩，而国家征收田租则是依据其受田额，不论其是否耕种，如云梦秦简《田律》所见：“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无𡵓（垦）不𡵓（垦），顷入刍三

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授田依据人户，田租征收依据授田额，因此其依据仍然是劳动者人身。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攫取农民剩余劳动的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国家与农民之间直接的人身控制关系来实现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以土地等物来作为中介，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以土地所有权作为实现剥削的依据。因此，在这种经济关系中，国家极为重视户口的控制，国家还以各种方式直接干预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以行政奖励与惩罚的手段来督促生产。当然，以被授受的田土作为中介，国家与农民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间接经济关系，因而在这些土地上表现出所有制的性质，其所有权属于国家而非农民，但是，在国家与农民的整个经济关系中，土地所有制只是处于从属的次要的位置，因为国家是主动、积极地授田予农民，目的只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实现结合，得以进行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必要劳动，从而能够为国家提供剩余劳动，并非是以这些土地作为要挟性的条件，迫使农民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我们在秦国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现象。例如，云梦秦律论及“匿田”罪时规定，基层官吏隐匿“民田”，当其已收取田租而未上缴，则为“匿田”罪，若未收取田租，则不论为“匿田”罪（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8页：“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可见，国家在这里最为关心的并非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之类，而是田租的征收，即农民剩余劳动的获取。又例如，秦国农民斗争的主要目的与宋以后截然不同，并非夺取土地，而是逃离国家授予的土地，同时，逃离国家控制，因此逃亡是主要斗争方式，董仲舒谈到秦代社会问题时说“民愁亡聊，亡逃山林”（《汉书·食货志》。），作为民间日常用书的云梦秦简《日书》中，专有为逃亡者趋吉避凶而设计的“亡者”、“亡日”两章，亦说明民间逃亡的盛行。

处在这种经济关系之中的国家，当然也像现代国家一样，其重要职能是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但另外更加鲜明、着重地表现出了其阶级性，在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中，它实际上是作为剥削阶级的总代表而存在的，它从农民身上攫取的租、赋、役等剩余劳动，以各种形式二次

分配于剥削阶级各成员，成为剥削阶级成员获取剩余劳动的主要形式。而不像宋代以后那样，地主在与农民的土地租佃关系中获取的剥削是其剥削收入的基本来源，国家则更多地以公共事务为其职能，特别是以各种手段调整地主与农民之间尖锐的阶级关系，以“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总括上述，我们可以简要地说，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其生产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的基本实现条件是国家对于农民人身的直接控制，而国家授田制度表现出来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只不过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从属内容，它的任务和作用辅助国家对农民剥削关系的实现。

第三节 商鞅变法中的农业技术变革——“爰田（辕田）”新解

一场卓有成效的大的经济变革不仅仅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往往也包含生产技术方面的变革，商鞅变法正是这样。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变革为商鞅变法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是秦国迅速强盛的极重要原因。那么，商鞅变法的农业技术变革究竟是什么呢？《汉书·地理志》说：“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这里将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也即秦国强盛的基本原因并举为“制辕田，开阡陌”两项。笔者以为，文中所说“开阡陌”即“开阡陌封疆”，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是通过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的设置，确定百亩田块顷，为授田制服务，因此“开阡陌”可以作为推行国家授田制的代称，而文中所说“制辕田”，则属于农业技术改革。先秦史上曾有晋、秦两次作“爰田（辕田）”，为使分析比较清晰，本节在一些问题上对二者合并予以讨论。

一 “爰田”诸说驳议

先秦史上的“爰田”究竟为何？后汉以降，众说纷纭，观点之多，古史研究中实属罕见，至今未获令人信服之结论，成为聚讼不决的悬案。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历史之谜，除寄希望于新资料的发现而外，方法也需适当调整。一是严格从现有史料出发，避免“增字解经”，并结合历史环境整体进行研究；二是尽量从汉魏人的注解中超脱出来，避免由此产生的纷乱；三是解字应本其初义，运用声训须十分审慎，力戒牵强附会。笔者试图由此出发作些新的探讨。

目前所见先秦“爰田”史料仅三条：

（秦）乃许晋平。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惠）公在秦三月，闻秦将成，乃使郤乞告吕甥。吕甥教之言，令国人于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将归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赏以悦众，众皆哭，焉作辕田。……焉作州兵。（《国语·晋语三》。）

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汉书·地理志》。）

“辕田”即“爰田”，历来学者并无异议，其理由王毓铨先生已作阐述（王毓铨：《爰田（辕田）解》，《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此不赘言。

以上史料记述了两件事，一是春秋中叶晋“作爰田”，一是战国中叶秦“制辕田”，这就在时空上对“爰田”制度作了限定。就空间说，它实行于秦晋之地，即黄土高原农业地区；就时间言，它存在于春秋中叶至战国时期，在没有发现新资料之前，我们不能说其他地区或其他时期也推行过“爰田”制。

晋“作爰田”有关历史事件如下。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背秦约，又拒秦余，秦穆公出兵伐晋，生俘晋惠公，后准备释

放惠公并与晋缔结和约。晋惠公知此消息后，命郤乞告知吕甥，后者给郤乞出主意，让他召集国人，假借晋惠公名义赏赐国人，“以悦众”，同时假传惠公之言：“孤虽归，辱社稷矣”，众人听是言皆哭，通过赏赐“悦众”和以国耻感人，争得国人支持，“于是乎作爰田”。接着，吕甥说：由于兵败于秦，“兵甲尽矣”，提议“征缮以辅孺子”，众人同意，“于是乎作州兵”。这里可清楚看到三点：一、晋“作爰田”直接导因是兵败后的国贫兵弱，故其目的在富国强兵；二、“作爰田”与“作州兵”有一定联系，一属经济改革，一属兵制改革，前者当是为后者提供经济条件；三、既称为“作”，则“爰田”制度乃新推行之制度。

《汉书》所记秦“制辕田”在孝公期间，由此史料亦可看到三点：一、“制辕田”为商鞅变法重要内容，既称“制”，则亦属新创设的制度；二、“制辕田”与“开阡陌”密切联系，因《史记》等述商鞅变法只记“开阡陌”而不记“制辕田”，可推测广义的“开阡陌”大概也包含了“制辕田”；三、“制辕田”与“开阡陌”一起是秦国强盛、“东雄诸侯”的基本经济原因。

为便于展开讨论，先联系上述史实，对诸种“爰田”解说略作驳议。

赏赐说。贾逵、服虔、孔晁等持赏田说，曰“爰田”即“赏众以田”（《国语·晋语三》韦昭注引，《左传·僖公十五年》孔颖达疏引。），近人亦多持此说者，如王毓铨先生认为，“爰田”即“赏赐在朝群臣的车马田或官府田而已”（王毓铨：《爰田（辕田）解》，《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杜预则持赏税说，曰“爰田”为“分公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于所赏之众”（《左传·僖公十五年》杜预注。）。此类说法疏漏有三：一、文献中无训爰为赏者；二、若为赏赐则无须用“作”字，无须当作一种新制度予以确定并记录在案。三、按晋之史实，郤乞依吕甥设计，对国人既以国耻感之，又以赏赐悦之，通过这两手，争取国人支持，然后方推行爰田，“以君命赏”在“作爰田”之前。

以田出车赋说。韦注引或云：“辕田，以田出车赋”（《国语·晋语三》韦昭注引，《左传·僖公十五年》孔颖达疏引。）。此说解“辕”为车，或可通，但疏漏有二：一、就晋“作爰田”而言，兵败之后，国内危机严重，以田出车赋势必加重国人负担，不利政治稳定，吕甥不会取此下策；二、

就秦“制辕田”而言，商鞅时车战已非主要作战形式，以田出车赋不合当时实际需要。

换田说。张晏、孟康认为：“爰田”有周制与秦制两种，周制“爰田”即换田，以使受田者通过定期换田而均享良田与瘠田。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近年王恩田先生亦持此说，认为“爰田制是为了财均力平而采取的定期交换耕地和住宅的制度”（王恩田：《临沂竹书 田法与爰田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只要有农村公社存在，为公平分配土地使用权而采取的定期换田制度就会存在，甚至在实行国家授田制度的战国时期，为使授田公平也采用此种制度，如银雀山出土《田法》所见，但中国古代农村公社不始于春秋，至少西周即已存在，因而定期换田制度不必由晋来“作”，这是换田说的最大障碍。其实，古代学者谈到换田制度，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肥饶不得独乐，瘠确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徙，谓爰土易居平肥饶也”，均指西周，并不认为始于春秋。

固定授田说。张晏释秦之“爰田”曰：“商鞅始割列（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近人亦多有持此说者，如罗镇岳先生曰：商鞅“制辕田”即“废除了三年一换土易居的旧制，每个男子一生只一次受田，一次还田”（罗镇岳：《秦国授田制的几点辨析》，《求索》1985年第1期）。战国时期普遍实行国家授田制度，这是事实，但此解不仅在训诂上没有根据，而且将同一概念“爰田”同时理解为晋制、秦制两种对立的实体，在逻辑上也有相当大的障碍。

轮耕说。孟康释秦之“爰田”曰：“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近人亦多采此说，如徐中舒先生认为，爰田制自西周即实行，包括耕百亩（含新田、畚田各五十亩）休五十亩（菑田）的菑、新、畚三田制，耕百亩休百亩的二田制，耕百亩休二百亩的复田制，总括起来即岁休轮耕制（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这种解释与史实亦难吻合。首先，岁休轮耕制既然西周时已存在，那么由晋首创的“作”字便无法解释，建国于西周故

土的秦在数百年后又作为变革措施重建这一制度，似乎并无必要。其次，若商鞅变法“制辕田”为推行岁休轮耕制，则授田额须超出百亩许多方可，但翻检战国文献，谈及授田额均为一夫百亩，“邲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战国思想家多重农，主张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商鞅认为“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反对浪费土地的“地不任”现象（《商君书·算地》），因此，这种解释与战国社会思想背景亦相抵牾。

此外还有一些解释，但多从音训“爰”字出发推测，牵强附会意味更浓，与史实距离更大，为避冗赘，这里不再罗列讨论。

二 “爰田”即牛耕之田

直接谈及“爰田”的资料过少，纠缠于此难获结论，而研究相关史实则有可能找到新的更有效的突破点。在目前所见有关史实中，关系密切而人们了解也较多的是“开阡陌”。《汉书·地理志》称商鞅“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足见二者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同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皆为秦国强盛的基本依据。因此，由“开阡陌”入手，或可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开阡陌”又称“开阡陌封疆”，是新创立的一整套农田规划制度，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秦《为田律》对其具体内容有详细记述，根据本章第一节的讨论，笔者认为律文有关田土规划的内容可简述如下：南北向的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土地为一亩，百亩土地并列为一顷，亩间以畛相隔；四顷土地成一大地块，东西两边围以阡道，南北两边围以陌道，四顷地之间以封、埒（即疆）为界，若干个四顷地又组成更大的地块，其东西两边围以阡，南北两边围以陌，由此形成完整的农田规划系统。其中，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疆）的设置均属于“开阡陌封疆”，其目的实际在于维护“顷”之地积。“顷”即百亩是基本的授田单位，因而是战国普遍实施的国家授田制之基础，同时也是征收赋役的基本依据。云梦秦简《田律》就有“入顷当，以其受田之数，无𡵓（垦）不𡵓（垦），顷入当三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因此，实施“开阡陌封疆”的新制度，目的是确立一种新的经济关系，本质上属于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革。但是，除此而外，秦《为田律》还有一些内容无法归入“开阡陌封疆”之内，这就是亩与畛的设置，畛作为亩界实质是为亩服务的，因此这部分内容的核心是确立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亩制形状，笔者以为，这正就是与“开阡陌”对应之“制辕田”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内容当然远远超出亩的形状这一点。

田块的形状与耕作方式有密切关系，在漫种耕作方式下，田地形状无一定之规，既不必方正规则，也不必确定地积，这种现象在汉

民族农业史上、在民族学资料中比比皆是。先秦两汉，亩的概念在用于地积时，很少规定其形状。西周时已有亩之概念，它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训为垄，即田埂，如《国语·周语下》韦注：“下曰畎，高曰亩，亩，垄也”，《庄子·让王》司马彪注曰：“垄上曰亩”。《诗·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此亩即为垄。一是表示确定地积。《贤簠》曰：“公命事，晦贤百晦（粮）”，据郭沫若先生释文，“晦，古亩字”，前一晦假借为贿，后一晦即地积之亩（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贤簠》，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表明了亩的地积数量，并未提及形状。西汉时期的亩一般并无固定形状，这可以从《九章算术》中看到，其中“方田”一卷专论土地面积的计算，所用亩积为二百四十方步，然田块形状有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环形、弓形等等。将亩与一定形状联系起来的史料有四项。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佚篇《吴问》，文中记叙了春秋时晋六家大夫竞相扩大亩积的情况：“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畛”，“[智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一百八十步为畛]”，“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畛”，“赵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卅步为畛”（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孙子兵法 残简释文》，《文物》1974年第12期。此释文及《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均隶定“畛”为“畛”，释为“亩”）。据青川出土秦《为田律》，畛为亩间界限，若干步“为畛”，即作畛以定出亩界，故此处之畛既可解为亩界，又可解为两畛所夹地块，与亩等义。“畹”，《说文》曰“三十亩为畹”，《楚辞·离骚》王逸注曰“十二亩为畹”，都与《吴问》不合，王逸注又说：“或曰田之长为畹也”，此解甚合。据此，晋六家所制亩均为两步宽的长条状地块，区别仅在亩长和亩积不同。二、秦《为田律》所述战国时秦国亩制，是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之长条状地块。三、《汉书·食货志》所记赵过“代田”亩制，文曰：“广尺深尺曰畎，长终亩，一亩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种于畎中”，“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由此可见，其亩地积为二百四十步，每亩由三条“广尺深尺”的畎贯穿始终，有畎必有垄，故其亩宽仍为六尺，即一步，长二百四十步，地积、形状与秦《为田律》所述一致。四、《韩诗外传》曰：“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这段

文字是在对所谓“井田”的诠释中提出的，在有关“井田”的解释中是最早提到亩之形状的，然此诠释似乎并非西周亩制的可靠描述，很可能是根据西汉某些制度所作的推测。前三项史料所反映史实有一共同点，即其亩制主要推行地区都是在黄土高原，《吴问》为晋，《为田律》为秦，赵过代田法也是由三辅推及四周，“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汉书·食货志》。）

那么，商鞅变法为什么要在扩大亩积的同时将亩的形状确定为仅有一步（1.386米）宽、却有二百四十步（332.64米）长呢？笔者以为，较合理的解释，当是推行某种新耕作技术之需。赵过确定一步宽长条形亩制，是为其代田法服务的。《汉书·食货志》又声明代田法乃“古法”，即承袭前代某种耕作方法而来，商鞅亩制与代田亩制完全相同，或许正反映了这种“古法”。





代田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推广铁犁牛耕，“用耦犁，二牛三人”，甚至在“民或苦少牛”的情况下，“教民相与庸挽犁”（《汉书·食货志》）。商鞅变法的农业技术改革主要内容也是推广铁犁牛耕，文献虽无直接记载，但有明显反映。据《战国策·赵策一》，赵孝成王三年（公元前263年），赵豹谏赵王曰：“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此处所列都是秦国的长处，政治上“令严政行”，经济上通过“开阡陌封疆”使国家授田制得以正确执行，战士都受到上地，由于发展水利事业而使军粮运输极为便捷，农业生产中则是普遍使用牛耕，而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成果。既是特有长处，则与此相对应，其他各国、或至少赵国牛耕普及程度当远不及秦。

直到汉代，耕犁都相当原始，目前已知最早犁耕图见于汉画像石，如陕西米脂、绥德东汉牛耕画像石，江苏睢宁双沟东汉牛耕画像石等。由画面中可见，汉代耕犁的基本特征是：犁辕为独辕，长且直，辕前端直接与犁衡联结，犁衡左右各一轭，各挽一牛，此即所谓“二牛抬杠”，犁辕与犁床、犁箭、犁梢固定为一体，不可调节。战国以及秦代的耕犁形制推测与汉代基本一致，如果说差别，大概就是更原始一些。这种耕犁由于辕长且直，耕牛又通过犁衡固定在犁辕之上，因此工作时转弯和回头都不方便，且地头不能耕及的土地较多，需人力找

补，地亩越短，缺点暴露越充分，地亩较长，则优点较易表现出来。另外，这种耜耕耕地较浅，使用人力较多，与人力翻掘耕地相比优势有限。耕地时须有一人扶耜；由于耜长且直、耕牛又与耜辕固定在一起，为保证耕牛笔直前进须有一人牵牛；由于长且直的耜又与犁衡连接在一起，扶耜者无法控制耕地深浅，须有一人持按耜辕予以控制。因此，每耕地须有二牛三人，这是赵过代田法耜耕“二牛三人”的真正解释。此种耜耕方式唐代在南诏地区被沿用，“犁田用二（“二”原作“一”，据《蛮书》改）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新唐书·南诏传》），“每耕田，用三尺犁，格（即犁衡）长约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即犁）”（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直到文革以后，云南剑川、洱源白族和宁蒗纳西族中仍保留有这种耜耕法（参见宋兆麟《西汉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考古》1976年第1期；李朝真《从白族的“二牛三人”耕作法看汉代的耦犁法》，李昆声《唐代云南“二牛三夫”耕作法民族学新证》，二文均载《农史研究》第5辑，1985年）。战国及秦代耜犁形制现尚未能见到，但估计只能比赵过时更为原始，相对人力掘耕的优势就更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普及推广牛耕，必须尽量发挥其长处，弥补其缺点，将亩确定为较长的长条形不失为一个切实有效的措施。

比较汉代的犁与先秦的车，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除战国时期可能出现的少量双辕车而外，先秦车制基本上是一辕、一衡、一轴、一舆、二轮，大多为二辐（如陕西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车马坑所见），少数为四辐（如陕西临潼秦陵兵马俑坑所见），辕长且直，辕与衡、轴、舆联结为一体，不可调节。除实物而外，甲骨文、金文中车字字形表现也极为清楚，甲骨文车字多作“𠨍”（如刘鹗《铁云藏龟》14·1），早期金文多作“𠨍”（如《父簋》）或“𠨍”（如《兮甲盘》）。后方简化为“𠨍”。汉代二牛犁与先秦车之牵引部分完全一样，犁辕与犁架、车辕与车体的联结方式也完全一样，这就启示我们，汉代耜犁前身春秋战国时期的犁，大概是由车演化而来的。可以推测，在激烈的车战之中，车体或有损坏，牛马拖曳残余车体奔跑，从而掘破土地，人们由此得到启发，添加耒耜之类破土工具的刃部，从而产生原始的耜犁。有的学者认为牛耕由耦耕演化而来，如孙常叙先生说：耦耕是

两人面对面共用一耜，一人蹠耒入土，一人曳绳拉耒使耜发土；拉绳者变换方向后，便成为犁地；此后耜之形制发生相应变化，铎出现，又以牛力代替人力，改人耦为牛耦，于是出现牛耕（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3页。）。本文不打算详评这种的观点，只想指出一点，如果犁耕由此产生，那么牛与耕犁之间应该是用绳索联结起来的，其发展结果应是形成隋唐时期的短辕犁，用人少，更便于操作，而不会自找麻烦，再重新创造出一种用人多、操作不便的长辕犁。

基于上述认识，再从文字学角度对“爰（辕）田”加以探讨，就有豁然开朗之感。甲骨文、金文均无“辕”字，只有“爰”字。“爰”，甲骨文多作，个别亦作，为双手牵引状，因此，牵引、援引当是“爰”字初义。金文字体略有变异，作，由此字形大致确定。《说文》字形与金文差不多，释曰：“引也，从从于，籀文以为车辕字。”可见，自甲骨文至《说文》，“爰”字字体未发生多大变化，字义更是明晰而确定，即牵引，车通过车辕被牵引方能行动，因此表示牵引的“爰”字被用为车辕之“辕”字。显然，“爰”字本义与赏、换等等含义毫无瓜葛。将本义为牵引、引申义为车辕的“爰”字，与田联系在一起，只能理解为与牛犁耕作有关。“爰田”作为动宾词组，当是指用类似车辕的东西以牵引的方式耕作田地。作为名词，则是指用牵引方式来耕作的田地，也即牛耕田地。当它作为一种制度的代名词时，则显然是指便于牛犁耕作的一种田地建设或田地规划。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辕”字从“爰”中分化出来，用以专指车辕，或许正说明，在车辕之外，已经有了其他的辕用以牵引，例如犁辕。

早期牛耕的形成及较大面积推广，除了耕犁的形成而外，还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土壤疏松便于早期牛耕的田地，二是耕牛的大量繁育，三是铁器的使用。早期耕犁粗笨，破土不力，若土壤粘重则很难耕动，黄土高原土壤疏松，是其广泛推行的最佳地区，而这正是春秋战国实行爰田和汉代推行代田的主要地区，二者联系决非偶然。耕牛在秦晋大地的大量繁育，文献中已可见端倪，《国语·晋语九》在文献中首次提到耕牛，曰：“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战国策·赵策一》说“秦以牛田”，表明秦耕牛数量不少，优于他国。这两条材料的时间分别在“作

爰田”、“制辕田”之后，似乎也表明实行“爰田”制之后耕牛数量的剧增。使用铁犁铧是普及牛耕的重要条件。当然，不用铁器也可犁耕（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及良渚文化中出土有一些三角形石器，许多学者称其为石犁，但是否犁，大可怀疑，特别是在土壤熟化程度较低的原始农业之中。季曙行依据机械学原理进行了研究，结论是：“真正有可能成为石犁的三角形器并不多”。参见其论文《“石犁”辨析》，《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王振中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所谓“石犁”，“出在北方的实际是石耜，出在南方的实际是石锄。”参见其著作《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页。），如唐代南室韦人“剡木为犁，不加金刃”（《新唐书·室韦传》），解放前夕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许多藏族人民使用硬木削成的木犁，以二牛抬杠方式耕地，每耕不到十分之一亩就须更换犁尖，耕深仅三、四寸（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藏族简志》下编，1963年，转引自谢忠梁《几种研究我国牛耕起源时代学说的简述》，《农史研究》第一辑，1980年）。但是，不用铁犁铧效率就十分低下，相对人力掘耕优越性不很明显，这就成为牛耕普及的障碍。在铁器的发明、生产和使用方面，黄土高原也处于优先地位。文献中有关铁器的第一个明确记载在晋国，公元前513年，晋赵鞅等人“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考古发掘的春秋时期人工冶造铁器，也以这一地区为最早和最多，特别是秦国。发现于甘肃灵台县景家庄的一件春秋早期铜柄铁剑（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人工铸铁器件。春秋时期秦国铁器的发现，无论早、中、晚期，都明显超过了东方诸国，遍布于当时秦国的整个中心地区。近年在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偏早秦墓中发现的二十余件人工冶造铁器，更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在铁器方面的优先地位（以上有关铁器内容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二十章“铁器”，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张天恩《秦器三论——益门春秋墓几个问题浅谈》，以上二文均载《文物》1993年第10期）。铁器的广泛应用使牛耕优越性较充分表现出来，为其推广普及提供了充分条件。

在前述基础上，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又进一步创造条件，国家为农户提供铁器、耕牛。云梦秦简《厩苑律》规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2页），对于借用国家铁器者，因铁器破旧不堪使用

而损坏者准予报销损耗。《厩苑律》又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者，给田啬夫、牛长、饲牛者分别予以奖励，反之则给予惩罚（[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此条足见国家对耕牛饲养、使用极为重视。律文未说明是官牛还是私牛，但似乎是官牛，云梦秦简《封诊式·封守》可作为旁证。《封守》为查封家产记录，被查封者是某士伍，其有家室子女，畜有臣妾，查封帐也细到“门桑十木”、“牡犬一”均记录在案，唯无田地，此当为国家授田，亦无铁器耕牛，当由国家借贷使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页。](#)）。国家又以法令形式规定亩制为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在授田中严格执行。通过这些措施，以国家力量普及牛耕，真正广泛实现了“以牛田”，达到了富国强兵、东雄诸侯的目的。

三 “制辕田”即推广垄畛耕作制

“制辕田”的主要内容是推广牛耕，但仅仅以此还不能充分解释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亩制，理由有二。一、为便于牛耕，增大田块长度即可，不必硬性规定亩之形状，特别是亩宽一步。二、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一夫挟五口”所能治田为百步之亩百亩。汉行代田法，“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汉书·食货志》），一夫实际所耕亦百步之亩百亩。解放前北方谚语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夫所能耕田三十旧市亩，按秦尺23.1厘米、旧市亩614.4平方米折算，大致也是百步之亩百亩。秦亩制百亩相当于百步之亩二百四十亩，以此授予一夫耕种，则大大超出其耕作能力，这正是《商君书》所说“地不任”现象，与商鞅务尽地力思想相矛盾。因此，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亩制的确定应当还有其他原因。

这里，赵过“代田法”又给我们启示。代田法的核心是以牛耕为基础、实行一亩三垄三畛的垄畛耕作法，其亩制形状是为正确布置垄、畛服务的。《汉书·食货志》称其为“古法”，则它与前代秦的耕作方法应当有直接渊源关系。成书于战国后期秦国的《吕氏春秋》中，收入了《任地》、《辩土》、《审时》等几篇农家著作，其中详细描述了垄畛耕作法的具体内容，这似乎就是赵过时所谓的“古法”，也当是商鞅变法中农业技术革命、即“制辕田”及其以后成果的总结，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亩制由此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

《吕氏春秋》所见垄畛耕作法的核心是整修垄、沟，以此为基准进行耕作。《任地》曰：“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文中的亩即垄，畛即沟。整地之后的农田由垄、沟相隔而组成，其宽度均与耨柄长度相同，为一尺（23.1厘米）。完成整地的工具是长六尺（1.386米）宽八寸（18.48厘米）的“耜”，这里的“耜”就是犁，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引黄东发曰：“耜者今之犁，广六尺，旋转以耕土”。此处耜宽即犁铧宽，用八寸宽的犁铧耕地，由于两边必然会带动土壤，所耕成的沟正好是一尺上下。

此犁铧宽度（八寸，合今18.48厘米）与考古发现基本统一，已知出土战国犁铧宽度大致是20厘米上下。关于出土汉代犁铧，黄展岳先生依其大小分为三类，小铧长宽各20厘米左右，中铧长宽各30厘米左右，大铧长宽在40厘米以上，并指出其中绝大部分是小铧和中铧（参见黄展岳《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农业考古》1981年第一期）。秦汉尺一尺左右宽度的犁铧大概比较适应于牛耕和田间播种行距，因此这个宽度沿袭至唐。唐人陆龟蒙《耒耜经》记当时犁头尺寸曰：“铧长一尺四寸，广六寸”，据万国鼎先生考证，“唐大尺的标准长度在0.2949米与0.2959米之间”，唐“后期渐有放长，有长到0.31米左右的”（万国鼎：《唐尺考》，《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依此，唐犁头宽度也在18厘米左右。战国时期尚未产生犁壁，无壁犁不能翻土，但可将土分向两边，形成沟畦，来回各一次，便形成一垄两沟，连续进行，则垄沟相间而完成整地，同时也可以完成播种。这种整地方式可以只耕总面积一半的土地即完成整地，其余一半是未耕地，被翻起的松土所覆盖，成为垄的基底，因此，以这样方式耕种二百亩土地，只相当于全部翻耕土地一百亩。秦亩积由百步扩大为二百四十步之后，一夫之力仍可耕种百亩，其奥妙大概就在于此。所整之地只播种一半，即所谓“上田弃亩，下田弃畦”（《吕氏春秋·任地》。），“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吕氏春秋·辩土》。），高旱田种于沟内，低湿田种于垄上，有苗之地占全部田地十分之五，来年则垄沟更换。秦地属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大概一般是将种子播种于沟畦之中，出苗以后，通过中耕、锄草、培土，原来的沟逐渐变为垄，原来的垄逐渐变为沟，第二年播种的沟正好是前一年的休闲地，即垄。

《吕氏春秋》所见商鞅变法后推行于秦地的垄畦耕作法，可由解放前东北地区普遍采用的垄、沟耕作法得到非常形象的说明。后者主要有如下一些内容：一、垄台一般为南北向，这与秦《为田律》中亩向完全一致，以便垄面多接受太阳照射，从而提高春秋两季地温，增加产量，经对照实验，在东北北部地区，南北垄比东西垄增产15%。二、不管栽培什么作物，垄宽不变，东北地区南部为51.4厘米，中部为56.9厘米，北部为70.0厘米，不同作物只调整株距。这里的垄宽实际上包含了垄台与垄沟、即垄和畦两部分，其形制与《吕氏

春秋》所述完全相同，只是宽度稍大一些，这大概与东北地区主要农作物为大豆、高粱有关。三、垄台与垄沟的宽度大小，是由犁及犁铧的大小所造成的，这与《吕氏春秋》所见也完全统一，后者用八寸之犁铧耕地，两边各带动一寸（2厘米）土壤，从而耕造出一尺左右宽的沟畦。四、具体耕作方式有反种、积种、坏种、薅种四种，其耕地深浅及用工多少各有差别，积种最省事。“积种是在去年的垄沟里播下种子，用装上‘犁铧头’（或草耙）的犁，把去年的垄台从中犁翻，把翻起的土翻落到两边的垄沟作为覆土，这样只需一个来回就可播完两垄，一天就可以翻耕播种两晌地（1.2公顷）”（[日]天野元之助：《中国传统耕作方法考》，《农史研究》第三辑，1983年）。这是一套完整的、适合我国北方土壤气候条件的、便于牛耕而又比较省时省力的耕作方法，可以推断，商鞅变法后秦国推行的耕种方法当与此类似。

由上述讨论可见，秦“制辕田”，确定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亩制，除了便于在长直辕犁条件下推广普及牛耕而外，也是为了推广以牛耕作为基础和核心的垄畦耕作技术。据《吕氏春秋》总结，这种新技术有许多优点。一、可以实现“息者欲劳，劳者欲息”（《吕氏春秋·任地》），使耕地每年都有一半休闲从而恢复地力，这实际上是变不同地块之间的轮休为同一地块不同部分之间的轮休，在不增加耕作劳动量的条件下加速土地熟化，改良土壤。二、垄、沟布置便于条播，“衡行必得，纵行必术”，可以避免农业生产中“三盗”之一的“既种而无行”，由于“茎生有行，故速长”（《吕氏春秋·辩土》），这在耒耨发明之前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措施。三、“稼欲生于虚而殖于实”（《吕氏春秋·辩土》），即禾稼生长最有利的土壤条件是上虚下实，种子处于其间，下实则利于种子吸水、扎根，上虚则利于种子发芽、禾苗生长，同时减少地表水分蒸发，可能类如东北地区“积种”方式的垄畦耕作法正好能实现这点，与现代农业中采用的免耕法或少耕法诸多类似之处。四、垄畦耕作条件下的条播使间苗大为方便，“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吕氏春秋·任地》），间苗使禾稼“弱不相害，故速大”（《吕氏春秋·辩土》）。五、垄畦条播使禾行与余地界限清楚，从而利于中耕、除草、培土等田间管理工作的进行。中耕“使地肥而土缓”（《吕氏春秋·任地》），起到保墒和释放土壤肥力的作用。除草可以去除农业生产“三盗”之一的“草窃”（《吕

氏春秋·辯土》。),使禾苗茁壮成长。培土则使禾稼根系发达,既能更多吸收水分养料,又能抵御风害抗倒伏。六、垄作条播利于禾间通风,即所谓“正其行,通其风”(《吕氏春秋·辯土》。),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利用光照。具有这些优点的垄畦耕作法与铁犁牛耕的推广普及相结合,形成农业生产技术的一场革命,它必然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增加了农业产量,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第四节 《管子》、银雀山竹书所反映的土地制度

前面，我们集中讨论了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土地制度，那么，这是否秦国特有的现象呢？当然不是。与秦国对立于东方的齐国，同样也实行了与秦国相类似的土地制度，这从《管子》以及近年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竹书《田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 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本节以下有关引文均本于此文，不再注出。《田法》及以下所引《王法》等篇未见标题简，但篇题木牍所记十三篇中有此标题，整理者据此及简文内容推定篇名。《田法》断代、作者从裘锡圭推断，为战国晚期齐人作品，见《啬夫初探》，载《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同出《王法》等篇断代和作者亦类同于此。）等文献可以清楚看出。

《管子》是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的一部经济巨著（关于《管子》的断代，学者看法不同，本文同意顾颉刚、冯友兰、胡家聪等人战国中晚期齐人作品之说，不再考证。文中所引《管子》文句据前人校释作了某些修改，为避冗繁，不再一一注出。），其中不仅有许多关于国家授田制的叙述，而且与此成为对照的是，在这部大谈特谈商品交换的巨著中，却找不到有关土地买卖的记述。这给我们以重要启示：《管子》作者们所处时代的土地制度与两汉迅速发展的土地私有制大相径庭，而与秦国类似。下面，我们就以《管子》为中心，辅之以银雀山竹书《田法》等出土文献，试就齐国等东方国家的土地制度作一些探讨。

一 《管子》、银雀山竹书所反映的国家授田制

统观《管子》全书，其中有关土地问题的论述所集中反映出来的是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书中许多文句直接叙述了国家对农民的授田：

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管子·度地》。
尹知章注：“案家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数，当受地若干。”）

凡国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管子·入国》。）

民人之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管子·轻重甲》。）

这些叙述直接反映出国家授田制的实施。这种国家授田制度有时又称之为“均地”、“分地”、“正地”。如：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故不均之为恶也。（《管子·乘马》。）

命之曰：地均以实数。（《管子·乘马》。）

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管子·乘马》。）

分地若一，强者能守。（《管子·国蓄》。）

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

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管子·乘马》。）

有时也使用“井田”名称：

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管子·侈靡》。）

此句中的“井田”一词如何理解，下章将作讨论，但不论如何理解，它至少反映了国家给农民授予定量土地的事实。

上述这些言论都说明，在《管子》作者所处的时代，基本的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度，即国家对直接生产者农民授予定量土地的制度。这与地下发现的资料相一致，银雀山竹书《田法》明确说：

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

又说：

循行立稼之状，而谨 美亚（恶）之所在，以为地均之岁。……
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 均之数也。

这里不仅是授田，而且通过定期更换重授，使受田者可以均享良瘠之田。还提到有基层吏员专门度量民之授田额：

邑嗇夫度量民之所田小……

《王法》也说：

……上家 亩四，中家三亩，下家二亩。

此处简残，似即言以家之等级授予不同廛宅之地。

《管子》一书所反映的土地国有的事实，可以作为当时国家授田制度实施的旁证。与土地国有相对立的土地私有权，其基本内涵至少应当包括一定限度内的土地买卖权，但是，在大谈特谈商品交换的《管子》书中，却找不到土地买卖的痕迹，相反，却有土地不能买卖的证据，《管子·小称》曰：“虽有天子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而走矣。”农民逃亡，土地只能遗弃，这说明土地不能买卖，归国家所有。由于土地国有，农民所需土地通过国家授田制得到满足，因此当时的社会问题中没有土地兼并问题。国家害怕的是农民逃亡，离开国有土地。《管子·立政》说：“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把农民不关心授予他的土地看作国家的危险。《管子·轻重甲》篇中，作者将农民忍饥挨饿的原因归结为商人囤积居奇，只字未提土地问题。在《管子·治国》中，作者分析农民“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的原因，列举了农轻商重、苛捐杂税、高利贷盘剥、“上征暴急无时”等，总括为“粟少而民无积也”，亦未提及土地问题，又说：“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从这些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土地兼并问题，这说明当时社会上不存在土地兼并。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土地”、即国家授予的土地结合在一起，国家通过授田制度来维持和保护这种结合，使他们为国家提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因此，农民不关心自己的土地成为统治者最担心的危险之一。

土地国有与国家授田制度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前提。土地归国家所有，授田制方有可能实施，而通过授田制度的实施，国家从农民身上取得了粮食等剩余产品和徭役等剩余劳动，土地国有才算真正实现。所以，土地垦辟状况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管子·权修》说：“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管子·事语》说：“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等等，因为土地不垦辟，即土地上没有受田农民在耕作，国家就得不到相应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土地国有权也就无法得到实现。

当然，土地国有制的存在形式除了国家授予农民的定量土地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式。一种是屯田：

（秋）三政曰：慎旅农，趣聚收。（《管子·四时》。尹知章注：“师旅营农，

当慎收之。”)

请以令发师置屯藉农，……(《管子·轻重乙》。)

一种是因爵位或功绩授予贵族土地：

度爵而制服，……六畜人徒有数，……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管子·立政》。)

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管子·君臣上》。)

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管子·国蓄》。)

这些，也都是国有土地的存在形式，但它们在整個社会经济生活中只占据次要的地位。

二 《管子》、银雀山竹书所反映国家授田制度的特征

就《管子》一书所见，对其中所反映的国家授田制度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内容和特征。

1．国家严密管理社会生产劳动者，按“夫”或“户”授予定量土地。

首先，国家设立严密户籍，定时核查登记：

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管子·乘马》。）

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管子·度地》。）

其次，按一定的行政组织强制编制生产劳动者。其形式或是以劳动者“家”为单位进行编制：

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立政》。）

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五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管子·乘马》。）

或是按土地、生产活动将劳动者编制起来：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管子·乘马》。）

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管子·乘马》。）

《田法》中也有类似规定：

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 州 而为州 乡 。

五人为伍，十人为连。

再次，用行政的暴力的手段直接控制劳动者人身，禁止其迁徙、流亡：

（冬）五政曰：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管子·四时》。尹知章注：“分异谓离居者。”）

逃徙者刑……（《管子·治国》。）

审间闭，慎箠键，箠藏于里尉。置间有司，以时开闭。……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间有司见之，复（里尉）无时。（《管子·立政》。）

国家是在对劳动者人身予以严密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方才实施授田制度的。授田按“夫”或“户”进行，一“夫”或一“户”授田一百亩：

一农之量，壤百亩也。（《管子·臣乘马》。）

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权数》。）

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管子·揆度》。）

方一里，九夫之田也。（《管子·乘马》。）

自然，其中所言亩积究竟多大，是百步之周亩，是《礼记·王制》所言之东亩，还是战国晚期流行西部的二百四十步之秦亩，仍不清楚。

《田法》有：“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一人而]田十九亩者霸，……”其中所称为大亩，与此相比，上引所言显非大亩（李学勤先生研究《田法》后认为：“简文所说的小亩就是《食货志》李悝所讲的亩，也便是周制百步之亩”，“《田法》的大亩应该就等于六小亩”。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71～372页。据此，则《田法》所说授田额也是周制百亩或稍多一些。）。

另外，《田法》规定了受田者的年龄限制：

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简文整理者认为此言为服役年龄，不妥，文中之“作”恐不能解为徭役。此句后续文字曰：“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原文误植为“作”）四人作者亡。”又曰：“王者一岁作而三岁食之，霸者一岁作而二岁食之，……”显然，不能说征发徭役越多国家越强盛、积蓄粮食越多。且其行文与《汉书·食货志》有关授田的文字非常相似，因而以理解为受田并从事农作的年龄界限为妥。）

2．设立严密田界系统。

国家要实施授田制度，就必须确立和维护严密的田界系统。对此，《管子》中有几条记载：

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管子·乘马》。）

（春）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阡（阡）伯（陌）。（《管子·四时》。）

显然，国家定时组织对田界系统的维修和订正。其中阡、陌、封、疆究竟为何，《管子》未作明确阐释。根据秦《为田律》，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疆），皆有确定形制，互相联结则构成一套完整的田界系统，这个系统是为推行授田制而建立的，其目的在于维护一夫所受田百亩顷的确定地积。《管子》书中所说阡陌封疆当与此相同，且

称封、疆为“修”，称阡、陌曰“正”，其间区别也与秦《为田律》意思相仿佛。

3．以所授土地的质与量确定国家租税征收额。

在国家授田制度下，国家征收的租税是地租与国税的统一体，即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管子》书中所见的租税征收有两项指标，一是根据所授土地的质量而定，即“相地而衰征”，一是根据所授土地的数量而定，而不依据实际耕作亩数，即不“以田亩籍”，这两个特点使国家租税征收更趋于合理。《管子》书中曰：

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管子·大匡》。）

相地而衰其征，则民不移矣。（《管子·小匡》。）

郡县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管子·乘马数》。）

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持也。（《管子·乘马数》。“田策相圆”即税额与田等相符。）

这些都是说，征收的租税必须与所授耕地的质量相应。《管子·乘马》篇中还具体叙述了旱地与涝地的减税比例：

一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一，二则去二，三则去三，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二，三则去三，二则去四，尺而见水，比之于泽。

租税的征收除依据地之肥瘠而有等差之外，授田数额也是其基本依据。《管子·乘马》篇谈到军赋的征收时说：

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器制也。

这里的军赋自然是按授田额征收，而不管其是否耕种。《管子·国蓄》篇曰：“以田亩籍，谓之禁耕。”这是说，如果以实际耕种土地的数量来征收租税，则必然挫伤农民耕作的积极性。若将此句解释为主张不征收土地租税，显然与实际情况难以相符。《管子·轻重甲》篇中有关于“正籍”的叙述：“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日本学者安井衡《管子纂诂》注曰：“与，预也。正籍谓正户正人之籍。无预正籍者，谓无本业者。”（转引自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正籍者正税也，此处所谓正籍显然是指依据国家授予的足额田地而必须交纳的租税，因此有可不交纳正籍者与必须交纳正籍者之分，其前提自然是得到了授田与否。

国家征收的地租与国税合一的剥削，除上述实物的租税与军赋而外，还有劳役。《管子·乘马》篇曰：

距国门以外，穷四境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

任何人都必须为国家按定额服三天徭役。

4．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予以行政干涉。

就《管子》书中所见，这种干涉主要有三：（1）国家给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以实物资助，并在灾荒和春秋物价变动较大时予以保护，使之不受高利贷盘剥，以致力于农业生产；（2）国家以兴修水利、不误农时等措施保护和促进农民的生产；（3）用行政手段对努力生产者予以奖励，而对懒惰者给以督促乃至惩罚。

国家给农民的资助有工具、粮食、货币等等，《管子》书中此类记载甚多：

故（人君）守之以准平，……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

种穰粮食，毕取贍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管子·国蓄》。）

泰春（国家）公布曰：……无货之家，皆假之器械： 、簠、筩、
、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管子·山国轨》。）

发故粟以田数。（《管子·五行》。尹知章注：“故粟，陈也。以田数多少用陈粟给人，使得务农。”）

百亩之夫予之策曰：率二十五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管子·臣乘马》。）

山田、间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管子·山国轨》。）

山田以寄君币，赈其不贍。”（《管子·山国轨》。）

民之无本者，贷之圃镪。（《管子·揆度》。）

由上述可见，国家资助的对象多是无食、无种、无以与正籍或耕种劣等田土的农民，时间则是春种等急迫需要资助的时节。这种政策对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具有重要意义，而高利贷盘剥是授田制度下农民贫困、破产逃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家还以调节市场物价、预付粮款或粮食、以工代赈等方式来保护农民：

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价，无倍称之民。（《管子·揆度》。“夷疏满之”，即平衡供求、疏通有无；“倍称”，即成倍的利息。）

春赋以敛缙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管子·国蓄》。）

若岁凶旱水沴，民失本事，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以平国策也。（《管子·乘马数》。）

其次，国家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并在征发民力时注意不误农时，以此维护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粉获，司空之事也。（《管子·立政》。）

（春）三政曰：冻解修沟渎。（《管子·四时》。）

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管子·臣乘马》。）

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谓之时作。（《管子·山国轨》。）

除上述两方面而外，国家对农民还以行政的暴力的手段奖勤罚懒：

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管子·揆度》。）

苟不树艺者，谓之贼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谓之不服之民。（《管子·轻重己》。）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管子·轻重己》。）

国家对努力耕作者予以名誉和实物的奖励，而将不努力从事农作者称为“贼人”、“不服之民”、“不令（善）”之民，轻则斥责，重则遣戍边疆。

银雀山竹书《王法》、《田法》中也有类似规定：

岁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十月冬衣毕具，无余布人卅尺、余帛人十尺者，亲死不得为（幻）。……
(《王法》。)

卒岁田入少入五十斗者， 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 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田法》。)

由上可见，《管子》与银雀山竹书所反映的国家授田制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些制度互相关联，互为条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

三 《管子》中国家授田制衰落的征兆

齐国等东部地区的国家授田制度自管仲变革时即已建立，到了《管子》各篇形成的时候，国家授田制似乎已呈现出某些衰落的征兆，这似乎预示着从战国国家授田制向两汉土地私有制过渡的开始。

从《管子》的有关叙述来看，这种征兆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国家有时不能确保授田，《问》篇曾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

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

官丞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

不仅已牺牲战士的儿子、外来移民中有未得到授田者，官吏中也有未得到国家所授禄田者。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因官僚主义等等而发生的暂时性工作错误，《管子·禁藏》曰：“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似乎当时已产生了授田不足、授田不等的现象，因而作者主张国家应使农民得到足额的授田，这样才能使农民富足。这里的原因似乎并非无田可授，而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当然，国家掌握大量荒地是授田制实施的基本条件之一，《管子》中也确有开荒耕种的迹象，《问》篇曰：“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荒地大量开垦必然使授田制走向尽头。上述现象的原因不能排除国家无田可授的可能性，但这仅为推测，其详如何，终不得知。

另一表现是私人强占或用其他方法占有国有土地，不向国家交纳租税。《管子》中有：

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

（《管子·轻重乙》。）

崇弟、蒋弟、丁、惠之世功，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管子·轻重乙》。）

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管子·山国轨》。）

边境荒地为私人强占，而且不交纳租税；贵族世家拒绝交纳应交纳的赋税；亩产十鼓的好地如果国家不设法控制，就会为私人所控制。这些记述都说明当时土地国有制开始被冲开某些缺口，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已经遇到了某些麻烦。关于战国国家授田制向两汉土地私有制的过渡，本文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

第五节 战国国家授田制度的普遍存在与其一般特征

一 战国国家授田制的普遍存在

前面，我们讨论了秦、齐东西两大国在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那么，这是否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独有现象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秦、齐之外，国家授田制仍然是普遍存在，这在文献和考古发现中都有证据。

在考古资料方面，睡虎地秦简中摘抄有一条《魏户律》：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自今以来，（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92～293页。）

这是魏国的法律。据该简整理小组考证，文中“廿五年”为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上距李悝、商鞅的变革已有百年上下。文献中反映国家授田制存在的材料就更多：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荀子·议兵》。）

这是授一些农民以好田。授田的另一个叫法是分田：

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尉繚子·原官》。文献本为“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为“均地分，节傅（赋）敛，……”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简本 尉繚子 释文（附校注）》，《文物》1977年第3期。据银雀山简本改。）

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

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吕氏春秋·审分》。）

也有将授田称之为“行田”者：

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

由于是授田制，故占用者无所有权，人死后受田收回，离弃农业也只能放弃受田：

夫陈善田利宅，所以厉战士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收（一作夺），……”（《韩非子·诡使》。）

这里谈到了授田，也谈到了收田。

战国时田土不可买卖，也是授田制存在的旁证。与战国时期田土买卖有涉的材料，目前能找到的仅有如下三条：

王登为中牟令，……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无敢仰视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美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董仲舒曰：“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

下面，我们就这三条史料作些分析。

《韩非子》所言其实被一些人所误解，其中说得很明白，所卖是“宅圃”，对于农耕田地，“中牟之人”是“弃其田耘”，且其中有王登对“二中大夫”予之田宅的记载，此即授田。

董仲舒所言对战国史研究影响颇大，云梦秦简发现之前，人们均以此来描述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变化，但此说法并不足以作为依据。这段话是董仲舒对秦自商鞅变法后社会弊病的描述，可是他与汉初其他人的描述并不相同。汉初贾谊评论商鞅变法的效用曰：“当是时（孝公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这完全是正面肯定，并不认为其有土地私有化的弊病。在谈到秦亡原因时，他假定说，若秦二世采取如下政策，则秦安矣：“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所谈方面不可谓不多，但无一言论及土地问题，尤其是土地私有化问题。班固在谈到商鞅变法后产生的社会问题时说：“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至秦始皇，“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汉书·食货志》。）同样没有谈到土地私有化问题。

在谈到“接秦之弊”而来的汉初粮食缺乏现象的原因时，班固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晁错说：“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汉初相对应的政策也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这里同样没有土地问题，当然也没有土地私有化问题。

显然，董仲舒是出于其儒家立场，认为汉武帝时一个重要的社会

经济问题就是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兼并，但他不好直说这是汉代形成的问题，便将其归之于商鞅，“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因此，他关于商鞅变法后土地私有化以及土地兼并的描述实在是以汉述秦，不足为据。

这样，说战国时期田土可以自由买卖，实际上只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条孤证，关于这条史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 战国国家授田制的一般特征

如果就社会关系角度着眼，战国授田制的本质是：整个社会的剥削阶级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因此，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以国家与一般公民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出来的。国家依据权力，通过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从而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迫使被剥削者为其提供剩余劳动，然后，国家又通过各种形式，将剩余劳动在剥削阶级内部进行分配。战国国家授田制不过是这种确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上的表现，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有如下一些特征或内容。

1．土地国有。

在法权关系上，战国授田制表现为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对土地有全面的控制权。它可以对土地进行适和其授田需要的全面规划，可以按制度授田予民，不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移，特别是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正是通过这一特征，在法权上确定了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2．严密户籍。

由于社会剥削关系的实现主要并非是以土地作为中介，因此战国授田制的实现必须以国家对生产者的严密控制为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授田予民和征收租赋徭役。战国时期的人口控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严密的户籍制度，二是以各种行政的强制手段编制劳动者，以联保制度控制其人身，三是禁止人口随意迁徙。

3．计户（人）授田。

在这种特定的经济关系之下，国家要保证剥削的实现，前提就是要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充分结合，从而保证生产活动正常、顺利地实现，因此，授田就成为这种经济关系中的必需组成部分。战国时期的授田或依人进行，或依户进行，但由于当时的趋势是建立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小家庭，例如商鞅变法时以法律强制实行的分户制

度那样，因此二者可以说等价。或许可以说，在主要家庭形式是个体小家庭的地区，通行计户授田，在仍然大量存在旧式大家庭的地区，则以计人授田为主。在授田额上，一般是一夫或一户百亩，而且各国都竞相扩大亩积，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不使“地有遗利，人有余力”，足可以使劳动者充分实现其全部劳动，创造出尽可能多社会财富，从而也贡献出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4．完整田界。

既然国家控制着全国土地，而且它必须通过授田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实现充分结合，因此它就必须也有可能对土地进行全面规划，设立完整严密的田界系统，如青川出土秦《为田律》所反映的那样，以使授田制能顺利进行。从秦齐两大国的有关资料看，这种田界系统一般包括阡陌和封疆两类。从秦《为田律》看，广义阡陌一称当包括阡道、陌道，都是大的固定的田界，而封疆（埒）则属于每年都须“修”、“正”的小的非固定田界，二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田界系统。其中封疆是沿用西周以来的旧制，而阡陌则是适应于新需要的创造。

5．国家剥削。

作为整个社会剥削阶级实现剥削的具体执行者，国家从劳动者身上攫取了全部的剩余劳动，与此同时，国家又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实现者，社会必须提供赋税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因此，国家从劳动者身上所获得的就包含了后来意义上的地租和赋税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在形式上并没有明显界限。战国时期，国家的这种收入大体分为租、赋、役三部分，一般来说，租依田征收，赋、役依人（或户）征收，其中赋一般重于租，役又重于租赋，因此国家从劳动者那里的收入主要以人为依据，即所谓“舍地而税人”。国家收入又以各种形式在剥削者中间进行二次分配，其中有的部分是官吏俸禄，有的部分是后来意义上的地租，同样，这两部分在形式上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6．干预生产。

在国家与农民这种特定的经济关系之中，土地虽然是必需的物质条件和中介物，但并非充分条件，像后来较充分的私有制时期那样，土地所有者可以丝毫不干预生产过程；以致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马克思、恩格斯：《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7页。)人身控制依然是战国时期剥削实现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国家必须也确实充分地干预生产全过程。国家干预一般包括三方面，一是以强有力的行政奖惩督促生产，一是以推广新技术、兴修水利、借贷籽种工具等方式组织生产，一是以平糴法、适当减轻农业租税等行政措施保护生产。

第五章 “井田”论研究

有了战国土地制度研究这一基础，便可以对“井田”论从新的角度重新进行了研究了。两汉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固定的看法：西周田制是“井田”制。虽然自此而后直到清儒，学者们并未就“井田”制究竟是什么达成共识，但也没有人否定“井田”制的存在。本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深入，“井田”制又一次被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研究，讨论辨析，众说纷纭，但主流是肯定其存在，分歧只在于如何具体理解。最早系统否定“井田”制存在的是胡适，他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胡适：《井田辨》，《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解放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胡适观点受到彻底批判，此后再坚持否定“井田”制的人便寥若晨星了。研究两周土地制度，无法回避“井田”制问题，而笔者的观点又不属多数之列，因此只能单列一章详加探究。

第一节 《孟子》“井田”言论剖析

谈到“井田”制，首先必须提到的就是《孟子》，虽然他尚未提出“井田”一词。《孟子·滕文公上》的两大段叙述，几乎可以说是“井田”论的经典性资料。为便于分析，下面先抄录其有关文字如下：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久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这些言论实际上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两段话，是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下说的。

第一段话是孟子对滕文公问“为国”的答复。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呢？在孟子看来，“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是重农的，他所谓“民事”就是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只有搞好农业生产，才能治理好国家。而要搞好农业生产，必须实行两项重要政策。一是制民恒产，这里的“产”，就是土地，“恒”者，不变也，也就是说，要使劳动力能够与定量的土地充分结合在一起，并且永远不变，从而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同时为国家提供剩余产品。这与他一贯的思想是统一的，他认为在经济方面，治民的理想状态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提供给农民以充分的土地，使其可以充分发挥出全部生产能力，由此实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王道”。这种思想不仅仅只是儒家的理想，它与整个战国社会背景相统一，这就是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为了给其论点提供论据，他列举了三代的政策：“夏后氏五十（亩）”、“殷人七十（亩）”、“周人百亩”，都是由国家提供土地，差别仅在于面积不同。这种说法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无法落实。但是，孟子的意图十分清楚，这就是要授予农民足额的土地。

另一项政策则是取于民有制。也就是说，在保证生产者能够与生产资料充分结合、顺利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还必须使社会剥削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比例与形式之下，由此使劳动者有兴趣继续从事生产。他主张剥削率为十分之一，作为依据，他说，夏、商、周三代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十一之税。在形式上，他激烈反对定额制，认为这种形式丰年不多取，歉年不少取，使“老稚转乎沟壑”，这是政府的失职。他主张采取非定额的分成制，而且以“助”法劳役剥削形式为最好。为了给其论点寻找依据，他指出，西周就是采取这种剥削形式。他说：“《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他是从《诗经》中有“公田”一词出发，“由此观之”，推测其剥削为分成制劳役剥削形式，这显然并非是有直接根据。由此

也可看出，孟子前面所说“周人百亩而彻”，其实也是推测。

第二段话则是在另一场合下对毕战“问井地”的答复。在讨论这段话之前，需要对“井”的词性作一些分析。“井”本为名词，下文“乡田同井”、“井九百亩”之“井”都是在名词意义上使用的，但在“井地”词组中，“井”一词则显然是名词作动词用，当然，这完全符合古汉语语法，名词动词化在古汉语中比比皆是。所谓“井地”，就是按“井”的形状或形式来划分土地。那么，这里的“井”之形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本章第四节中将详细讨论；“井”字在这里的实际含义就是方块，“井地”就是按方块形状来划分土地。孟子认为，“井地”关系重大，涉及“谷禄”是否合理、均平，即社会总剥削量及其在剥削阶级中的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要实现“井地”之“均”，先要实现“经界”之“正”，“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怎样实现“经界正”呢？孟子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即以一里见方为土地划分的一个单位，这样的一块土地由八家耕种，每家各耕种百亩，同时共同耕种提供剩余产品的百亩“公田”，最后实现“九一而助”。这个方案属设想性质，从孟子本人的话中就可清楚看出，他说：“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设想，如何具体实施，则在于滕文公和毕战的具体规划与设计了。

由上述讨论可以清楚看出，孟子在这里提出的确实是一种政治、经济的设想，他列举出三代，只是为其设想制造历史依据，以增强说服力。任何人都不会平白无故提出某种思想的，特别像孟子这样的大思想家。那么，孟子提出这种设想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分析一下孟子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关于孟子的生卒年代，古今有各种推断，莫衷一是，大致来说，他的政治活动是在公元前4世纪，或延续至公元前3世纪初，比商鞅进行政治活动的时间稍晚一些，但可以说属于同一时期。其活动区域主要在东部地区，最西到魏。对于这个时期，司马迁有很好的描述：“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春秋战国变革运动已接近尾声，各国忙于兼并战争。孟子说这段话时，各国已普遍实行国家授田制，在

西部地区，商鞅变法已经完成，而在东部地区，春秋前期管仲在齐国的变革已过去了数百年，管仲所创立的以国家授田为重要内容的书社制度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弊端愈积愈多，已不再适应社会需要。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孟子所说“经界不正，井地不均”，由于“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田界系统已被破坏，导致按方块划分土地不能实现平均，从而导致“谷禄不平”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田界系统，如孟子所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孟子提出了一个“方里而井”的田界系统设想，试图予以解决。在东西部既相同又不相同的总体背景之下，商鞅在西部地区提出并实施了他的变革方案，孟子则依据东部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孟子并不是一个仅仅怀旧的腐儒，而是面对现实的思想家，“方里而井”的制度便是他奉献给社会的精神产品。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孟子的经济构想并没有得到实际推行的机会。

其实，孟子决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热衷于复旧，不食人间烟火，在《孟子》一书中，处处表现出他实行国家授田制度的积极主张。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

另外也有一些言论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国家授田制事实。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孟子·滕文公上》。）

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孟子·滕文公上》。）

有故而去，……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今也为臣，……有故而去，……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离娄下》。）

相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需求，必然导致各种经济思想本质上的统一，孟子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也不例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孟子的田制思想，简略地比较一下商鞅和孟子的田制思想与政策，可能会有一定意义。

在商鞅和孟子那里，都看不到任何土地私有化的主张或记载，他们都主张由国家授田。在商鞅，建立了包容于“为田开阡陌封疆”中的一整套授田制度。孟子则讲：“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主张“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家百亩田、五亩宅是他理想的恒产标准。使民有恒产，则必须由国家授其田产。要保证一家能得到百亩受田，就必须确立比较健全的田界系统。商鞅建立了阡、陌、阡道、陌道、封、埒配套的完整田界系统，而孟子的第一条经济政策便是正经界，“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为此，他设计了一个“方里而井”、内含九个百亩方块的田界系统。建立完整的田界，达到使授田平均，其目的在商鞅为“赋税平”，而在孟子则是“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商鞅、孟子在田制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其差别只在一些非决定性的方面，例如，商鞅在奖励耕战的前提下可以给某些人授予较多的土地（同时授予的自然也有耕种这些土地的“隶臣妾”或“庶子”），而孟子则是一家百亩；商鞅似乎是按夫授田，而孟子主张则是依家授田；商鞅主张“訾粟而税”（《商君书·垦令》。），孟子则主张八家共耕百亩公田的“助”法；等等。

商鞅与孟子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田制思想，时代决定了其间本质上的相同。当然，孟子是一个思想家，不是政治家，具有浓厚的书呆子气，因此，他的“八家共井”的具体构想、规划自然成为无法实施的空中楼阁。商、孟相比，商鞅的政策比较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多空想。他看到了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并试图去

解决它们，但又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只有参考古今，提出一个想当然的规划。他的设计在现实中确实难以实行，例如八家共井，就对各家的人口多少、人口变化情况未予考虑，也未充分考虑土地的肥瘠差别，能否使各家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实现战国思想家普遍重视的“地无余利，人无余力”，则更在考虑之外。又例如“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也根本没有考虑人口的增减变化、男婚女嫁等实际情况。孟子的思想未被当时的政治家们所采用，除了各种不利客观条件而外，这是一个基本原因。人们之所以往往把孟子“八家共井”看为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制度，甚至将此看为西周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于孟子的构想与规划中糅合进去了许多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制度。他据《诗经》推断的“助”法剥削形式，在西周时期确实存在过；他所说的一家私百亩的授田制度、“八家共井”以及所谓“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相类似的社会基层组织结构在书社制度阶段也曾存在过。这些内容，再加上他针对当时现实所提出的正经界、制民以恒产、取民有度、八家各私百亩而同养百亩公田等思想，搅和成了他的一整套“井地”思想。这本来是一种思想，硬要将其看作是西周现实的描述，当然会感觉到扑朔迷离。至于西周的社会经济状况，孟子其实了解并不多，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关于西周行“助”法，是他据《诗经》有“公田”一词推测出来的；北宫锜问他周室如何班爵禄，他说“其详不可得闻也”（《孟子·万章上》），因此，据孟子的话来推导西周社会状况，实在是有点缘木求鱼。

第二节 “井田”资料的流变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所谓“井田”制问题，从文献角度来说，除了对《孟子》予以详细讨论而外，还需要从整体上分析“井田”资料的流变，同时简略讨论一下其内部本身就具有的矛盾（关于这些矛盾，已有许多学者作过阐述，其中以胡寄窗《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研究》1981年第4、5期）论述最为详细。）。

通常被用来论述“井田”制的材料，是成书于战国的《孟子》、《周礼》（关于《周礼》断代，自古众说纷纭，今学界有影响人物多持战国说，如钱穆、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杨向奎等，本书从之，不再讨论。关于《周礼》经济内容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事实，请参看本书第三章。）《司马法》（本书所引《司马法》有关内容为佚文。关于其断代，因其内容多与《周礼》相出入，且《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故本书将其作战国文献对待，暂排列于《周礼》之后，不再详论其断代。）和成书两汉的《谷梁传》（关于《谷梁传》断代，一说为战国谷梁赤所撰，一说其在汉以前口耳相传，汉初方写定成书。不论采取何说，其书汉初已写定，而主要内容当形成于战国，故本文将其排于《韩诗外传》之前。）《韩诗外传》、《汉书》、何休《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春秋井田记》已佚，作者亦不知。原文系《后汉书·循吏列传》李贤等注引《风俗通》所引，《风俗通》作者应劭与何休相前后，故本文将其排列于《公羊解诂》之后予以讨论。），其中最早的是《孟子》、《周礼》和《司马法》。《司马法》与《周礼》相类，而《孟子》和《周礼》看来属于不同的系统。关于《孟子》，本章第一节已经作了讨论，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周礼》。

《周礼》谈到与土地有关的“井”的记载有两条，其具体记述如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羨。……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

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周礼·地官·小司徒》。）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周礼·考工记·匠人》。）

此外，与其相类涉及授与农民定量土地的记载还有如下几条：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鄯，五鄯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周礼·地官·遂人》。）

《周礼》的叙述显然与《孟子》大为不同。

其一，不见专门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耕地。孟子的设计专门在九百亩中划出一百亩作为“公田”，以使各耕种百亩的八家在这里实现剩余劳动。但《周礼》在与土地有关的场合中提到井时，都是说“九夫为井”，并未保留出类如孟子所说的“公田”百亩，可见其所采取的剥削形式是以定额制或分成制直接收取实物的。

其二，授予土地的对象是“夫”而非“家”，除户主外，“余夫亦

如之”。根据《小司徒》中提到每家“可任者”有三人、二人半、二人之别来看，每家“夫”数并不相同，这样，一家所受耕地当不限于百亩，而《孟子》所述为按家授田，若据《周礼》，则“八家共井”便成为不可能，甚至一家所受土地分属于不同的“井”。

其三，由于轮耕之需，每夫受田并不限于百亩，还有“莱五十亩”、“莱百亩”、“莱二百亩”之别，《孟子》则无此考虑。按照《周礼》的授田额，《孟子》式的设计便成为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在本章第四节的讨论中将要说明，“井田”制的内涵实际有两个来源，一是反映了西周社会的“公私田”之别与“助”法劳役剥削形式的内容，一是反映了春秋战国社会的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孟子》杂糅了这两方面内容，而《周礼》只有后一项内容。因此，《周礼》的有关内容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授田制度的设计或规整化的反映。从它与《孟子》区别来看，除了上述来源不同而外，还表现出，《周礼》考虑到了各种现实情况，如土地肥瘠的差别、一家人口多少的不同等等，而《孟子》的设计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脱离实际的书斋特色。另外，《周礼》以夫授田，也表现出了它出身于东部的地区特色，西部的秦由于商鞅的分户政策，家庭多被分割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小家庭，东部地区则似乎多有大家庭，如《管子·海王》所说的“百口之家”，适应这种实际，国家授田只能按夫进行。东部地区的这一特点，在银雀山竹书《田法》中表现很清楚：“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 州 而为州 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 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对居民的行政编制，以“家”为单位，而耕地的编制，则按“人”所受定额田为单位。

当然，与《孟子》相同，《周礼》依然带有浓厚的书斋气。如果仅就授田方面而言，《周礼》的设计是切实可行的，但它在授田以上的设计则多属空想，特别是沟洫制度。《地官·遂人》有关于遂、沟、洫、浍、川和径、畛、涂、道、路的一整套设计，在千里大平原上，由于本来就存在着的山陵河川湖泊，这种设计既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能性，也没有任何实际必要性，如宋人叶适早就指出过的那样（叶适《水心别集·民事下》：“夫吠遂沟洫，……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于后世耳。大陂长堰，因山为

源，钟固流潦，因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不在乎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如果真要如此建设，则工作量之大难以想像，据《考工记》，遂广深各二尺，沟各四尺，洫各八尺，浍广二寻（十六尺）深二仞（十六尺），而在一“万夫”之国（依一夫百亩计之，不过方三十余里）中，需开凿长60丈之遂 条，长600丈之沟900条，长600丈之洫90条，长 6000 丈之遂9条，按尺为0.231米计之，暂不考虑径畛涂道路的建设，仅沟洫之类总土方量为 4366500 立方米，“夫”均436立方米，在工具落后的先秦，这是不小的工作量，且不说自然及人文地貌也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建设。宋人苏洵早已指出过这一点（苏洵《嘉祐集·田制》：“非塞谿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垵，不可为也，纵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划于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也。”）。这种设计与现实存在尖锐矛盾。

与《周礼》相类，《司马法》也有将土地与“井”联系在一起的叙述：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

就亩百为夫、九夫为井而言，《司马法》与《周礼》相类，而且同样也没有“井田”字样，只是多出亩之地积的确定和夫三为屋之说。由于《司马法》的断代以及整体情况很难把握，无法作出更细致分析，故讨论战国有关文献时，本文主要着眼于《孟子》和《周礼》。

成书于战国的《周礼》和《孟子》，都没有明确提出“井田”一词，都表现出浓厚的政治、经济设计的特色，而且两者之间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到了汉代，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针对于新的经济需求，汉儒们开始提出“井田”制概念，并把它作为西周甚至更前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其源头，似乎都是《孟子》，《汉书》以后方又杂以《周礼》。《孟子》只是作为一种经济设想提出“方里而井”

的设计，其目的主要是为解决“经界不正”的弊病，汉儒则将“井田”当作西周土地制度，目的是为扼制汉代的土地私有化势头寻找理论根据，这样，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成为必然。但是，汉儒所能依据的最早文献只有《孟子》，因此只能以修改、完善《孟子》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只能离《孟子》越来越远。

在涉及“井田”内涵的资料中，最早提出“井田”一词的是《谷梁传》：

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谷梁传·宣公十五年》。）

此条说法沿袭《孟子》，只是增添了“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一句，大概作者感觉到《孟子》的设想没有考虑到农民居住地，是一缺陷。但是，它将实现劳役剥削的土地和作为居住地的土地都放在公田上，如何安排？似乎并没有予以考虑。显然，这里作者已经把“井田”作为古代实际存在的一种土地制度来加以描述。

接着谈到类似内容的是《韩诗外传》：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韩诗外传》卷四。）

作者又在《谷梁传》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设法解决农民的居住地问题。他的思路很巧妙，首先将公田百亩划为两部分，其中八十亩作为实现剩余劳动的场所，每家承担十亩，正好合于十一之比（关于“什一之税”，汉儒理解亦多混乱。依孟子之言：八家共井，为“九一而助”，其“九一”是指总

产品或总劳动的九分之一。依李悝所言：“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其“什一之税”即十分税一，是指总产品的十分之一，而非农民所得与税收之比为十比一，《韩诗外传》所说与下述何休《公羊解诂》所说，实际都是十一分税一，而并非“什一之税”。），所余二十亩分与八家，每家二亩半，用以“为庐舍”。然而，这里对庐舍用地的设计依然与《孟子》相矛盾，因为孟子的理想是“家五亩宅，百亩田”，二亩半宅地其实只够一半。同时，他又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即每家余夫各得二十五亩，但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各家余夫的二十五亩田地如何安排？《孟子》谈到余夫时说的很清楚，卿以下有圭田五十亩，卿家之余夫有圭田二十五亩。《礼记·祭义》曰：“昔者天子为藉千亩，……诸侯为藉百亩”，各级统治者祭田规模各不相同，孟子所设计“卿以下”以及其余夫所受圭田五十亩、二十五亩与此祭田数额吻合，此处圭田当即祭田，千亩、百亩、五十亩、二十五亩之差也正与天子、诸侯、卿大夫、卿家“余夫”之等差成比例。孟子此处所谓“余夫”，当即“余子”。“余子”，即卿大夫家嫡子以外之诸子，显非一般农民。《周礼·地官·小司徒》：“大故致余子。”郑玄注：“余子，卿大夫之子。”《吕氏春秋·报更》：“张仪，魏氏之余子也。”高诱注：“大夫庶子为余。”《左传·宣公二年》：“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杜预注：“余子，嫡子之母弟也。”《汉书·食货志》：“余子亦在于序室。”苏林注：“余子，庶子也。”圭田显然与农民每家所受百亩性质不同，无论解释为祭田，还是像有些学者那样解释为畸零之田，因其数量大大少于农民每家所受之百亩，故都不是由受田者自己耕种，当属孟子所说“公田”，是农民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因此，孟子的说法与“八家共井”并无冲突。《韩诗外传》将余夫解释为受田农民各家之余夫，则其所受二十五亩土地实际上无法安排，与孟子的设计形成尖锐矛盾。

至《汉书》，则杂糅了《孟子》和《周礼》：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

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爱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藪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饁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

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

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连帅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汉书·刑法志》。）

上述所录《食货志》三段文字，第一段来自《孟子》以及其后的《谷梁传》、《韩诗外传》，但是略去了《韩诗外传》所谓“余夫”之说，第二、三段基本来自《周礼》以及《司马法》，其内容与第一段形成尖锐矛盾，其实二者无法并存。除此而外，又增加了一些内容，诸如授收田年龄界限、对于生产的直接干预、对受田农民更严密的管制，等等。《刑法志》内容则基本来自《周礼》和《司马法》。《汉书》“井田”论由于是杂糅了《孟子》和《周礼》两个系统的内容，其中的矛盾是显然的。按夫授田，“余夫”同于“户人”（即户主），且按土地肥瘠有百亩、二百亩、三百亩之差，按此则根本无法形成所谓“八家共井”。另外，适应两种不同的土地规划的两种剥削形式，即公田“助”法剥削形式与直接征收实物剥削形式，也形成尖锐矛盾，二者无法统一起来。

何休《公羊解诂》则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

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种谷不得种一谷，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还庐舍种桑荻杂菜，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女工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余夫，余夫以率受田二十五亩。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硖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兵车素定，是谓均民力强国家。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

这里，明确了受田百亩之“家”的人口数量，为五口，同时明确了“余夫”的定义，即一“家”多于五口者。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有关社会风气、道德方面的叙述，主要是所谓贵人、重公贱私之类。但是，他将余夫作为各家多于五口之人，且授予其二十五亩，田又有一岁一垦、二岁一垦、三岁一垦之别，为“肥饶不得独乐，硖埆不得独苦”，又须“三年一换土易居”，土地如何分配安排，仍是难题。其叙述前后两部分依然矛盾，考虑到“余夫”和上、中、下三种田土的不同分配，孟子所言“八家共井”在这里仍无法实现。

最后是《春秋井田记》：

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父母妻子也。公田十亩，庐舍五亩，成田一顷十五亩，八家而九顷二十亩，共为一井。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也。（《后汉书·循吏列传》李贤等注引《风俗通》所引。）

这里又有改变，将宅地扩大为五亩，突破一井九百亩之限，似如《孟子》，实与《孟子》已截然不同，其所谓“八家共井”似乎是作为一种社会基层组织，是以家而并非以土地为组织依据的，因为九顷二十亩作为八家共之的一个方块，实在是难以实现的规划。它与《孟子》的相同之处，只是同样有授田予民的内容而已。

从上述罗列可以看出，“井田”资料有一个明显的增补、发展的演变过程。“井田”资料的源头在战国，主要是《孟子》和《周礼》二书。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这一大环境之下，思想家们不可能脱离现实，他们为治国平天下设计了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规划与方案。这些设计在本质上属于新的精神产品，但在具体内容上，必然也必须借鉴前代和当代的许多适合其思想体系的东西。在笔者看来，《孟子》是这样，他既借鉴了西周的“助”法剥削形式，又参考了战国普遍存在的国家授田制形式，提出了全新的“方里而井”设计；《周礼》也是这样，其作者既吸收了大量的西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方面的成果，又吸收了自管仲以来的政治、经济改革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一统天下的统治体系。然而，就这两本书有关所谓“井田”的内容而言，不管其包含了多少与历史上或现实中相符的东西，在总体上只能归于设想、规划、方案一类，属于精神范畴之内，而无法归于现实，因此，如果从实际施行角度来看，其必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当然，从“设计书”角度看，这种矛盾完全可以理解。另外，正因为《孟子》与《周礼》是两套不同的“设计书”，其间矛盾也是完全正常的了。《孟子》和《周礼》都没有提出“井田”一词，“井田”制作为对西周土地制度的一种描述，应当说在汉儒那里方才形成。由于“井田”资料有两个存在矛盾的不同源头，而这两个源头都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设计而将“井”与土地联系起来，与社会实际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凡是试图延袭这两个源头、并将其作为一种现实制度来理解的努力，都必然因内部存在尖锐矛盾而不能成功。汉儒是这样，后人也是这样。胡适从文献角度着眼，考察“井田沿革史”，“以为大概井田论是到汉代方才完备的”，从而否定井田制的存在（胡适：《井田辨》，《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应当说是有道理的。

第三节 “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比较研究

“井田”制究竟是否存在？《孟子》、《周礼》等文献中所说的“井田”究竟反映了什么历史事实？仅仅局限于有关文献还难以得到最后结论，要打破僵局，目前还有一个途径，这就是把它与战国田制联系起来，放在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无论对中国古史分期持何种观点，学者们都承认，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社会经济结构。古人早就看到了这点，如王夫之就说：“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必然的推理：作为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肯定与战国土地制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人们对西周土地制度的描述与战国相类，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描述是不可信的。因此，如果将“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进行比较研究，寻其同异，看看二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这对于最后解决“井田”制问题，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 “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之异同

通常被使用涉及“井田”制内涵的材料，仅见于成书战国的《孟子》、《周礼》、《司马法》和成书两汉的《谷梁传》、《韩诗外传》、《汉书》、何休《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其间不乏矛盾抵牾之处。战国授田制的内涵，不仅见于地下材料，亦散见于战国及秦汉的各种文献，经过学者们多年研究，已经可以描绘出一个大致轮廓（[参见本文第四章的讨论。](#)），当然，由于材料仍相当缺乏，我们尚难以完整地叙述出它的法律形式，也无法充分把握它在地域上的差别。为使叙述简明，本节暂不考虑有关“井田”制材料的内部矛盾，按照有则录之的原则归纳出其内涵的一些条目，以此为基准，逐条比较它与战国授田制的异同，并进行简略的分析。由于“井田”制是一个古老而庞杂的问题，为尽量避免误解和无谓争论，本节不得不罗列有关各种材料，并将历来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暂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的比较可从下述十六个方面进行。

1．受田单位

“井田”制：

有家、夫两种。《孟子·滕文公上》、《周礼·大司徒》所述受田单位为家（[《孟子·滕文公上》有“余夫二十五亩”，据文意，此指受圭田的“卿以下”之家的余夫，非直接生产者家庭的余夫。关于圭田，“官吏受田”一条将予以讨论。](#)），《汉书·食货志》有一处叙述同此。《韩诗外传》除家而外，开始列出余夫。《公羊解诂》更明确为一夫一妇及以此为核心形成的五口之家。《周礼·遂人》所述受田单位为夫，《汉书·食货志》另一处记述同此。《春秋井田记》亦为夫，但又进一步说明，该夫受田“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父母妻子也。”

战国授田制：

亦有家、夫两种。《魏户律》有“（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92页](#)），可见立户为受田前提。所谓“家五亩宅，

百亩田”(《荀子·大略》。),即为以家授田。银雀山汉墓出土战国齐人作品《田法》曰:“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 州 而为州 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 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即在以家为单位组成的行政区划州、乡中按夫授田,百人、千人所受田组成相应地块区、域。“一农之量,壤百亩也”(《管子·臣乘马》。),“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权数》。),等等,皆为以夫授田。

比较与分析:

二者受田单位皆有家、夫两种。战国授田制中这种差别可能与不同地区家庭结构不同有关,但其着眼点都在主要劳动力“夫”身上。商鞅变法明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李悝尽地力之教所述标准生产单位为“一夫挟五口”(《汉书·食货志》。),可见,秦与三晋受田之“家”是以一夫为核心的小家庭,授田予“家”和授田予该家主要劳动力“夫”可以说完全等价。而齐鲁之地多未分居之大家庭,如“八口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尽心下》。),“十口之家,……百口之家”(《管子·海王》。),因此必须以夫授田。“井田”制材料中的家、夫之别,从《公羊解诂》和《春秋井田记》看,似乎亦出于同样原因。

2. 受田者年龄限制

“井田”制:

着眼于是否成为劳动力。《汉书·食货志》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春秋井田记》曰:“人年三十,受田百亩。”

战国授田制:

亦着眼于是否成为劳动力。银雀山竹书《田法》有:“(疑为“年七十”三字)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简文整理者认为此言为服役年龄,不受,文中之“作”恐不能解为徭役。此句后续文字曰:“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原文误植为“作”)四人作者亡。”又曰:“王者一岁作而三岁食之,霸者一岁作而二岁食

之，……”显然，不能说征发徭役越多国家越强盛、积蓄粮食越多。且其行文与《汉书·食货志》有关授田的文字非常相似，因而以理解为受田并从事农作的年龄界限为妥。此处受田者限于十六岁与六十岁之间，十四至十六岁、六十岁以上（可能至七十岁）授以半额田。

比较与分析：

《春秋井田记》所述始受田年龄偏大，不合情理，“三十”可能为“二十”之误。此外，两者具体年龄限制虽略有差别，但都着眼于劳动力，成年劳动力皆授以全额田。《汉书》所谓“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即勉强、强迫其参加一定劳动，有可能是指授予一定量土地，与《田法》半劳力使之半作，即授以半额田相类。至于两者中以家为受田单位者，其核心当然是成年男劳力。

3．授田者

“井田”制：

授田由国家实施。《孟子》是建议滕文公实施；《周礼》中为大司徒、遂人等官员之职；《汉书·食货志》记曰“先王”、“圣王”“制土处民”。这些，都代表着国家。

战国授田制：

亦由国家实施授田，并以法律形式固定化。云梦《秦律》为证。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由国家授田，表明授田以土地国有为前提。

4．授田额

“井田”制：

一般为一家或一夫授田百亩。《孟子》、《韩诗外传》、《汉书》、《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皆为一家或一夫授私田百亩。除《孟子》为八家同养公田百亩外，余皆家或夫授公田十亩。另，《韩诗外传》、《公羊解诂》又有余夫授田二十五亩之说。《周礼》则为依田等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上地夫……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夫……田百亩，莱百亩，……下地夫……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皆相同（《周礼·地官·遂人》）。《汉书·食货志》另一处记述与此类似：“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余夫亦相同。

战国授田制：

一般也是一家或一夫授田百亩。“家……百亩田”（《荀子·大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一农之壤，量百亩也”（《管子·臣乘马》）；“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管子·轻重甲》）；“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吕氏春秋·乐成》），等等。有因土地瘠薄而多授田者，“邲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有因亩积小而亩数多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商君书·算地》）。亦有因亩积大而亩数少者，如《田法》：“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

比较与分析：

两者均为一家或一夫授田百亩，土地瘠薄者多授，以供轮作耕休。两者差别，“井田”制材料中多数有公田十亩之授予。关于公私田之分，本节后面集中分析。另外，《韩诗外传》、《公羊解诂》曰余夫受田二十五亩，大大低于正夫，不合情理，显系对《孟子》卿以下之家余夫受圭田二十五亩的误传，不足为比较的基准。

5．宅地

“井田”制：

授以定量宅地。《谷梁传》称：“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但未指明一家宅地多少。《韩诗外传》、《汉书》、《公羊解诂》为一家授庐舍地二亩半。《春秋井田记》为一家庐舍五亩。《周礼·遂人》曰授田时夫授一廛，郑玄注：“廛，居也”。《说文》：“廛，一亩半，一家之居”。不论面积大小，授田同时总要授予定量宅地。

战国授田制：

亦授定量宅地。通常一家五亩左右，《荀子·大略》曰“家五亩宅”。银雀山竹书《王法》有“……上家（疑为地）亩四，中家三亩，下家二亩”（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此处所言当为授宅地亩数，依家大小而有等差。

比较与分析：

两者数量不一，但皆授以宅地。地域不同，宅地面积有差，此亦情理中事。

6 . 官吏受田

“井田”制：

《孟子》有：“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圭田为何，解释不一，但为卿以下官吏及其家属所受田无疑，其上所得自然为该家收入。

战国授田制：

亦见对官吏类如俸禄田之土地授收事例。“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韩非子·喻老》）；齐国臣下离“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离娄下》）；秦甘罗出使有功，“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有相似的官吏受田。其上劳动力如何解决，收益如何分配，不清。战国授田制可能同时授予一定劳动力，《商君书·境内》曰：“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孟子》所言圭田数量很少，就文义似可推测为公田的分割部分，即圭田由井中农民代耕。

7 . 田界

“井田”制：

高度重视田界问题。《孟子》谈“井地”时，置田界问题于首位，“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汉书·食货志》谈到“先王制土处民”时亦言：“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周礼》每言规划土地，必有田界，“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周礼·地官·大司徒》），“……皆有地域沟树之”（《周礼·地官·遂人》），还设计有沟洫与道路配套的规整的田界系统，“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周礼·地官·遂人》）。

战国授田制：

商鞅变法亦将田界问题置于极重要地位，“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即确立起以固定田界阡、陌、阡道、陌道和非固定田界封、埒（疆）配套的田界系统，以保证授田的实施。东部地区也有类似设置，“春三月以甲乙之时发五政，……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

正千（阡）伯（陌）”（《管子·四时》）。

比较与分析：

细节虽有差别，但重视田界、确立田界系统，两者相同。授民以田，自然必须有相应田界系统保证其实施。

8．耕休与换田

“井田”制：

有耕休与换田之制。《周礼·大司徒》记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遂人》授田中有莱田，郑玄注曰：“莱，谓休不耕者”；《汉书》记授田有不易上田、一易中田、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爱其处”，这些都是说授田中包括耕休之地。《公羊解诂》曰：“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这里不仅谈到耕休，也谈到定期更换耕地的制度。

战国授田制：

亦有耕休与换田之制。“魏氏之行田”，“邲独二百亩”（《吕氏春秋·乐成》），倍于通常之百亩授田，是因“田恶”，当实行耕休。《田法》有“循行立稼之状，而谨美亚（恶）之所在，以为地均之岁……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其中赋田即授田，《国语·晋语》“赋职任功”韦注：“赋，授也”；《吕氏春秋·分职》“出高库之兵以赋民”高诱注：“赋，予也”；《汉书·哀帝纪》“皆以赋贫民”颜注：“赋，给与也”。该句即曰，根据庄稼生长状况确定田之肥瘠，三年更换一次授田，十年全部更换一遍。

比较与分析：

两者基本相同。耕休轮作作为耕作制度，在任何田多人少之地都可以实施。换田制度则不仅皆有记述，而且都是三年更换一次。

9．公私田之别

“井田”制：

除《周礼》而外，皆有公田与私田之别。《孟子》为八家同养公田百亩，《谷梁传》为九百亩中“公田居一”，其余材料皆曰家受公田十亩。《谷梁传》还有“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

可见公田、私田与吏、民相对应，公田由官吏管理，农民耕作，收入归官府。

战国授田制：

未见。

比较与分析：

两者完全不同。对此，本节后面集中分析。

10．亩积

“井田”制：

亩积皆为百步。《韩诗外传》：“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汉书》：“六尺为步，步百为亩。”《孟子》：“方里九百亩。”《谷梁传》：“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

战国授田制：

亩积不一。秦制二百四十步为亩。齐鲁等东部地区大约是百步为亩。《礼记·王制》云：“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又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其谓“东田”，当指战国或秦汉时期东部地区亩积，似为六尺步之百步之亩。武帝末年行代田法，“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汉书·食货志》），以班固之言：“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汉书·食货志》），一井一屋共一千二百亩，折为五百亩。可见当时仍行两种亩积，大约前者为东田，百步为亩，后者为西田，二百四十步为亩。东西田之别当为战国旧制，残存于汉初（参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三“王制东田名制解义”，《癸巳存稿》卷十“亩制”）。与亩积西部大东部小相对应，西部有“小亩”之称，“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商君书·算地》），东部齐国则有“大亩”之称，《田法》云：“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此种亩积变化春秋时即已产生，《孙子兵法》佚篇《吴问》述晋之亩积变化曰：“范、中行是（氏）制田，……百六十步为畛，……〔智是（氏）制田，……以百八十步为畛〕，……韩、魏制田，……以二百步为畛，……赵是（氏）制田，以二百卅步为畛”（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孙子兵法 残简释文》，《文物》1974年第12期。引文中“畛”原作“”，释为“亩”，据黄盛璋《青川新出秦田律木牍及其

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第9期)改。),此处之畛实际为亩的代名词。

比较与分析:

战国时各地亩积不同,且多有变化,但若不考虑一步尺寸长短的差别和变化,东部地区一般亩积大致为百步,这与“井田”制材料中的亩积是统一的。而有关井田制的早期文献,恰恰也都出自东部地区,两者间自然会有某种联系。

1.1. 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

“井田”制:

有三方面的干预:督促生产,组织生产,提供保险。一、督促农民生产。《周礼》记一些官吏之职曰:“趋其稼事而赏罚之”(《周礼·地官·县正》);“教甿稼穡”(《周礼·地官·遂人》);“趋其耕耨,稽其女功”(《周礼·地官·酇长》);等等。还规定:“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椹,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周礼·地官·閭师》)。《汉书·食货志》所记则有如监督囚犯生产,“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且民出入之时,有“里胥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直接监督。二、组织生产。《周礼》所述亦多。有沟洫水利设施和道路的统一规划与建设,“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周礼·地官·遂人》)。有耦耕的组织,里宰之职,“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穡,趋其耕耨,行其秩叙”,有掌握土地情况以定作物和施肥的种类,草人之职,“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汉书·食货志》所述对作物种植亦有种种规定,如“种谷必杂五种”,“田中不得有树”等等。三、提供保险。《周礼》有记载,司稼之职,“掌均万民之食,而赙其急,而平其兴”(《周礼·地官·司稼》);廩人之职,“若食不能人二,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周礼·地官·廩人》,郑玄注:“六斗四升曰”);旅师之职,“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周礼·地官·旅师》)。

战国授田制:

亦有督促生产、组织生产、提供保险三方面的干预。一、督促生

产。《田法》等篇明确规定，一年受田收获粮食少入百斗、二百斗、三百斗者，分别处以罚为公人一岁、二岁、黥刑以为公人的刑罚；家中没有一定数量余粮、余布帛，亲属死不得含，不得以衾复尸（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卒岁田入少入五十斗者，^{〔一〕}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二〕}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岁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十月冬衣毕具，无余布人十尺、余帛人十尺者，亲死不得为^{〔三〕}（幘）。……”）。《魏奔命律》规定，带头不事生产者，遣入军队干苦活危险活，每天只给口粮三分之一斗，不给肉吃（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94页：“（假）门逆^{〔四〕}（旅），赘^{〔五〕}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六〕}（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七〕}（予）穀。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八〕}（壕）。”）。文献记载也很多，“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行罪无疑”（《吕氏春秋·仲秋纪》）。“魏三月上祀，农官读法，法曰：……上上之田收下下，女则有罚”（董说：《七国考》卷二“农官读法”条引桓谭《新论》）。二、组织生产。就目前所知，有两方面。一是国家主持大规模兴修农田灌溉水利。如西门豹治邺，组织开凿了十二道水渠，引漳水灌溉农田；又如都江堰、郑国渠的建设。一是某种程度解决生产困难，提供籽种、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云梦秦简有律文言，县仓库专门存放作物籽种，仓库管理人员必须掌握各种作物的亩用种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4页：“县遗麦以为种用者，穀禾以臧^{〔一〕}（藏）之”。第43页：“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二〕}（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三〕}（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这可能类如江陵凤凰山西汉前期墓出土贷谷帐所反映的，国家借贷种子与贫苦农民（参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秦简中所见定期评比耕牛并行赏罚的律文，借铁制农具因破旧而损坏者准予报销的律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一〕}（牖）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二〕}（酒）束脯，为旱^{〔三〕}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诎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絮，治^{〔四〕}（笞）主者寸十。有^{〔五〕}（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六〕}（笞）卅。”32页：“（假）铁

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似说明国家借耕牛、铁制农具予农民。《封诊式·封守》记查封某里一士伍之家产，他有家室子女，有房产，畜臣妾，查封帐也细到门前桑树十株、公狗一只俱记录在案，但其中不仅无田，亦无耕牛、铁制农具（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页。），此为旁证。三、提供保险。如李悝曾针对“余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的情况，设平余之法，“取有余以补不足”（《汉书·食货志》。），为农民提供灾年保险。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从督促生产、组织生产、提供保险三方面干预农业生产。如果说它们有差别，除了具体措施有些差异而外，“井田”制材料所记似过于规整而难以实施，不如战国授田制中政策之切实可行。

1 2 . 剥削形式和剥削率

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依据所授土地而进行的剥削。如上所述“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从所见材料看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这种情况下如马克思所说，地租与赋税合为一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0页。）。为叙述方便，本节以国家剥削称呼这种租税统一体。

“井田”制：

国家依据所授土地而攫取的剥削，形式有劳役剥削与实物剥削两种，剥削率大致在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之间，最低二十之一，最高百分之二十五。《孟子》“请野九一而助”；《谷梁传》“古者什一，藉而不税”；《韩诗外传》、《汉书》、《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皆为家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这些都取劳役剥削形式，剥削率分别为九分之一、十分之一、十一分之一。《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周礼·地官·载师》“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这些都取实物剥削形式，剥削率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仅园廛二十之一，漆林百分之二十五。从字面看，这种实物剥削皆为分成制。《周礼·地官·载师》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似乎也取定额制。另外，还依地征军赋。《汉书·刑

法志》曰：甸（六十四方里）“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具备，”《公羊解诂》曰：“十井（九十顷）共出兵车一乘。”《周礼·夏官·大司马》所记则为军役，“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战国授田制：

国家依据所授土地而征收的剥削基本上是实物剥削，剥削率已知者大致在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之间，亦有高于或低于此者。国家实物剥削有定额制和分成制两种。云梦秦简有：“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无鬲（垦）不鬲（垦），顷入刍三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此为定额制。“案田而税”（《管子·大匡》。），“相地而衰征”（《荀子·王制》。），都是根据土地肥瘠程度确定剥削定额。商鞅变法定“訾粟而税”（《商君书·垦令》。），此为分成制。就分成制而言，剥削率大致在什一到什二之间。什一之税大约是战国儒家的理想剥削率，故儒家文献多见什一之说，《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曰：“什一者，天下之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李悝估算农民收支帐，即以什一之税计之（《汉书·食货志》。）。《管子·大匡》曰：“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则平均大致在什二左右。有低于此限者，《管子·幼官》“田租百取五”，《孟子·告子下》记白圭主张“二十而取一”，此为二十税一，剥削率偏低，不一定实行。亦有高于此限者，《管子·臣乘马》“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藉九矣。”此言什伍之税，似为夸大之词。

比较与分析：

如果暂且抛去“井田”制材料中有关公田劳役剥削形式的内容，则两者剥削形式与剥削率基本一致。战国授田制下虽未见以地征徭役者，但在对劳动力授以定额土地的前提下，以人征徭役与以地征徭役可以说等价。至于两者有无公田劳役剥削形式的差别，本节后面集中分析。

1.3. 户口管理

“井田”制：

有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禁民随意迁徙。据《周礼》，地官首位大司徒之职为“掌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专人掌管户口，“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周礼·秋官·司民》）。另如司书、遂师、遂大夫、鄙师、鄴长、里宰等官吏都有掌管户口之职，必须按时予以清点。同时，禁民随意迁徙，移居须得官府批准，“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圉土内之。”（《周礼·地官·比长》。）

战国授田制：

亦有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禁民随意迁徙。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守法》有“中县、小县以民户之数制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可见制县之前有一定户籍。户籍经常检阅，“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管子·度地》），“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管子·立政》）。亦“禁迁徙，止流民”（《管子·四时》）。“废逆旅”，“使民不得擅徙”（《商君书·垦令》），擅徙者处以刑罚（《管子·立国》）。云梦秦简中有律文规定，迁徙者必须得到官府批准，有帮助故秦人出境者，削籍，处以鬼薪、城旦的刑罚（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214页：“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130页：“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有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禁止随意迁徙。不论国家以何种形式授田予民，户口是其直接依据，也是征收赋税徭役的基础，因而必然严加管理。

1.4 对劳动者人身的超经济控制

“井田”制：

按一定规格强制编制劳动者，施行联保，并以暴力予以控制。《周礼·地官·遂人》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鄴，五鄴为鄙，

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周礼》其他职官、《韩诗外传》、《汉书》、《公羊解诂》中，都有关于这类编制的叙述。编制如此规整，显非自然形成，只能由国家强制实施，是一种行政组织。《周礼》还有：“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周礼·地官·族师》）；“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周礼·地官·小司徒》），等等。这里，对劳动者的编制与联保制合一，功同赏，过同罚，并以此征发劳役，征收贡赋。另外，还以直接的暴力控制劳动者人身。《汉书·食货志》叙述曰：“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这里的里胥、邻长简直就是狱卒。

战国授田制：

亦强制编制劳动者，设什伍联保，并用暴力控制民户。《田法》曰：“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 州 而为州 乡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即为强制编制。亦立联保制，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齐地类似，“五人为伍，十人为连”（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立政》）。也严密监视劳动者，“筑障塞匿，一道路，转出入。审闾闭，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管子·立政》）。居民点定时启闭，出入人员稍有变异，则上报予以处罚。

比较与分析：

两者基本相同。以超经济手段控制劳动者人身，才能在授田条件下保证国家剥削的实现，这种手段是国家对农民进行剥削的经济关系中更为直接和核心的内容。

1 5 . 使民互助

“井田”制：

使受田者互相帮助。《孟子》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韩诗外传》、《汉书》、《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皆有类似叙述。《周礼·地官·大司徒》也有“相救”、“相受”等内容。

战国授田制：

《田法》有：“……五人为伍，十人为连，贫富相……”（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简已残断，有可能为贫富相助之类语句。

比较与分析：

我们不能断定战国授田制下也有类似政策。这属于社会的风气、习俗，对经济关系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说，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周礼》记有调人一职，“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周礼·地官·调人》），专门调解民间杀、伤、言语争斗等，这反过来说明使民互助更多属于儒家的理想。

16．国野之别

“井田”制：

部分材料有国野区别的叙述。《孟子》有：“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周礼》有国中、野（《周礼·地官·乡大夫》），国中、四郊都鄙（《周礼·地官·小司徒》），国中、园、近郊、远郊、甸、稍、县、疆（《周礼·地官·载师》）等等之别；从职官名称看，亦有乡、遂之别。不同的地区，施以不同的政策。

战国授田制：

战国时至少当有国野区别之残存，但目前尚不知战国授田制度对国、野的政策有无差别。

比较与分析：

国野之别，形成于周灭殷前后的武装殖民，既有阶级差别的因素，又含部族差别的内容，因而它延续时间相当长。《周礼》所言与《孟子》的国野有何关系，历来说法不一。战国授田制对国野是否有不同政策，目前也不清楚。但可以说，“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有关这方面的政策是否统一，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来说无关宏旨。

二 “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异同之分析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井田”制提出了种种假说性质的解释，有的甚至只使用了“井田”之名，任意解释，而将明确谈及“井田”制内涵的材料大部分不予考虑。如果抛开这种种解释，探讨一下“井田”制内涵的构成，从上述简略的比较研究中可见，除去“使民互助”与“国野之别”这无关紧要的两项而外，“井田”制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公私田之分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助”法劳役剥削形式，一是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方面的内容。相对于这两个部分的区分，“井田”制材料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有公私田之分与“助”法的《孟子》，一是无公私田之分与“助”法的《周礼》（胡寄窗认为：自先秦两汉以来，人们对“井田”的理解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孟子》中所记的原始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有公田而不附沟洫系统。另一种是《周礼》一书出现后才形成的派生模式，其特点是附有沟洫系统而无公田。”见其《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研究》1981年第4、5期。）《谷梁传》、《韩诗外传》、《春秋井田记》承续《孟子》，《汉书》《公羊解诂》则杂糅《孟子》与《周礼》。相对于战国授田制来说，《周礼》系统与其基本统一，而《孟子》系统则和它存在着矛盾。如果按照“井田”制内容的这两个部分，将“井田”制同西周社会、战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作一番比较，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公私田之分（《孟子》所说的公私田之分，实际是指由于采取“助”法而必须将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与农民用以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区分开来，这两种土地分别被称为公田和私田，本文肯定孟子所说公私田之分与西周实际统一，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至于西周社会实际存在的公私田之分，即在作为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田”意义上的区分，则与孟子所言大相径庭。关于这一点，参见本文第二章。）与“助”法劳役剥削形式，西周社会存在，战国社会不存在；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内容，西周史料中不见，而战国社会则全部存在。

西周社会存在公私田之分，《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为证。西周时期的公私田内涵究竟为何？与《孟子》所言是否统一？诸家说法不一，本文第二章提出了笔者的一种解释，请参考，

但不论如何解释，劳役剥削是西周社会的主要剥削形式，这大概没有问题，《诗·豳风·七月》为证。战国授田制下未见公私田之分，以所授耕地为依据的劳役剥削亦仅见痕迹。在这点上，“井田”制材料可以说反映了西周社会实际，而与战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相矛盾。

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内容，即，国家以土地国有为前提，在对劳动者人身予以很强直接控制的基础上，授予农民以适应其生产力水平的足够土地，实现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土地的充分结合，同时，多方面直接干预社会生产过程，并最后实现对农民的剥削。这部分内容，除去那些过于理想化、规整化的色彩而外，广泛存在于战国社会，但在确认产生于西周或反映西周社会的史料中，无论是彝铭，还是《尚书》、《周易》、《诗经》、《国语·周语》等文献，都很难看到痕迹。相反，有一些与之矛盾的记述。例如《国语·周语上》记载，宣王之前国家并不直接掌握人民户口，自宣王始方有“料民”之举。这样，国家既不掌握全部土地，又不掌握人民户口，当然无法授田予民。不论给这些史料予以何种解释，对其性质和程度有何种看法，它们都与“井田”制材料有尖锐的矛盾。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井田”说实际上有两个来源。有关公私田之别与“助”法劳役剥削形式的内容，来自反映西周社会实际的记述；有关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则来自对战国社会实际以及社会需要的反映。当然，这种反映是对历史和现实有一定歪曲的反映。它们被规整化、理想化，而且往往将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东西糅合在了一起。“井田”制材料中的《周礼》系统，仅仅有后一个来源，因此，它与战国授田制基本精神一致，而《孟子》系统，则糅合了这两个来源。成书于两汉的“井田”制材料，杂糅了两个时代的现实，予以规整化、理想化的歪曲，然后又一股脑套在西周头上，这就是“井田”制两千余年来扑朔迷离，真真假假，使人难辨真面目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个罪过并不能归于孟子本人，他是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分别谈到这两方面内容，而且说得很清楚，周行“助”法，是他根据《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作的推测；所谓“井地”办法，是他“请”滕文公与毕战尝试实行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予以改变，“润泽之”，可见这是他的一种经济设想和规划。但是，《孟子》

系统在它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成为所谓对西周社会土地关系、土地制度的记述，后人大多数从这个角度来看《孟子》，这就完全改变了孟子的本意。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说，从整体上看，“井田”制并非一种现实的土地制度，它是一个建立在现实之上、然而又不反映这些现实的经济构想。

这个推论，还可以从另一角度进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是不论持何种古史分期意见的人都承认的。这种社会大变革必然需要以一定的经济关系变革为核心和基础，而经济关系的变革必定要求其重要表现形式土地制度也有相应变革。反过来可以说，如果不存在土地制度的一定变革，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也不可能存在。从上述的比较研究可见，“井田”制与战国授田制的基本区别，仅在有无公私田之分和“助”法劳役剥削形式，这实际上可归纳为一点，即是否以劳役剥削作为依据土地进行剥削的基本形式，除此而外，两者大体相同。如果假设“井田”制是西周社会的基本土地制度，仅仅靠基本剥削形式由劳役剥削转变为实物剥削，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关系无任何根本改变，是不足以解释春秋战国期间的社会大变革的。因此，唯一合理的结论只能是：“井田”制并非西周社会的基本土地制度。

第四节 “井田”一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真正含义

明确将“井”字与耕地联系起来的史料，大概最早出现于春秋。除了上述列举的“井田”制资料而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一些含有“井田”字样、或将“井”字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史料，这些史料应当说是当时历史事实的反映，其中有几条还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革密切相关。对此，也应予以较为合理的解释。

古代文献在它流传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免发生改窜。例如《尉繚子·原官》宋本有“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一句，银雀山汉墓所出竹书则为“均地分，节傅（赋）敛，……”（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简本 尉繚子 释文（附校注）》，《文物》1977年第3期。）文中“地分”二字被改窜为“井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与“井田”有关的其他史料，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在未发现确证之前，只能以并未被改窜这一假定作为分析的基础。

为了正确理解这些史料，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井”字。

“井田”之说，不论《孟子》系统或《周礼》系统，都与“井”字形状有关。后人一般理解为一块方田分割为九块，成“井”形，中间为一“井”字，故曰“井田”，如程瑶田所说：“井之名，命于疆别九夫，二纵二横，如井字也”（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井田沟洫名义记》，《皇清经解》卷七二）。其实，这种理解不一定符合先秦“井”字的本义。

“井”，金文中通常为“𠂔”（金文中“井”实际上包含了“开”与“井”两个字，陈梦家先生区分这两字曰：“开”，“两横平行，两直不平行而向外斜，中无一点”；“井”，“两横两直平行，常有一点。”（《西周铜器断代·免簋》，《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本文讨论所涉仅水井之“井”字。）《说文》曰：井，“象构韩形，𠂔，瓮之象也。”就是说，“井”本方形水井之象形，“井”为水井井盘，“𠂔”为汲水瓶罐。水井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产生，而且这时也有了方形的井盘，如河南汤阴白营早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眼水井，该井在居住遗址附近，井口近方形，上口约5.7米见方，向下约半米后即收缩为3.7米见方，井底更小，约1.2米见方，井深约1.2米，井内有加固井壁

的井字形木架，共四十六层，井架用木棍作成，交叉处有榫，井底出土大量碎陶器，当即汲水器具残片（《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此后的有井盘水井出土不少，例如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址中的两眼水井，这两眼井井口为圆形或圆角长方形，内有木质井盘，为原木按井字形两两叠压，水井内还有木桶、陶罐等遗物（河北省博物馆等：《蒿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66～71页）。“井”字之象形，当就是取这类水井在井盘限制下的方形井筒之形状。有趣的是，金文“井”字在作为“静”字偏旁时，有的直接写作“𠂔”，例如在《静簋》、《静叔鼎》（容庚：《金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78～279页；周法高：《金文诂林》卷五“静”字条，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版。）中，这就更表明“井”字象形之本义。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当先秦人将“井”字与田地之类词汇连起来使用时，实际所取即“井”的方块形状之意。

如本文第二章已经讨论过的，在计量手段还不发达的古代，对土地的度量开始时往往不是直接的，一般采取间接的方式，民族学资料中常常可以看到类似情况。有的以种子来度量，如云南景颇族以箩种度量土地，一箩种水田约4亩、旱谷约2.5亩（马曜：《关于潞西县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藏族也是这样，其类似于斗的量器“克”（一般容谷物25～28斤），同时也是计算耕地面积的单位，一克地就是可以播种一克种子的土地（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有的以牛耕来度量，如云南怒族以“架”度量土地，所谓一“架”，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一条牛一天能够犁耕的土地面积，约折合两市亩（《碧江一区九村怒族社会调查》，《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可以想象，在尚未产生牛耕的西周时期，大概是以人力作为耕地度量标准，即所谓一“田”，大概就是一个成年男劳力可以耕作的土地，后来演化为“一夫”耕作之“百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着需要直接度量土地的时候，方块田，无论是正方形还是长方形，都是确定定量土地的最好形式。“井”是当时人们熟悉的方形器物，用其作方形标志，以表示方形田块，显然是比较合适的，因此人们将“井”与耕地联系到了一起。所谓一“井”之田，即一个方块田，在国家授田制下，它大概就是指一个劳动力所受的具有百亩的一个方块田，这是它真正的含义。具有

百亩面积的方块田，是国家授田制的一个特征，因而，随着国家授田制的开始实施，“井田”一称或将“井”字与耕地联系起来的现象也就应运而生，这是它始见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的文献，并作为齐、楚等国经济变革内容之一的根本原因。以这个推定看先秦将“井”字与耕地联系起来的资料，不仅不发生矛盾，而且显得更通畅、简明。

《国语·齐语》：“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瑾，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此为管仲变革时“五鄙”措施之一。对于“陆阜陵瑾，井田畴均，则民不憾”一句，韦昭注：“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瑾，沟上之道也。九夫为井，井间有沟。谷地曰田，麻地曰畴。憾，恨也。”此处“井”字，韦注沿袭汉儒之说，本文不取。其中“瑾”、“井”均为名词动词化。“陆阜陵瑾”，意为将道路布置、建设于“陆”、“阜”、“陵”之上。“井田畴均”，意为按井状、即方块形状来平均地划分土地，或者说划分土地使之平均。该句大意即，在不同的各种土地上布置道路（这可能类如秦“为田律”所记的阡道、陌道，既为道路，又作田界），将田地划分为方块，使之平均。这是管仲经济变革的一项基本政策，与“相地而衰征”并行，显然并非沿袭前制，而是新建制度，这就是意味着开始实行国家授田制，即将土地划分为整齐的方块，授之予民，然后根据土地肥瘠状况征收定额的实物剥削。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蔦掩书土田：度山林，鳩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渚），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文中“度”、“鳩”、“辨”、“表”、“数”、“规”、“町”、“牧”等均为动词，“井”字亦然。“井衍沃”一句，杜预注曰：“衍沃，平美之地，则如《周礼》制以为井田，……亩百为夫，九夫为井。”杜注依汉儒，本文亦不取。据前所说，“井”字作动词时是指按方块划分土地，“井衍沃”意即将平坦肥美之地划分为方块。楚蔦掩为改革军赋制度，将各种土地进行规划登记，其中平坦肥美之地被划分为方块，然后根据各种土地上的收入确定征收军赋的数量。这是楚国的一次经济变革，此类政策显然前所未有，而系新建。“井衍沃”作为一种新建立制度，也意味着实行国家授田制，即将

农耕良田平均地划分为方块，授之予民，然后征收实物剥削。

《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杜预注“庐井有伍”曰：“庐，舍也。九夫为井，使五家相保。”此亦依汉儒，解“庐”为“舍”，即“家”，解“井”为“九夫”，解“伍”为实行联保制，既然是联保，所谓“夫”显然是指人。这种解释本于汉儒“井田”说，又与“井田”资料相矛盾，当然不妥。《周礼》等文献谈土地时讲“夫”均指一定量的土地，而非指人。如《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此处之“夫”系划分田野所产生，当然是指一定量土地。《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考工记·匠人》：“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这里“夫”也都是指定量土地。《汉书·食货志》所言更清楚：“亩百为夫”。因此，这里被“伍”之的对象，当是以劳动力即人为依据的“庐”，和以一定量土地为依据的“井”，“伍”即强制编制。子产对土地的强制编制，《左传》同年后文即有说明，曰：“取我田畴而伍之。”这种编制，与《田法》的一项规定非常相似，可互为注解。《田法》曰：“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 州 而为州 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 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对“家”按一定数量强制编制为“里”、“州”、“乡”，对“田”，则以每人所受定额土地为单位，强制编制为“区”、“域”。子产的这项变革，与商鞅变法诸多相似之处：在土地上设置田界系统（“田有封洫”），划分为方块田，对劳动者人身和土地都予以编制，此种设计，似乎也是为了实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即国家授田制度。

这三条史料所反映史实都是一种变革，也就是说，其所立制度均为新设立制度，以前没有。它们都是按“井”字形状、也即方块形状规划土地，与此相应，都有赋税制度的改革，可以推测，这些改革都是实行国家授田制，或与之有关。

以本节对“井”字的解释来看其他一些将“井”与土地联系起来的史料，也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国语·鲁语下》：“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

井出 禾、秉刍、缶米，不过是也。”韦昭注：“其岁，有军旅之岁也。缶，庾也。《聘礼》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一作二百四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 。 ，六百四十斛也。” 、秉、缶三字除韦注外亦有他解。“ ，犹束也 ”（《周礼·秋官·掌客》郑玄注。）；又作 ，“ ，束也，或作 ”（《集韵》。）；“秉，禾束也”（《说文解字》。），“秉，把也”（《诗经·大雅·大田》“彼有遗秉”毛传。）；“缶，瓦器，所以盛酒浆”（《说文解字》。），“盎谓之缶”（《尔雅·释器》。）。此处之“井”，若依汉儒之说，以九百亩计之， 、秉、缶依韦注，即军旅之岁加征640斛禾、16斛饲草、16斗米，则数额太大，依后一解，即军旅之岁加征一束禾、一把饲草、一盆米，则数额太小，均不可信。若以一块方田，即一夫所受之百亩计之，则按后一解非常通达：军旅之岁在正常租税而外，再加征一束禾、一把饲草、一盆米。因此孔子称其少，曰“不过是也”。

《管子·侈靡》：“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田之众，制之。”尹知章注“断方井田之数”曰：“谓分人之地，每断定其方而立之田数，屋三为井也。”句中，断，“截也”（《说文解字》。），“段也，分为异段也”（《释名·释言语》。）；数，当解为常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杜注：“使器械有常数”；井，亦动词，“断方”与“井田”同义重复。此句大意即：将分割方块田的尺寸常数，定量军赋“乘马”所由征自的方块田数量的多少，确定为制度。这一方面将土地规整地划分为方块，另一方面又改革军赋征收制度，似乎也是实行国家授田制度，尹注“谓分人之地”，看来是恰当的。

即使以本节对“井”字解释来看《孟子》、《周礼》，也显得更为通畅、简明，并不发生矛盾。

《孟子·滕文公上》记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此“井”为动词，即问如何按方块划分土地。从孟子关于“为国”、“井地”的答复看，当时用以授田的方块田制已在实行，孟子认为它有两个弊病。一是行“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贡法，实即“相地而衰征”、“案田而税”之类，其弊端为“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岁，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一是田界混乱，“经界不正”，它带来的坏处是“井地不均（划分的方块田大小不一样），谷禄不平”。针对这

两个弊病，孟子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请”滕实行“方里而井”、即以九百亩为一大方块田的办法，以八家共受边长为一里的规整正方形田块的形式，防止暴君污吏“慢其经界”，以八家同养百亩公田的劳役剥削形式，消除定额实物剥削的弊病。由于这仅仅是个方案，因而他请滕文公和毕战酌情修改补充，“润泽之”。

《周礼·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井牧田野”，即按方块形状规划、分割、管理田野，九夫所受田是一个基本的方块田。这里，它与《孟子》并无不同，都是规划一个大的方块田，其内容为九百亩，其目的，自然都是为了使一夫所受百亩田平均、准确。

第六章 国家授田制的演化与最后消亡

历史是一个过程。只有在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变动的过程之中，历史才能存在。对研究主体来说，只有将对象和自己都置身于这样的过程之中，才有希望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充分、准确的描述和解释。本书已经就两周土地制度及其来源进行了讨论，但这还远远不够，要充分、准确地把握它，还需要对它的演化、消亡过程作一些探讨。笔者以为，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的国家授田制度，以种种形态一直延续至唐代后期，而宋初确立的、“不抑兼并”政策，形成的“田制不立”局面，方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要充分把握两周土地制度，必须对战国至宋代土地制度的变化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本章即试图对这一过程作一个粗线条的讨论。

第一节 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的崩溃——“使黔首自实田”新解

肇始于管仲、集成于商鞅的春秋战国大变革，确立了国家授田制度，那么，这种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呢？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颁布了一条重要法令：“使黔首自实田”，它便标志着战国国家授田制崩溃的开始。这个法令仅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由于秦代土地制度史料极缺，因而它显得特别珍贵，为当代史家普遍注意。正确解释它，对于把握战国到两汉土地制度的演变，填补其间的缺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诸说驳议

当代学者对这条法令的解释，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类。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法令是命令黔首向政府呈报自己占有的土地数额，目的是确定赋税，它意味着在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人所有制。郭沫若先生说：这条法令“就是命令有田的黔首向政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它标志着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权（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范文澜先生说：“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陈报所有土地实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土地个人私有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页）。杨宽先生说：这个法令“命令全国有田的人自报占有田地的实际数额，以便征收赋税，同时也就在全中国范围内从法律上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现行的各种教科书及有关专著基本上都取这种解释。

有少数学者将这条法令解释为使黔首自由占有土地。翦伯赞先生曾说过：“所谓‘自实田’，即自由占有土地之谓也”（翦伯赞：《秦汉史》1947年版，第35页。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校订者张传玺等先生将这句话改为：“所谓‘自实田’，即向官府自报占有的土地之谓也。”）。但他的观点后来似乎有所变化，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说这个法令使农民户籍中增加了土地占有状况的记载（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这意味着，他后来也认为这个法令包含有呈报土地数额的内容。任再衡先生认为，这个法令的意思是“让百姓开荒，扩充土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任再衡《“使黔首自实田”解》，《黑龙江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李福泉先生也解“自实田”为自由占有土地，但他怀疑这条记载的可靠性，认为秦代不可能实行自由占有土地的政策（李福泉《秦代实行过“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政策吗？》，《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笔者认为，这两类解释都难以成立，仅就文字上来说，它们都有“改字解经”或“增字解经”的问题。

先看第一类。这类解释将“实”解为“呈报”或“如实呈报”，查遍文献，“实”字并无呈报之义，古代汉语中是这样，现代汉语中也是这样。《说文》：“实，富也，从宀从贯。贯，货贝也。”段玉裁注：“以货物充于屋下，是为实。”这当是“实”字本义，它在使用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解为财，转义为器物以至爵禄之类。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聚敛积实”注：“实，财也”；《礼记·表记》“耻费轻实”注：“实，谓财货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注：“军实，军器”；《吕览·下贤》“既受吾实”注：“实，犹爵禄也。”一是解为充实，与空、虚、无、假等义相对，又转用为植物种子等义。如《玉篇》曰：“实，不空也”，《诗·小雅·节南山》“有实其猗”注：“实，满也”；《诗·召南·小星》“寔命不同”注：“寔，韩诗作实，云：有也”；《广雅·释诂》曰：“实，诚也”；等等。在现代汉语中，使用后一意义，解为充实，充满、真实等义。亦引申为植物种子。因此，解“自实田”为“自报田”，在文字上没有依据。

这种解释似乎是逐渐演化而产生的。自裴骃《史记集解》引述这条材料后，司马光《资治通鉴》引用了它，但未作解释。郑樵《通志·秦纪》引为“此年使黔首自实其田”，亦未作解释。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一》载录了这条史料，其按语曰：“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仍未加解释，只是主观地将这条法令的目的解为确定赋税。到清康熙年间，王之枢等编纂《历代纪事年表》，才给它添加了呈报的意思，其曰：“自实，令民自具顷亩实数也。”这个解释似为今日众说之始祖。它似乎是从马端临衍化而来的，既然要确定赋税，就要登记田产，要登记田产，又须使田主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这样，便产生了将“自实田”解为自报田产实数的说法。

再看第二类。这类解释解“自”为“自由”，亦出于杜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均无此种用法。《说文》：“自，鼻也，象鼻形。”此其本义，极少用，引申为己、从、率等。如《孟子·离娄下》：“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自即用为己；《诗·召南·羔羊》“退食自公”注：“自，从也”；《礼记·杂记》“客使自下由路西”注：“自，率也”；等等。因此段玉裁说：“此以鼻训自，……而用为鼻者绝少也，今义从也、己也，自然也，皆引申之义。”现代汉语亦用此引申义。可见，“自”

字并不含自由之义，解“自实田”为“自由占田”，在文字上也没有依据。

这样看来，我们必须对“使黔首自实田”重新作出解释，使之既在文字上有依据，又符合战国至两汉土地制度演化的历史。

二 真实含义

那么，“使黔首自实田”究竟应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由“鼻”之本义出发，按其引申义解为“己”，即自己。“实”，取其“不空”、“满”、“有”之解，即充实、充满、具有之义，用为动词（此处“实”若取“财货”之义，则只能用为名词，显然于句不通）。这样，“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命令黔首自己去充实（充满、具有）土地，即命令黔首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数额，自己设法占有足额的土地，国家不再保证按规定授田。这样解释，不仅在文字上没有矛盾，而且密合于目前我们对战国至两汉土地制度演变史的认识，填补了战国国家授田制与两汉较普遍的土地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缺环。

如本文第四章所讨论，国家授田制度是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然而，经过秦代，到西汉时期，战国类型的国家授田制度开始崩溃了，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在汉初，国家授田制仍在实行（[汉初实行授田制，目前尚无公开发表的明确证据，但据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前期墓所出竹简中有关授田的材料是“大量的”，有一些与秦简记载相似。我们希望这批资料能早日公布。](#)），并以授田型“假民公田”的形式延续了下去（[参阅高敏《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求索》1985年第1期。](#)），但是，以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为基本标志的土地私人所有制逐渐发展了起来，成为汉代社会土地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萧何“贱强买民田”（[《史记·萧相国世家》。](#)）开始，土地买卖史不绝书，武帝时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哀帝以后到东汉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那么导致这个重大变化的契机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就是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法令的颁布与实施。

战国国家授田制度本身存在着导致自己瓦解的因素。在这种制度下，社会总剥削收入在剥削阶级具体成员中的分割形式决定了一些人可以控制大量土地，他们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多，则国家实际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便使国家授田制的实施越来越困难。

在战国类型的国家授田制下，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社会剥削总

收入亦归国家，因此，剥削阶级具体成员对社会总剥削收入的分割表现为对国家总收入的分割，其分割形式可区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以官俸形式直接给予实物，如《商君书·境内》有“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之称，这是以官俸数量标志官职级别。一是直接分割国家的租税收入，如《商君书·境内》所说“税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就是指将这些劳动者原应交与国家的租税转交予受赐者。“食封”、“食邑”也是这种形式，即得到了征收封户租税的特权，因此，《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索隐》即解为“收其国之租税也。”秦汉分封承袭此制，故《史记·货殖列传》曰：“封者食租税。”第三，则是采取国家授予或赐予多量土地、同时给予役使定量劳动者的特权之形式，以分割社会总剥削收入。这种形式多用于军功授田之类。在这种形式下，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分割者仅仅具有占有权，他同时从国家那里获得控制相应劳动力的权力，其剥削所得仍是国家租税的分割。《商君书·境内》有两条材料，很值得注意。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衍字）除庶子一人。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

这就是说，具有杀死敌人一个甲士功劳的人，可以在原受田的基础上，再增授耕地一百亩，同时增加役使一个劳动力的权力。其庶子平时每月服役六天，恰为全部劳动时间的十分之二，与战国时期国家租税剥削率统一。如《孙子兵法》佚篇《吴问》说，晋之六家除赵而外皆“五税之”，即取什二之租税；《管子·大匡》曰：“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平均亦为十分之二。这种统一表明，得到增授耕地者实际是以劳役形式取得了庶子应交与国家的租税，仍然是国家租税的分割。

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因功授田或赐田数量急剧增加，规模越来越大。如：

(魏王)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爨襄田各十万。
(《战国策·魏策一》。)

(魏王对公叔痤)又与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百四十万。(《战国策·魏策一》。)

卫嗣君谓薄疑曰:……请进爵以子为上卿。乃进田万顷。(《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赵烈侯曰:)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史记·赵世家》。)

这类赐田给国家授田制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这些土地是否可以传予子孙,目前可见两类矛盾材料。有收回授田或赐田的记载,如《韩非子·诡使》“身死田收”,《韩非子·喻老》“(楚)禄臣再世而收地”,《孟子·离娄下》齐臣属离去,“遂收其田里”,《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甘茂出亡,田宅被收,后赐其孙甘罗。也有可传予子孙的材料,如《史记·王翦列传》“(翦)请园池以为子孙业”,云梦秦简《秦律杂抄》“战死事不出,论其后”(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46页。),《法律答问》“官其男为爵后”(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页。),皆讲子袭父爵之事,袭爵者当继承与其爵位相应的田宅。对此,我们尚难以得出完整结论,但至少他们是终身享用的。这样,便带来两个直接结果。一方面,国家实际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不得不停止对某些人授田。《商君书·徠民》说三晋“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者比比皆是。魏《户律》规定不给“假门逆旅、赘婿后父”授田。《管子·问》篇亦问曰:“群(原文为‘君’,据王引之、猪饲彦博改,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等等。另一方面,一批因种种原因被赐、授予大量土地的人手中有了可以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土地,从而造成劳动力从国家向

豪势之家转移，使国家授田制达不到其原定目的。《韩非子·诡使》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状况，它说，“陈善田利宅”，实行授田，是为了鼓励战士，但他们“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优先受田，受好田，这就造成“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役，而上不得者万数。”国家实际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可以控制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这样，国家授田制不仅失去了实行的条件，也失去了实行的意义，逐渐走向崩溃，而私人手中控制的土地和劳动力却越来越多，为土地私人所有制的形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后者需要取代前者的统治地位。“使黔首自实田”法令的颁布，便是这种社会变化趋势的表现。

“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正式宣布了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度崩溃的开始，国家不再按制度规定向黔首授田，黔首应占有的土地由他们自己去设法解决。这个政策，无疑给以土地自由买卖为基本标志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开放了绿灯，但它并未公开宣布土地私人所有为合法，也未放弃国家对社会土地关系的严密控制。这个政策的施行，便形成了西汉前期的所谓“名田”制度。

“名田”一称，始于商鞅，商鞅变法时规定：“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其内容，即以该家所处的等级地位，占有相应数额的国家授予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时所谓的“名田”，实际就是国家授田制的另一种称呼。它包含两层意思：一、占有国家土地者必须将自己的姓名、爵级等等登记于国家户籍；二、国家依此户籍对有名者按制度授予相应数额的土地，其中既有对一般劳动者的授田，也有对军功者增授的土地。因此，《商君书·徕民》说三晋许多人“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将户籍中的名与实际占有的田宅密切联系在一起。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名田曰：“以名占田”，正好反映了战国时期所谓“名田”的内涵。

西汉前期，仍然沿用了“名田”的名称，但其内涵已发生巨大变化，它显然指私人通过各种途径所占有的土地。如董仲舒所言：“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汉书·食货志》）；武帝时公卿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颜师古注：“一人有市籍，则身及家内皆不得有田也”（《汉书·食货志》）；哀帝时有司奏曰：“诸王列侯得

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汉书·哀帝纪》），这些都是称私人占有的土地为“名田”。所以沿用“名田”之称，说明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并未放弃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它作为一种土地制度，就是严格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武帝时为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曾专门颁布六条诏书，其第一条就是禁止“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其所谓“制”就是“名田制”。颜师古注释名田甚得汉代名田制精要，其曰：“名田，占田也，各立为限，不许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它不禁土地买卖，但严禁占田越出限额，如武帝时，乐平简侯嗣侯侈“坐买田宅不法”而死（《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可见，汉代名田制与战国不同，它着眼于按制度限田，而战国名田制着眼于依制度授田。国家保持对全部土地名义上的所有权，按照制度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这是汉代名田制的基本内涵，而这与本文所解释的“使黔首自实田”相符。自己设法依制占满土地，同时也就意味着私人占有的土地数额被严格限制在制度规定范围以内。这说明，汉代的名田制，正是“使黔首自实田”政策的延续和结果。显然，在这种制度下，土地私人所有制始终受到国家的限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那么，两汉发展较为充分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始于何时呢？《汉书·王嘉传》记王嘉奏曰：“（哀帝）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由此堕坏。”孟康注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顷数，于品制中令均等。今赐贤二千余顷，则坏其等制也。”这里所谓均田，即国家对私人占有土地数额依照制度按等级予以明确限制，其实就是名田。自哀帝开始，名田制度被公开破坏，此后史籍中不再见名田之称，土地私人所有制开始摆脱了国家的限制，有如脱缰的野马，迅速发展，成为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社会土地关系的主要内容。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战国至两汉土地制度演变的线索：随着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的逐渐瓦解，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宣布不再按制度授田；这条法令实施的结果形成了西汉前期的名田制，其特征是国家名义上具有全部土地所有权和依制限民占田；由于土地私人所有制的迅猛发展，名田制也逐

渐崩溃，自汉哀帝始，名田制公开废除，土地私人所有制开始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三 一条旁证

秦代的粮价变化，似亦可为上述解释提供间接旁证。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这条记载与“使黔首自实田”法令的颁布同年，它的出现显得很奇怪。战国至两汉，除楚汉之争时因战乱造成的经济破坏，使米价增至一石五千钱至一万钱而外，平时一般一石数十钱。战国时期李悝作尽地力之教，粮价按一石三十钱计算；《管子·国蓄》记粮价曰：“中岁之谷，粟石十钱。……岁凶谷贵，粟石二十钱。”秦代也是一石三十钱，云梦秦简《司空律》曰：“（系）城旦舂，公食当责者，石卅钱。”（[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88 页。墓主人喜秦始皇时为吏，死于始皇三十年，其所抄律文当是当时实施的法律，故断定此律中所记粮价是当时一般粮价。](#)）西汉自文帝以后，粮价平岁一石大致十余钱，宣帝时低至五钱，河西等边地粮价较高，但只有百余钱。元帝时积年饥荒，粮价暴涨，也不过“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汉书·冯奉世传》](#)）。相比之下，始皇三十一年粮价高得出奇。另外，查《始皇本纪》，记始皇年间灾荒变异者有十余处，其中如三年“岁大饥”、十七年“民大饥”、十八年“大饥”等，均未记粮价上涨之事。三十一年未见灾荒，而记粮价空前暴涨至一石一千六百钱。这个现象用灾荒之类难以解释，一是就《始皇本纪》来看，三十一年不见灾荒之类记载，有灾荒之年亦不见粮价记载；一是与西汉灾年相比，粮价上涨幅度过大。这件事可能与“使黔首自实田”法令的颁布有关。然而，按以前对这个法令的理解则很难解释：若是命令黔首呈报占田数量，则不改变现实的土地占有关系，从而不会引起粮价的过分上涨；若是使黔首自由开荒占田，则随耕地增加，粮价理应呈下降趋势。笔者认为，可以设想，由于国家宣布不再按制度授田，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土地、以及土地上生产的粮食马上成为奇货，商人乘机屯积居奇，利用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哄抬物价，由此导致了粮价的突然暴涨。

第二节 北魏均田制与战国授田制之比较研究

从宣王料民开始、经管仲改革、到商鞅变法，持续的变革造就了一整个时代，其结果是确立了以国家授田制度为标志的一整套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导致强盛秦汉帝国的历史与经济前提。以“使黔首自实田”为标志，战国类型的国家授田制逐渐崩溃，但是，国家授田制度并没有死亡，而是继续存在着，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一是国家设法直接保证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土地的结合，汉初仍在实行的授田制度，两汉授田型“假民公田”（参阅高敏《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求索》1985年第1期。他将汉代“假民公田”分为租佃制与授田型两类，认为授田型“假民公田”存在于西汉昭宣之后与东汉时期。）和屯田制度，曹魏屯田，北魏初年实行于代北的“计口授田”等等就是。一是国家以各种手段限制地主私有土地的发展，西汉的“名田”、“均田”、“限田”，王莽的“王田”试验，西晋的“占田制”等等就是。以这两种形态残存下来的国家授田制度在北魏有如火凤凰般复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数百年的均田制度，它导致了与秦汉帝国相媲美的强盛隋唐帝国。从北魏开始的均田制度并非少数民族从边地带入中原的新制度，实滥觞于战国授田制。从战国到隋唐，表面上看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曲折，其间是间断的，但表面的曲折与间断之下却是实质的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就经济关系和土地制度方面来说，应当将其视为同一个历史时期。战国授田制导致强盛秦汉帝国，北朝均田制导致强盛隋唐帝国，这两段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将这两种田制进行比较研究，寻其同异，究其规律，对于在历史过程之中理解和把握两周土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 北魏均田制与战国授田制之异同

如本文第四章所讨论，随着资料的逐渐丰富，我们对战国授田制度已经可以描绘出一个大概轮廓。北魏均田制度的实施，目前也为多数学者所公认，尽管在实施程度上还有不同看法。它的内容以法律形式集中反映于太和九年均田令之中（本节所引用太和九年均田令文字均据《魏书·食货志》，不再一一注出）。下面，笔者以太和九年令为主要基准，分十三个方面，简略比较两种田制的异同，同时试加以分析。

1. 受田单位与受田者年龄限制

北魏均田制：

以人为受田单位，分男夫、妇人两类。其年龄限制，“诸民年及课则受田”，男夫为十五岁以上至老免（七十岁），妇人未指年龄，据“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以及征收民调时规定“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并未言及未嫁者来看，当指已婚且配偶在世之妇女。

战国授田制：

有以户为授田单位者。云梦秦简摘抄《魏户律》曰：“（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92页。），可见立户为受田前提。所谓“家五亩宅，百亩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等等，都是以户为受田单位。也有以人为受田单位者。《田法》曰：“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即在以家为单位编制组成的行政区划“州”、“乡”中，按人授田，百人、千人所受田组成为相应的大块田地“区”、“域”。《管子》书中许多一夫百亩的授田记载，也是以人为受田单位。关于受田者年龄限制，《田法》有“（疑当为“年七十”三字）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

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简文整理者认为此处所言为服役年龄，似不妥。《汉书·食货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行文与此类似。且简文前半言“食于上”，恐不能以此称免役。此段后续文字为“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原文误植为“作”）四人作者亡。”其中之“作”更不能解为劳役，当指农作，因此，文中年龄解作受田年龄为妥。可见此处受全额田者限于十七岁至六十岁之间，十四岁至十六岁、六十岁以上（可能至七十岁）授以半田。

比较与分析：

名义上受田单位有人、户之差，但实质都着眼于劳动者人身。战国授田有以户为单位者，但这种户基本上是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小家庭。商鞅变法明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目的是以行政手段建立这种小家庭。云梦秦简《封诊式·封守》记“某里士伍甲”的家人共有夫、妻、子、女共四人，另有臣、妾各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页。），就是实例。这种小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一夫一妻，其农作的核心是一夫，因而，无论以一夫、以成年男女、或以户授田，实质上都是等价的。着眼于劳动者人身，才能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实现充分结合，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也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

2．授田数量

北魏均田制：

露田，男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依《通典》改“作”为“休”）及还受之盈缩”；桑田，初受田男夫二十亩；麻田，麻布之士另给男夫十亩，妇人五亩；榆枣之田，初受田男夫一亩。其中倍田情况复杂，一是桑田通入倍田分，一是“地狭之处，……又不足，不给倍田”，可见倍田的授予与否及数量依具体情况而定。更有甚者，不给倍田仍不足则“家内人别减分”。按此标准估算，桑乡一般情况下一夫一妻小家庭受田额较少者为八十一亩（露田男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桑田二十亩，榆枣之田一亩），较多者为一百二十一亩（再加倍田男夫二十亩（男夫露田倍田四十亩，其中二十亩以桑田充倍，故余二十亩。参见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妇人二十亩），平均大致在百亩上下。麻乡再另加

十五亩。

战国授田制：

一般也是一家百亩。“家五亩宅，百亩田”（《荀子·大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吕氏春秋·乐成》）；等等。有多授田类如倍田者，“邲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也有材料记为一夫授田百亩，“一农之量，壤百亩也”（《管子·臣乘马》）；“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权数》）；“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管子·轻重甲》）。

比较与分析：

两者大致都是一夫一妻小家庭受田百亩上下。北朝法定亩积依汉制，六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唐改为五尺步，但仍是二百四十步为亩。唐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旧唐书·食货上》。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一、附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战国期间，亩积则多有变化，因地因时而有不同。《孙子兵法》佚篇《吴问》所记晋六家亩积有一百六十步、一百八十步、二百步、二百四十步之别，秦相对于一般亩积有“小亩”，齐相对于一般亩积有“大亩”，但就最终统一六国的秦而言，由《为田律》及文献可见，其一般亩积为二百四十步，此种亩积大概随着秦并六国后的“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而逐渐普及于全国。如果以战国后期之秦与北魏相比，则亩积一致，授田百亩之地积亦一致。此种授田额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以汉代考察，一男丁一般大约可耕种田地四、五十亩。汉初，“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淮南子·主术训》），此数甚少，与不用牛耕有关。河湟屯田，“田事出，赋人二十亩”（《汉书·赵充国传》）；居延屯田，有“率人田卅四亩”（新出居延汉简72·E·J·C：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页。）；玉门屯田，有“班田七顷，给弛刑十七人”（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56页。），人均四十一亩，这些都有戍事干扰。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汉书·食货志》），看来一家有两个劳动力，即可治田百亩。北魏农业生产率大致也在此水平。太和元年三月丙午诏曰：“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魏书·高祖纪》），此

数略低，与上年耕牛因瘟疫死伤太半有关。太和九年令规定正常情况下授以倍田，一夫一妻授一百二十一亩，加进再倍田可达一百九十六亩，数量较高。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北魏人口稀少，土地荒芜，授田中包括大量耕休之地；二是均田令中有一些非常灵活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狭地授田也可不及百亩，甚至不仅不给倍田，最低者露田数也保证不了。战国授田制一般一家百亩，而《管子》书中多记为一夫百亩，这可能与齐地多大家庭有关，如有所谓“十口之家，……百口之家”（《管子·海王》）。这种家庭除主要劳力而外，必然有其配偶及其他人口，因而，一夫百亩之制实际上相当于给一夫一妻小家庭授田百亩。总之，这两种田制都试图使劳动者与充足的生产资料土地相结合，实现“人无遗力，地无遗利”。战国与北魏生产力水平类似，因而授田数也相近。

3．奴婢受田

北魏均田制：

露田、桑田、麻田、榆枣之田授还一如良人。受田奴婢人数是否有限制，未见规定。

战国授田制：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衍字）除庶子一人。”（《商君书·境内》。）对作战有功士兵，增授耕地百亩，同时给“庶子”一人，此“庶子”当为所益百亩田上之劳动力，实即百亩田为其而授。该授田额同于普通农民。商鞅变法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其中亦似有踪迹，即所“名”（商鞅时即为授予）田宅、臣妾与其家次匹配，这也就意味着该家所受田地与臣妾数量相对应，实际相当于给所占臣妾授予相应土地，这样，才能保证对臣妾剥削的实现。

比较与分析：

战国有关材料目前所见极少，其中“庶子”可类比于北魏奴婢。从此极有限材料可见，两种田制下奴婢受田额与普通农民相同。其目的，是保证作为奴婢的农业劳动力也能与充分的土地相结合。关于受田奴婢或“庶子”数量，战国时有限制，即由其主人家庭的政治等级

所规定。北魏均田令未见限制。据北齐河清三年均田令，可受田奴婢人数依官品有差；隋制“未受地者皆不课”，而炀帝继位时“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书·食货志》），可见已终止奴婢受田；唐对奴婢亦不授田。由此演化过程看，我们似乎可以说，北魏均田制存在着限制受田奴婢人数的潜在趋势。

4．耕牛受田

北魏均田制：

“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

战国授田制：

未见。

比较与分析：

北魏时予耕牛授田，为战国所无，这当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人少地多特别突出等具体因素有关。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到隋唐时，耕牛受田制度便被取消。

5．社会救济性质之授田

北魏均田制：

“有举户老小癯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癯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

战国授田制：

未见。

比较与分析：

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社会救济事业，战国亦当有，只是形式可能与北魏不同。《田法》所说“（疑当为“年七十”三字）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 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这就属于社会救济之类。

6．官吏受田

北魏均田制：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这种俸禄与班禄制下之实物俸禄互为补充。

战国授田制：

亦有此类俸禄田授收事例。“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韩非子·喻老》）；齐国臣“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离娄下》）；秦甘罗出使有功，“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与这类俸禄田并存，有实物俸禄，如秦有“千石之令”、“八百之令”（《商君书·境内》）等等；也有分食地税者，如秦“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商君书·境内》）。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授以官吏俸禄田，而且都作为俸禄多种支付形式中之一。俸禄田上的劳动力如何解决，不清。西晋称此类俸禄田为“菜田”、“厨田”，每给菜田一顷，同给田驺一人，给厨田一顷，同给厨士一人（《晋书·职官志》）。北魏、战国应当有某种类似解决办法。

7．田土买卖

北魏均田制：

一定程度允许土地买卖。对桑田，“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战国授田制：

如本文第四章所讨论，土地不可买卖。

比较与分析：

战国授田制下禁止土地买卖，北魏均田制下耕地的多数（露田、麻田等）也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这是两者的统一之处。不同者，是北魏均田制下桑田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买卖。北魏之前，土地私有制就有相当发展，北魏国家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因而制定土地政策时不能不予以充分考虑。

8．还田规定

北魏均田制：

“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超过限额者亦如之，“于分虽盈，（以下依《通典》删去“没则还田”四字）不得以充露田之数”。露田及麻田，“老免（七十岁）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俸禄田“更代相付”，职去则田还。

战国授田制：

由《田法》可见，年六十以上仅受半额田，即归还半额田，可能到七十岁时，归还全部受田。也有身没则还田的记载，“夫陈善田利宅，所以厉战士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收”（《韩非子·诡使》）。俸禄田如第6条所引资料，也是职去则田还。

比较与分析：

除桑田外，两种田制下的土地归还都是以失去劳动能力为标准。其目的，仍然是使定量的土地与相应的劳动力相结合，以创造剩余产品。北魏均田制下桑田不还，这自然是土地私有制已有相当发展的表现。

9．授田顺序。

北魏均田制：

“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

战国授田制：

一方面，对农民授田实行定期更换制，“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恶（恶）

均之数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另一方面，以政治等级爵秩决定受田的顺序，“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优先考虑政治等级地位高者。

比较与分析：

北魏均田制下授田“恒从所近”，是为了便于生产。“先贫后富”，则含有抑富扶贫的意思，目的是维持一个较为广泛的小农阶层的存在。战国授田制采取授田定期更换的制度，意图在使授田良恶趋于平均化，并不包含抑富扶贫的意思。它不仅在授田时优先考虑政治地位高的人，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惩治贫穷者。云梦秦简摘抄《魏户律》规定“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92页。）赘婿一般系因贫穷而出赘，《汉书·严助传》曰：“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汉书·贾谊传》也说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后父，当即赘于有子寡妇之赘婿，都是贫穷者，而《魏户律》竟然规定不给他们授予田宇。商鞅还明令“事

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其目的则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发展。两种田制间的这个差别，表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它已经懂得了，把剥削比率和阶级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不至过分激化，对于维护剥削者整体的长远利益，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存在都具有重要意义。

10．设立严密户籍

北魏均田制：

建立三长制(三长制建立与均田制实施的时间先后，文献记载矛盾而不能决。此处取韩国磐先生的一种推测：“颁布均田制只是先公布法令条文，待次年立三长、括户口后，才实际上进行均田工作。”)(《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此说较合理，因为没有严密的户籍，均田制是难以实施的。)，“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靠此三长，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督租课。检括户口，必然要设立严密户籍。早在平城计口授田中，就有设立严密户籍之举，拓跋晃明令：“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魏书·恭帝纪》)。要使户籍严密，就需在一定范围内禁止人口迁徙。太和九年令规定：“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战国授田制：

商鞅变法时即设立严密户籍，“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而且经常检阅，“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管子·度地》)，“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管子·立政》)。另外，设什伍联保制控制民户，“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立政》)。亦禁止随意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擅徙者及其帮助者被处以刑罚，“逃徙者刑……”(《管子·治国》)。云梦秦简中有规定，迁徙者必需得到官府批准，有帮助故秦人出境者，削籍，处以鬼薪、城旦的刑罚，即三至五年苦役(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130页)。

比较与分析：

两种田制实施中都设有严密户籍，这是实现国家授田制度的基本前提。不同的是，战国授田制下对劳动者人身的控制更为严密，控制手段也更加多样。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诸雄并立、竞相争夺劳动力等原因而外，早期国家授田制下实现剥削的依据更侧重于控制劳动者人身，这是更基本的原因。

1 1 . 国家对生产的直接干预

北魏均田制：

其一为督促、强制农民生产。太和九年令有“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实早在平城计口授田时，拓跋嗣就有劝课农桑之敕令：“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辛亥诏更严厉：“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魏书·高祖纪》）。均田令颁布后仍然如此，太和二十年五月丙子诏“令畿内严加课督，惰业者申以楚挞，力田者具以名闻”（《魏书·高祖纪》）。此类政策，为北魏代北计口授田后之惯例。其二为规定必须种植一定量的某些农林作物，在桑田上，“课蒔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蒔榆、枣。……限三年种毕”；另“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这是对生产的具体组织。其三为某种程度解决生产困难。如解决耕牛缺少问题，太和令虽无规定，但早在平城计口授田之时，拓跋晃就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魏书·恭帝纪》），此类政策当有某种延续性。

战国授田制：

首先，也是督促、强制农民生产。《田法》、《王法》等篇规定，一岁受田收获粮食少入百斗、二百斗、三百斗者，分别处以罚为公人一岁、二岁、黥刑以为公人的刑罚；家中没有一定数量的余粮、余布帛，亲属死不得殓，不得以衾复尸（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 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类似规定，战国文献记载很多。其二为设平余法保护农民免受商人盘剥而破产。李悝曾针对“余贵伤民，余贱伤农”的情况，设平余法，由国家组织适时余粟，平衡粮价，“取有余以补不足”（《汉书·食货志》）。其三为某种程度解决生产困难，向农民提供籽种、铁器、耕牛（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

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4、43、32、30 页。》。

比较与分析：

国家授田予民的目的在于从农民身上获得剥削和国税收入，而生产状况则直接影响到这种收入的实现以及实现水平，因此，在北魏均田制和战国授田制下，国家都积极从各方面干预生产活动，强迫农民尽力去从事生产，如果说两者的区别，那么，战国时期的国家对生产的保护似乎更有力一些。

1 2 . 鼓励开荒

北魏均田制：

“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蒔。”“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

战国授田制：

商鞅变法竭力扩大农业生产，他以及其后继者明确主张，“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商君书·算地》）。因而“以草茅之地，徠三晋之民”，“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商君书·徠民》），用以开垦荒地。《商君书·垦令》每项政策之后都曰“则草必垦也”，说明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使荒地得到开垦、农业得到发展。不仅秦如此，战国齐人作品《王法》曰：“凡欲富国殽（垦）草仁（仞）邑，必外示之以利，内为禁邪除害”（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也是将垦草同富国、仞邑并列视为国家大事。

比较与分析：

两种田制都鼓励开荒，发展农业生产。在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这极为正常，因为这样可以扩大生产，从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产品。

1 3 . 国家剥削

北魏均田制：

以户为基准取之，为定额。“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

下至牛，以此为降。”未明言徭役数量，但肯定并非轻缓，例如均田制推行十余年后的宣武帝年间，“民多绝户而为沙门”，李瑒上奏言曰：“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魏书·李孝伯传附李蟠传》）。民为避役而抛弃父母，成为沙门，可见徭役之酷重。

战国授田制：

以受田额取之，有定额制与分成制。云梦秦简有“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无鬲（垦）不鬲（垦），顷入刍三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此为定额制，战国齐国的“以田亩籍”（《管子·国蓄》）。入“案田而税”（《管子·大匡》。），即为此类。《孙子兵法》佚篇《吴问》记晋之六家除赵而外，皆“伍税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孙子兵法 残简释文》，《文物》1974年第12期。），取什二之租税，此为分成制，商鞅变法定“訾粟而税”（《商君书·垦令》。），亦此类。此外，还有军赋，“以县小大为赋之数也，车可用者，大县七十乘，小县五十乘”（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有人头税，商鞅变法之后，“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有类如北魏户调之布帛的“布缕之征”（《孟子·尽心下》。），等等。另有“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亦未见定制，然适逢战乱之时，徭役必然酷重，且征发不时，例如秦、赵长平大战时，秦将河内之民凡十五岁以上者皆征发投入战争，对此，董仲舒曾说，商鞅变法后“力役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

比较与分析：

两种田制下的国家剥削虽然形式多样，征发依据在形式上亦各不相同，但由于对农民授田有定制，因而在保证基本授田额的情况下，根据授田额或农民人、户征收国家剥削，其实是等价的。如果说区别，战国时还采用一定的分成制剥削，表明国家对生产活动干预较深，而北魏则完全取定额剥削，国家对生产的干预已逐渐浅化。

二 北魏均田制与战国授田制异同之分析

由于材料仍然有限，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北魏均田制和战国授田制进行完全充分的比较研究。但是，仅仅从上述有限材料的排比和分析中，已经可以大致看出，这两种田制的根本性内容是一致的。它们的基本精神，就是试图将社会基本剥削关系规定为以国家和农民为两极的简单关系，在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通过国家授田的方式，使农民和与其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定量土地结合起来。从而维护和促进社会生产，同时使剥削得以实现。

这两个时期土地制度的一致性，起码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北魏社会和战国社会，两者经济发展条件的主导方面大致类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从而确定了本质上一致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其法律表现形式。如果这个推论能站住脚，那就意味着必须重新研究战国至唐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土地所有制形式，重新把握这段表面看来似乎并不统一的历史。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它在经济上的基本成果之一，就是国家授田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它把社会剥削关系规定为国家和受田农民两极之间的关系。被剥削者不再以集团形式出现，而是分化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小家庭。国家对被剥削者的控制也不再终止于“族”、“邑”之类公社，而是深入到了其“夫”与“家”，凭借国家权力，通过授田制度保证被剥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的充分结合，从而保证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保证社会剩余产品与剩余劳动的顺利形成。而每个具体剥削者的剥削收入，则表现为国家剥削的分割。或根据政治地位的高低（爵秩），占有一定的劳动力（臣妾之类）和相应数量的土地，据此获取剩余劳动。或依据官职和军功，直接从国家剥削收入中分割得一部分，如所谓食俸若干，“税邑”若干家，“赐邑”若干家，等等。

相对于自宋开始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那种土地私有制充

分发展的状况而言，我们可以说，战国至初唐是一个有“田制”的时期，也就是说，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予以强力干预的时期，特别是其中以种种措施保证直接生产者农民与相应土地实现结合的那一部分，更表现了国家干预程度之深。战国授田制所开始建立的国家直接干预全社会土地所有权的制度，在战国之后以两种不同方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直延续了下去。

一种方式，是国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各种方式授田予农民，保证一批小农（即国家控制的劳动力“编户齐民”）的存在。西汉，有“假郡国贫民田”，“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汉书·宣帝纪》），有边地由徙民而非单纯兵士开发的屯田。东汉，有“悉以公田赋与贫人”（《后汉书·樊宏传附樊准传》），也有徙民开发之边地屯田。三国，曹魏广行屯田，几乎遍及全境，吴、蜀也不同程度经营屯田。西晋，有占田制，它规定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晋书·食货志》为：“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通典》无“外”字。笔者以为从当时生产力水平看，当从后者，即无“外”字，课田包括于占田之中。），这就需要国家授田予民，而看来当时确实进行过授田（西晋占田制是否实施，看法不同，史书中相关材料极少。史籍未明确记载占田制颁布时间，但指明在“平吴之后”（《晋书·食货志》），灭吴之年为太康元年，该年民户为二百四十六万（《晋书·地理志》），太康三年猛增为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注引《太康三年地记》），两年增长一百三十一万户，此当为占田制实施的有力佐证。），《晋书·食货志》明确谈到：“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东晋南朝历朝都有授田之举。如晋，安帝时“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赐贫人”（《晋书·安帝纪》）。如宋，文帝时“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迁于京口），给以田宅，并蠲复”（《宋书·文帝纪》）；刘劭曾令，“田苑山泽有可弛者，假与贫民”（《宋书·二凶传》）；孝武帝亦下诏曰：“诸苑禁制绵远，有妨肄业，可详所开弛，假与贫民”（《宋书·孝武帝纪》）。如齐，郁林王曾诏令“御府诸署池田邸治，……于今无用者，详所罢省，公宜权禁，一以还民”（《南齐书·郁林王纪》）。如梁，武帝曾诏：“其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梁书·武帝纪》）。如陈规定对北来流民，经州县甄别后，“良田废村，随便安处”，“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陈书·宣帝纪》）。十六国，亦间有授田记载，成汉李班向李雄建议，以“垦田

均平，贫富获所”，来改变“贵者广占荒田，贫者殖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的局面，李雄采纳了这一建议（《晋书·李班载记》），实施这一制度，则必然有授田；前燕慕容皝亦曾下令“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晋书·慕容皝载记》）。北魏自拓跋珪始，首先屯田于柘阳塞外，然后又迁徙大批吏民至京师平城，“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魏书·太祖纪》），拓跋嗣时又徙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魏书·太宗纪》）。

另一方面，国家竭力阻止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抑制兼并，以保护小农的土地占有。西汉武帝时，初设刺史，其职责为“六条问事”，第一条即“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汉书·百官公卿志》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同时抑制商人兼并土地，“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史记·平准书》）。哀帝时，国家曾试图限制私有土地的过份发展，“有司”提出无论贵族平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贾人皆不得名田”（《汉书·哀帝纪》）。王莽的王田试验，则打算将已被地主兼并的土地没收而成为国有土地“王田”。东汉光武帝之“度田”亦对地主占田数额作出明确规定，这从刘隆所说可以清楚看出，其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后汉书·刘隆传》）。所谓“制”，即国家有关占有田地的制度，实即占有田地的限额。西晋占田制规定了各个政治等级地主占田的最高限额，“国王公侯……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官员“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田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九品十顷。”（《晋书·食货志》）东晋时虽未见关于占田具体限额的记载，但荫客制中的一些规定仍表现出国家对大地主的限制，其曰：“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官品第六以上，并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一人。”（《隋书·食货志》）对地主所控制劳动力的直接限制，便限制了其剥削收入，其实与对其占有土地的限制等价。刘宋大明年间，亦曾规定占山限额，“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宋书·羊玄保传附羊希传》）

上述两条演变线索的汇合，成为北魏均田制产生的历史前提。北

魏均田制是战国授田制的必然延续，两者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是两种田制在根本上一致的直接原因。

有人认为，北魏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非常奇特的土地制度”，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而带来的氏族制土地制度，“由于落后民族的入侵，使中国北部的经济生活竟倒退了两千年。”（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56、362 页。）这种看法难以成立。从理论上讲，暴力征服必须在根本上服从经济发展的制约，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暴力征服，除了个别情况下由于驱走或杀光某个国家的居民，使社会经济大倒退而外，绝大多数情况下，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99 页。）北魏自拓跋珪进入中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北史·贺讷传》），同时实行屯田和计口授田，就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到孝文帝太和年间，行均田，立三长，改租调，全面推行了以汉化为基本内容的改制。这段历史，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论断。不是拓跋鲜卑把均田制带入了中原，而是在征服过程中，拓跋鲜卑学会了并发扬光大了中原汉民族社会的授田与限田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了国家授田制度。因此，它才能持续三百来年，成为强盛隋唐帝国的经济基础。自然，拓跋鲜卑氏族制组织及其习惯，曾为国家授田制的重新发扬光大创造了便利条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在于国家授田制存在的历史延续性之中。

当然，北魏距战国六七百年，社会经济状况毕竟发生了许多变化，复活了的国家授田制度必然带有新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相当程度上允许土地买卖，这表明，土地私有制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奠定了相当牢固的基础，地主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个基本阶级，国家制定的土地制度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地主阶级出于其固有的贪欲，总是希望土地私有的发展，以使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土地，从而获得更多的剥削收入，而国家则出于稳定整个社会秩序、维护剥削阶级的长远利益，必须限制这种贪欲，把阶级“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以避免地主阶级“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马克

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4页。）。地主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左右着战国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形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矛盾的发展，矛盾两方面的平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最终形成了宋代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从而开始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第三节 国家授田制的最后消亡与较充分土地私有制的形成

在均田制中复活了的国家授田制度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就像“使黔首自实田”宣布了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度崩溃的开始一样，唐代的“两税法”也宣布了均田制消亡的开始。宋代则完成了自中唐以来的土地关系变化，最后结束了自战国一直到唐代国家机器以行政手段积极干预社会土地关系的状况，开始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关系发展新时期，并使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这种新的土地关系，以往论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宋代的不抑兼并政策造成生产者同生产资料更进一步的分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趋深刻，从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历史现实中，虽然我们看到的宋王朝是“积贫积弱”，但这仅仅是在国家财政和对外关系上而言，其主要原因实际是宋王朝在经济繁荣基础上的政治腐败。宋代人口相当于汉、唐两倍，赋税收入“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一《外稿·财总论二》），但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都被腐败的宋政府浪费殆尽，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在对外关系上屈膝投降。但是，这并不反映社会经济本身的停滞或衰败，相反，宋代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这种状况当然与土地关系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宋代土地关系对整个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是又一个重大题目，本节只能就其与两周土地制度有较密切、较直接联系的部分作简要讨论，以交待清楚从战国形成的国家直接干预社会土地关系之制度的最后消亡。当然，讨论仍然必须从两周说起。

一 国家、地主、农民三角关系的形成

由前述讨论可见，从宣王料民开始直至战国时期国家授田制的充分形成，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特别是在其核心与基础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之中，变化剧烈、深刻的方面在被剥削者一极，他们从“族”“邑”等形式的公社开始，经历了书社这一中间形态，最终变化为以“家”为单位的个体小农。而剥削者方面，尽管在社会大变革中其具体成员浮降不定，贵者贱，贱者贵，富者贫，贫者富，但作为剥削者这一极，其基本存在方式和结构并无多大变化。这一极的特点，是其中成员同时具有剥削者与统治者两重身份，也就是说，凡是剥削者，他得以成为剥削者的基本前提是他又作为一个统治者，而统治者之一员又必然就是剥削者，贵者必富，富者必贵。因此，就整个社会的剥削者这一极来看，它表现为国家，而且社会总剥削也是以国家租赋徭役为基本表现形态。当中央集权国家尚未形成时，一个个独立性较强的权力体系同时就是其统辖范围以内剥削者一极之整体，而当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以后，这个国家就是其统辖范围之内的剥削者整体。至于每个具体剥削者的经济收入，不管其形式有何种差别，都是从国家剥削整体收入中以各种形式的分割，其前提，就是他同时又在国家体系中扮演着某种角色，如王侯、官僚、吏员等等。

然而，在这个时期，始终有一支游离于社会基本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之外的力量——商人，从十二牛救国之弦高、孔子弟子子贡直至受到秦始皇礼遇之巴寡妇清。他们并不直接参预到国家对农民的剥削之中，但他们通过经营工业，对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奴婢进行剥削，通过经营商业，从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收入中进行分割，从而成为最早的富而不贵的阶层，尽管其中个别人曾得到国家的特别礼遇，如乌氏倮被秦始皇令“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为秦始皇器重，“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自战国至西汉，商人始终是国家所压抑的对象，抑商政策层出不穷，抑商思想一直是经济思想之主流，其原因，就在于商人始终是社会基本经济结构

中的一个异己力量，对社会基本经济关系始终构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当他们将手伸向土地的时候，这一威胁就显得尤为突出。而自从秦始皇实行“使黔首自实田”政策之后，商人购买土地开始具有了条件，于是，威胁便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迫使国家采取更为强烈的措施，汉武帝时实行的告缗政策便是一例。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

但是，这种政策只能暂时解决问题，无法根治，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商人开始将其触角伸向政治领域，一方面，商人凭借其经济力量设法谋取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官僚也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将手伸向工商业领域，大发横财。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集官僚、地主、商人甚至高利贷者为一身的社会阶层，他们贵且富，表面看来似乎与社会基本经济结构并无冲突，但实际上，他们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与在经济结构中并不一致。在政治结构中，他们是国家官僚，其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国家的存在，保证国家顺利调控社会各阶级关系，以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在经济结构中，他们又是地主，经济身份必然导致他们从事直接依据土地的剥削活动，而不再经过从国家总剥削收入中进行分割这一中间过程，因而又成为国家的异己力量，成为国家的对立面。具有政治身份的地主阶层一经形成，便会影响整个社会，与此相应，很快便会形成不具有政治身份但仍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层。

当然，最初与国家对立而又属剥削者一极的经济力量不只是商人，还有贵族官僚本身，他们同样是对立统一体，他们的政治职能是维护国家的存在及其正常运转，然而在经济上，为贪欲所驱动他们总是试图削弱国家，以由此获得更多的剥削收入。这种现象自战国便已产生，如《韩非子》有如下言论：

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韩非子·备内》。）

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而上不得者万数。（《韩非子·诡使》。）

他们在农民被国家加重负担的过程中致富，收容隐匿应由国家控制的劳动力，在经济上已经明显是国家的对立力量。这一支力量也是与国家对立的地主集团形成来源之一。

独立于国家之外直接依据土地进行剥削的地主阶层的形成与壮大，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两极变为三极。原来是国家与农民两极，农民提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国家获取这些，然后通过各种形式的二次分配，再达到各个剥削者具体成员手中。现在是国家、地主、农民三极，被剥削者的农民没有大的变化，剥削者却分化为两极。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限定下，在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条件的限定下，社会所能提供的总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是确定的，那么这些东西如何分配，便在国家与地主之间导致尖锐矛盾。两极的比较简单的矛盾关系，转变为比较复杂的三角关系，其中的每一极都与另外两极发生矛盾，一方面，它制约着其他两极，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另外两极的制约。这种三角关系决定了从两汉直到清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

地主是其中的一极，形成一大经济利益集团，其共同特征是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并以土地所有权作为剥削农民的重要依据。当然，仅仅有土地所有权还不足以成为地主，还必须使农民——不论是依附农民还是自由的租佃农民——在他的土地上耕作，从而生产出剩余产品或支付剩余劳动，地主身份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吸引和控制农民是地主存在的必需重要条件。在后期较自由租佃关系形成之后，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于控制农民并实现剥削来说是主要条件，但在早期，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相对于控制劳动力来说并非处于绝对主要的地位，大部分时候和情况下，通过人身依附关系直接控制农民人身比占有土地重要得多。地主要剥削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必然要与之发生矛盾，受到他们的抵制与反抗。另外，地主作为土地私有权的人格化，必然对地产有着无限的追求欲望，所谓“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

求田问舍”(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而获得更多土地的办法只能是兼并自耕农土地，这样，潜在和现实的威胁又使之与自耕农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与此同时，地主又必然与国家发生尖锐矛盾，虽然从本质来说，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它必然要为剥削者服务，例如唐太宗就曾坦率地对臣下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贞观政要》卷六《论贪鄙》)，宋代文彦博也赤裸裸地说：国家“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职役考》)但国家的首要职能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以使之稳定存在。由于对一个确定的社会来说，其所可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在总量上是确定的，因此，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职能，就是控制社会总剥削量，使之不致超限，尽量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避免因过量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而使社会崩溃。地主的剥削欲望是无限的，这与国家控制必然形成尖锐矛盾。另外，国家本身并非一个虚幻的存在，它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现实机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只能从国家那里得到实现。同时，国家本身的运转也需要物质条件，因而国家也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两种利益以国家经济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试图从社会剥削总量这一蛋糕上切得尽可能大的一块，这也必然与地主发生尖锐冲突。

农民是其中的又一极，也形成一大经济利益集团。农民中包含不同的阶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形态不断发生变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生活资料来源于自己的劳动，同时以不同形式和份额为社会提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他们为自己的农民身份所决定，必须从事农业生产，而为此就必须与一定量的土地相结合。对农民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他们拥有所结合土地的所有权，由此成为自耕农，然而更多情况下却是必须付出若干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换取与定量土地结合的权力，后种形式可以是自由的租佃农民，也可以是附加有不同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看，自耕农当然不会受到剥削，他们必须支付赋税，但这属于国税范畴，而且表面看来自耕农在中国古代大量存在，但实际上，真正的自耕农较少存在，特别是在宋代以前，他们往往除了必须缴纳国税而外，还必须在国家赋税的名义下缴纳大量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以今天的常用概念

来表述，即地租，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自耕农——特别是宋代以前的自耕农，实际上依然是国家的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无地农民或缺地农民要实现与相应土地相结合，就必须向地主缴纳地租，接受其剥削，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至于自耕农，虽未直接受到地主剥削，但地主的兼并趋势使其受到严重威胁，二者的矛盾也是必然的。另外，租佃农民也好，依附农民也好，自耕农也好，他们都要接受国家的剥削，因为国家收入不光是国税，还有类似地租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皇室、贵族、官僚，他们从国家所获收入中只有一部分属于职俸范畴，另一部分属于剥削收入。当一个王朝开始时期，政治清明，国库充盈，那么国家剥削一般还可以为农民所接受，而到王朝后期，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国家剥削越来越重，农民与国家矛盾便急剧尖锐，甚至发展为严重社会危机，导致社会秩序崩溃，爆发农民起义。

国家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第三极，它是游离于地主与农民两大利益集团之外、又凌驾于其上的一种经济力量和利益集团。它首先表现为一整套国家机器，它必须起到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职能，为此，它必须有确定的经济收入，这便是国税。同时，国家又表现为由皇室、贵族、官僚等一部分具体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作为剥削者和统治者，必然要从农民身上获得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但表面上，这部分收入表现为国家赋税徭役的分割。这样，国家机器本身的经济利益和组成国家机器那部分具体的人的经济利益融合起来，形成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当然要与地主利益发生冲突。首先，国家职能要求地主必须把剥削量控制在一个恰当的范围之内，避免因超限而导致社会崩溃，但这与地主的本性是相冲突的。其次，无论是地主的剥削收入，还是国家的租赋徭役收入，都是农民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分割，在确定的社会里，剩余价值总量是确定的，谁都想分得更大的份额，因而国家与地主的冲突也是必然的。国家利益当然也要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国家毕竟是无偿地从农民那里攫取着国税以及国税以外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

矛盾机制本身就是制约机制。在三极结构中，每两极之间存在的矛盾，同时也是互相制约。如果仅仅是地主与农民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制约，那么其间的均衡很难维持，矛盾的发展必然使其中一方逐渐增

强而另一方削弱,最后在不均衡条件下导致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崩溃。但是在三角形的关系之中,就很容易达到一种均衡关系,因为每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力都会通过第三方这一中间环节又反过来作用于自己,形成对自己的制约。例如,地主对农民的过量剥削,必然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影响社会稳定程度,从而迫使国家对地主剥削予以限制,使其局限于正常限度之内。这三大利益集团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好像三条边构成的三角形,三角形决定了三条边的稳定性,而三条边也决定了三角形的稳定性,中国古代自汉代开始的社会稳定性实质就是这个三角形的稳定性。

二 国家调控经济方式之转变

一定的剥削要能够存在，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剥削关系包涵于其中的生产关系——或者再宏观一些说，经济结构——能够存在，生产关系的稳定存在需要一定的秩序，而且生产关系本身也就是一种秩序，因此，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关系到社会本身的存在，对一定的剥削关系来说当然至关重要，无序状态无法使具有确定结构的社会存在，当然也无法使确定形态的剥削存在，而维护秩序，这便是国家的首要职能。恩格斯曾经对国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在于调和阶级矛盾，而不是镇压某一阶级，因为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存在的各主要社会阶级，互为存在依据和条件，其间的均衡对各个阶级的存在都必须的，一方面过分削弱，打破平衡，必然会危及另一方面的存在，只有在“秩序”之中，才能使各阶级都得到正常的存在。当然，在社会各阶级中，总有一个阶级处于主导的方面，国家不能不表现和维护这个阶级的主导地位。

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同时又作为一大利益集团的国家究竟是怎样实现这一职能的呢？毫无疑问，这一职能的实现是与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相统一的，也就是说，国家在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了其社会职能，而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同时又实现了其经济利益。从国家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其社会职能的实现，可能更为方便和清楚。

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税收，一是经营。税收包括实物、货币、劳役。观察税收演变史，唐两税法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人头税为主，此后，财产税为主。均田制、占田制下，法律明文规定租赋徭役以人头为基本征收依据，即使在两汉，人头税仍然是主要部分（马大英先生算过一笔帐：据历朝垦田数和户数统计，汉代农民平均每户耕作土地约在67.66~79.24亩之间，姑以70亩计之；平均亩产据仲长统“今通肥境之率，计稼穡之入，令亩收三斛”（《后汉书·仲长统传》），平均以三石计之；平年粟价以30钱计之；则每户农民粮食生产总收入折钱6300钱。税收中田租（以三十税一计）为210钱；以一户五人计，其中应纳算赋者以2/3计，则须交400钱；应交口赋者以1/6计，须交19钱；服役者以每户1.5人计，过更折钱450钱，践更折钱1500钱。以上各项合计2579钱，已占自耕农总收入的40.93%（马大英：《汉代财政史》第二章、第三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上述数据尽管可能还有可讨论之处，但已足反映两个事实。一是国家租赋徭役征发繁重，其中显然已不仅是后来意义上的国税，而还包括一部分类似后来地租的剥削收入。一是人头税在赋税徭役中占有绝大部分，其与地税之比为11.28比1。）。唐两税法之后，财产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内容，两税中的地税依亩征收，户税依户等征收，而划分户等的依据是该户资产的多少。尽管宋代之后增加了种种以身丁为对象而征收的杂税，总名之“丁口之赋”，其中包含有人头税内容，但也不尽然，如明代丁役并不单纯以人口计算，而是“量地计丁”，有地一顷，征丁一名。同时，从明代的“一条鞭法”到清代的“摊丁入亩”，人头税一次又一次被并入财产税之中，清雍正年间的“地丁合一”终于最后废止了人头税。

国家经营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两方面。农业方面主要表现为在屯田、营田、官庄、学田等土地上对农民的各种类型的剥削。农业方面的经营有时规模相当大，收益也相当多，如明初洪武年间全国屯田数为893000余顷（《明史·食货志》：“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余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余顷。”），永乐年间虽低于此数，但估计相差不至太远，永乐元年（1403年）所收屯田子粒为23450799石；同期民间垦田约400余万顷，所收田赋米麦为31299704石（梁方仲：《中国古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360、186页。），多出屯田所入仅三分之一。工商业方面的经营

则包括各种专卖经营，如汉代的盐铁酒专卖，宋代的盐茶酒矾专卖等，也包括一般商品经营，如汉代的均输平准，既收到了平抑物价、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又为国家获取了一定的商业利润。

国家正是在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在以人头税为主要税收的时期，控制人口是国家利益实现的基本前提，因此国家以赋民公田、占田制、均田制等等措施扶植、维护小自耕农的存在，同时又以赈济等行政措施救援破产、流亡农民。与此同时，还以各种方式限制、清查地主占有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地主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直接劳动者农民，从刘秀“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之“度田”，一直到隋代之“大索貌阅”，都是这一斗争的表现。而争夺的最有效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国家剥削过重，农民则逃亡成为地主的隐户，相反，则农民又从隐户变为编户。正是在国家与地主的这种斗争关系中，农民所承受的剥削被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国家、地主、农民三大利益集团的关系在一定秩序之中稳定了下来。在以财产税为主要税收的时期，控制实际垦田数额是国家经济利益实现的基本前提，因此国家以种种方法与地主的隐冒土地进行斗争，从王安石“方田均税法”，张居正丈量全国田亩，一直到清代编制《赋役全书》和鱼鳞册。在保证税收的获取、从而使自己经济利益得到实现而外，国家没有必要再去过多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社会经济在自运转过程中实现了自平衡。由于怎样使现有财产带来更多的剩余产品成为关键，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千方百计吸引劳动力，例如宋代在佃户较缺乏地区，每有农民流徙而来，地主“争欲得之，借贷种粮与夫室庐牛具之属，其费动百千计，例不取息。”（薛季宣：《浪语集》卷十七。）而且平时还须尽量“抚存”，“富户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在这种关系之下，国家通过财产税获得了较稳定的收益，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地主之间互相争夺劳动力而达到平衡，使社会剥削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从两汉直到清代，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三角形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是以两税法为界，国家与地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说国家与地主分割社会总剥削收入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

化。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手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控制、争夺劳动者人身，转变为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即以财产税为基本税收内容，解脱农民人身依附关系，让地主与农民在自由的斗争中自我调控。宋代土地关系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

三 宋代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

两税法将税收依据从人头转变为财产，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剥削关系实现条件的转变，也就是说，剥削的主要依据从控制人身转变为控制生产资料。然而，剥削是对被剥削者劳动的攫取，如果没有相应的劳动者，控制生产资料并不能达到剥削的目的。因此，要使依据生产资料便可实现剥削的社会经济关系得以确立，首先必须使劳动力相对自由化，也即解除农民身上所背负的人身控制关系，而这一点，在宋代得到了实现。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曰：

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主。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宋会要辑稿·食货·农田杂录》。）

这里对比排列出旧新两种条例，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解脱过程。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诏令也规定：

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随契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佃耕。如违，许越诉，比附‘因有利债负虚立人力顾契敕’科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

阶级关系有了这样的变化，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了较少人身依附的经济关系，较自由的租佃关系逐渐形成。在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较充分的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终于形成，并奠定了此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基本格局。宋代土地所有制大致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以

下有关宋代土地关系特点的叙述许多内容依据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第三章《宋代的土地占有制度》,非直接引文不再一一注出。)

1 . 土地私有制大发展。

其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土地买卖盛行,例如宋高宗时,四川立限令典卖田宅者纳税印契,一次就征收到契税四百万贯,此时四川地价每亩为近四贯,官府卖田定价为八贯到十贯,如果依一般情况下税率 10 % 计,土地价格取较高者每亩十贯,则四川此次纳税印契的田地共有四百万亩,足见土地买卖之盛行。二是土地兼并大发展,由于“不抑兼并”政策的实施,大地主迅速发展起来,如官僚地主朱 被籍没,仅浙西田数达三十万亩;又如世俗地主,“有张拐腿者,淮东土豪也,其家收谷七十万斛。”(《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八《陈子长筑绍熙堰》)。三是私田数量大大超过官田,如神宗熙宁七年(公元 1074 年),全国垦田四百四十五万余顷,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仅占十分之一,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四是出现了明确为土地兼并辩护的言论,如苏辙说:“城廓之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廓者,与在官府无异也。”(苏辙:《栾城集》卷三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2 . 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

由于土地买卖盛行,“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宋会要辑稿·食货·营田杂录》),从而带来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使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经济地位经常变动,这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现象。“千年田换八百主”(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三《最高楼》),“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富室置产当存仁心》),“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取士》),等等。宋人的这些言论,突出表现了宋代土地关系的这一特点。

3 . 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与土地经营的日趋分散。

土地自由买卖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权呈现强烈集中趋势,但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来越细小和分散,如宋理宗时,吏人张洪在平江府有田一百五十六亩,分散为三十八段,

佃户共二十五家；淳祐三年，常州无锡县学添置“养士田”近一百段，客户五十余家，但每段土地多者七八亩，少者仅一角、二角几十步（《江苏金石志》卷一七。）。

4．官田的私田化

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形式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国家利益即税收的实现以财产为基本依据，宋代的官田也逐渐向私田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官田转变为私田，或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售田变为私田，或是通过赏赐官僚地产而变为私田。一是国家采用与地主相同的地租剥削方式来经营官田，如宋高宗曾说：“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三。）又如太宗年间大臣陈鼎上言曰：“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这里无论观念还是剥削方式与数额，都与民间地主无异。

四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经济意义

从唐两税法开始，到宋代完成的经济关系、土地制度变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变革，那么，这次变革的经济含义究竟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它可以归结为两个分离，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国家同社会经济活动的分离，而这两个分离在新社会历史条件下，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表现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劳动者人身的解放。

从战国直到唐代，剥削都是以人身控制为首要的或主要的条件，无论是地主的剥削，还是国家的剥削。控制的形式形形色色，但其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即劳动者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捆绑到了一起。对于国家剥削来说，各种各样的国家授田把受田农民与所受土地紧紧地绑在一起。对于地主剥削来说，极为强烈的超经济强制、人身依附关系，各种各样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本前提的地主庄园，把地主所控制的农民与地主的土地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种状况到宋代终于被打破了，新型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形成，以土地为剥削之基本依据、以劳动者人身相对自由为基本前提的租佃关系得到了充分发展。与土地所有权集中同时发生的土地经营越来越分散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变革过程。这一变革对改善农民状况、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相当的作用。仅有土地，并不能保证剥削的实现，因此，在地主阶级成员中，始终存在着争夺劳动力的斗争，这就迫使他们以各种经济手段控制农民，高利贷是其中之一，但这种手段的作用极为有限，地主必须时时“抚存”客户，否则客户会转佃他人之田，使自己的剥削不能实现。如苏轼说：“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然至水旱之岁，必须放免欠负、借贷种粮者，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倍于今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一。）王岩叟亦言：“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三九七。)当然，有宋一朝，宋以后各朝，有的地区，有些时期，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仍然较强，甚至有进一步加强的现象，但这都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并没有影响劳动者人身控制关系减轻的基本趋势。

2．推动社会积累与土地开发。

随着土地成为获得剩余价值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直接依据，土地的边际效用价值急剧提高，这就推动、迫使地主将剥削所得积累下来，去开发新的土地，改善土地经营，从而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开发新土地之广泛，土地种类之多，为前代所未见，仅从田土名称即可看出，如“圩田”、“山田”、“淤田”、“湖田”、“沙田”、“架田”等等。宋代的水利建设也与以前大不一样，局部地区性水利建设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其中基本或主要部分当出自地主），例如神宗熙宁三年至九年共七年时间内，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 1 0 7 9 3 处，受惠耕地达 3 6 1 1 7 8 顷，可谓空前未有。土地经营也开始向着多种方向发展，开始形成了一些充分利用有利自然条件的经济作物区，如太湖洞庭山之专种柑桔，福州、六化军之广种荔枝等等。也出现了专营某种经济作物种植的地主，如四川有专门的“茶园人户”，其岁出茶叶可达三五万斤，在明州、福州、广州等地有专门种植甘蔗制糖的“糖霜户”等等。随着土地经营的改善，土地投入工本的增多，精耕细作的发展，单产明显提高，如苏州亩产谷四至六石，两浙上田亩收谷五六石，明州民田亩产谷六七石。

3．迫使地主阶级不断进行自我更新。

由于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不再以直接的赤裸裸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土地开始成为这种社会关系的表现物，剥削关系被掩盖于土地的自然属性之下，仿佛地租是土地本来就具有的属性。随着这种变化，地主阶级职能的主要体现者，已不再是具体的某一地主，而是抽象为土地这一自然物。这样，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的经济地位，就不再由其出身来决定，而取决于他在土地上的经营，如果经营有方，勤于积累，他就有可能保持以至扩大土地，继续保持地主地位，如果不善经营，且淫佚奢侈，他就必然丧失土地，失去地主身份。脱离生产、腐败堕落是地主阶级的本性，然而这一机制就使其可以不断清除其中丧失活力的成员，不断补

充进新生力量。这种现象在宋人言论中多有表述，如吕皓曰：“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吕皓：《云谿稿·上邱宪宗卿书》），张载说：“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黄震曰：“财货不过外物，贫富久必易位”（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朱熹弟子刘燾还把富贵者之财宝田宅很少再传、三传的现象称为“盈虚相代”，是“天之道也”（刘燾：《云庄集》卷四。）。地主阶级的自我更新，当然有利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4．使社会经济有条件自我调节。

宋代以前，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强力干预，大部分时期这种干预对社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国家经济政策毕竟是人为规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其中错误部分在所难免，再加上官僚的腐败，执行政策的偏差，这些时候便会给社会经济发展以巨大阻力。宋代国家在保证农民有可以迁徙、可以选择剥削者权力的前提下，只问赋税收入，不管其余，就使社会经济活动有条件在运动过程中自我调节，自己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选择到比较合理的发展路径。例如，国家除了维护自由租佃关系的存在，并不干预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这一关系在租佃过程中自然达到相对平衡。地主利用农民之间矛盾，用增租划佃方式试图增加地租，而农民则利用地主之间矛盾，用转佃他人之田的方式来达到降低地租的目的，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地租剥削率自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从唐两税法开始到宋代完成的经济结构与土地关系的变革，终于最后结束了春秋战国变革所确立的基本格局，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关于两周经济关系和土地制度的讨论，至此也终于可以划一个句号。

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

[捷]奥塔·锡克《经济 - 利益 - 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苏] . . . 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王炳文、贾泽林译，三联书店，1980年。

[法]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78年。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文史哲》杂志编委会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中华书局，1957年。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

62年。

吴泽主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三联书店，1994年。

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张广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马非伯《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2年。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

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

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

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吴慧《井田制考索》，农业出版社，1985年。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

形式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

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锄研究室编著《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

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编《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

周法高《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

[日]白川静《金文通释》，白鹤美术馆，1962~1984年。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9年。

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

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童恩正译，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

后记

这本书是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本，但也是近二十年来研究先秦土地制度的所得汇集，心血所在，敝帚自珍，笔者是很疼惜他的。

先秦土地制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被史学家们研究得相当充分的一个领域，不少人认为，这个领域不再有什么大的可研究余地，也很难获得重要成果。笔者斗胆进入这一领域，除了个人兴趣而外，一方面是遇上了好时机。近二十多年的考古新发现提供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新资料，其中一些资料直接推翻了成说，为笔者的思考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文革”之后的思想解放使理论研究有了一个宽松科学的环境，获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这些则为笔者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全新的基点。上述两个前提促使笔者从新的视角和前提出发，对先秦土地制度史研究中一切以前认为不存在问题的定论或没有研究余地的领域重新进行研究。

促使笔者进行研究和写作的另一原因，则是前辈的引导和鼓励，笔者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笔者永远忘不了恩师王玉哲先生给笔者上的第一课。关于笔者的学位论文，他明确指出，一定要把写论文与写书区分开来，论文一定要有新东西，要敢于写出自己的新见解，不成熟、不完善都不要紧，可以慢慢修改完善。在王先生的引导和鼓励下，笔者着手进行这篇论文的写作。在论文的审阅过程中，王先生对其中引用的资料和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了严格审查，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但涉及观点方面，却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一些观点王先生不同意，但他只是与笔者进行讨论，不要求一定按先生的观点进行修改，而且一再鼓励笔者，只要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就要敢于坚持，不要轻易改变。没有王先生的指导、修改、宽容和鼓励，本书是不可能形成的。王先生高尚的道德修养、雄厚的长者风度、大度的宽容精神，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笔者在求学中获得的最大财富，笔者将努力学习，身体力行，

使之发扬光大。

本书能够写成，恩师赵俪生先生的引导和鼓励起了极大作用。大学时代，有幸系统听过赵先生“中国土地制度史”课程，这门课是研究生课程，但我们被准许同时听讲。赵先生精辟透彻的讲述，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笔者下决心就其中比较重要的先秦土地制度进行研究。1982年大学毕业，笔者有幸留校作为赵先生的助手，自此而后，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导，而笔者也是明里暗中，学习琢磨，自以为得到不少“秘诀”。在这些“秘诀”中，笔者以为比较重要的，就是以理性思维来驾驭、统率史学研究，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角进行探索。由于笔者哲学兴趣比较浓厚，学起先生这一“秘诀”，自觉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再加上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笔者逐渐形成了本书所陈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论证。没有赵先生的引导和教育，本书也是不可能形成的。

本书能够写成并得以出版，也要感谢恩师詹子庆先生。1984~1985年，笔者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助教进修班进修，詹先生既是指导老师，也是班主任，他对笔者的学术发展予以了很大关心。有关本书研究内容的第一次报告，就是由詹先生组织和主持，笔者在进修班上关于战国授田制特征的报告。此后，先生对笔者的科研活动予以了很大关注和支持，使笔者开始有条件在一些新的领域展开科研。先生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主动向笔者提出联系解决此书的出版问题。没有詹先生的大力支持，本书也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包瑞峰先生为本书出版，多方操劳，焚膏继晷，付出了很多心血，笔者在这里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为书生，出本书、而且还是学术方面的书，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仅止于此，如果不能对学术有所贡献，有所推动，实在也没有太大意思。如果仅仅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那就更没有意思。笔者自以为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推翻了一些成说，并试图对先秦土地制度及相关问题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解，这些东西是否正确，尚有待进一步讨论研究。笔者恳切希望一切对本书涉及问题有兴趣的同道，对本书进行严厉的批评，以期在讨论中推动先秦土地制度研究的发展，这是笔者看到校样后所最先想到的。希望读者能恩赐批评，这

是笔者对自己劳动所想得到的最好回报。
是为后记。

袁林于古城西安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日